

# 目 录

## 第一部分 回忆录、访问记和传略

- 黄炎培的一生.....黄大能( 1 )  
从追求维新到热爱社会主义  
——记爱国老人陈叔通.....寿墨卿( 11 )  
不老斋中胡厥老.....胡尚建( 18 )  
光辉的胜利 莫大的光荣.....胡子昂( 26 )  
一次深刻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孙晓村( 32 )  
  
学习、学习、再学习.....万国权( 36 )  
峰回路转万象新.....刘念智( 39 )  
宝元通转向国营的经过.....黄凉尘 樊陶斋( 45 )  
  
老企业家的新天地  
——访荣毅仁和他领导的中国  
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计泓 林 晰( 52 )  
我成了国家的主人.....经叔平( 57 )  
百万富翁为什么会走社会主义道路  
——猪鬃大王古耕虞传略.....王慧章( 60 )  
我是怎样走上社会主义大道的.....吴羹梅( 71 )  
奔向新中国  
——记爱国银行家资耀华解放前夕  
由美归来.....力伯雄( 78 )  
我象一滴水.....柏 岳( 83 )

DI24/09

## 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

——实业家刘鸿生逝世半个月前

- 对新闻记者的谈话……………杨友(86)  
“味精大王”吴蕴初的心愿……………斯寄(98)  
盛世如花，前程似锦……………刘靖基(103)  
回忆企业公私合营前后……………陈铭珊(107)  
提倡国货，反抗日本侵略

——记爱国企业家王性尧……………寿墨卿 魏吉甫(111)

- 曲曲折折 走向光明……………汤蒂因(116)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银行家徐国懋……………吾新民(125)  
加强海外亲友联系，尽心竭力为“四化”……………荣漱仁(130)  
三十二年来的经历……………杨少振(134)  
爱国之心象冶铁炉一样熊熊燃烧……………严开镐(144)  
从“敲门”到“升堂入室”……………张善章(149)

- 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周叔弼(154)  
在接受改造中发挥自己的才能……………黄兆贵(157)  
银发童心办“兰园”……………戴翩英(166)

- 我们的最大心愿……………浦洁修 孙孚凌(169)  
挣脱羁绊的骏马

——记同仁堂药店经理乐松生……………何婉言(171)

献给新中国的一份薄礼

——记陈荫棠解放初期的一段往事……………寿乐英(174)

- 爱国实业家刘国钧……………江苏省民建、工商联(177)  
难忘的话语……………陈邃衡(183)  
改造了企业，也改造了人……………吴春达(186)  
有比较才有鉴别……………吴慎裕(188)

经历三次考验，走上新的征途·····	谈家骏(191)
没有人民的政权，“实业救国”只是空谈·····	周志俊(195)
要以实际行动热爱祖国·····	荣广宏(198)
我转变的开始·····	胡庆照(200)
一轮皓月当空·····	沈翰卿(202)
共产党的政策暖人心·····	卢广绩(205)
为兴办集体企业安置青年就业贡献力量·····	成盛三(207)
我做对了·····	郭守昌(211)
从太原铁工业的历史联想到的·····	贾泽卿(214)
从新乡看祖国·····	柴玉德(216)
他衷心最感愉快的一件大事	
——记爱国企业家李国伟·····	林涤非(219)
一个回族企业家的历程·····	斯  寄(223)
热爱祖国支持革命的湖北金融家周苍柏·····	林涤非(227)
感受最深的一件事·····	冯锦卿(230)
回忆与对比·····	彭六安(232)
第二笔财富·····	陈芸田(235)
岁月匆匆六十年，半生碌碌半生甜·····	朱永濂(237)
处处以诚相见·····	熊应栋(244)
八九述怀·····	傅道伸(246)
千金难买阶级变·····	严树棠(249)
愿以有生之年，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韩铁城(252)
愿做新愚公，开拓青海省	
——访青海省工商联主委廖霭庭·····	克  刚(254)
雄心尚在·····	童少生(256)

两代人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薛云麟(259)
从老板娘到女技工·····	何玉兴(262)
海纳百川，不弃细流	
——访贵州省工商联主委毛铁桥·····	唐慧敏(266)
党恩似海·····	冯程南(270)
我怎样从一个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	
劳动者·····	庄启发(273)
为振兴中华贡献我们的聪明才智·····	郭棣活(280)
走在宽广的社会主义大道上·····	卢燕南(282)
新旧对比，社会主义就是好·····	林杏雨(284)
<b>第二部分 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事记</b>	
(1949——1980)	

# 黄炎培\*的一生

黄大能

吾父黄炎培，字任之（1878—1965），曾因在乡间办学校，反对科举，反对封建，几被清廷所杀，亡命日本。1905年他加入刚成立的同盟会，投入了辛亥革命，接着又参加了倒袁运动。他一生从事职业教育事业和爱国民主活动，在中间路线几经碰壁后，终于认清了只有全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挽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他投身解放区，参加新政协，晚年做了多年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官和人民的代表。

## 毕生从事职业教育事业

吾父任江苏省教育会常任调查干事时，以上海《申报》旅行记者身份走遍皖、赣、浙、鲁、冀诸省进行考察，目睹了中国普遍存在的教育与生活，教育与劳动严重脱节的状况，“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毒素蔓延着。1915年吾父参加游美实业团，担任编辑报道，旅美三月。对比之下，他认为“观其职业教育之成绩，益觉我国教育之亟宜改革”。于是他在江苏省教育会内附设职业教育研究会，提出沟通教育与职业的主张。不久，他赴菲律宾考察，设法赢得许多华侨的拥护。1917年在吾父的努力下，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了。当时南北前辈名流蔡元培、蒋梦麟、马良、严修、伍

---

\* 黄炎培，曾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廷芳、张元济、郭秉文、聂云台、宋汉章、穆藕初等，还有许多教育和实业界人士，在成立的宣言书上签了名。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受到各方重视。海外有南洋华侨（特别是陈嘉庚先生），国内有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纺织界巨子聂云台、徐静仁、穆恕再、穆藕初、刘柏生等）慷慨捐赠，经费不虞匮乏。因此，早在1922年就在北京政府的新学制中确立了相当于初中和高中的职业教育地位。当时职业教育已成为一时风尚。

中华职业教育社从创办到1949年全国解放为止的32年中，除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先后培育了7000余名毕业生外，还办有重庆中华职业学校、上海和重庆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南京女子职业传习所、镇江女子职业学校、四川灌县都江实用职业学校、昆明中华业余中学、上海比乐中学，并在上海办过七个职业补习学校，还联合地方实业界人士创办了各类职业学校。为了指导青年就学和介绍就业，1934年起，职教社在上海创办了一个职业指导所，此后在重庆、桂林、昆明等地也相继建立。1926年职教社在昆山徐公桥成立乡村改进实验区，进行文化教育工作。“八·一三”以后，职教社在川、滇成立分社或办事处，都设有学校或工厂。中华职业教育社先后出版有120多种书刊，其中《教育与职业》期刊连续出版30多年之久。邹韬奋同志主编的《生活周刊》也曾是职教社所办的刊物。以后还出版过《国讯》、《展望》等进步期刊。

1924年吾父另又创设了一个专门搜集、整理、分类、保管政治、经济、文化、学术资料的组织。因创设之年岁次甲子，故称“甲子社”，1931年改称“人文社”。在筹措经费中，得叶鸿英先生1932年慨捐50万元，于是改名“鸿英图书馆”。这个组织1930年起出版《人文月刊》，前后8年，共出80册。到1935年止，该社藏书64802册，图表219幅，报纸49种，选辑各种史料达100多万件，杂志日报的要目索引达15万多片。

吾父提倡职业教育中曾屡遭国民党政府的打击。1927年北伐

军到上海，江苏省教育会被封闭，财产被清算没收，职教社和中华职业学校都被暴徒捣乱。然而当时职教社已誉满中外，国民党虽然忌恨，也无可奈何。职教社在这内忧外患的恶劣环境中，渡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始终不曾停止活动。

1957年，在北京举行立社40周年纪念会，敬爱的周总理参加了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

### 参加辛亥革命

吾父生于上海浦东川沙县，虽曾乡试中举，却决计从事新文化教育。他先在上海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前身）特班就学，在老师蔡元培的影响下，增强了办学校以唤醒民众扫除愚盲的决心。1903年吾父和几个朋友一起在川沙县办小学堂，标榜反对封建统治，用新教育救中国。正课以外，到处请人演说，宣传清廷腐败。经人告密，被逮捕，两江制府令就地正法。幸得美牧师营救得脱，亡命日本。

吾父亡命日本一年归来，又在乡间办起了学校。其中著名的是上海浦东中学，它是由建筑工人起家的杨斯盛先生毁家兴学，先后捐银24万两所创建的。

1905年7月，吾父应蔡元培老师之招到蔡家。蔡告以“现在爱国志士集中于中国革命同盟会。你愿意加入否？”父答：“刀下余生，只求于国有益，一切唯师命。”于是成为中国革命同盟会会员。以后吾父接蔡任同盟会上海干事，保管党员名册，曾招待过路的革命领袖廖仲恺等。辛亥革命以后，孙先生卸脱政权在沪闭门写《孙文学说》之时，忽招吾父畅谈“知难行易”的道理。当时宋庆龄先生亦在座，并共餐。

辛亥革命前夕，吾父受江苏苏南各县公推，到苏州劝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江苏和平光复后，程德全为江苏都督。吾父在都督府负责教育科的两年内，曾创建、改建及扩建了省立24所高等和中等学校以及大量县立小学。当时南京东南大学（后改中央大

学)、暨南大学(后吸收侨资,迁沪,今在穗)、河海工程学校、江苏蚕桑学校等都是该一时期先后成立的。吾父这些活动也为以后办职业教育打下了基础。

### 从“九·一八”“一·二八”到“八·一三”

“九·一八”东北沦亡,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学生救亡运动席卷全国。当时我在中华职业学校求学,办墙报、演话剧、沿街募捐支援东北义勇军,常常深夜回家。吾父平时家教极严,子女晚归常遭训斥,而这一时期一反常规,竟然慙勉有加。特别不能忘记的是在“一·二八”淞沪战役中,为了支援十九路军抗日,我们全家男女老少在父亲带领下曾连续几个晚上做丝棉背心送往前线。此时吾父已发起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后改称上海市地方协会)与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和以后的第五军张治中将军等取得联系,宣传动员上海市民供应军需物资、筹募捐款。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上海地方协会在战区救济、救护、推动民族工业内迁,以及慰劳、募捐等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还有一件难以忘怀的事是,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我在复旦大学参加上海各大学学生组成的赴南京请愿团,要求蒋政权出兵抗日。学生队伍冲破军警层层阻拦到达北火车站,与军警僵持。当晚吾父竟和吾母深夜亲来车站慰问。月色朦胧,站台上,父母对我谆谆嘱咐。吾父在我耳边低声说:“胆要大而心要细,要勇敢而有策略。”

### 延安归来

1945年6月,吾父在重庆任国民参政员期间,曾与褚辅成一起推动几位参政员联名致电延安党中央毛主席。6月22日得回电,欢迎他们访问延安商谈国事。于是吾父偕同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从重庆飞往延安,从7月1日至5日在延



安访问了5天。这短短的5天，却成为吾父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当时抗战已入末期，胜利在望。国共合作，由于蒋政权的种种破坏，几濒破裂，常驻重庆的周恩来同志也已回到延安。吾父只是抱着促进国共恢复商谈，召开国大，实施宪政的心愿而去，却从解放区铁一般的事实中认识了真理。

蒋政权在大后方曾制造大量诽谤解放区的谣言。吾父一回重庆，在极短时间内写成《延安归来》一书，用日记方式详细记载了亲眼目睹的中国共产党施政政策和解放区的成就，给各种荒唐谣言以当头一棒。这本薄薄74页的小册子，在当时的大后方和港、沪敌占区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后来上海沦陷区翻印，前后共达十几万册。这不能不触怒国民党，造成以后特务在重庆张家花园普同吾父居处抄家搜查的暴行。

延安访问时间虽短，吾父却认识了大部分共产党中央领导同志和高级将领，与毛泽东主席多次促膝长谈。这里有两段从《延安归来》中摘录的文字，反映了吾父在延安的见闻和当时的政治态度。

吾父曾在延安欢迎大会上发言：

……第二目的想来看看延安。我们来到这里，还只有一天半，当然不够资格说什么话，不过就我所看到的，没有一寸上是荒着的，也没有一个人好象在闲荡。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象都负责的，这句话做到，在政治上更没有其他问题了……

另有与毛主席问答的一段：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

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溘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

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息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以上这段对话，即使从目前政治形势看来，也还是值得回味和警惕的。

早在1939年11月，吾父与张澜、沈钧儒、梁漱溟等人在重庆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参加的有国共以外的三党三派负责人，职教社是其中的一派。1941年3月，“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又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在民盟早期历史上，由于成员十分复杂，在国共两党间实际上走的是中间偏右路线。成员中如张君勱的国社党，左舜生的青年党最后都投降了蒋介石。吾父1945年7月延安归来，模糊思想逐渐澄清，乃于同年12月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杨卫玉等联合以工商界人士为主另外成立了“民主建国会”。以后的行动，虽仍

没有离开中间路线，想在国共之间做调人，达到和平、团结、民主、建国的目的，但立场有所转变。在一次又一次的事实教育面前，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正确的道路。

### “与官不做，遇事生风”

我自幼就多次听说，民国初年，袁世凯和以后的北洋政府曾两次邀吾父去北京任教育总长，吾父都坚辞不就。袁世凯曾无可奈何地给了他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这八个字也适用在吾父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上。

1927年蒋介石一登台，先是通缉吾父，称吾父为“学阀”，逼吾父又一次出亡。年后悄悄回来，卖文为生，闭门读书三年。以后，蒋的态度忽变，改迫害为拉拢，前后有过多次数，或封官许愿，许以特权，或提携后代，予以优待，都被吾父一一婉拒。值得一提的是1946~1947年间蒋介石对他最后的拉拢。

抗战胜利以后，吾父为民盟代表之一，与其他民主人士一起作为第三方面在国共间调停。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有各方代表参加的政协所通过的和平建国等五项政治决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与此同时，在蒋管区加强了特务恐怖活动。1946年6月，南京下关上海呼吁和平代表被殴在先，7月，昆明李公朴、闻一多被害在后，形势十分紧张。蒋介石威胁利诱，一再通过他人企图拉吾父“下海”。先是有人来拉吾父参加政府。吾父当即答复：第一，必须实施宪政；第二，要国共合作；第三，要多党多派共同参加，以构成一个统一的政府，若只凭几个人来做是无用的。后来，又有人来要挟他参加伪国大，脱离民盟。吾父曾坚决表示：（1）不能同意于不统一、不团结之下通过宪法，此是不通之路；（2）我不能与人共走不通之路；（3）欲我脱离民盟，不能再毁人格。为了表明心迹，曾在上海赴南京请愿代表聚会上出示题为《吾心》的近作七律一首：

老叩吾心矩或违，十年回首只无衣。

立身不管人推挽，铄口宁愁众是非。

渊静被驱鱼忍逝，巢空犹恋燕知归。

谁仁谁暴终须问，那许西山托采薇。

1947年国共和谈全面破裂。3月7日，中共代表被迫从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撤退。3月18日，蒋介石入侵延安，得意忘形，执意单独召开伪国大。这时，青年、民社两党已投降蒋介石，全国大捕民盟盟员。10月7日，民盟中央常委、西北总支部主任杜斌丞被害于西安。10月26日，蒋政权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开始了更大规模的逮捕。11月初，吾父在沪奉民盟中央之派与叶笃义同志到南京和国民党当局交涉。交涉过程中，吾父寄其心情于《玄武湖秋感三绝》中：

黄花心事有谁知，傲尽风霜两鬓丝。

争羨湖园秋色好，万千凉叶正辞枝。

红黄设色补寒苔，点缀秋光枉费才。

毕竟冰霜谁耐得，青松园角后凋材。

那有秋纨怨弃遗，金风尽尔鼓寒漪。

谁从草际怜生意，百万虫儿绝命时。

返沪后，民盟总部在沪领导成员决议，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总部领导总辞职，总部即日解散。此后，部分民盟领导转移香港，盟务活动则全部转入地下。吾父受到特务严密监视。1949年2月14日，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协助下，终于摆脱了特务尾随，搭船潜离上海，经香港、天津，于3月25日到达北平，参加建国大业。我的二哥、民盟兼民建成员黄竞武在上海解放前夕被蒋介石逮捕惨杀，血的教训更教育了我的父亲。

### 做人民的官

我们做子女的，从小都有一个深刻印象：父亲一向拒绝做

官。然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在大连工作时，从报上竟然看到吾父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的职务，异常纳闷。1950年到北京公干，一见吾父，我就问：“一生拒不做官，恁地年过七十而做起官来了？”父亲于是详告了周恩来总理动员他的经过，最后父亲严肃地说：“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呵！”

确实，父亲做的是人民的官。在领导轻工业部工作中，事无巨细，躬亲过问。70余岁高龄，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整顿了许多国民党遗留下的工矿企业，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然而，父亲较大的贡献还在于，通过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活动，团结广大工商业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件事是1952年在“五反”运动后，工商界普遍存在着恐慌心理，甚至抱着吃光花光的消极态度。吾父及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于3月15日对吾父的谈话中对工商界工作有三点重要指示：（1）私人资本在中国建设上是有贡献的，只要不让它向坏的方面发展；（2）不能让资本家光是图私人的利，必须兼顾国家的利、工人的利；（3）很好地团结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先学习并实行《共同纲领》。根据毛主席以上指示，吾父做了广泛的传达和宣传，收到了积极效果。

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工商业者会员，在引导和带动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挥了积极的、骨干的作用。1956年，继农业合作化高潮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很快出现了高潮，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这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

继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国民主建国会明确了全会的中心任务：“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当然也是吾父当时的行动准则。

吾父教育我做一个人正直的、勤恳的人。我从学生时代起就树

立起爱国主义思想，走上社会后便开始参加民主革命，以及全国解放后我之所以能紧跟共产党献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和我父的谆谆教诲分不开。父亲在我走上社会前给我的座右铭，今天看来仍有意义，我确也得益匪浅。兹抄录如下：

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  
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  
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

1981年第一稿  
1985年12月修改

# 从追求维新到热爱社会主义

——记爱国老人陈叔通\*

寿 墨 卿

陈叔通老人原名敬第，辛亥后以字行。1876年8月7日（清光绪二年丙子六月十八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府仁和县（今杭州市）的封建世家。

叔老幼承家学，在古文诗词上用过功夫，早年就立志功名，26岁（光绪二十八年）考中举人，次年中进士，接着朝考中式，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升任编修。

## 反对袁世凯帝制

在辛亥革命以前，叔老同情维新运动，与维新党人梁启超有深厚的交谊。民国成立，他由浙江省推选为第一届国会议员。当时国内政党林立，叔老也热中政党活动，他与黎元洪、梁启超、汤化龙等组成了进步党。

袁世凯利用进步党力量以抵制国民党，并蓄意实行独裁。在登上大总统宝座之后不久，他即下令解散国会。

当时叔老发觉袁氏怀有称帝野心，曾与梁启超数度密商对策。1915年1月，袁氏复辟野心日益暴露，梁即移家避居天津。

---

\* 陈叔通，建国前曾任商务印书馆董事、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建国后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梁、陈等在天津梁宅开始进行频繁的倒袁密议。“筹安会”成立后，叔老离京南下，在上海马霍路（现黄陂北路）福德里租赁房子作为反袁的秘密联络点。

1915年12月，蔡锷在云南吹响了讨袁号角，但西南各省军政要人大多迟疑观望。当时督办江苏军务冯国璋是一位关键性人物，他的秘书长胡嗣瑗是叔老的同科翰林，彼此交谊颇深。叔老与黄群商量后，由黄赴南京劝冯国璋内应，并从胡嗣瑗那里借得“华密”官电本，通电西南各省讨袁。各省要人如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等收到“华密”电后，都以为冯国璋已内应，因而先后响应起义。

袁世凯于1916年（民国5年）元旦登上帝位，改元“洪宪”，但只做了83天的皇帝梦，便被迫于3月22日下令撤销帝制，延至6月5日忧急身死。失败如此之速，与“华密”电不无关系。

### 灰心政治，弃政从商

民国成立后，叔老到北京做国会议员，还担任了《北京日报》经理职务。他对民国前途抱有极大希望，因而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不料袁氏窃位，国会解散，南北分裂。莽莽神州，漫漫长夜，看不见曙光。岁月蹉跎，两鬓渐斑，回想辛亥以后这几年的政治生涯，他产生了“积悔”心情。正在歧途彷徨的时候，上海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菊生来电相邀。他考虑到在袁氏压迫下，《北京日报》是办不下去了，于是辞职南下，进商务印书馆工作。弃政从商，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

商务印书馆是我国最大的一家出版商，设有编辑、印刷、发行三所。叔老进馆以后，发现三所各自为政，缺乏联系。在他的建议下，在三所之上设立了统一管理机构，定名为总务处，由他负责主持。他任事以后，逐步建立起各种规章制度和工作规程，从而密切了各所、各科室之间的联系，促进了该馆出版事业的发展。



当时该馆总经理为高翰卿，经理为张菊生。两人在方针政策  
的决定上，经常发生意见分歧，甚至闹到破裂的地步。叔老斡旋  
其间，起到了排难解纷的作用。因此该馆负责人都尊重叔老，请  
他担任了该馆董事，还一度担任过董事长。

叔老于1920年底离开商务印书馆，应上海金融业巨头叶揆初  
的邀请，担任浙江兴业银行驻行常务董事。他处事谨慎，洁己奉  
公，从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个人谋私利，因而成为卓有声誉的  
金融家。

### 日寇侵略，痛感河山破碎

叔老弃政从商以后，拒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一切邀  
请，立志不再做官，并把他的书斋题名为“有所不为斋”。

叔老喜欢梅花。他说：“梅花品格最高，能耐寒，有骨气。”他  
曾把他的书斋改名为“百梅书屋”，并搜求得名人画梅真迹百幅，  
每当寒冬来临、梅花含苞待放之时，他就把书斋布置成为梅室。  
双罍插梅，四壁张画，邀上三五知心友人赏梅赋诗。一时忘却了  
室外的“兵氛”世界。

但是在内忧外患交迫的岁月里，他实在不能忘怀国家安危和  
民生疾苦。他在蜀游时曾赋诗《杜公祠》：“一掬忧时泪，西来谒  
杜祠。不堪风雨叹，终与日星垂。丧乱谈天宝，飘零老拾遗。两  
贤心迹似，异代有同悲。”“异代同悲”是他内心的真正痛苦。

“九·一八”、“七·七”、“一·二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  
的抗日怒潮，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叔老多次斥责国民党  
对外不抵抗，对内却自相残杀的荒谬行径。

1937年冬，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都武汉。1938年武汉告  
急，又迁都重庆。12月，汪精卫从重庆逃到河内，公开投降日  
本。叔老以“太息咨嗟吾老矣，独立苍茫自咏诗”的悲凉心情，  
写下了长诗《卢沟桥行》，发出了“一误再误唯尔辜，尔辜尔辜万  
夫指”的严厉指责。

1939年，叔老移居吉羊村，居处狭隘，以迟暮之年，遭受亡国之痛，形神沮丧，如同丧家之狗。但他抱着沉痛心情，磨砺意志，以保持晚节自誓。当时敌伪一再诱人邀他出来担任伪职，他杜门谢客，坚决拒绝。

1943年，敌我形势有了改观，叔老以为抗战胜利已经在握。尽管当时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措施，但叔老希望他采纳“狂夫之言”，认为国共合作是打败日寇的最重要条件。

### 抗战胜利，投身民主运动

1945年8月10日夜，上海传来日寇乞降喜讯。八载困顿，一旦复苏，七旬老人，喜而不寐。他在枕上写下了七律一首，其中有句云：“明知后事纷难说，纵带惭颜喜欲狂。”

胜利以后，最使叔老愤怒的是，在经受了八年抗战的艰苦生活之后，全国人民正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却把全面内战的灾难强加在全国人民的头上。不甘“忍视神州随劫尽”的70老人，抑止不住愤怒的心情，终于拍案而起，积极投身于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洪流中去了。

他参加了上海市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又参加了上海大滬别墅包达三家中的星期二聚餐会，同马叙伦、周建人、马寅初等民主人士和地下党员交流情况、研究形势、交换意见，开展反蒋爱国民主斗争。1947年5月底，上海警备司令部捏造“共产党阴谋嫌疑分子”的罪名，肆意逮捕大批爱国学生。叔老义愤填膺，立即联合上海知名老人张菊生、唐蔚芝、李拔可、叶揆初、张国淦、胡藻青、项兰生、钱自严、陈仲恕等共同具名分函吴国桢（上海市长）、宣铁吾（上海警备司令），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这就是当时社会上盛传的“十老上书”。经努力，被捕学生获得了释放。

1947年7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所谓“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接着又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加紧取缔民主运动。从此，

上海一部分革命同志和民主人士不得不转入地下或撤离上海。但叔老不愿撤离，仍留在上海，团结一部分进步人士继续进行反蒋斗争。对于个人安危处之泰然。

有一次，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托人转告他说：“我已两次救了你，把你的大名从共匪嫌疑分子名单上勾了去。今后你若再要活动，我就无能为力了！”叔老听后一笑置之，遂即托人转告陈布雷说：“你的好意，我感谢。我也劝你早日洗手，弃暗投明。”刚直不屈，不畏强暴，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在经济崩溃，军事节节失利的1948年七八月间，国民党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和谈攻势。接着，上海有一些人鼓吹“去草和谈”（即蒋介石下台，李宗仁上台），并策划“千人通电”，呼吁国共谈判。有人要求叔老在“千人通电”上签名，他严词拒绝。他对来人说，“此次是革命，且希望彻底革命”，不能中途妥协。他又说：“革命要流血，谁流血？无疑是友方（共产党）。我们要与友方配合。老实说，要得其同意，否则即是不予帮助，反而打击。”由于他表示了严正的立场，所谓“去草和谈”和“千人通电”的策划，也就未能实现。

叔老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协的“五一”号召，但主张召开日期必须与军事的进展相配合，不可过早。他认为，召开地点最好是在北平。他对于新政协的组织、程序、议题、组成成员以及新中国的经济政策、外交政策等等，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均用秘密通讯办法，寄给当时在香港的马叙伦老人转给共产党，得到共产党的重视。

1948年下半年，共产党邀请他进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他一再谦逊，认为自己没有多大用处，比他好的人多得很。他说：“人苦不自知，甚至妄自尊大。此次我们唯有‘惭愧’两字。良心驱使，不过尚有一种认识而已。”经过中共一再敦促，他于1949年1月初离开上海，于22日到达香港。2月27日，他与柳亚子、叶圣陶、郑振铎、马寅初、曹禺、王芸生等一起离港北

上，于3月18日到达北平。

### 紧跟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

叔老北上以后，受到毛主席等领导人的亲切会见，共商建国大事。不久，上海解放，他又回到上海向工商界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并发起成立上海工商界劳军分会，进行慰劳活动。1949年6月15日，他参加在北平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被推选为副主任。同年9月21日，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接着，他又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盛典。这位73岁的老人，欢欣鼓舞地高歌：“溯自解放更生日，始见辉煌革命天，大好前程能到眼，未来盛业共加肩。”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担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不辞以古稀之年远涉重洋，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和平理事會。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1951年10月，他受全国政协的委托，着手筹建工商界的全国性组织，于1952年6月成立了筹备委员会。一年以后，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他连续三届被推选为主任委员，肩负起引导全国工商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任务。

1955年10月，全国工商联举行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前夕，毛主席召开座谈会，教导工商界，只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有前途，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叔老及时地传达了毛主席的教导，并强调指出：“国家的前途就是我们个人的前途。我们的道路是光明的、是广阔的，工作是做不完的。每一个人只要他愿意贡献他的力量，为人民服务，都会有他发挥能力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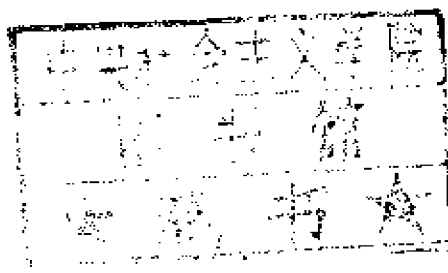
嗣后工商界掀起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掀起全国各行各业实现公私合营的高潮。叔老深有体会地说：“我们工商业者特别

感到庆幸的，也引为光荣的，是我们国家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根据我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改变了农民、手工业者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而且改变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为国家资本主义最高形式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并将进一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向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变，这在世界上早已出现过。但在说服教育的和平方法下，能够使工商业者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来接受改造，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

三年困难时期，有人动摇不安，丧失信心。他认为困难是暂时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他撰写了一副名联。上联是：“一心记住六亿人民”；下联是：“两眼看清九个指头。”在工商界中受到广泛传诵。

1966年2月17日，叔老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1985年



## 不老斋中胡厥老\*

胡尚建

胡厥文先生生于1895年，经历了在三座大山重压下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和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设四化的新中国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

### 实业救国，立志图强

胡厥文的青年时期正值祖国任人宰割之秋，他深感国弱民贫的苦处，立志走实业救国的道路。他认为，要振兴中华，富国强兵，首先要有工业，而机械工业乃工业之本。1914年他考入北京高等工业学校攻读机械，大学毕业后到汉阳铁工厂工作，甘愿放弃助理工程师待遇，下车间当工人，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以后的全面发展打下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战败，上海同济大学机械、电器、木工三个工场的三位德籍工程师返国，他经人推荐到那里担任工场主任。他不仅担当了三位外国专家的工作，而且干得十分出色，显示了管理企业的才能。

1922年，他创办并主持的新民机器厂投产。这家工厂从承接德大、厚生纱厂的纺纱机修理开始，逐步走上研制和仿制各种机器

---

\* 胡厥文，曾任新民机器厂总经理、上海机器业同业公会主席、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1938年曾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现任民建中央名誉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

设备，直到提供成套设备的道路。当时，大多数工厂用的机器都是外国货，很多人认为这些机器中国人不能制造。胡厥文则认为，外国人能办到的，中国人一定也能办到。他与工人师傅通力合作，苦心钻研，先后制造了当时国内没有生产过的彩色油墨机、大型立式锯木机等上百种机器设备。他与天厨味精厂经理吴蕴初是世交，该厂需要的各种机器均无图纸。新民厂根据样本上的照片，设想其内容，为该厂设计制造出了面筋机、蒸馏塔、调和机等。制造灯泡中钨丝的钨丝机精密度极高，外国人说中国不能制造，新民机器厂精心制造了8台，质量优良，价格却比外国货低许多。该厂工人师傅还用手工制出柴油机的油嘴、油泵，使外国工程师叹为观止。新民机器厂就是这样闯出了路子，赢得了声誉。

胡厥文还办过合作五金公司、长城砖瓦股份有限公司、黄渡电灯公司、大中机器厂等企业。他的实业救国志向和才能深获实业界推重。1927年起，胡厥文被推选为上海机器制造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

为了国家的富强，1932年夏，他与友人组织了西北实业考察团。经过实地考察，他深感大西北具有开采煤矿和种植棉花的优越条件。他怀着富国富民的激情，向当局写了开发西北工农业的建议，但最终却如石沉大海，无人过问。

### 外侮当前，先国后家

胡厥文不仅苦心经营着自己的企业，而且十分关心国家、民族的兴亡。1932年1月28日，日寇进兵淞沪，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他号召和组织同业，建起临时工场，制造手榴弹、迫击炮弹、水雷等支援前方。这期间，他日夜奔忙，忘记了个人的一切，甚至无暇理发剃须。朋友见他胡子长得太长提醒他时，他毅然说：“赶走倭寇再剃。”他的长髯一直留到14年后、日寇投降前夕，方始剃去，并作《薙髯乐》以明志。

1933年，面对日本棉纱倾销，国内小织布厂纷纷停业的情况，他不顾个人得失，征得史量才、穆藕初、黄炎培等社会贤达人士的赞助，向银行贷款组织棉布市场，集中纺纱，分散织布，生产自救。他还与同业公会商议，提出所有机器厂都不使用日铁作原料。一时间，在黄浦码头堆积了数千吨日铁而无人问津。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媚日，凡有抵制日货者，只要日人示意即有被捕之虞，同业中纷纷自危，因而停办。

抗战爆发后，为了保存民族工业的实力，支持抗战，他同颜耀秋、支秉渊等担任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负责人，动员和组织了100多家工厂内迁。为了解除各工厂的困难，他只身留在上海，到处奔走，接洽运费、办理运输等，顾不上照应家人逃难。他的先公后私精神受到同业的称赞。1944年，他担任了迁川工厂联合会的理事长。

当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战区人民流离失所之时，少数达官贵人却巧取豪夺，大发国难财，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这截然不同的鲜明对比，使他感到万分愤慨，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有了初步认识。1941年，在湖南祁阳建湘厂时，他把住宅定名为“耐村”，以示耐心等待抗战胜利之意。针对国民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口号，他还在路上用石子铺上“抗战必胜，建国在政”八个大字。

抗战胜利，迎来的是美国货如潮水般涌入。国民党挑起内战，货币贬值。百废待兴的民族工商业面临破产的境地。

### **认清方向，投身洪流**

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早在1932年参加西北实业考察团时，胡厥文就经历了一件难忘的事情。

旅途中，他们到达一处乡镇，老百姓见他们带着军队，纷纷逃避。后来他们想方设法找到了几位当地老人，款待酒饭，一起喝茶聊天，慢慢亲热起来。有位老人忽然问：“你们是不是红军？”



他告诉老人，他们既不是红军，也不是国民党官兵，都是些老百姓，随行的军队是杨虎城将军派的卫兵。老人摇摇头说：“你们一定是共产党红军，不然不会对我们老百姓这样好。”当时他想，要不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真的好，为什么老百姓对他们那样亲？从此，他暗暗对共产党留心观察。后来，读到了范长江写的《塞上行》等进步书籍，很受启发。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全国掀起抗日热潮。胡厥文支持曾在他工厂内任工务副主任的郑汉涛去陕北，在《赠别汉涛》一诗中写到：“世事乱如麻，西北生彩霞”。“心焉向往之，不惮阻且赊。壮哉誓茹苦，为国以忘家。”

抗战胜利前后，由于对国民党逐渐失去了信心，他在重庆经常同黄炎培、章乃器、施复亮、杨卫玉等人一起，研讨在工商界中建立政治团体的问题。这期间，他有机会接触了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同志。他们对国内外形势洞若观火的分析、忠贞谋国的远见卓识和平易近人的作风都使他十分钦佩。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主席亲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特园”初次见到毛主席时，他曾天真地问：“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互相协商解决，而要武装斗争呢？”毛主席讲解了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共产党的道理，使他茅塞顿开。

是年底，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他当选为常务理事之一，积极投身于民主运动的洪流。后来，蒋介石自食其言，发动内战，更增加了他对国民党的鄙视和憎恨，决心同共产党一起，走真正救国救民的道路。

在光明和黑暗进行最后决战的时刻，国民党当局在国统区变本加厉地镇压民主运动。一些民主党派不得不转入地下。为了掩护民主建国会继续活动，他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工业月刊社。上海解放前夕，民建的其他几位主要负责人分别去香港和解放区工作，他受组织委托一直坚守在上海，领导民建的地下工作，与各界人士一起迎来了上海的黎明。

## 自觉改造，一心跟党走

1949年9月，胡厥文作为中国民主建国会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参加了开国大典。此后，他率领上海工商界参观团赴华北、东北参观。

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他积极推动上海工商界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出力，带头认购胜利折实公债。他自己办的新民机器厂第一批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1957年，在庆祝全行业公私合营一周年之际，他作了《和平改造胜利歌》，表达了自我改造的决心。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鼓励次子参军，奔赴朝鲜战场，自己还担任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副团长，到朝鲜慰问中朝部队，受到了极大的教育。以后每年春节，他都把参加慰问解放军当作大事，并作《慰问战士歌》，以表敬仰之心。

通过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对比，他一心跟党走，对党的领袖满怀崇敬、爱戴的深情。1976年周总理、朱委员长、毛主席先后逝世，他十分悲恸，赋诗缅怀领袖的丰功伟绩，先后蓄起上下胡须以表怀念。他说：“到我实现四化时再剃髯庆祝领袖们的遗愿实现。”

党和国家对他也十分重视和信任。1953年，他当选为民建上海市副主任委员。1957年6月，他率中国民主建国会代表团前往民主德国，参加德国自由民主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61年，他担任民建上海市主任委员，1962年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1966年调民建中央工作，先后当选为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主席。解放以来，他荣任历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

## 欣逢盛世，共赴长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祖国迎来了新的春天，胡厥文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说：“民族独立，祖国统一，实现四

化，是我青年时代以来的最大愿望。现在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我们原工商业者必须把全部力量贡献出来。”

前些年，他做过两次大手术，但一俟身体好转，他都坚持到一些省市走走，找一些原工商业者和有关部门做调查研究工作。

1981年，他到武汉、福州、上海等地调查，针对各地机械设备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九条建设性意见。国务院认真研究了他的建议，国家经济委员会还专门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设备管理工作的通知》。

1981年4月，他在苏州休假期间，了解了一些常州工业发展情况，认为常州市根据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扬长避短，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这条路子是很值得中小城市借鉴的。于是，他很快写出了《关于常州市工业发展情况的报告》。胡耀邦同志见到报告后极为重视，立即批示：“厥老从考察常州市的工业入手，提出了发展工业的一些好意见，指出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厥老是党外人士，年近90，关心国家兴旺发达之心，溢于言表，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1981年12月28日，趁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之际，他联合全国工商联主席胡子昂，上书中共中央，就加强统战理论和政策的再教育，肃清“左”的流毒和影响，发挥和提高统战工作效益，尊重和听取各方面代表人士的意见以及落实政策等问题，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份建议书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赞扬。

邓小平同志提出实现四化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战略思想之后，他感慨颇深，认为必须采取多层次、多渠道的方式为四化建设多培养人才。1982年11月20日，他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代理董事长的名义致信胡耀邦同志，希望批准正式恢复在“文化革命”期间被迫停止活动的职教社组织和工作。四天后，胡耀邦同志就复了信。信中说：“此种好事有统战部赞助就行，毋须等待中央批准。现在百废待兴，应多多提倡人人奋勇争先的风气，不宜层层

设卡，贻误良机。尚望厥老鼓励该会同仁发扬主动精神和创造性，放胆把工作推向前进。”收到这封热情洋溢的复信，他反复展读，心情十分激动。

1983年10月21日到26日，中共中央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就中共整党问题听取意见。胡厥文在会上说：“‘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这八个字就是我对中共整党以及党的全部事业的立场。”他又说：“象我这样在旧中国度过了大半辈子的人，脑子里装着三笔对比帐：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对比；新中国同旧中国的对比；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比。从亲身备尝的酸甜苦辣算出来的对比帐，使我得出了一个不可动摇的结论——中国的一切事业必须靠共产党领导。我们这一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希望，都寄托在共产党的身上。所以，我们必须以‘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态度来对待中共整党，切实做到整党与生产、工作两不误。整党中要有具体的适当措施，保证充分听取党外群众的意见。”

最近，他在医院中对民建中央看望他的同志说：“我对国家的前途是乐观的，而且是一贯的乐观派。乐观并不等于不承认工作中有困难和毛病。我虽然近来因病不大了解实际情况，但听到一些，也可以想见毛病会不少，有的可能是新问题。对这些问题要有一个基本的看法：搞现在这样的大事业，不遇到困难，不出点毛病，不可能。以为什么问题都没有，都不会出，那才是最大的问题。现在的党中央领导得好，不在于工作中会不会出毛病，而是工作中出了毛病肯承认，能改正。”他又说：“对这么好的党中央，一要拥护它制定的方针、政策，身体力行地去做；二要把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直言不讳地向党提出来，这样才算得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数十年来和共产党真诚合作，风雨同舟，深受人们的敬重，被尊称为“厥老”。然而，他给自己的书斋题名为“不老斋”，表达了人老心不老的志愿。他说：“我已经

90岁了，但还有一个‘野心’，就是要活到106岁，活到2001年。这样，我就是个跨越3个世纪，亲眼看到梦寐以求的祖国富强昌盛的幸福老人了！”他曾赋诗道：“垂暮欣逢此盛世，愿随青壮赴长征。”我们衷心祝愿丹心一片的厥老健康长寿，迈进21世纪。

1985年

## 光辉的胜利 莫大的光荣

胡子昂\*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统一战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来达到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我们工商界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指引下，能够逐步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终于成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以自己的知识、才能和经验，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服务，感到莫大的光荣，感到无比的自豪。

在旧中国，我在四川重庆经营过自来水公司、水泥厂、华西实业公司、中国兴业公司、川康兴业公司、华康银行等工矿、金融事业。在那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岁月，惨淡经营，艰辛备尝，渴望尽自己的才能，发展民族工商业，使祖国富强起来。但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榨下，这种愿望终成泡影。我不满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因而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被迫离乡背井，出走香港。1949年夏，我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从香港到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

\* 胡子昂，曾任重庆华西公司、自来水公司、中国兴业公司总经理，重庆川康兴业公司总经理兼董事长，重庆华康银行董事长，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原任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席，现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议第一届首次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从此，我和全国工商界一道，开始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光明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我主要在民建会、工商联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工商界，走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

工商界走上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路程。旧中国在三座大山的长期统治下，成为一个经济极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工业凋敝，农村破产，民不聊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打倒了三大敌人，建立了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社会主义革命，首先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党和政府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采取和平改造的办法，通过各种形式国家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纳入社会主义轨道，这是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的，也是我们工商界能够接受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贯彻执行《共同纲领》，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政策，采取了加工、订货、收购、贷款等许多有力措施，扶植私营工商业，发挥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我当时在四川主持民建会西南区办事处和重庆市工商联工作。仅1950、1951两年间，人民政府发放给重庆工商界的几次专项贷款即达300亿元以上，一般贷款为数更大；同时，由政府 and 国营企业向私营厂商投放大批加工订货，并使私营工商业有利可图，以调动其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全国解放前夕，民族工商业早已凋零破败，气息奄奄。而在国家的扶持、指导下，全国私营工商业得到迅速复苏和发展，为国家恢复经济，稳定市场，保证需要，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也使广大工商界加深了对政府政策的认识，提高了经营信心，从而也更加依靠和信任人民政府。

私营工商业有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一面，也有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一面。无可讳言，工商界长期生活在旧社会，解放后虽然经过学习和参加各项爱国运动，获得了进步，但是资产阶级的本性和旧社会带来的污泥浊水，决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一些人利用政府的加工订货，偷工减料，粗制滥造，盗窃国家资财，牟取非法利润，并且大肆偷漏国家税收，使国家和人民蒙受重大损失。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揭露了私营工商业的消极行为，打击了它的破坏性。这场运动，工商界受到深刻的教育，清除了“五毒”，极大地提高了觉悟。运动后，党和政府根据对民族资产阶级一贯的方针政策，进一步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帮助工商界解决生产经营上存在的困难，推动工商界爱国守法，积极经营。

1953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全国工商联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上传达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两三年间，全国私营工商业或实行公私合营，或接受加工订货，或承做经销代销，逐步地纳入了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到1955年下半年，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农业合作化高潮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

1955年，全国工商联举行执行委员会会议，这是工商界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上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约集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谈话，接着又向全体执行委员做了重要讲话，教导我们工商业者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我接连两次聆听毛主席的指示，兴奋之情，难以言喻。参加那次执行委员会会议的同志们，都是各地工商界代表人士，大家回顾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比新旧两个社会、两种制度，深感在旧社会，谁要失去生产资料就意味着谁将陷入贫困、破产的悲惨境地；而在新社会，工商界的生产资料实现国有化，结束了阶级剥削制度的历



史，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工商界也同样可以过幸福的生活。因此，许多同志认为，放弃剥削不怕共产，前途无限光明；一张选票，一个饭碗，安排十分周到，我们感激不暇，还有什么吊桶放不下呢？这次会议，向全国工商界提出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号召。会后，各地工商界敲锣打鼓，张灯结彩，欢天喜地，争先恐后地走上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道路，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所有制的改造，跨进了社会主义门槛。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工商界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热烈庆祝。毛主席和党中央许多领导人亲临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里，我向毛主席汇报了西南各地工商界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盛况，他十分高兴地说，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伟大胜利。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逐步赎买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和平过渡的办法实现的。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以前，实行“四马分肥”的办法，即实行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集体福利和股东股息四方面共同分配企业利润的办法。根据这个办法，私营工商业根据企业盈利多少而取得一定的利润。公私合营以后，实行了定息制度。这种逐步赎买的办法，工商界是乐于接受的。同时，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党和政府根据“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方针，对工商业者的工作职务作了妥善安排，使大家各得其所，能够安心地工作和学习，愉快地为国家贡献自己的才能。

企业的改造是和人的改造分不开的。资本主义企业国有化的逐步实现，也是工商界思想认识逐步提高的表现。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更为工商业者通过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实践和学习，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者创造了条件。为了适应新形势对工商界的要求，1956年12月，全国工商联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提出全国工商界共同遵守的五条基本准则，要求广大工商界要继续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把自己的一切才能贡献给国家，

为祖国的社会主义服务；要守职尽责，克勤克俭，养成艰苦朴素作风，努力工作；要进一步搞好公私共事关系，进一步增进相互团结；要加强学习，逐步消除旧思想旧作风，提高社会主义觉悟。那时，我们工商界确实心情舒畅，思想愉快，进一步激发了大家为社会主义服务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积极性。

工商界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教育下，经过民建会和工商联各级组织的帮助、培养，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骨干分子。他们以自己带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模范事迹，对广大工商界进行说服教育和团结工作。同时，他们生活在工商界中，了解工商界情况，关心工商界生活、学习和工作，既向工商界宣传国家的方针政策，又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向党和政府反映工商界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成为工商界与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他们对于国家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一伟大任务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在国际上影响很大，社会主义国家和友好国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56年底，我作为工商界代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应邀访问了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等国家，到处受到热烈欢迎。在这些国家领导人举行的欢迎会上，我向他们介绍我们中国资本家为什么愿意接受利用、限制、改造政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道理。我告诉他们，中国共产党对我们工商界的企业采取赎买办法，对我们工商业者采取了包下来的办法，不仅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力和专长，为祖国效力，而且在政治上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地位，许多人担任了各级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或者被任命为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的经理、厂长，更有许多人被选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对于我们的思想改造，中国共产党以说服教育的方法，一贯地耐心地对我们进行帮助。这些都使我们工商

界清楚地认识到，遵循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方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铁托同志对我说，在欧洲是找不出你们这样的资本家的，这是中国很大的成就，把国内所有力量都团结起来了，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当时，我和工商界其他几位同志的心情都异常激动，我们一方面感到无比光荣，一方面也深深认识到这个光荣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给我们的，也是全国工商界跟着共产党，愿意接受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光荣。

回顾前尘，展望未来，我们工商界的同志们对于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伟业是满怀信心的，对于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随着时代步伐而不断前进！

1985年

## 一次深刻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

孙晓村\*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人民对世界革命的重大贡献。这场社会主义改造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头七年中进行的。这七年是不平静的七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伟业，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统一财经，平定物价，医治战争创伤等等。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人口众多，情况复杂，居然能在建国后短短的几年内，在人民生活不受影响的情况下，用和平方式全面地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是在民族工商业者敲锣打鼓、欢天喜地的气氛中进行的，这不能不说是政治上、经济上的奇迹。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估价这场改造的胜利完成时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我认为这样估价一点也没有过高。

中国民主建国会在这场伟大的变革中是起了配合作用。作为民建会的一个成员，我在这场变革中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认识到没有正确的思想路线，任何革命或改革不可能取得胜利。

1953年共产党提出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民建同志就忙于学习、宣传总路线，忙于了解、分析民族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的

---

\* 孙晓村，原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现任民建中央咨议委员会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

意见，向党提出建议。从那时起到1956年，因忙于工作，我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会不深。现在回想起来，这样大的变革能够一帆风顺地实现（当然不是说没有斗争），值得人们深思，从中反映了正确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被推翻了。这时，掌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面临一个关系极为重大的问题：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对他们的生产资料是没收呢，还是采取别的政策；在步骤上，对他们所经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立即宣布收归国有呢，还是让它存在一个时期。如果按照本本办事，民族资产阶级也是进行剥削的，对他们的生产资料理应没收，也就是说对他们经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应收归国有。但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没有这样做。而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剥削工人的一面，但也有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限制、同其斗争、希望国家富强的一面。从抗日战争时起，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就同中国共产党有交往，赞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们支持共产党的和平、民主的主张，并为此而奔走效力。他们所经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有国民经济所需要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也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共产党从这个实际出发，考虑到人民的最大利益，制定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这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明确指出的：“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

这一政策威力极大。记得解放战争时期，我在上海同民族工商业者中代表人物时有接触。1947年，大家已看到中共必胜，担心中共的工商业政策。济南解放后的一些情况传到上海，大家感到安心，不少大户开始放弃了把工厂迁往香港的打算。1949年6

月30日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民族资产阶级象吃了定心丸。记得那时我在杭州，有一天中国银行浙江分行经理、江浙金融界的重要人物金润泉对我说：“我只要看到报上常有陈叔通的名字，<sup>3</sup>登载他在北京的活动，我就睡得着觉了。”9月，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通过《共同纲领》。《纲领》明确规定：“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规定包括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五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规定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等等。这些规定都是当时大多数民族工商业者能够接受的。记得好几位工商界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在《共同纲领》发表一段时间后，从香港回大陆的。《共同纲领》没有提出社会主义，也是从实际出发的一个标志。现在回想起来，在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这一问题上，新中国迈出的第一步是十分高明的。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党的领导艺术。

由于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者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以及以身作则的行为，加上其他各种条件的成熟，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终于在1956年水到渠成，顺利地实现了。

时间过得很快，从欢庆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到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宣布我国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经有20多年了。这段时间中国人民是在大风大浪中度过，特别是十年“文革”给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场空前的浩劫，思想理论、原则都被“四人帮”搞得颠倒混乱，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严峻的历史事实证明，没有正确的思想路线，国家、民族会被引导到何等危险的境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真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从那时起，在短短的七年中，中国政治上出现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经济上出现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大改革、大发展的局面。这种奇迹般的变化，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

中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目标，已把全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智慧凝结成伟大的力量投入祖国的第三次腾飞。

1985年

# 学习、学习、再学习

万国权\*

我们原工商业者在党的领导、教育下，从剥削者转化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是个180度的大转弯。我们亲历者深知这一段经历来之不易。回顾我们走过的历程，我认为有条十分重要的经验，与我们接受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关，也与我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有关，那就是学习。解放初期，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还存在，民建会、工商联相互协作，组织我们学习时事政策，学习政治理论。记得当时通过学习社会发展史，我逐渐认识了社会发展规律，并由此而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我所经营的企业在1954年1月实现了公私合营，过了两年，全行业都公私合营了。这是党的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的伟大胜利，而就我们讲，能够不太勉强地接受改造，是和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分不开的。正因为平时不断学习，思想认识不断提高，为我们接受改造奠定了思想基础。

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们成了国家的工作人员，在社会主义企业工作。这时，民建会和工商联进一步加强协作，遵循党提出的以政治思想为统帅、以劳动实践为基础、以企业为基地的改造方针，继续组织我们学习，帮助我们继续接受

---

\* 万国权，曾任天津利中酸厂经理、民建天津市委员会副主委。现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顾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社会主义改造。当时，天津市民建和工商联成立了工商界学习委员会，针对工商界当时的不同情况，举办了马列主义业余大学和工商界政治学校，系统学习政治理论。马列主义业余学校邀请大学教授讲课，在那里，我们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经济学。通过学习劳动价值论以及剩余价值学说，我们加深了对剥削根源和剥削事实的认识，进一步提高了根本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正是因为多年的不断学习，不断改造，所以坚定了“听、跟、走”的信念。

十年内乱中，我们原工商业者被列为专政对象，大都被打入“牛棚”劳动改造。尽管思想不通，但绝大多数人并未对党的理论、路线、政策丧失信念，跟着党走了过来，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我认为这并不是偶然的。历史证明，这是党的政策英明伟大，是民建会和工商联组织多年来帮助我们学习的结果，也是我们自己努力学习，认真改造思想的结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要求我们原工商业者发挥专长，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在执行这个宏伟而光荣的任务中，我们的学习有了新的、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从我们天津市的情况看，近几年来我们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条件，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有关部门支持下，积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先是开办了一批待业“青年点”，继而开展了经济咨询服务、工商专业培训和对外联络工作。在协助政府发展集体经济、扩大城镇就业；为经济调整、企业改革提供咨询，开发智力；为支援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培养人才；为改进外贸工作，扩大对外贸易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逐渐摸索出一条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新路子。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新情况、新课题、新工作，实际上也是一个新的学习和实践。现实的工作和生活告诉我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过程，是我们社会主义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的过程。我们天津市民建、工商联成员大都年逾花甲，60岁以上的约占90%以上，已经退休的占80%。但是，年事虽高，报国之心更切，大家

都以能在晚年为四化贡献余热为荣。不少同志的事迹非常感人，许多人受到党和政府的表扬，全市有200多人获得先进称号，三个年度中有6位同志（8人次）被评为市级劳动模范，有的同志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所有这些，都是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分不开的。

邓颖超同志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开幕词中，倡导各民主党派成员、知识分子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我们自己的工作自觉地同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联系起来。这就在新的历史时期，为我们今后的学习和继续改造世界观，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任务。我们每个同志都应当用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应有的条件，来看我们哪些做得还不够？我们社会主义觉悟有哪些还不高？我们的世界观改造还有什么问题？尤其是我们做出了一些成绩，受到社会上的表扬之后，我们愈要看到自己的差距、缺点和不足，继续发扬我们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优良传统。学习、学习、再学习，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

1983年

# 峰回路转万象新

刘念智\*

## 漫漫长夜，命运难掌

我已年逾古稀，38年在旧社会。在新社会的时间虽然较短，却有幸接受脱胎换骨的改造。共产党的教育和关怀，毕生难忘。

我自16岁留学英国，毕业于剑桥大学，23岁归国，在父亲身边，担任他的英文秘书。我父刘鸿生，早年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以后辗转当上了英商开滦矿务总局买办。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每年收入达100万元之巨，由于不愿久仰外人鼻息，乃自办企业。先后创办章华毛纺织厂、上海水泥厂、华丰搪瓷厂、中华码头公司、大中华火柴公司、华东煤矿公司等厂矿，经营范围很广。他还开办一家中国企业银行，当时不少人到银行借钱，冒着风险作生意，有的人经营不幸失败，到春节无力还款，跳入黄浦江自杀。全上海这样死去的人不知有多少！孤儿寡妇到处流浪的又不知有多少！我家所住花园，占地30多亩，建筑四层楼房（现为上海市政府招待所），雇用六个保镖。别看千万富翁之家表面上如此豪华，实际上我们的股票全抵押在各家银行里，每天为筹措开支，煞费苦心。1935年，上海发生金融风潮，银根奇紧，我家企业周转不灵，父亲想起曾和宋子文、宋子良在大学同学，

---

\* 刘念智，曾任上海中华码头公司总经理、华东煤矿公司副经理、中国火柴原料厂协理。现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侨联副主席。

去向宋子文借钱。宋问有何抵押品。我父答拟以股票作抵。宋子文竟轻蔑地说，股票还不及手纸有用，拒绝贷款。当时经济情况非常紧张，不仅我家如此，即以全国闻名的荣家企业来说，也是有苦难言。记得1937年日军侵入上海前夕，荣宗敬老先生来和我父商量，诉说他家上海陕西北路的大宅，由于付不出水电费，将被断电绝水。我父对他说：“咱两家目前处境是半斤八两，不相上下。”这时我看到二老相对流泪，不胜唏嘘。

蒋王朝崩溃前夕，蒋经国到上海，借口整顿货币，大肆绑架勒索。荣鸿元被绑架，交出美金100万元，才放回家；我的同学胡国梁被敲去25万美金，方被释出，当时人身毫无保障。四大家族每乘民族工业的艰难时刻，强行加入股本，企图吃掉我们的企业。抗战胜利时，我家在大后方的企业的4/5股份，已变成官僚资本，而我家只余1/5了。

### 柳暗花明，喜获新生

新中国建立后，首先最使我对共产党信服的就是稳定物价，消灭通货的恶性膨胀。解放前，物价一日数变，货币不断贬值，多少中外专家，对于通货膨胀束手无策。解放后，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大力整顿，不到六个月就初见成效，一年内几乎完全解决，真令我这个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非常钦佩。我寄信给在港的父亲，介绍国内情况，建议他及早回国。我父由我二哥刘念义冒着生命危险陪同，乘英商太古洋行轮船抵津转京。周总理邀他和我二哥念义到家吃饭。总理说：“鸿老来，我们很高兴。你的全部历史和企业情况，我全清楚，请你放心。你属于民族资产阶级，是共产党的朋友，希望你带头办好企业。你的财产，在将来适当时期都会统一发还给你。”总理看到了我们心里，把我们急于要了解的事，一语道破，拨开云雾，使我们顿见光明，感到无限温暖。

真正解决我父思想问题的关键是抗美援朝。解放前，我父认识不清，以为我国贫弱，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常错误地对

儿女们谈到，中国永远不会独立，总要有外国人来管。他把我们弟兄姊妹11人分别送到英、美、日三国留学，准备将来无论哪一国来管中国，我家都有留学生出面周旋，以维护刘家企业。我有9个兄弟3个姊妹，4人留英，4人留美，3人留学日本。抗美援朝引起我父的极大忧虑，他很担心地对我说：“这是在老虎头上拍苍蝇，自找麻烦，这样一来，朝鲜和中国都要倒楣。”但后来事实教育了我们，靠着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终于赢得了胜利，把美帝气焰打下去，也震动了全世界。美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回忆录上承认，在美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倒霉的总司令，被迫签订了一个被打败的停战协定。当我父听二哥讲述上甘岭战役的壮烈事迹时，他被中华儿女们的英勇坚强，感动得流泪，立即嘱咐所有刘氏企业都要捐献飞机大炮。他深为中国人吐气扬眉，感到欣慰。他亲眼看见前人不能办到的事共产党办到了，从而对党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旧社会追随蒋家王朝22年，忠心耿耿，到头来才识破四大家族损公肥私置国家民族于不顾的真面目，终于弃暗投明。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委员以及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的常务委员。他每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自豪，以民族工商业得到保护而自慰，以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关怀而自喜，甘愿以其年迈之身，为祖国的建设和富强贡献余力。

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令人鼓舞。回忆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时，我正就读于剑桥大学一年级，一位英国同学问我：你们这样大的国家为何却被小小的日本占领，这是怎么搞的？我面红耳赤几难作答。我国公使在国联慷慨陈词，痛斥侵略者，而日人却诡称为了保护侨民利益，甚至污蔑中国无能，不会开发东北，胡说他们是来协助我国建设东北的。我当时听到这种情形，深感痛恨。我毕业后归国途经瑞士，原拟就宿于某家大饭店内，店主起初把我当作日人，极表欢迎，当他见我在旅客簿上写出中国国籍时，立即改变态度，拒绝留宿。又一次，路经罗马，意大利

宪兵最初向我敬礼，后来看清楚是中国籍时，竟将我的护照掷于地上，我愤怒抢回，他们又抢过去，还用脚踩。那时候我们被看作是世界上最底级的公民，到处被人轻视。我永远不能忘记这种耻辱，时常告人，并以奋发图强相共勉。1958年，我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团出国，任生活总干事。飞机在罗马机场加油，须停留二小时，我随团长下机，看到在机场维持秩序的宪兵是意大利人，不禁勾起往事的回忆。但此次他们却毕恭毕敬，很有礼貌。现在我国人民到处受到尊重，充分体现出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中国人民翻了身。

### 千锤百炼，接受考验

建国之初，我有80万元美金存在美国，折合人民币200多万元，原不拟调回国内，可见我在解放初期尚是身在曹而心在汉。

“三反”运动中，工人阶级声势浩大，使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触动，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最后过关时，我将逃避的80万美金全数调了回来。党对我们洞察一切，我信服党的对资改造政策，这个运动真是伟大的创举。

公私合营时，我理解这是党的政策，不可违抗，我们于1954年第一批参加了公私合营企业。在我兄弟行中，从前对工人如何精打细算及与外人办交涉，以我为能手。公方代表来了，我也能善与相处，搞好公私合作共事关系。合营以后，面貌一新。以毛纺织业中最大的章华毛纺织厂为例，工人较前大不相同，干劲很足，产量显著增加。过去我国毛纺织品全靠进口，现在已能输出115个国家和地区，包括英、美、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华达呢在国际市场上有名，但质量还需提高。

在十年动乱中，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妄图篡权，违反政策，祸国殃民，我虽吃了不少苦头，却也受到教益，得到锻炼。十年中我经常每天劳动8小时，负重100公斤，到晚间疲惫不堪。还做过三年夜班，白天挨批斗，夜里劳动，有时24小时不得睡

眠。由于疑虑不解，我曾动过自杀的念头。我的爱人卓碧玉极力劝我要相信党的政策终会正确贯彻，我心情稍安，偷空阅读英文的毛主席著作。有的群众要没收此书，我让他们看书里的毛主席像。他们将书还我，问我为何看英文书。我告诉他们，我相信毛主席，相信党，我也认为英文在将来还会有用。我熟读其中多篇，背诵不忘，后来在接待外宾时大有帮助。当时有老工人见我情绪低沉，对我说：“你要想想过去你是如何对待工人的，而今你也应忍受下去，我们老工人对于某些做法并不赞成，毛泽东思想终有一天会回来的。”这些话使我深受教育，我体会资产阶级的改造确实不是容易的事，决不能离开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

我自调京以后，三次去港。有人以为我曾在英国留学，在港又有外汇，既去之后，不会再回祖国。可是党让我出国，我去了还是要回来的，绝对不能辜负党的信任。

### 报国有门，协方奋进

1980年11月间，我参加以胡子昂主委为首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代表团，应香港中华总商会之邀，参加该会成立80周年的庆祝会，这是建国以来工商界代表团第一次出境访问。我们到港后，受到香港中外工商界的隆重接待，会见了不少知名人士。彼此沟通了情况，增进了友谊，为今后加强联系，开辟了渠道。在港期间，我们在胡子昂主委带动下，厉行节约，仅用旅费港币2300元，折合人民币800元，回国后将余下的24000多元，全数上交。全体成员约定，不在港抢购贵重物品带回国内。当我们带着港澳同胞的深情厚谊归国时，海关人员看着这个代表团，每人轻装薄篋，没有“满载而归”的现象，叹为罕见，免验放行。我相信做为爱国的工商业者，在有关涉外和扭转社会风气方面，不仅应该而且可能做出良好的行动。

我家每星期都有外宾来作客，英、美、法、德、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人都来，他们对“对资改造”极感兴趣，对于

象我这样的人为何愿意留在“红色中国”感到奇怪不解，经我详加介绍政策，他们赞扬我国的对资改造政策在国际上具有深远意义。

1982年



## 宝元通转向国营的经过

黄凉尘\* 樊陶斋\*\*

总公司设在重庆的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元通），于1949年冬重庆解放之前，在北京向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申请，参加国营贸易工作，中财委原则上同意了这一申请。1950年1月，原西南大区财政经济委员会和西南贸易部正式批准了这个申请，并热烈地欢迎宝元通贸易部门的全体职工转向国营贸易机构工作。

宝元通转向国营，正如当年它的创办人肖则可在西南贸易部举行的欢迎会上所讲：“这是宝元通自1920年创办以来翻天覆地的-件大事。”也是党和国家在特殊条件下，把民族资本企业转化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一种特殊政策措施。1950年1月25日，原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邓小平接见黄凉尘、樊陶斋时说：宝元通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企业，实践证明改良主义是行不通的。但是，在旧社会，宝元通是划地为城的好人社会，近于空想的社会主义，培养了一批有经营管理经验的人才，这些经验是有用的，要批判地运用，为开创西南国营贸易工作做出贡献（大意如此）。这是对宝元通十分中肯的评价。

---

\* 黄凉尘，曾任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顾问。

\*\* 樊陶斋，曾任宝元通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后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1986年逝世。

宝元通在民族资产阶级当中，有它的特性。这种特性就在于它搞改良主义，诸如对企业的民主管理，搞劳资合作，对股东的资本限制，对职工的思想教育和福利设施等等。

全国解放前夕，宝元通面临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

一方面是物价腾涨，货币贬值，购买力低落，生意难做。年终结算以货币计有天文数字般的盈余，以实物计则年年亏损，还要缴纳很重的所得税，叫做“虚盈实税”。所幸宝元通在金融界的信誉较好，可以增加贷款营运，保存一些实力。同时，香港的对外贸易经营较好，也可以弥补国内的亏损。

另一方面，宝元通对职工的工资福利负担很大。40年代后期，在贸易事业虚盈实亏的情况下，也未降低过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遂致入不敷出，捉襟见肘。1949年，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部分不在职的股东要求退股，企图把宝元通财产分掉。几经调解，最后以法币10万元股本折合阴丹士林布25匹，实行退股的办法来解决。不在职股东的退股，波及在职股东。虽然总管理处及时公告在职股东要求退股者必须同时辞职，但仍有少数职工请准退股辞职。这方面的问题比经营方法的问题严重得多，而且难于解决。

总管理处同人逐步认识到宝元通这条改良主义的老路是走不通了。于是，“宝元通往何处去？”就成为大家深思的问题。从1948年5月到1949年4月，宝元通按月发行的内部刊物《宝元通简报》，就有9篇文章专门探讨这个问题。1949年夏天，总管理处在重庆北碚温泉召开了主干人会议，对宝元通的改良主义作了全面的检讨。经过一周的讨论，终于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宝元通的所谓团体精神和事业意义，不仅不足以妄自尊大，即使退而求其为划地为城的好人社会，最后也落了空。为了固守团体的所谓特质，宁见事业发展迟滞而不容其变质，这牛角尖愈钻愈深，而愈不通了。

实际上，在淮海战役前后，总管理处极少数主干人即开始酝

酿全国解放后宝元通的出路问题。1948年10月，黄凉尘、樊陶斋、李清法到香港视察宝星纺织厂筹建工作时，黄曾找章乃器交谈，章介绍了淮海战役情况。黄问章，宝元通将来的出路何在，章说要靠拢进步力量。当年宝元通年会期间，极少数主干人对此又做了进一步的酝酿。会后，1949年3月，黄凉尘再到香港，经陈铭德、邓季惺介绍，在华人行楼上会见了许涤新和夏衍。许讲了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和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黄介绍了宝元通的情况和倾向革命的愿望，表示拥护解放，遂约以后再谈。5月，黄回重庆参加股东会，带回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小册子和解放地区的剪报。这些是同其他一些报纸混在一起垫在水果筐子下面带回的。总管理处极少数主干人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这些书报，又一次结合共产党的政策酝酿解放后的出路。在此期间，黄凉尘曾两次和成都地下党员易野源（他的两个弟弟易仲鄂和易明哲都是宝元通的主干人）接触。易说重庆解放不会太远，他完全赞成我们的愿望，表示宝元通应转向国营。他的话更坚定了我们的意志。所以在部分股东闹事时，我们不惜由香港调回资金，实行退股，也不能被少数股东拖垮，而要把这个事业保留到解放以后。8月4日，黄凉尘再到香港，并经由香港转往北平，正式受命联系谋求宝元通的出路问题，重庆解放前就不再回四川了。黄凉尘到达北平后，见到了黄炎培、章乃器，他们对宝元通转向国营的意愿，表示赞助。随后，章即在政务会议上代宝元通向陈云申请。不久，章转告黄说，中财委原则同意，但重庆尚未解放，可先在北平等着。重庆解放后，章又告黄，中财委原则上同意的电报已发，嘱黄回重庆向西南财委申请。当时章给西南财委秘书长刘岱峰、西南贸易部副部长李斌、川东行署财委副主任沈兰芝写了介绍信，信末都说在政治上他负完全责任。

这时，樊陶斋任上海分公司经理。南京、上海解放前夕，四川商业界驻沪代表纷纷撤回，宝元通上海分公司仍坚持营业。上海解放后，樊立即赶往南京组织分公司恢复营业，并参加了上海

市委统战部举办的工商界短期学习班。10月樊参加以胡厥文为团长的上海工商界赴东北、华北参观团，目睹解放区的新气象，对党的政策更有了深切的体会。重庆解放前半个多月，总管理处召开扩大主干人会议，对事业方向转向国营，取得了原则上的一致意见。解放后，宝元通照常营业，总管理处并派人主动向共产党的有关方面介绍宝元通的情况，参加党组织的工商界的学习。青年职工，情绪高涨，学唱革命歌曲，学扭秧歌舞。在举行入城式大游行时，全体职工穿着“号服”，队列整齐，高举“完成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的大幅标语，引人注目。总管理处为了使全体职工提前做好转向国营的思想准备，于1949年12月9日发出解放后的第一次通关信，小标题为：（一）报告平安；（二）开始我们的新生；（三）团体的灵魂解放了；（四）我们的使命和方向；（五）甩掉旧包袱。信中明确指出：“由于人民解放大业的完成，由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我们团体的特质已不复存在，以往我们对于团体精神和事业意义的妄自尊大，排他性，甚至至大无外，都应该立即改正过来，弃之如敝屣”，通关信号召全体职工“认清新民主主义所规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任务”，“提早转向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认为“提早转向之后，从事于反帝和国家经济的独立的工作，可以做得更有效率”。

这时，黄凉尘、樊陶斋回到重庆，总管理处指定他们与西南大区财经贸易方面的负责同志恳谈，提出申请转向国营的要求。他们与西南贸易部副部长刘卓甫和李斌进行了交谈。总管理处为了广泛开展民主讨论，召开了重庆、成都、宜宾、泸县四地总、分公司主干人和职工代表的扩大联席会议，说服了少数认识不清的分歧意见；对于要脱离宝元通的职工，经西南财委同意，即以政府接收宝元通贸易部分全部资产的作价收入，照章发给退职金和退休费，从而顺利地作出了一致赞同转向国营的决议。

1950年1月25日，西南大区主要负责人邓小平接见了黄凉尘、樊陶斋，正式宣布，任命黄凉尘为西南贸易部副部长、樊陶

斋为中国百货公司西南区公司经理。2月4日，西南贸易部在重庆冠生园举行欢迎会，欢迎宝元通总管理处和重庆分公司的全体职工及成都、宜宾、泸县三个公司的来渝开会的负责人和职工代表。会上，西南财委刘岱峰讲了话。当时《新华日报》报道：“刘岱峰讲话中对宝元通职工们要求进步，要求参加国营贸易机构，更积极地为人民贸易事业服务的热忱深表称赞。他说：过去宝元通公司在组织与管理上虽比较科学，比较进步一些，但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今后变为国营贸易机构，在工作的性质及个人思想观点上则已完全不同，因此，必须树立真正为人民服务思想与工作作风，防止单纯营利观点。国营贸易的主要任务是：第一，为生产服务（包括公私经营的生产事业）；第二，沟通城乡贸易，调剂市场供求，稳定物价，与投机奸商作斗争；第三，巩固人民币。希望大家依据这三条基本任务与方针，计划和布置今后的具体工作。宝元通创办人肖则可和上海分公司经理樊陶斋相继讲话，职工代表纷纷发言，一致表示参加国营贸易事业是无上的光荣，决心走上真正为人民服务的道路，向贸易部的老同志们学习，克服困难，为发展西南贸易事业而奋斗。欢迎会后，宝元通董事会、总管理处发布文件说：“宝元通创立于1920年，到现在整整30个年头了，由于创办人的极力倡导，建立了宝元通的民主精神，创造了宝元通的物质条件。宝元通的事业方向是以经营贸易生产为业务，发展民族经济为目的的。所有这些，在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统治之下，不仅无以发展，而且受到阻碍，我们朴素的空想落了空。现在我们主动提出的贸易部门的转向，已得到西南财经当局的最后决定，立即便要开始我们的新工作。我们自愧于过去未曾献身革命，今后自应在岗位上把工作搞好，把全部智慧和能力贡献给人民事业。”

樊陶斋在北京参加中国百货公司成立会后，按照原中央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的指示，于1950年4月上旬由北京去香港，将宝元通设在香港和印度加尔各答的贸易机构交给国家，全部职工转

到外贸部在香港的机构华润公司工作。然后又到上海，将上海、南京两地的贸易机构转为国营，交给中国百货公司华东区公司。至于重庆、成都、宜宾、泸县四处，即以宝元通的贸易机构为基础，改变为国营百货公司。至此，宝元通主动申请转向国营的愿望，终于完全实现。

宝元通为什么能够转向国营，我们有如下几点体会：

第一，宝元通是民族资本企业，在旧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排挤，难以发展。加之又搞的是改良主义，自己给自己加上一道紧箍咒，外患内忧交织，终于无路可走。好在迷路知返，醒悟不迟，在全国解放之后，很快实现了转向国营的愿望，涓滴归海。

同时，宝元通转向国营的道路，对于个别私营企业转向国营，或多或少起了一点影响。1950年2月樊陶斋在北京出席百货总公司会议期间，四川畜产公司正在武汉召开经理会议，樊陶斋与古耕虞联系，转达了中央贸易部姚依林副部长的意图，四川畜产公司出席经理会议的全体人员，很快来到北京，大家一致赞成按照宝元通的办法转向国营，古耕虞担任中国畜产公司总经理，为我国猪鬃出口做出了贡献。在全国解放初期，国营商业无论内贸、外贸，都需要很快地有一个大发展。个别接受一些规模较大、信誉较好的民族资本企业，对于发展国营贸易是有利的。

第二，宝元通是在《生活周刊》、生活书店的影响下，采取一些改良主义的作法来办企业，在当时，具有一定进步意义。虽就其思想影响来说，有消极的一面。但它的大多数职工都是爱国的、有事业心的，真心实意地想把宝元通这个事业办大办好，使民族经济得到发展。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接触一些地下党员和党外进步人士，诸如黄炎培、章乃器、江问渔、李筱亭、李紫翔、易野源等同志。章曾在宝元通作过报告，二李则是宝元通重庆、成都分公司的语文教员，他们对宝元通职工，尤其是总管理处的主干人是有思想影响的。当然，在创办人中，在主干人中，

在职工中，意见分歧，甚至道路分歧的问题也是存在的。不过，宝元通的企业组织与管理，不存在阴一套，阳一套的东西，对职工没有欺骗。1945年开始由全体职工选举总经理，组织总管理处，实行集体领导，是宝元通实行民主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董事长、总经理的提议，并经由总管理处讨论通过，有时也遭到否决，说明宝元通的民主管理是认真的。

第三，宝元通的职工转向国营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自我改造。30多年来，经历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绝大多数同志仍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党工作，不少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总的来说，没有辜负党和人民对宝元通这个民族资本企业的信任与期望。今天，宝元通的职工，大都是年近花甲或年逾花甲的人了，在向四化进军的长征路上，还要以有生之年，发挥所长，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1983年

# 老企业家的新天地

## ——访荣毅仁\*和他领导的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计泓虞 林 晰

谈起中国工商界的历史，人们常常会提到荣毅仁。他是旧中国拥有24家纺织、印染、面粉和机械工厂的荣氏家族的代表。如今，荣毅仁领导下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远远越出了轻纺、机械行业，超越了国界，更是越过了个人拥有资产的范畴，成为一个金融、生产、贸易、服务四者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实体。

—

“荣毅仁的公司效率高”。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样的反映。由法国100多家企业组成的一个贸易委员会的秘书长莫诺布洛卡夫人在巴黎对记者说：“中国机构有不少办事高效率的，荣毅仁的公司便是一个。”

这是对荣毅仁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信任和赞赏。荣毅仁，在建国以来，先后担任过全国工商联副主委、上海市副市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现任

---

\* 荣毅仁，曾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助理、经理，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现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中国十年动乱期间，他同许多正直的人们一样，身处逆境，是周总理巧妙地保护了他。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一直没有忘记他。

“我们这个公司是对外开放的产物”。仲夏之日，年近古稀但精神矍铄的荣毅仁，操着浓厚的无锡乡音，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们。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鼓励一些原工商业者，发扬自己的长处，运用自己的影响，促进对外经济的发展。荣毅仁受命“组阁”——成立一个全新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一位中央领导同志风趣地对他说：“荣老板，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大干一番吧！”十年浩劫中被禁锢的荣毅仁身上的活力，在党的开放政策的春风沐浴下，一下子迸发出来。当时，他经常对人说：“浪费了十年光阴，一定要在今后的十年中追回来！”他和十几位老资格的工商界企业家，以及一批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们苦心经营，开拓出利用外资发展我国经济的新天地。

## 二

信托投资，在国际上是筹措资金，互通有无，活跃经济的一种通常业务。但在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搞？怎么搞？这类企业到底姓“资”还是姓“社”？当人们的思想还没有完全冲破“左”的束缚时，难免投以疑惑的眼光。荣毅仁和他的伙伴们，在当初也不是没有疑虑，但是他们脚踏实地地干，用事实来回答挑战，用成就来说明问题。当时，国内外对中国创办引进外资业务顾虑重重。荣毅仁大胆创新，探索出一条利用外资的路子——既吸引了外资，又引进了先进技术和设备，同时避免了中外双方在直接打交道过程中的复杂性，受到企业界的欢迎。利用这种信托投资的方式，这家公司已经在全国20多个省、市组成了40多家合资企业。多少年想办而办不成的一些事，在荣毅仁的公司里办成了。他们还在国外发行债券，这是建国以来从未做过，甚至连想也不敢想的事。荣毅仁和他的伙伴认为，这是当今国际上通行的利用

商业信贷筹集资金的一种主要方式，它不受国别限制，利率固定，使用自由，期限又长，完全可以用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82年初，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首次在东京发行了100亿日元的公司私募债券，这是我国利用外资新进展的一个标志。这笔钱，大部分用于江苏仪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取得了很好的效益。他们还最先用租赁的方式，在国内首创租赁业务。租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借鸡下蛋”，引进快，方式灵活，手续简便。1980年，他们用这种方式，从日本引进400辆汽车，解决了当时首都旅游用车的困难。公司除自营租赁业务外，还于1981年会同北京市机电设备公司，同日本东方租赁公司合资兴办了东方租赁公司。紧接着，又与国家物资总局合资组建了中租公司。现在已发展成为一个租赁系统。不少租赁项目做到当年委托，当年到货投产。1983年，投资公司的这个租赁系统就为电子、轻纺、机械、化工、冶金、旅馆等行业的技术改造，组织了238个项目，成交租赁合同总金额达到8600多万美元。

创业维艰。荣毅仁和他的伙伴经过几年的开拓、探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已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经济实体，除组成了许多个中外合资企业外，还从国内扩展到海外投资，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业务联系，在日本、法国和香港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这家公司在短短几年间取得的成就证明了荣毅仁做事是有胆有识的。

### 三

荣毅仁说：“投资公司不是投机公司。我们公司的宗旨是：既要有利可图，又不唯利是图。”是的，有利可图是所有经济工作者都要讲求的，也就是说办任何事业一定要考虑经济效益。唯利是图则是资本主义的宗旨，荣毅仁的公司不唯利是图，也就是说，他们办一切事情，充分考虑了社会的效益。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确实是本着这个宗旨做的。云南磷肥

厂，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因资金不足而陷于停顿。荣毅仁的公司鉴于农村急需磷肥，决定为它筹集资金3000万元，四次为它引进设备和材料。现在这个厂年生产能力可达9万吨重磷酸钙。北京市牛奶供应一直紧张，荣毅仁本着只要不亏本的宗旨，由投资公司和北京市农场局、中国农业银行合资办了京联奶牛公司。第一批从丹麦引进108头奶牛，还要从西德等国继续引进奶牛，一共将达到1000头。据说，这些牛长得不错，出奶量不断增加，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北京市牛奶供应紧张的局面。

#### 四

“凡有利的、有把握的事，我们就去做；做不到的，先不说，也不勉强去做。我是反对说大话、空话、假话的。”荣毅仁认为，唯有求实精神，才能干出事业来。有人邀请他搞水电站，因为要几十亿投资，一时没有这个力量，当然不能贸然去干。他说，办事业，既要积极，又要稳妥，一时兴起是办不好事的。办事要有魄力，需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真正的魄力要建筑在可能性、可行性的基础之上。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每天要收到大量的来自国内外的函、电，洽谈业务排得满满的。这是一个仅仅270多人的机构，从事的是综合性的经济活动，事情相当庞杂。几年来，荣毅仁的公司坚持做到这一条：有信必复，有客必见，有问必答，答复信一般不超过10天时间。1982年，日本野村证券公司要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按照惯例，从提出申请到批准，最快也得半年时间，野村公司委托投资公司办这件事，结果两个月就办成了。奥秘在哪里呢？在于他们不打官腔，公司内部手续简便，不搞公文旅行；与兄弟单位随时通报情况，把工作做在前头，主动取得各方面的支持，用荣毅仁的话来说：“紧急的就派人盯着——‘坐催’，对前来接洽的人士，把意图尽量搞清楚，注意搜集有关材料，并尽可能一次性地告诉人家，需要通过哪些部门，要办哪些手续，准备哪些材料，

事前都考虑周全，而不能让人家左一趟右一趟地飞来飞去。”

## 五

荣毅仁每天的活动总是排得满满的。自从他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国务繁忙，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仍然是他的“根据地”，是他倾注心血最多的地方。他谦逊地对我们说，他和他的公司在整个国家的建设中，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可是，在这一粟之中，凝聚着荣毅仁和他的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多少的心血和才智啊！

士为知己者用。昔日的“荣老板”和他的同伴们，如今已成为社会主义企业精明干练的当家人了。荣毅仁表示，过去的成就需要巩固，但更重要的是开动脑筋，不断创新，开拓新的路子，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才会越来越宽广。

# 我成了国家的主人

经叔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了，看到我们的祖国在这短短历史时期里成长壮大、繁荣昌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是令人精神振奋。回顾往事，不禁感慨万分。

记得1952年，那时我还住在上海。在全国“三反”“五反”运动中，我作为完全守法户第一批过了关。就在当年6月间，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议准备在北京召开。我被推选为会议代表和其他30几位前上海工商界人士一同前往北京参加会议，我感到非常荣幸。那时陈毅同志是上海市市长，他正在南京。我们全体上海工商界代表应他的邀请，在北上途经南京时下了车，在那停留了一天。现在我还能感觉到当时那种难以言表的复杂心情：既激动兴奋，又忐忑不安；既感激共产党的光明伟大的政策，又为自己是民族资本家的代表而感到抬不起头来（当时资本家中很多人做了不少违法的，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揭发出来）。我想其他30几位上海工商界的代表大概也都是怀着同样的心情吧。陈毅同志似乎猜透了我们的心思，晚上他招待了我们，并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要振作起来，国家经济要发展，需要内行，欢迎我们同共产党合作，用自己的所长为国家经济建设出力，并要求我们到北京去一定要把会议开好。到北京后，当

---

\* 经叔平，曾任上海华明烟公司经理。现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秘书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副秘书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常务董事，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董事长。

时的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同志接见了我们，他也同样鼓励我们放下包袱，重新开始。他说过去有“五毒”，现在消除了，就不要总是抬不起头来。最难忘的是，敬爱的周总理接见了我们，当时他风趣地称荣毅仁和我等一些较年轻的工商业者为“少壮派”，希望我们投身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中来。

1955年，全国公私合营进入了高潮，我曾任经理的上海华明烟厂在1954年就来了公方代表。华明烟厂公私合营了，我作为私方代表任经理。1956年，我离开上海来到北京任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伴随我们党和国家所经受的风风雨雨，我的经历也是曲折的，但无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我对接受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始终坚定不移。我感激党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怀着一颗报国之心，积极为国家和人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可是在我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感觉无法排除，这就是我同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等有区别，我不能象他们那样作为国家的主人而工作。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使我国进入了建国以来最好的经济建设时期。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宣布我国阶级状况发生根本变化，他说资本家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现在，他们作为劳动者，正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这些话对我们老工商界人士是莫大的激励、鼓舞。紧接着，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宣告成立。我受到共产党和国家的关怀和信任来到投资公司，参加了吸引外资、振兴我国经济的工作。5年来，我在投资公司的工作能充分发挥我的特长和优势，能有机会报效国家，特别是在1983年我陪同赵总理出访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这是我从未想到过的。我的心情从来没有这么舒畅，精神从来没有这么振奋。这几年，我曾多次出国考察、学习、访问，在同外国人的接触中，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受到外国人的尊重，这使我感到无比骄傲、光荣和自豪。

在旧社会我曾梦想实业救国，竭尽全力，发展民族工商业，但在三座大山的压迫、排挤下，实业救国终成泡影。解放后，在少壮时期，又由于种种原因，没能为我们的国家多做些事情，我感到万分惭愧，现在到了桑榆之年，却赶上了我们国家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加倍工作，弥补过去失去的时间，将有生之年全部贡献给我们国家的现代化经济建设。

1984年

# 百万富翁为什么会走社会主义道路

## ——猪鬃大王古耕虞\* 传略

王慧章

### 猪鬃大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古耕虞是中国也是世界著名的猪鬃大王。以一个行业垄断程度之高而言，可谓全国第一。1948年，经他的四川畜产公司（其前身为“古青记”）出口到欧美各国的猪鬃，包括当时各解放区委托他经销、代销的部分，占全国总出口量85%。猪鬃是中国传统的出口物资之一，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市场所需猪鬃，几乎全部由中国供应。他的古青记“虎”牌猪鬃（标记是只红色的老虎），早在30年代就驰誉世界。其主要输往美国，几乎独占了美国市场。美国工业三大支柱——钢铁、汽车、建筑，除钢铁外，后两项离不开猪鬃。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的牙刷、衣刷等等更是种类繁多。猪鬃又为重要的军用物资。从油漆兵舰、飞机、卡车到清扫大炮的炮筒，海陆空军都需要它，特别是海军。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政府把它列为战略物资A类，与军火等同。各盟国为了取得中国的猪鬃，在华盛顿设有专门的分配机构。当时我国内陆对外交通被日军封锁，由美国空军用飞

---

\* 古耕虞，曾任四川畜产公司总经理。现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部特约顾问。



机运到印度。这条航线要飞越喜马拉雅驼峰，其高度要超过当时飞机一般飞行高度的一倍，因而在空运中飞机常常出事。为了战时需要，美国政府不惜以飞行员生命来换取中国的猪鬃。

### 百万富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古耕虞是位地道道的美金百万富翁。解放战争期间，他按月向中国银行结汇100万美元（这是约定的数字），其他银行尚不计算在内。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打包放款，其一半以上是贷给他的天津分公司的。他在纽约的子公司——海洋公司，可以一次向华尔街银行开出见票4个月兑现、年息3厘、金额达1000万美元的信用状。在生意场，信誉就是财富。伦敦的鬃商称古耕虞的信誉，与英格兰银行一样可靠。新中国刚诞生几个月时（1950年初），我国的国际环境还很险恶，国际贸易尚未开展。有一次人民政府急需一笔外汇，要他设法，他当天从内地赶到香港，第二天就把500万美元拨交香港中国银行。

我国外贸部的一位副部长，当年曾戏称古耕虞“富甲天下，可与石崇媲美”。由于多年来美国市场热销他的“虎”牌猪鬃，所以全国解放前后，各解放区或新中国出口的猪鬃很大部分是直接卖给他或委托他经销、代销的。当时，他的公司业务主要是在香港。他本人及其亲属或在香港或在美国。如果他对共产党稍具疑虑，以他当时的财富而论，他完全可以到美国去当寓公，享福一辈子，也未必花得完这么多钱。即使他还想做生意，以他的经营管理才能和商业信誉，正如他的高级经理人员所说的，“完全可以把几百万变成几千万”。何况，新中国的猪鬃当时需通过他的公司出口，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他可以在香港和美国当共产党的“往来户”，以观变化。然而，他放弃了上述各条可行方案。新中国一成立，周恩来总理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就从香港回到北京。一见到总理，他就把自己遍及全国各大城市、香港、美国的公司和资财，多年物色来的一批出色的国际贸易人才（这是一笔能够创造

财富的智力资源),对他来说价值连城的商誉和“虎”牌商标,连同他自己和他的子女,一古脑儿交给了人民和人民的政府。从此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同全国人民一起,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艰辛地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 共产党帮了他的忙

古耕虞说过,“我能成为猪鬃大王,是共产党帮了我的忙”。这句话,决非仅仅出于个人的风趣,而是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民族资本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反帝运动的发展而发展的历史进程。新中国成立之前,民族资本是在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的。特别是国际贸易,除了绝个别的例外,一般经营山货的出口商能够摆脱帝国主义洋行的控制和居间盘剥的,古青记恐怕是第一家。

国际贸易是个非常复杂的行业,海关、航运、保险、国际汇兑等等都与它有关。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这一切都控制在帝国主义手中。不论银行结汇,航运的运价和吨位,以及税收等方面,洋商都得到特殊照顾和优先权利,而华商则受到种种留难和压制。这种由于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不平等局面,使中国民族工商业负担增加,成本提高,根本没有条件与帝国主义洋行进行竞争。

这种局面一直到北伐战争胜利地进展到长江流域,才开始有了转机。这首先表现于重庆。重庆地处长江上游,远离帝国主义侵华的大本营上海。当地虽然也是洋行林立,但列强只能派遣一些浅水航行的兵舰。每只兵舰有几十个水兵,英美法日等国统统加起来不过几百个。正因为他们在重庆的兵力不足以护侨,所以只要胜利了的中国人民,把长江拦腰截断,这些洋商、洋舰和洋兵之类就成了瓮中之鳖。因此,重庆的洋行在北伐军胜利抵达长江流域时就仓惶撤离了,这才给了古耕虞以发展的良机。

美国市场所需的“虎”牌猪鬃，过去都是由上海——伦敦的英国鬃商转手供应的。1927—1928年间，美国最大的猪鬃进口商孔公司派了两个人到重庆来，名义上是调查重庆猪鬃的出口情况，实际上是来拜会那只驰誉美国的“红色老虎”的主人。古耕虞当时是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英语说得很流利（他曾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通张謇先生办的纺织学堂读书），对重庆猪鬃的生产和出口情况很熟识。过去孔公司是从伦敦进口“虎”牌猪鬃的，他们很想摆脱英国中间商转手牟利，而古耕虞更是雄心勃勃，欲图直接向美出口。因而双方一拍即合，当场就签订了一项密约，古青记输美的“虎”牌猪鬃不再由伦敦转口。20年代末，英国还是雄视两洋的“海上霸王”，美国不敢过分冒犯他的利益。开始时，古耕虞把一部分猪鬃继续交售给上海的洋行，另一部分直接输美。至后逐步扩大数量，以至最后全部摆脱上海、伦敦英商的双重分润。

这个密约，使古青记和孔公司成了一个很大的国际性垄断组合，双方都有了成为“大王”的条件，一个垄断出口，另一个垄断进口。形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民革命军胜利地进展到了长江，帝国主义洋行撤离了重庆。

从那时起，古耕虞所向披靡，没有一个重庆的鬃商可与之匹敌。到了30年代末，整个重庆猪鬃出口行业，几乎是古青记的一统天下了。

从此以后，古耕虞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反帝运动是和民族工商业的利益相一致的。他说：“我就喜欢反帝，因为反帝给我带来了好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就是因为这个阶级有爱国反帝的一面。”

### 与官僚资本斗法

解放以前，四大家族垄断了中国经济命脉，民族工商业受到了控制、摧残，以致被吞噬。古耕虞当然也逃不脱这种控制和压迫，但他手中握有一张王牌——“虎”牌商标，以及在国际市场上的

信誉，可以和官僚资本进行斗争。他曾经自豪地说：“你宋子文、孔祥熙之流，可以在国内为所欲为，依靠政治权力把全部猪鬃垄断起来，但一出国门你就没有威风了。猪鬃要销往美国，还得靠我虎牌。”

古耕虞在经营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方针，即他的企业决不容许官僚资本以投资、贷款等方式来染指。他也用银行的钱，但他只向银行做打包放款，决不做抵押放款，更不接受银行投资，以免官僚资本乘机插手。

抗战时期，由于各盟国的战略需要，中国猪鬃的出口利润是非常大的，较诸国内成本高达10倍以上。同时，各盟国支援中国抗战的贷款，有相当部分约定以猪鬃偿还，所以国民党政府在战时对猪鬃实行统购统销。这在非常时期，应该说是合理的，但官僚资本却以抗战名义，大肆与民争利。古耕虞的态度，一方面是以抗战为重，服从战时的统购统销；另一方面维护自己的利益与官僚资本作斗争。抗战初期，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大少爷孔令侃任中央信托局的常务理事，趁蒋介石下手谕以猪鬃换取美国卡车的机会，利用其掌握的权力，企图由他开设的公司来代替古青记。古耕虞因此自动停止营业，与之周旋。结果，孔令侃虽然能以“战时法令”的手段，置古青记于死地（甚至连一张运输证都不发），但美国市场只信任“虎”牌。古青记罢工了，没有“虎”牌，孔令侃权力再大也无能为力。这是一场富有戏剧性的闹剧，最后以孔令侃失败告终。国民党行政院被迫修改猪鬃统购统销办法，孔令侃也被迫放弃了垄断猪鬃出口的企图，古青记才恢复营业。

这类斗争越到抗战后期越激烈。这是因为胜利在望，古耕虞要使他的企业向全国发展，就必须打破这种由官方统购统销的局面。他在这方面的活动是非常厉害而巧妙的。譬如利用社会舆论和进步力量，充分揭露官僚资本的贪污、腐败和无能；利用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和失业救济，把工人对资本家的斗争矛头引向对政府的现行政策；以及与同业结成“同盟”，向官营企业“开炮”等

等。

### 红色老虎投向党和人民

古耕虞之所以能够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除了上述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外，根本的历史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的统一战线，以及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资本、官僚资本和支持发展民族资本的政策。

古耕虞在政治生活上有个“三步曲”：（一）在国共两党斗争之间不偏不倚；（二）国共两党对他“一推一拉”；（三）投向共产党。这是随人民革命的胜利而发展的总趋势，其中心环节是“一推一拉”。

所谓“推”，是指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所为。太平洋战争胜利前夕，各盟国准备举行一次世界经济会议，讨论战后经济和贸易问题，邀请有关各国商会派代表参加。古耕虞被选为中国商会的代表。赴会之前，中国经济学会集合讨论战后中国经济建设问题，他竭力主张战后建设要靠自己的经济力量，扩大出口；而与会的所谓“主流派”，却主张战后建设要靠美国贷款。针锋相对，相持不下。古耕虞在会上“出言不逊”。他说：“如果我父亲有钱，那我可以向他要钱。但可惜美国人不是我的父亲，最多是个干爸爸。”这一下惹怒了蒋介石，当代表团名单送到委员长侍从室时，蒋介石在古耕虞姓名下，批了四个字：“宁缺勿滥”。于是他的代表资格就被取消了，甚至正当选为重庆市参议员的四川畜产公司董事长吴晋航，也被迫辞职。

在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发行金圆券，勒令民间缴纳金银外汇。古耕虞是被当时国民党财政部驻沪经济督导员办公处副督导员蒋经国看中的“大户”，亲自召见，要他交出金银外汇。当时，可供他选择的道路只有两条：要么他把金银外汇去换回一大堆烂纸；要么他去坐牢（当时蒋经国曾逮捕了一批上海的著名资本家）。因此，他说：“民族资产阶级本来是中间派，这样一来，就把

整个阶级推到共产党那边去了。蒋经国先生帮了共产党的忙，确实确实帮了大忙。”

所谓“拉”，那就是周恩来总理对他的教育、引导和启迪。古耕虞结识周恩来总理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当时因为猪鬃出口关系到换取抗战军需物资和军火，而且盟国认为猪鬃作为战略物资，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因而周总理很关心猪鬃。周总理常常约见古耕虞询问关于猪鬃的情况，并勉励他要以团结抗战为重，在猪鬃出口事业上服从大局的需要。

抗战胜利以后，周总理在当时民族工业家组织的西南实业协会的星五聚餐会上，宣布“中国不但要政治民主，经济上也要民主，工业界应推代表参加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决定施政纲领和修改宪章。”其时，正是古耕虞准备把他的事业向全国发展的时候。共产党提出的民主与和平建国的方针，完全体现了包括民族工商业家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这对古耕虞说来是非常亲切的。

从此之后，古耕虞同共产党的距离就越来越接近了。过去，他在国共两党之间，是保持“等距离”的。这并不是由于他不认识国民党的专制、贪婪和腐败，不认识共产党所代表的人民革命的力量，而是由于他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现实的经济利益。他需要在国民党统治下与美国人做生意。为了保持他的利益，发展他的事业，他不能不与自己所不喜欢的国民党与美国帝国主义打交道。但也不能因此就说古耕虞喜欢共产党。他要的是自由企业、自由竞争，而共产党是决不会给他这些他所希望的东西的。迄至全国解放为止，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是中间阶级，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国民党政权日趋崩溃，大势所趋，民族工商业者不能不相应地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作出抉择。当然，抉择的过程有快有慢，对共产党的认识和感情有高有低，因而他们下定决心投向人民也有先有后。古耕虞由于前述的经历

以及他对中国现代史发展进程的理解，他的抉择是比较快、决心也比较大的。

事实上，当时解放区越来越大，解放区的猪鬃也越来越多。因此，他要做猪鬃生意，不论政治形势、经济形势，最好的上策是和共产党合作。

有人曾经问他：你这只红色的老虎为什么会投向人民？他的答复是令人很感兴趣的。理由可归纳为三点：（一）最根本的一条是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包括建国以后所采取的对民族资本的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客观现实中，共产党的政策是爱国反帝的民族资本家所能够接受的。（二）企业家有所谓“企业心”。在他们身上，发财欲望和事业欲望往往混为一体，这是中外一律的。他们把自己事业的成功看作是自己的创造，惨淡经营，百折不挠，不惜为之绞尽脑汁，倾注全力。这有些象文学家、艺术家之对待自己的杰作。在某种情况下，他们的事业欲望甚至会超过发财欲望。现在各国许多具有“创造狂”的、开拓型的、甘冒风险的企业家大率类此。（三）建国以后，共产党和政府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企业和个人改造相结合，理论、政策学习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的。要求工商业者既对国家经济建设贡献才能，并在政策上、业务上提出意见和建议，同时又对自己旧思想、旧习惯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古耕虞是在事业上进取心非常强烈的人。新中国一成立，周恩来总理就请他担任中国畜产公司总公司的经理并授之以全权。一位民族资本家，在社会主义企业的总公司担任正职经理，这在新中国恐怕也是第一个。解放前，他经营猪鬃有个夙愿，是在行业中“执牛耳”，而这个夙愿的真正实现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因此，他非常感激周总理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也非常感激周总理对他的知遇之恩。

## 为新中国效力

“老虎”投向人民之后，他自称是“‘资’家女儿，‘无’家妇”，是从资产阶级“嫁”到无产阶级来的。他有两个心愿：（一）他到新中国是来做事的，不是来做官的；（二）对共产党和国家抱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行一致、表里一致的态度。要做到这两点，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须认真地学习，切实地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世界观的根本改造。

建国以后，他作了许多工作，这里不再一一细述了，仅举几件大事：

（一）抗美援朝期间他奉周总理之命，到美国去推销猪鬃，并换回我国需要的物资。1950年我国猪鬃出口创历史最高纪录。特别是后来美国政府冻结我国在美资金，他的公司资金也在被冻结之列，但他用十分机智的方法，把一大笔在美资金解冻，其数额几达当时我国在美被冻结资金总额的1/10，比上海银行在美被冻结的资金还多。解冻以后，他把全部资金汇回国内，交给政府。当时，几乎所有知情人都认为这件事是办不到的，然而他办到了，其经过也极富戏剧性。有人因此认为这是古耕虞生平最出色的活动之一，甚至认为是“奇迹”。

（二）三年困难时，由于“左”倾错误泛滥所造成的经济工作上的失误，猪鬃收购不上来，出口几乎断档，国际市场鬃价因而暴涨。当时国内各大城市粮食供应困难，外贸部长叶季壮要古耕虞设法出口猪鬃换取粮食。他在熟识猪鬃行业的朱德委员长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四川省委全力支持下，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报告，主张适当提高猪鬃收购价格，并给予有关的屠工和小贩以适当的奖励，经政府采纳，迅速恢复了出口。

（三）十年内乱期间，他与共产党和劳动人民共命运、共患难。当时很多工商业者，被无辜地打成“反动资本家”，而对古耕虞却称之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挂牌时，他对“造反派”说：“我



既无权、也无威，更不反动。”含蓄而尖锐，也可说是“横眉冷对”了。

1969年他被“解放”了。在周总理关怀下，1975年他改任中国土畜产公司顾问。这在当时工商界中，恐怕又是第一个。当年，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对各条战线、各个方面实行整顿。古耕虞在公司党委领导下，着手处理因“左”倾错误和十年内乱被大量积压在仓库里的猪鬃。他提出了一个建议，经批准实行后，1976年我国猪鬃出口约达20万箱，比平常年景大3倍，比1950年的历史最高纪录也超过1倍。

（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根据党中央确定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对各项重要问题提出他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如何调动工商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积极性。在古耕虞看来，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在掌握着生产资料，可以剥削工人的时候，他们是资本家；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生产资料归国家和人民所有之后，他们应该说是具有商品知识和企业经营管理知识的知识分子。关键在于他们是否接受党的领导，是否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他的全部建议可以说是以这个前提为出发点的。1979—1980年间，即我国开始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时候，他提了许多建议，包括让原来的工商业者担任顾问（后来发展成为经济咨询服务）；培养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技术工作的接班人（后来发展成为工商专业培训）；利用他们对港澳、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关系，让他们在引进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牵线搭桥当“红娘”等等。他在工商界中，大约是最早提出应该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上多年来形成的僵死的模式，主张把政企分开，在产供销上给企业以充分的活力的人之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我国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已经基本完成，而且绝大多数工商业者在此后的思想改造和为社会主义服务中的表现是好的，他向党中央领导

人当面建议，应该给资本家阶级“摘帽子”。这些建议，大部分被肯定和采纳了。

1985年

# 我是怎样走上社会主义大道的

吴羹梅\*

## 从工厂迁川说起

我于1928年赴日攻读应用化学，于1933年回国。在帝国主义疯狂侵略的年代，我抱着实业救国的愿望，于1935年在上海创办了第一家中国标准铅笔厂。不料创办不久，即碰到“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在战火逼近上海的时候，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号召民营工厂一致内迁。1937年8月11日和12日，先后成立了“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和“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国难临头，义无反顾，中国标准铅笔厂也参加了内迁行列。

在炮火连天之际拆迁工厂，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由于敌军进攻淞沪，正式船运已断，只得将机器材料装上木船，由小火轮拖到镇江，再转装江轮运到武汉局部开工。不久武汉吃紧，再迁宜昌开工。等到宜昌吃紧，不得不再装木船溯江西上，“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渡过无数险滩恶浪，终于1938年底到达了后方山城——重庆，于1939年复工生产。

## 迁川工厂联合会

为了互助，迁川工厂于1938年4月17日成立了“迁川工厂联

---

\* 吴羹梅，曾任中国标准铅笔厂总经理、迁川工厂联合会常务理事兼总干事。现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驻会常委、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制笔协会名誉会长。

合会”，当时有会员30多家。1942年召开第五届会员大会，推颜耀秋为理事长，我被选为常务理事。当时会员有208家，翌年又增至230多家。会务繁忙，我以常务理事曾兼任总干事职。

抗战期间，敌人狂轰滥炸，厂房设施时遭损坏，资金、原料和水电供应短缺，政府定货时断时续，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困难是很多的。为了解除困难，联合会曾不止一次地联合其他工业团体向政府申请救济或发放贷款，以资维持。

尽管如此，迁川工厂仍本着互助合作精神，排除万难，发展生产，它们的产品对于供应前方军用和后方民用曾起到很大的作用。1944年10月10日，迁川工厂联合会和全国工业协会在重庆市牛角沱生生花园，联合举办会员厂矿出品展览会，琳琅满目，轰动山城。特别使迁川工厂同仁感到兴奋的是，周总理、邓大姐和董老亲临参观并留下了题词。董老题：“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奠定新中国工业的基础”；周总理的题词中说：“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邓大姐题了“合作奋斗，发扬生产”八个字。

1944年11月17日，迁川工厂联合会和中国工业协会等七团体联合建议，在重庆创办了新兵服务社，为改善新兵的衣食住行和疾病医疗提供了必要和可能的服务，对于鼓舞前方士气起了一定的作用。

为了调查研究战时经济情况，为实业界提供参考，迁川工厂联合会还联合实业界知名人士，创设了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该所由章乃器任所长，从事研究、征信工作，并出版了刊物。抗战胜利以后，该所迁回上海，编写了上海工厂名录，供给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参考。上海解放后，该所交由华东财委接收。

抗战期间，币值不断下跌，物价不断上涨。按币值计算，盈余甚多；按实物计算，亏损甚巨。工矿企业不断受虚盈实税之累。为了纠正这种不合理的征税方法，我提出，所有工矿企业固定资产的增值数字一律转作股本，不得征税的建议。这项建议，由迁川工厂联合会提请第二次全国生产会议制定方案，经由国民

政府经济部、财政部拟具办法，复经行政院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先后审核通过。但直到抗战胜利，终未见诸实行。同时，我对所得税简化稽征办法也曾著文提出改进意见，发表在《迁川工厂联合会会讯》上，也未引起国民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

### 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教导

早在1925年和1926年，在上海同济大学学习的时候，我因参加了“五·卅”和“三·一八”爱国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到北京时，一个偶然的机，我认识了共产党员张友渔、韩幽桐夫妇。以后我和爱人高静宜留学日本时，又同他们夫妇俩常有往来。抗战期间，我在重庆除经常和他们见面外，又认识了在《新华日报》社工作的陆诒、许涤新等同志和一些记者。随后，我和董老、林老、徐冰、张晓梅、彭友今等同志有了接触，所有这些交往和接触，对于我认清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很大的帮助。

1945年日本投降后，毛泽东主席为了国内和平偕同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于1945年8月28日飞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在国共双方进行谈判的百忙中间，毛泽东同志于9月17日下午在重庆张治中将军的住宅桂园举行茶会，接见了刘鸿生、潘昌猷、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章乃器、范旭东等七位实业界代表人士。随后，我和胡厥文等人在重庆民主人士鲜特生住宅特园，宴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同志。不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又在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举行茶会，接见了重庆工商界各团体负责人，我也有幸参加了接见。在历次会见中，毛主席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的方针，使在座的多数工商界人士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和对毛泽东主席的爱戴。同年10月19日，周恩来同志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在星五聚餐会上发表了《当前经济形势》的演讲，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经

济政策，为民族工商业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工商界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同志的历次会见和谈话，对我教益极大。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希望避免内战，愿意和平合作共建新中国的诚意；了解到对日抗战，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开辟的敌后战场，抗击了大部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决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认识到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下，各民主党派是无法存在的，政治民主也无法实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要消灭资本主义，而是对民族工商业采取保护的政策。这也就减少了我的一些不必要的顾虑。

### 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产生和斗争

在旧中国，工商界是不问政治，“莫谈国事”的。1944年中，日寇深入贵州，军事形势愈形恶化。在后方的一些民族工业家如胡厥文等都感到愤慨和不安。大家认为，国家安危已到了严重关头，工商界再不应坐视不问，必须公开发表主张，以冀挽救危局。于是，我和另外几个人负责起草对时局的声明，以迁川工厂联合会等五个工业团体的名义公开发表。声明提出了十项政治主张，主要是要求国共合作，组织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改善新兵待遇，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等等。这是旧中国工商界公开发表的第一个政治宣言，引起了国民党的震动。

接着，我参加了由黄炎培、孙起孟等64人联名发表《为转换当前局势献言》，就当时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向当局提出了意见20条。其中大声疾呼准许各政党公开活动，彼此推诚合作，切实保障民权，释放政治犯等。

1945年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的艰苦抗战结束了。全国人民要求民主，反对独裁，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呼声，不断高涨。素与工商界有密切联系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人黄炎培，约集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以及章乃器和我等若干人士，共

同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该会于同年12月16日在重庆成立，我被推选为常务理事之一。

抗战胜利以后，由于一时间物价暴跌，市场萧条，金融奇紧，国民党政府又停止了军需物资的定货，使后方民营工业周转困难，发生停工关厂的危机。1945年10月31日，迁川工厂联合会和全国工业协会联合召开会员大会，发表了《后方工业界对目前紧急情势宣言》，要求政府继续定货，发放紧急工贷，并呼吁停止内战。散会后，请愿团108人，到行政院请愿，毫无结果。11月5日，胡厥文、胡西园和我代表工业界，面见蒋介石，提出9条具体建议。几经周折，政府发放了紧急工贷50亿元，使一些停工工厂渡过了难关，有一些工厂陆续迁回上海。

### 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1947年以后，国民党特务加紧对民主党派的迫害，民建会转入地下工作。当时我在上海，在反蒋的各种民主运动中，我与黄炎培、胡厥文、盛丕华、孙晓村、胡子婴、金学成等民建会负责人以及中共地下党员张锡昌等经常有联系。1948年“五·一”节，中共中央发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迅速获得各民主党派的响应。

1948年冬，中共上海负责人通知我，要我离沪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我感到自己代表性不够，德才不称，难以胜任。经过孙晓村、金学成的鼓励，我才于1949年元旦偕同夫人和子女三人，以去南洋为名离沪赴港。在港与潘汉年，许涤新、连贯等取得联系，并参与了民建港九分会的筹备工作。港九分会成立大会开过之后，2月间我搭一艘500吨的小轮船离港北上，在烟台换乘敞篷汽车绕道天津，于3月8日到达北平。我受到中共领导同志林伯渠、李维汉的接见，参加各种报告会、座谈会，学习解放区颁布的各项政策法规，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3月25日，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来北平，我同各界民主人士到西苑机场迎

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满面笑容地和大家握手问好。解放的喜悦，令人难忘。

同年4月间，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在平各界民主人士59人，组成“民主东北参观团”，到东北老解放区参观访问。李维汉部长嘱我担任团长，统战部于刚、管易文、何成湘三同志担任副团长。参观团一行由南到北，先后访问了旅大、鞍山、本溪、安东、沈阳、抚顺、长春、吉林、小丰满、哈尔滨各城市，受到当地党政领导同志的盛情接待，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6月8日，参观团回到北平，联名写信给毛主席陈述感想，并表示敬意。

我于6月15日至17日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9月21日至30日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我衷心地感到无上光荣和幸福。我亲耳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讲坛上用震动世界的声音庄严地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亲眼见到首都30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庆祝开国盛典的狂欢景象。而今虽已时隔近36年，仍然记忆犹新。

### **解除顾虑，奔上社会主义大道**

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工商界代表，连我在内共15人。这些人中是否都没有思想顾虑呢？我想其中一部分人还是有顾虑的。一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能搞多久？也就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能存在多久呢？当时工商界连我在内，曾以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存在三五十年。随着国营经济的逐步发展和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深入，才觉得我们的想法不合实际。另一个问题是，工商界曾有人认为，到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人民政协这样的组织就不需要了。后来周总理解释说：政协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政协仍将是一个协商机构而继续存在。毛主席也明确指出，只要在人民还有需要的时候为人民做好事，而且一贯地做下去，到将



来社会主义建成的时候，党和政府是不会不给人们以效力的机会的。

共产党的政策在我身上得到了完全的实现。从第二届起，我是历届全国政协委员，从第五届起，我还被推选为常务委员。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就被任命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私营企业局副局长，成为国家的干部。在中财委的领导下，私营企业局拟订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和《实施细则》以及《私营企业重估财产调整资本办法》，于1950年和1951年先后由中财委予以公布。

早在1949年6月，我以一套生产铅笔设备作为投资，与哈尔滨企业公司合资创办了公私合营哈尔滨中国铅笔公司。翌年7月，我的中国标准铅笔公司经我申请，被批准为公私合营企业，从而走上了社会主义光明大道。1954年9月，我奉调担任上海中国铅笔公司经理；1955年，我担任第一个全国工业专业公司——上海制笔公司的经理。从1958年起，我奉调回京，在民建会中常委会任常委。

建国以来，虽然国家遭到十年浩劫，但经中共中央拨乱反正，党的统一战线已经更加广泛、更加发展，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欣逢盛世，无限振奋。我虽已年近八旬，衰老多病，仍当重视学习，量力工作，为四化建设发挥余光余热。

1985年

# 奔向新中国

## ——记爱国银行家资耀华\*解放前夕由美归来

力伯雄

1948年冬，解放军发动平津战役，有钱人纷纷出走，到处流传着北平至上海班机即将停航的消息。

### 由美返津，迎接解放

正当局势紧张的时候，上海银行华北区行经理资耀华中断了在美国的金融研究工作，急急忙忙地由美国直飞上海，又从上海搭乘最后一班航机，飞到北平，转回天津。

资耀华返津消息在金融界不胫而走，引起纷纷议论。有人说：“在这紧张时刻，有办法的人都已先后出走，唯有资耀华却自愿回来，实在令人费解！”这话很快就传到他的耳边，他回答说：“我是来迎接解放的！”

有人为此登门造访，询问真情。他说：“我怀着共产党可以救中国的信念，抱着愿为新中国做贡献的决心而来。”他诚恳地劝说朋友们不要走。例如盐业银行经理陈亦侯、招商局局长张庆枬、华北电讯局局长黄如祖等人，本来对去留问题一直犹豫不决，最后终于留了下来，这和资的劝说或多或少有些关系。

---

\* 资耀华，曾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华北区管辖行经理、中国旅行社华北区经理、天津东亚毛纺织厂常务董事、天津济安自来水公司常务董事。建国后曾任上海银行总行总经理。现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驻会常委、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交通银行副董事长、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

解放前，资耀华交游很广，可以说“座上客常满”。其中有的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现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定（当时公开身份是《大公报》记者）就是他家的座上客，对他思想的进步帮助很大。

### 为天津的金融、外贸工作献计献策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1月16日，李定即驱车来到资耀华家，邀他一同前往天津市军管会金融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负责人曾凌、何松亭、尚明等在那里接见了她，并就解放后的金融和外贸政策征求她的意见。他以极其坦率的态度就以下几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中国银行的存废问题。他认为，中国银行在国际上有一定的信誉，应保留这块牌子为新中国所用，这对于发展国际贸易有好处。

关于金融业的复业问题。他建议大力支持全部银行、钱庄复业，即使个别钱庄复业有困难，亦应予以维持，这对于恢复市场、繁荣经济有好处。

关于伪币流通问题。他主张把回收的伪币送到使用伪币的华北农村和国民党统治区，换回土特产品和我方所需要的物资。这不仅可以丰富我方的城市供应，而且可以满足出口需要。

关于伪币兑换问题。他主张规定两种兑换率，一个是一般兑换率，一个是优惠兑换率。前者供工商企业兑换之用，后者供市民兑换之用。

以后不久，大约是1月22日，人民银行采纳了他的意见，把一般兑换率规定为6：1，以后又两次变更为8：1和10：1；至于优惠兑换率则始终保持为3：1的比率不变，在公布后10天内，凡工人、学生、职员、市民等都可享受优待。这一有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措施深受市民的欢迎。

## 代理中国银行外汇业务

中国银行是国民党政府指定的国家外汇银行。但自天津解放以后，中国银行中断了海外关系，外汇业务一时无法进行。其他在天津的华商外汇银行，也有同样的困难，因而影响了天津外贸业务的开展。当时只有上海银行不仅继续保持着同海外的联系，而且有熟悉外汇业务的人手，具有承办国际清算业务的条件。为此，资耀华主动提出由上海银行代理中国银行外汇业务的建议，得到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意，为开展天津地区外贸业务作出了贡献。

## 为开拓新中国外贸业务尽心竭力

上海银行被批准代理中国银行外汇业务后，全体行员自觉地加班加点，辛勤工作。资耀华一面继续抽调人手，充实外汇部的力量，一面要求上海银行总行立即拨给天津分行外汇25万元，增加周转资金。同时，他深入实际，随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顺利地完成了代理任务。

与此同时，上海银行还加强了国际经济信息的联系，每日由香港上海银行电告当地和海外市场物价动态以及美国道琼指数的变化情况。凡是有关此项经济消息的来电，他都要亲自过目。

在天津外贸业务逐步恢复、日益发展的过程中，中国银行照例于每星期六下午召开华商外汇银行座谈会，交换有关国内外市场的情况和意见。资耀华每会必到。他早年留学日本和美国，专攻经济学，获硕士学位，并撰有《国外汇兑》、《英美银行制度》等多种著作。解放以后，他努力学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随时掌握国内外经济信息，因而他的发言深受与会者的重视。

1949年3月前后，天津外贸管理局成立，外汇和外贸管理办法相继公布。4月18日，天津外汇交易所正式成立。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分别担任交易所的主任和第一副主任。在交易所开幕前夕，受中国银行的委托，上海银行以副主任名义召集各中外指定

银行，举行座谈会，讨论新公布的外汇管理办法，征求对外汇管理工作的意见。座谈会由资耀华亲自主持。会上打破了解放前使用外语交谈的旧习惯，所有外商银行经理的发言一律由陪同翻译人员译成汉语。会上气氛严肃认真，一扫解放前中外银行开会时由外商银行经理指手划脚、目空一切的情况。

### **建议取消进口托购证制，一律改为信用证制**

在外商银行控制外汇业务的旧中国，我国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经常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比如，外商从我国出口货物时，是用银行信用证付款。但华商从外国进口货物时，外国银行只肯开给托购证，不肯开给信用证。照国际惯例，托购证比信用证垫款多，利息负担重，在国际市场上不受欢迎，因而使我国进口商人经常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解放以后，我国国际地位提高了，掌握了外贸的自主权。资耀华看到改变这种不合理制度的时机已经到来，曾多次向中国银行提出建议，要以平等互利的信用证制度代替不合理的托购证制度。1950年冬，这项建议得到批准。中国银行委托上海银行试行。

考虑到当时的国际环境，资耀华首先从瑞士做起，并征得瑞士代理行的同意，将中瑞双方的进出口贸易，一律采用银行信用证付款办法。但由于此后不久，国内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此项改革不得不停止开展。但长期存在的不合理的托购证制从此被冲破了。

### **争取公私合营，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早在1949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北平召开的欢迎民主人士和庆祝北平和平解放的大会上，资耀华曾向天津市长黄敬和民主人士章乃器反映当时金融界的情况，以及他争取上海银行实现公私合营的设想。

同年9月，他被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

议，他和黄敬市长共同讨论了《共同纲领》有关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共同纲领》规定：“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这更坚定了他争取公私合营的信心和决心。

1950年4月，资耀华被任命为上海银行总经理，从此他更为积极地为实现上海银行公私合营而积极奔走。在此后不久的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上，资耀华再一次提出公私合营的要求。黄敬市长表示可以由上海银行试点，先行一步。当即介绍他去北京向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和私营企业局副局长千家驹商谈，得到他们的赞许。与此同时，人民银行顾问章乃器也已同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交换过意见。因此，当南汉宸会见资耀华时，当场表示可以考虑由国家出资购买上海银行的股票。

为此资耀华几次前往香港，与逗留在那里的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和董事们，共同讨论公私合营问题和具体措施。他提出把总管理处由上海迁往北京，并由人民银行派员参加上海银行董事会等建议。他们对此表示同意并派常务董事朱如堂和徐谢康来京。经过多次商谈，1950年5月31日上海银行提出申请，经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送呈周总理，获得批准。1950年9月1日，上海银行正式成为解放后第一家公私合营银行，为其他私营银行进行公私合营树立了榜样。金融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他担任了合营银行总管理处的副总经理。

资耀华现届85高龄，每天还坚持半天工作。他深深感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作为一个炎黄子孙，能够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无比幸福。

1985年

# 我象一滴水

柏岳\*

我出身于小学教师家庭，童年时代家境贫寒，因而在家乡解放时，比较容易接近革命，促使我参加了政治干部训练班，学到了一些革命道理。但是，在结业前动员我们参加民运工作队去搞土改时，由于我对革命的认识肤浅，还有些旧观念以及对土改中某些做法有看法，因而没有参加。谁知这一念之差，一步之错，竟成了进入不同阶级的分水线。后来我进了工厂，由于有文化很快掌握了技术，博得资本家的青睐，给了我人力股，从而进入了资本家的行列。这样，我就成了革命浪潮中溅出的一滴水。

然而，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特别是两年后，我一跃当上了哈尔滨一家奖章厂的经理时，年仅24岁。1949年北京召开第一届政协会议时，我曾代表全厂向全体政协委员赠送了特制的纪念章，在中南海受到齐燕铭、周子健、王炳南等同志的接见和设宴招待。这时，我自以为少年腾达，颇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之感。何况经营一帆风顺，又在北京开设了分厂，我心里真是美滋滋的。

正当我踌躇满志时，不料“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在党的教育和群众帮助下，我象吃了一剂大败毒剂，猛醒过来。一想年纪尚轻，“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应“迷途知返”。我随即写信给股东会，要求把人力股所得红利全部上缴国家，并立志考大学，但未果。公私合营时这份红利作了我的股金，但我始终未领过分

\* 柏岳，曾任哈尔滨再励奖章厂经理，北京朝阳电机厂经理。现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常委、中央执行局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文股息。

运动过去了，由于北京市机电、五金同业公会主委成了“大老虎”，我这副主委只好挑起了主委的担子，响应政府号召，搞好生产。当时要把几百个小厂联营起来，由于余悸未消，谁都不肯当经理。经资方要求和工商局同志的动员，我被聘为由十来个小厂联营的朝阳电机厂的经理。这次，我成了不要人力股的资方代理人。这个厂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生产不断发展，一年多后，成为北京市机电行业中第一个公私合营厂。在清产核资中，公私协商，公平合理，一些重大设备私方作价还低于公方。有的厂一年多才搞完，而我厂只用了一个多月就顺利完成了，做到了双方满意。由于带了好头，领导要我写了一篇题为《并厂合营是私营工业企业争取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文章，刊在《工商界》及《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怎样争取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一书中，对观望、等待的经理们起了促进作用。后来，据说毛主席曾看了这个厂合营的总结，陈云同志也在一次人数不多的会上听了这个厂党支部书记的汇报。

合营后怎样当好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人，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新课题。我决定重新学习，向公方厂长学习。公方厂长裴仁同志原则性强，处事果断，深入细致，群众关系好。但开始共事时，我有顾虑，常常话到舌边留半句，把自己当作“外人”，工作也不大胆。裴仁同志说：“你是副厂长，是厂的领导人，这里不存在政府对你信不信任的问题。”如我管总务，食堂没搞好，我就常到外面去吃饭。他建议我还是在厂里吃，可以了解情况。他还点名要总务科长下食堂，我则认为一个大学生下厨房岂不大材小用？不料那位科长下去不多久，伙食竟搞好了，群众纷纷写稿表扬他，使我很受教育。厂里生产的配电箱售出后，订户认为不合用，要求返修。我们都不同意，因为订户是看过图纸并同意的。但裴仁同志说：“订户是外行，我们是内行，错了我们也有责任，何况我们生产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由于他的帮



助，我的认识不断提高，我们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了。在1957年工商界重谈“如何正确处理公私关系”时，《人民日报》记者叶剑韵访问了我，并在5月29日《人民日报》上刊载了我们的谈话：《我和公方代表之间》。

1955年下半年，北京市机电行业进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试点，我担任了行业的私方代表。由于毛主席“要认清形势”、“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教导深入人心，和平赎买政策符合人民利益，试点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又由于在清产核资中创造了由职工帮助清点，资方自己作价的核资定股方法，使得在过去合营中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在几天之内就顺利完成了。这是党和政府对工商界和两会组织的信任，也是党对我们教育改造的结果。据闻，1956年初，在几天之内完成的全国范围的公私合营，就是党中央研究了这一经验之后决定行动的。所以，北京市机电行业的公私合营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试点工作，它加快了社会主义的进程。

饮水思源。我这在革命浪潮中溅出的一滴水，在共产党的和平改造政策下，经过蒸腾转化，又重新回到了革命的洪流之中。我将按照党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把有生之年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983年

# 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

## ——实业家刘鸿生\*逝世半个月前 对新闻记者的谈话

杨 友

过了今年（1956年），我就70岁了。俗语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特别是对患有严重心脏病的我，这句话就更有意义。在过去半个动荡不安的世纪中，我曾被人称为中国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企业大王”……。今年年初，我2000多万元资本的全部企业都公私合营了，这是我以实际的行动拥护共产党。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呢？

### 从买办到“大王”

我们这一辈的人大概都会有同感，人生的经历是复杂曲折的。我并不是生在一个资本家的家庭中，记得19岁我读完圣约翰大学一年级时，我多年守寡的老母几乎把家当变卖光了。为了担负起家用，我踏上了社会，吃上了所谓“洋饭”。不久，我作了开滦煤矿的买办。开滦煤矿当时在英国人的手中，销路不好。我曾绞尽脑汁，使开滦的煤在长江流域上打开销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战争的破坏，各国工业都受了影响。国内工业包括外

---

\* 刘鸿生，原鸿生企业集团总负责人。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民建上海市委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

商工业有了突然发展，煤的需要量大大增加，因此开滦的煤大量倾销。按照合同，由于煤的销售量增加，我的收入突然大增。同时，战争期间，轮船缺少，我租了轮船运煤，获利很大。短短几年的推销煤炭工作，使我突然从一个贫寒的大学生成了百万富翁。究竟有多少钱落入外国人的腰包呢？老实说，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这点。40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觉得这是最使我痛心的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出现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那时候我还很年轻，虽然口袋中的钞票很多，但我毕竟是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在短短的买办生涯中，使我感到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我觉得中国之所以受气，是因为没有工业、没有科学。因此就想利用口袋中的现钞做点事。同时，在我作推销煤炭的工作中，使我接触到了生活的另一面。我押着煤船逆江而上，在沿江的小镇上推销煤和收帐的日子中，有一次几乎被成千的以打柴为生的山民包围起来打死。因为廉价的煤夺去了他们的生计。这件事多少使我感到“一人享福、万人受苦”的日子是过不太平的。

我的第一个企业是鸿生火柴厂。由于市面上充斥着“凤凰”牌的瑞典火柴和“猴”牌的日本火柴，鸿生火柴厂的火柴出来后，推销工作立刻受到障碍。为了和外国火柴竞争市场，我用高价请了化学工程师，改进技术，提高质量，压低价格。同时和火柴同业组成了全国火柴联合会来共同抵制外货。经过了一年多的斗争，国货火柴在市面上取得了优势。但是真正使我第一个企业成功的主要原因，是那时的爱国运动的发展，当时每个人都愿意买国货。

当中国火柴在市场上打垮了“猴”牌并使“凤凰”牌火柴的销售量受到限制以后，火柴企业在国内就大有起色。国内的火柴企业开始彼此竞争市场。我感到，这样下去新厂不断出现，那么鸿生火柴厂总也要受到威胁。因此我就想法子迫使几个较大规模

的工厂和鸿生厂合并，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在全国各地设立事务所，掌握了广阔的市场。当地的许多小厂，吃不住这样的竞争，有的被挤垮了，有的被我们收买了进来。不到几年，我就被称为全国的“火柴大王”。

我相信所有的资本家都有这样一个癖好，那就是总希望一个企业变成两个，两个变三个……。

我办企业获得成功后，信心鼓舞着我又去投资水泥业、毛纺织业、搪瓷业等等。在我40岁上，已经是全国知名的实业家了，拥有不少企业。

### 两次交锋不利

大约27年前，我结识了年轻的地质学家丁文江，他告诉我在徐州附近的贾汪煤矿，煤量很大，煤质量也很好。他对我说，这片煤矿将来可以抵得上开滦煤矿。说实话，我在开滦工作了20多年，总盼望自己能拥有一片煤矿和开滦抗争。因此，我用200万投资到贾汪煤矿去。然而由于当时的铁路和政权都掌握在军阀手中，治安、运输、开采都有很大的困难。煤矿一直没有很大的发展，这位地质学家的预言在他生前并没有实现。直到20几年后的今天，煤矿公私合营之后，在贾汪煤矿真正发现了新的矿苗，现在正很快地发展业务。

在1926年左右，中国市场上充满了外国的毛纺品。我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收买了一家旧的毛纺厂。当时我想，出产高级呢绒在国内无人竞争，可以取得厚利，但是这家毛纺厂成立后却年年亏本。后来，在我一生中最有兴趣的企业是毛纺业。朋友们说我对毛纺业着迷，原因是我想尽各种办法为我的章华厂的呢绒寻找市场。我亲自研究了毛条、纺纱、染整等各种技术，以使呢绒在质量上抵得过外国货。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上海，穿得起呢绒的人们，习惯性的只认识外国货。尽管章华的呢绒在质量上已能与外国货相比，却仍然找不到主顾。那时我把呢绒卖给在上海的

呢绒商包括外商，他们采取冒牌的手段，把章华的商标剪掉，冒充外国货。这措施使得上海各大商店中都采用了远比外国货价格低廉的冒牌货——章华厂的出品。

### 和宋子文打交道

接着我又投资创办了企业银行。朋友们称我为“点金石”，我自己也常常说：“我的企业只有开的，没有关的。”的确，在旧社会中我算得上是一个精明强干的资本家，可是有钱的人不结交几个当时的大老板是站不住脚的，而我这块“点金石”对大老板们也还有些用处，早在30多年前，我和T·V·宋（即宋子文）交上了朋友。

1932年，世界经济危机的余波传到了中国，当时银根正紧，宋要我出来在上海维持场面，作招商局总办。他一口允诺，我在企业上的一切问题由他包下来。宋是中国真正数一、数二的大老板。在这样的互惠条件下，我放下了自己的实业出去作了官。1935年国内许多厂矿纷纷倒闭，刘氏企业的全部产业已都抵押在银行中。外面风声传说刘鸿生要倒，银行首先来要求收回债款。我不得不去找宋，希望能将全部财产抵押给中国银行。那真是我一生难忘的一个夜晚！宋忽然改变了面孔问我：“你用什么作抵押呢？”

“我全部企业的股票！”

宋嘲笑地说：“O.S.（即刘鸿生的名字）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

我回到家中告诉孩子们：“船沉之前，吃饱了米的老鼠总是先跑掉的，我只不过作了宋的伙计而已。”

那一年，我们差不多天天过“年三十”，总有人来逼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的亲人也对我失去了信心，连我的弟弟也要从我的帐房中提取他11万的现金存款。我当时不得不送90多万的银行股票到他那儿去作抵押。在旧社会中，人为了钱可以变得冷酷

无情。

一年以后，市场从萧条转到好转，宋派人示意给我，要支持我组织企业大托拉斯，我不敢再冒险了。

### 抗战前后

1937年，中日关系已经非常紧张。大敌当前，我不得不丢掉了赚钱的念头。抗日斗争爆发后，我丢下了在上海的企业，逃往香港。蒋介石打电报要我去重庆，他开始给我一张空头支票，答应偿还我企业上的一切损失。如果我到内地去办厂，当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援。当时，我相信了他的话，就通知我在上海的企业用了种种办法，把厂里的机器偷运出来。

我到重庆之后，很快就发现了一条规律：所谓大后方的企业，事实上是由官僚资本控制的。我在重庆办的中国毛纺织厂、火柴原料厂及在兰州办的西北毛纺织厂，都有官僚资本投资。我原来在上海是大老板，到了重庆却成了大老板的伙计。我并没有得到蒋政府的支援，倒为当时的大老板赚了一笔国难财。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美货大批运到西南、西北，那边的两个厂已经完全失去了市场。为了维持这个企业，我曾向四联总处贷款，回答是只能借给解雇工人费用。

回到上海后，我到善后救济总署作署长。许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去搞这个事情，然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讲老实话，我当时觉得担任这项工作可以取得同宋子文等官僚讲价钱的条件，就此使自己庞大的企业借借光。我的企业当时都需要外汇，需要机器，因此我们又再度合作了。不久我发现善后救济总署中的一些机器器材都是从菲律宾、南洋一带运来的所谓“战后剩余物资”，全是些残缺不全的机件，用这些机件是无法使工厂冒烟的。后来，虽然我的水泥厂装备好美国机器，仍然无法开工。即使短短的开工，也无法和市面上大量倾销的美国水泥竞争，美国水泥50公斤一包，只售1.80元，我们自己的水泥成本就达3元。然而

这时我们的码头生意却大发其财，栈房里堆满了美国水泥、毛纺、面粉等物资。最后，我们的水泥厂只好关门，变成了一片仓库，专存美国的剩余物资！

如果从生意人的角度说，那几年我确实是赚了一笔钱。但是从一个搞实业的人来说，我的企业在那几年中几乎全部停顿了。因为当时只要生产，必定赔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投机。由于币值不稳定，市场上的风暴很大，每天拿起电话来，可能赚进几十万，也可能赔成个穷光蛋。1948年国民党政府搞的金圆券政策，从我们的手中捞去了大量的美钞和黄金。当时我的一个老朋友儿子被关了进去，用几百根金条才赎了出来。

### 香港 去 来

1946年以后，国内的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解放战争在全国展开。当时我感到非常矛盾，过去40年的经验使我深知蒋介石是长不了的，跟着他跑只有死路一条；我也并不想流落国外作“白华”。然而，我那时不但不能相信共产党，而且怕他，怕共产党来了要清算我。当时，上海民主人士曾示意要我留下，我也有意留下。但是，上海解放前三天的夜晚10点多钟，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派了军用车来押我，要我立刻离开上海。我连行李都来不及收拾就被押上了军用飞机，到了广州。为了怕他们把我弄到台湾去，我从那儿溜到了香港。

上海解放后没有几天，我的二儿子刘念义到香港来接我，他对我说回去绝无危险，并且一再描述上海解放后秩序良好，我们的企业正在恢复等等。说实话，我当时是很想回国的。我已经说过我不想作“白华”，我的企业又都在国内。我已经是60出头的老人了，儿孙都盼望我回去，一个人流落在海外有什么出路。但是，当时在香港的一些资本家正在彼此观望，谁都不愿意先走一步。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朋友说：“共产党什么都有办法，只是经济问题没办法。”我也觉得他的话有些道理，因此又踌躇起来。念义

在香港等了两个月，我一直没有答应他“走”或“不走”。直到念义决定单独回上海，临行那天，我才下定决心乘船转回上海。

### 对共产党的第一个印象

我到达北京后，周恩来总理约我去谈话。这是我解放后第一次会见共产党的高级首长。周恩来总理诚恳、坦率的谈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不但没有随便地许下诺言，而且坦率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老实说，我当时还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意见，但是他的坦率已经使我开始消除对共产党的疑虑，增长了一点信心。因为我过去40年出入官府，从来没听过这么诚恳和坦率的言论，我觉得共产党有些不同。

但是到上海之后，我感到很失望。我满脑子想很快地将一个工厂变成两个，两个变三个……。但刚刚解放后的上海，情况却并不那么理想。国民党走的时候，把一些企业的设备拉走的拉走，破坏的破坏；由于敌人的封锁，原料无法进来；而且刚刚解放，有钱人跑了许多，广大人民的购买力也不高，这些都造成了发展企业的困难。不久，“二·六”大轰炸，这时我想共产党这么快拿下了大陆，是不是守得住呢？同时，那位在香港的朋友的话又响在我耳旁了。然而，有些事我却也不得不佩服共产党。上海的“二白一黑”（米、棉花、煤）是长久以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多年来市场上难以稳定价格。共产党虽然是空手打下了上海，却很快地解决了这个和上海人民生活关系最密切的问题。我的企业当时都在困难中，由人民银行贷款帮助稳定了企业。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人民政府也不曾亏待我，只是当时我对大局的看法仍然是动摇的。

### 在两次风暴中

1950年下半年，全国展开了“抗美援朝”运动。在起初的那些日子里，我每日心事重重。我一生对帝国主义是又怕、又恨、



又崇拜。我自己以为是既知道中国人，又懂得外国人。美国是全世界的大老板，碰碰别人可以，为什么要去碰这位大老板呢？我觉得这是一种冒险行为。傍晚时光，推开窗户看见灯光辉煌的上海，我总怕它很快就要变成一片废墟，过去50年的建设都会化成乌有。有一天，一位研究国际问题的朋友对我讲，毛主席说“美帝是纸老虎”，劝我不必恐惧。我心里觉得有些道理，但还是将信将疑。志愿军过了鸭绿江以后，不久捷报传来，这位大老板被朝中人民打败了。我开始感到无比的兴奋，因为外国人从来就看不起中国人，如今是中国人抬头的辰光了。接着我又有些怀疑，这些消息是不是真实的呢？我的儿子念义曾到朝鲜去看了实际情况，他回来谈的比报纸上的还要动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作一个中国人是值得骄傲的。

那一年企业开始好转了，章华毛纺厂、水泥厂，都有一些发展。国内的购买力已逐步提高，部分原料问题已可以在国内解决。西南的厂子由于大部分是官僚资本投资，很快就公私合营了，这些自从抗日战争胜利后就停工的工厂，不但开了工，而且不断地增加了设备。整个国家经济情况显然有了起色。这时候，我就感到又可以扩大企业，自由经营了。

“五反”运动开始时，我很感震动。我当时生病在家中，并没有参加斗争，李维汉部长、盛丕华副市长到家中来看我。我的全部企业都受了检查，这使我很不痛快。我告诉我的儿子们：“如今国家有了前途，共产党在经济问题上也很有办法，不要我们资产阶级这个朋友了。你们各自想办法吧！”我心中觉得大概象我这样做过各种各样事情的人，早晚要被清算掉的。然而“五反”运动结束后，由于刘氏的企业在这几年中没有什么违法行为，全部都是守法户，这使我对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态度很服贴。回想起来，我是很感谢“五反”运动的。你知道凡是过去生长在上海的人都会感到，上海大概是最复杂最可怕的地方。我曾和朋友谈过，“上海的风气很难改变，除非连根挖才行”，但谁能有这个力

量？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我出入有6个保镖，还是感到不安全。“五反”运动真的把一切腐朽思想的根子挖掉了，社会风气有了很大的改变，人们可以不必提心吊胆地生活了。此外，过去我感到逐渐壮大起来的国营企业对我的企业发展是莫大的威胁，思想上搞不通，觉得如此声势逼人那还有什么搞头？在“五反”中的许多具体事例使我感到，私营企业如果不在国营企业的领导下发展，不逐渐纳入国家的计划轨道，依然会走到盲目竞争，互相倾轧的老路上去，那样私营企业仍然没有保障。“五反”运动并没有清算我，而且不久我还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奇迹”的出现

1953年是上海工商界、可能也是全国工商界常常谈起的“难忘的1953年”。刘家的企业普遍有了好转。“五反”过后，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原料，可以及时的供应给工厂，物价也非常稳定，这对所有的企业家都是最大的保障。国家的大规模建设开始了，水泥业、煤矿业首先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盛况。我的水泥厂的机器都是30多年的老机器了，我想这个厂的产品已无法打破全盛时代的每月1万吨的指标。但是，在全厂职工支持国家建设的热情下，产量竟达到了18000吨左右。水泥厂中的主要设备大窑，一般只能维持180天到200天就需要大大地翻修一次。过去，多半是不到180天就需要整修。这几年水泥厂的工人想出办法来自己修理大窑，而且能够维持连续使用300天。这使我深有感触，过去我总以为工厂办得好坏，主要是靠资本家精明强干的经营和个别专家的技术。新的事物使我理解到，没有成百上千的工人的智慧，要使工厂增加生产是困难的。

这一年最使我兴奋的一件事是章华毛纺厂的呢绒出口了，这是我一生中的梦想。在章华的产品不得不冒充外国货时，我就总盼望有一天章华的呢绒能到国际市场上去比一比。这一年的9月16日，政府贸易部门向章华订货出口呢绒12万公尺，在3个月内交

货。这个订货使我又兴奋、又担心。因为章华的产量每月总在2万公尺到3万公尺之间，如今突然要增产1/3，按照我的看法是很难完成这个任务的，但是章华厂的900多职工却欣然地承应了这份光荣的任务。这年年底，12万公尺的高等呢绒打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的金色大字商标，送到了国际市场上，立刻受到了外国顾客的欢迎。如今章华厂每月的产量已达11万公尺以上，它的很大一部分产品都是出口货。我是一个中国的企业家，你可以想象到我是多么骄傲、快活和感激。有一天，我的儿子从市场上回来，他笑着告诉我，在旧货摊上看到几段外国呢绒，事实上是章华的冒牌货。我告诉他：“现在和过去是很不一样了。过去，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有些中国人自己也瞧不起中国人！从此以后，我们的子孙再也不会遭受那样的命运了。”

### 可以放心了

解放以后，刘氏企业开始公私合营，到了1956年初全部公私合营了。有的朋友说我心中实在是舍不得的，我告诉你实话：西南、西北几个企业由于有官僚资本投资，很早就公私合营了，那些企业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的梦想。这几年来，上海的企业也在很快地发展。我有过几十年办厂的经验，因此深知照目前的规模发展，即使我有青年时的精力，要想独自担当下来也有困难。这几年我身体不好，企业中的事务都交给我几个儿子了。俗语说：“知子莫如父”，我为了保存企业，曾经亲自训练几个儿子管理企业。然而，“富贵出娇儿”，过去我的孩子都不肯勤勤恳恳地管理企业。如今在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下，他们原来作经理的仍然作经理，有职有权。而过去由我参加建立起来的一片企业正在不断地增加冒烟的烟筒，为什么我不愿意？我已经是靠70岁的人了，我有10个儿子、3个女儿。我过去总担着心事，怕这份家业要败在孩子手上，他们说说不定会变成瘪三。我的岳父是老牌的火柴大王，他留给我郎舅至少有15万两白银。我眼看着这位郎舅，在短

短十几年中就完全败光，最后在我家寄食。每次我看见他的时候，总想我的儿女中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人呢？在旧社会中，我不知看了多少人家的盛衰。去年，毛泽东主席提出资本家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句话使我心弦振动，在过去哪一个资本家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呢？即使他侥幸成功了，谁又知道他的子孙命运如何呢？在中国我还没有看见有过了三代兴旺的资本家。尽管，我对孩子们的教育是十分严肃的，但是我仍然担这份心事。如今，我在国内的孩子们都各有岗位，他们在新社会中都逐渐地真正熟习了专门业务。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媳妇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我的孙子孙女早就带上了红领巾，有四个是全国少年游泳选手。要是我和他们谈股票、利息等等，他们准会大笑我。在他们的头脑中，想的都是一个光明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我是一个老祖父了，可是我知道他们是对的。我看见下一代人的决心，知道那一天会很快来到的。

### 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你问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我是一个企业家，我的企业，无论水泥、毛纺、码头、火柴、煤矿、银行业目前都在发展着，规模远较过去大得多，共产党能推动企业，能使中国变工业化的国家，这是我过去50年的梦想，我为什么不拥护它？解放以后，我个人和我家属生活仍然和过去一样。今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陈云副总理的报告提出私营企业的定息制度，私营企业的资方有5%的定息。我的章华毛纺厂和水泥业、火柴业、码头及其他企业已先后拿到了定息。这笔定息的数字从我们的生活需要看来是相当大的。我告诉孩子们，我不是不愿意他们生活过得更舒适一些，但千万不要走回老路上去！我感到政府的照顾实在太多了。

我拥护共产党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资本家。现在我身体不好，不能陪你去黄浦滩头看看。在过去

几十年中，从杨树浦到南码头，沿着黄浦江一带是各国的码头，一长串的外国兵舰插着各式各样的外国旗。人们走过这里，会不知道这儿究竟是哪国的土地。我自己是搞码头企业的，常常站在码头上摇头。如今呢，这一带每个码头上都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你想想看，一个看过上海50年变迁的中国人，他心中会不高兴吗？

1956年

## “味精大王”吴蕴初\*的心愿

新 寄

吴蕴初1891年出生于江苏嘉定一个教员家庭，因家境贫寒，几度辍学。后考入上海兵工学堂学习化学，半工半读，191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又先后在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汉口焯昌硝碱公司等企业任职。

20年代初，从日本进口的调味品——“味之素”在我国十分畅销，深入千家万户。在上海街道两旁常可看到“味之素”的巨幅广告。吴蕴初从书本里查到，这是一种叫做“谷氨酸钠”的物质，制造并不太困难。他就在家中的亭子间里，由夫人吴仪帮助，着手试制。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摸索，终于试制成功。但他自己没有资金，无法办厂生产。后来经人介绍，他结识了上海酱园业巨商张逸云。双方达成协议，由张出资5000元，由吴出技术，合伙开办上海天厨味精厂。

天厨开办的时候，完全是个小型的家庭工业。两年以后，产品销路逐渐打开。张逸云见味精这个行业利润丰厚，有发展前途，于是与吴蕴初商议增加资本，扩大生产。1923年8月，正式成立合伙公司组织，资本50000元，分为10股，每股5000元。除张氏自占8股外，赠送给吴1股，作为技术酬劳。公司由张逸云任总经理，吴蕴初任经理兼技师，总经理与经理享受同等红利，并订明每生产味精一磅，由吴提取发明费一角。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全国人民掀起了抵制日货高

---

\* 吴蕴初，曾任上海天厨味精厂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后任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市化学原料工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潮，天厨味精销路益增，公司获得了巨额利润。1938年增资为10万元，至1935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时，资本已增加到220万元，其中吴蕴初占有股份50余万元。

味精的原料主要为面筋和盐酸。面筋可在国内生产，盐酸则完全依赖日本供应，不仅运费昂贵，而且随时可被日人卡住脖子。吴蕴初决定自己建厂生产。碰巧当时安南海防有个法国人办的盐酸厂出盘，他就花了9万银洋买了下来，并集资20万元，在上海建成天原电化厂，于1929年开工生产。从此，制造味精所需要的盐酸完全做到自给，天厨味精成为名副其实的完全国货。

天原电化厂是用电解食盐的方法制造盐酸的。在生产盐酸的过程中，同时生产漂白粉和液体烧碱两种工业原料，既抵制了外货的进口，又满足了国内工业上的需要。天原电化厂的建成，是我国民用化学工业的一个新起点，由于市场需求不断扩大，该厂于1931年、1933年、1935年和1937年几度增资扩建。资本额由原来的20万元增加到105万元。

产品产量增加以后，需用的耐酸陶器也日益增加。当时耐酸陶器都是由法国进口的，远道运输，费用昂贵，也容易破损。吴蕴初根据当年在兵工厂生产锰砖的经验，认为耐酸陶器不仅必须自给，也可以自给。1934年，他在上海龙华建设天盛陶器厂，1935年出货。除生产盐酸髻外，还生产化学工业所需要的各种耐酸器皿，填补了我国化学陶器的空白。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吴蕴初在奠定了民用化学工业的基础以后，又开始向国防化学工业进军。他集资100万元在上海开设了天利淡气厂，向美国购进了合成氨厂设备，向法国购进了全套硝酸厂设备。经过亲自试车投产，液氨于1935年出货，硝酸于1936年出货。产品优良，民用工厂纷纷采用。硝酸是制造炸药的原料，吴蕴初为我国国防工业的建设开创了先河。当时我国另一化学巨子范旭东在北方发展制碱工业，时人因有“南吴北范”之誉。

抗战军兴，吴蕴初正在海外。他匆匆回国，应付事变。一方

面，他把大量味精存货运往香港，准备在香港建厂。一方面筹划把天原、天利两厂的主要设备运往后方，响应内迁的号召。同时把天厨厂设备迁进上海法租界，继续进行生产。“做一个中国人，总要对得起自己的国家”，这是他的信念。

在迁川过程中，两厂员工历尽艰苦，部分机件被敌机炸沉在苏州河内。川江险阻，一路迁延耽搁，一直到1939年才陆续到达重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天原电化厂于1940年开工出货，满足后方工业需求。

天厨港厂于1939年开工生产，产品主要行销南洋一带。可惜好景不长，1941年珍珠港事变发生后，即被迫停产撤退。

天厨川厂于1940年开工投产，因当地缺乏面筋，又办了小型面粉厂，解决面筋供应。不久，政府限制小麦供应，改以大豆作原料，维持生产。虽然产量不多，但利润优厚，积累了一部分资金用作战后沪厂复建。

经过近20年的发展，吴蕴初已积累了相当一笔钱财，他商请社会贤达，组成蕴初公益基金委员会，希望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以此来发展国家的化工事业，培养化工人才，也保持自己的企业利润集中、兴旺发达。他对子女说：“发展中国工业靠我一个人做不成大事，事情总得大家来做，我不过是开个头。”“我不想把钱留给你们。为社会上做些有益的事，也为你们消灾。”

抗战期内，吴蕴初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发生接触，特别是曾多次与周恩来见面。

1945年，毛泽东亲率代表团到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王若飞、邓颖超专程到天原厂访问，并代表毛泽东向吴蕴初赠送了陕北根据地的土产：一条毛毯和一些小米、红枣。他们向吴介绍根据地的情况时说：生活虽然艰苦，但上下平等。耐心地解释：“中共不是割地自治，而是为了抗日”，“希望吴先生和我们多接触，增进了解”。他们又说：“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还需要吴先生这样的实业家振兴工业。”吴蕴初听后很有感触，他对家人说：共产党得



人心，将来总是共产党的天下。”他们那些人都是有本领的，不象国民党，太腐败，没有希望。”

从那以后，吴蕴初出门总发现有特务盯梢。有一次，一个自称是进步学生的小特务找上门去，要吴蕴初资助他去解放区。吴蕴初一眼就看出了这家伙的真面目，故意吓唬说：“你是共产党，我要拿你交官。”小特务狼狈不堪，马上辩白自己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还拿出几张证件给吴看，然后灰溜溜地走了。

抗战胜利，吴蕴初回到上海后，收回了天原、天利两个厂，整顿了天厨厂。1946年，天厨厂和天原厂先后恢复生产，还在沪西建了天厨新厂，于1948年投产。天厨港厂也很快恢复了生产。

那时，中共地下党常送一些宣传品给吴蕴初。他对共产党的政策将信将疑。他在广州买了土地，准备建分厂，寻找新的出路。他让儿子吴志超主持上海天厨厂的事务，自己于1948年冬到香港，不久转赴美国。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吴蕴初从美国打电话回国了解情况，得知他的“天字号系统”一切正常，感到欣慰。但是否回国，他还拿不定主意。他觉得，共产党说话是否算数，心里没底。同年秋天，他回到香港，想再听一听，看一看。

在香港，吴蕴初经常收到吴志超报告厂内情况良好的信件，又经过中共党组织的耐心工作和朋友的劝说，终于下定决心，于1950年10月回到北京。

周恩来总理会见了，一见面就说：“味精大王回来了，欢迎欢迎。”还勉励他说，中国的化工事业将会有很大发展，希望他能继续努力。那时，北京的天气已冷，有关领导派人给他做了一套宽大的蓝布棉制服，他对镜自照，欣喜地说：“看来我也象个共产党了”，就拉着儿子进照相馆去照了个相。接着，他还和刘鸿生一起去东北参观，感到昔日孜孜以求的中国工业大发展的时刻终于将要到来了。

11月下旬，他回到上海，厂里职工特地开了大会欢迎他。接

着，他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了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和化学原料工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等职。

因为有官僚资本的投资，天原电化厂已经军管。吴蕴初多年来对厂内大事习惯于一个人说了算，因此总与军代表处不来。后来军代表撤离，他又觉得劳资矛盾不好处理，请求再委派公方代表。1951年，上级派了公方代表担任副经理，以后，他就逐渐摆脱了一般行政工作。

抗美援朝开始后，他积极支持女儿参军，在工商界中产生了很好影响。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中共党组织照顾他，派他参加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回来后知道企业已被定为守法户，他感到安心。

他对人说：“上面认为我有点技术，现在懂技术的实业家不多了，劝我今后可以不必管天原、天厨这些厂，到北京去参加工作，对发展中国化学工业做更多的事。”因此，他打算在北京找房子，迁到北京居住。

1953年4月，吴蕴初的夫人吴仪患癌症在香港去世。噩耗传来，他悼念不已，旧病复发，住进医院。当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曾去探望他。1953年10月15日吴蕴初终因医治无效在沪逝世。

临终前，吴志超曾到医院向他汇报，根据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天厨厂产品已全部交给国家包销。他在病榻上微笑着说：“好，你们今后总得要照国家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这是“味精大王”积一生经验所表达的最后心愿。

1985年

## 盛世如花，前程似锦

刘靖基\*

全国工商联和地方各级工商联一直是工商界的人民团体，但其组成人员的成份，随着形势的发展，在不断发生变化。开始，它主要是由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营人员组成；后来，演变为主要由公私合营企业的私方人员参加；1979年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宣布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根本变化，工商联虽然仍由过去经营工商业的人员组成，但就其成员的成份来说，都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工商联这种性质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平改造方针的伟大胜利，也反映了我们全国工商界长期的愿望。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们怎能不感到由衷的高兴呢？

建国以后，共产党和政府用和平的、赎买的方法，把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改造成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这一实现过程中，全国工商联随着党的对私改造的逐步深入发展，开展工作，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

长期以来，全国工商联紧密结合会的性质的演变和成员在各个时期的特点，进行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不断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鼓励和引导全国资本主义工

\* 刘靖基，曾任常州大成纱厂常务董事兼经理、上海安达纱厂董事兼总经理、南京江南水泥厂董事长、上海大丰纱厂常务董事、裕靖棉织厂经理。现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民建上海市委主任委员，上海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商业者一步一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特别令人难忘的是，1955年全国工商联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教导，推动我们各级工商联组织成员学习，激发了广大成员进一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掀起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实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伟大变革。1956年，我们上海工商界不分昼夜，兴高采烈地敲锣打鼓申请公私合营，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动人、热烈场面，我们都亲身经历。几十年过去了，每念及此，还是记忆犹新，心头感到热呼呼的。

之后，全国工商联在推动地方组织协助党贯彻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同时，又不断推动大家抓紧个人改造，提高对一心一意顾社会主义这一头的认识，要求大家以企业为基地，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在服务中，自觉进行自我教育，加强世界观改造。在这些日子里，尽管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但工作是扎扎实实的，对调动我们成员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加强个人改造的积极性，起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横行的十年，全国工商联和地方各级工商联被迫停止活动，广大成员遭到残酷迫害，绝大多数人经受住了这场严峻的政治考验，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动摇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邓小平同志对此作了“难能可贵”的高度评价，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励。我体会，我们之所以有这种感情，除了由于我们长期受共产党的熏陶和党的政策暖人心之外，同全国工商联和地方各级工商联组织对广大成员的长期帮助也是分不开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在我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之后，全国工商联又领导我们根据会的历史特点和历史作用，进一步开展工作，打开新局面。

1977年底，上海市工商联恢复活动。说实在话，由于我们学习不够，思想大大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工商联工作是恢复了，但我们思想深处认为没有什么作用可以发挥了。1978年底，中国共

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已经呈现在我们全国人民面前。随着全国人民80年代三大任务的提出，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制订，及共产党对原工商业者各项政策的逐步落实，在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下，我们经过反复研讨，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工商联应该配合共产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在动员成员努力为四化建设服务方面发挥应有的组织作用。上海市工商联的成员和各地兄弟工商联的同志们一样，绝大多数人怀着热切的报国心情，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的愿望。经过我们工商联系统的推动，在市各级党委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下，我们创办了以爱国建设为唯一宗旨，不以个人盈利为目的的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调动上海工商界的“有贝之才”和“无贝之才”，为社会生产拾遗补缺，扩大知青就业面。全国工商联提出“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极大地鼓舞了我们成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聪明才智的信心和决心。我们上海大多数成员虽然已经退休，出于迫切的报国之心，不少人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在工商联开展的各项经济咨询服务和培训工作活动中，以“不用扬鞭自奋蹄”的诗句相互勉励，积极发挥各自在过去长期从事生产经营中得到的经验和才能，对企业挖潜革新改造、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厉行增产节约、提高产品质量，进行新产品试制、扩大花色品种、加速资金周转、增加资金积累、开展工商专业培训等等方面，作出了显著成绩，得到社会较好的评价。目前，有些服务和咨询活动已经越出了市的地域，面更加广泛了。我们上海市工商联成员通过在港澳和国外的自然关系，逐步发展同港澳和国外工商界之间的经济交往和合作。许多友好国家的企业界、经济界、金融界的著名人士非常乐于同我们进行民间交往。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彼此之间的相互访问、洽谈也有了新的开展。

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工商联的任务是任重而道远的，我们已经做的工作，只能说是刚刚起步。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商联的工作确实大有可为，一定能够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发挥更好的作用，作出更多的贡献。

1983年

## 回忆企业公私合营前后

陈 铭 珊\*

在旧中国，上海的制药工业实际是加工工业，绝大部分原料都依赖外国进口。因此，我们同业常说，“只有黄浦江的水，才是我们的国产原料”。即使自己能够制造一点点，也敌不过外国货的倾销。例如磺胺类药品，当时是非常畅销的，由于美国货的大量涌入，许多小厂纷纷停工停产，一半以上的小厂因无法维持而倒闭。我们信谊药厂也只能大量减产，凭借一块名牌，以进口原料加工制造，勉强有些销路，但还是入不敷出。

上海解放时，曾经受到国民党反动派严重破坏的工商企业，百孔千疮，要收拾起来，确实不很容易。我对共产党能否收拾好旧上海这个烂摊子，也曾有过怀疑。上海解放后没有几天，陈毅市长在中国银行大楼接见上海各界人士，我也参加了。陈市长谈到共产党的经济政策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对凡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民族工商企业，共产党和政府是保护的。我听了以后，心里踏实些了。由于当时我对党的政策并不理解，因而时信时疑，有时疑多于信，有时信多于疑。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困难时，我的信心就多些；碰到困难或者资本主义经营作风受到限制时，疑虑就多些。到了1953年，我国国民经济不仅迅速恢复了，而且有了发展，事实给了我深刻的教育。

---

\* 陈铭珊，曾任上海信谊药厂总经理。现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席、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3年下半年，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我们来说，就是要通过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当时，我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思想上是没有什么准备的，因此顾虑重重。在华东局统战部和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召开的一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我感到非常紧张。特别是听到一家老公私合营厂的私方被批判为“合公营私”后，顾虑很大。我一直沉默不言。后来领导上要大家畅所欲言，有意见和要求尽管提出来，人民政府会考虑的。我憋不住了，就在小组会上提出了四个“担心”：第一，担心股东红利是不是照发；第二，担心总经理是不是还让我做；第三，我的高工资是否要减到工人的水平；第四，与公方代表是不是合得来。我的意见发表以后，小组会上许多人都和我有同感，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工商界人士所关心的。实际上，共产党和政府早就在研究考虑这些问题了。所以后来公开宣布：企业有盈余的，红利照发（当时是四马分肥，1956年后改为定息）；职位不动；工资照旧；公方代表要派。这样，我所担心的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解决。同时，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我也看到公私合营、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势在必行，走在前头总比落在别人后面要光彩点。所以会后我马上回厂召开股东大会，对几百个股东进行宣传、动员，通过了向政府申请公私合营的决议。1953年底第一批上报，1954年7月1日就正式公私合营了。在市政府举行的任命首批公私合营负责人的会议上，潘汉年副市长宣布我为信谊药厂厂长，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反而有点惶恐了。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深深感到共产党的政策说到做到，是令人信服的。

在清产核资中，我又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原来我总觉得固定资产的估价，还是估得低些比较稳妥，怕将来检查起来说我抬高估价，“合公营私”。为了免得麻烦，因此就借口一处墙上有条裂缝，把整个厂房的估价打了一个折扣。但是上级公司评议下来，还是不折不扣地照房地产公司的估价处理，其他资产也实事求是



地照当时行情作价。这样，清产核资的结果比帐面资产高3倍多。过去我们做经理的对股东总有些保留，红利能少分就少分；而公私合营时，政府对企业资产的估价，则完全是实事求是的。算算10年定息，我厂的股东实际拿到的大大超过了他们的投资。由于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政策，对有些亏损倒挂的企业，按照“从宽”、“从了”的原则给予解决，不但没有追索赔补，有的反而送一点私股给他们。有些与我们往来的小厂亏欠很多，我们也就这样解决了。

信谊药厂公私合营后，职工的地位改变了，积极性大大提高，生产大幅度地增长。通过实践，我深受教育。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工商界同仁宣传公私合营的优越性，以及共产党的和平改造政策的英明正确。到1956年1月，在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我和刘靖基、刘念义、经叔平、王兼士、刘公诚、吴振珊、韩志明，分别抬着4只扎彩的红漆箱，里面放着用红布包裹的各行各业要求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书，走在各行各业代表队伍的前面，兴奋而激动地进入上海展览馆大厅，参加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申请公私合营大会，和大家一起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紧接着，我又作为上海工商青年的代表，参加了青联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大会期间，在接见全体代表之前，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北京的孙孚凌、天津的王光英、上海的我和全国青联负责人，听取我们汇报公私合营的体会。在走向草坪拍照的路上，刘少奇有意地让我和毛主席走在一起，毛主席边走边问我们厂里的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毛主席很高兴。后来，1957年7月，毛主席在上海接见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我也光荣地受到接见。毛主席的亲切教导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几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制药工业有了很大

的发展。绝大部分的西药原料，我们都能自己生产了。例如过去我们信谊药厂的名牌产品“消治龙”，原料都是靠进口的，现在各种磺胺类药物的原料，不但上海自己能够制造，供应国内有余，还大量出口远销国外。维生素一类原料过去都被外国药厂垄断，现在我国也是大量生产、大量出口。抗生素一类更是突飞猛进，青霉素、链霉素、卡那霉素、庆大霉素、氯霉素、四环素等，过去是空白，现在不仅充分供应国内需要，还在国际市场上占到优先地位，其中“四环素”已经成为国际上有名的“中国黄”。生物制品，也是解放后异军突起的一个方面，有些产品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且能够大量出口。解放前中国制药工业只是外国药厂附属的一个加工工业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信谊药厂的生产规模也已大非昔比，现在一天的生产比1949年全年生产还多。我们现在一不愁原料，二不愁销路，生产和业务蒸蒸日上，正在为人民保健事业、为四化建设作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回顾往事，饮水思源，深深体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党的领导英明正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没有我们原工商业者今天的光明和幸福。我愿献我余热，为四化竭尽绵薄。

1983年

# 提倡国货，反抗日本侵略

## ——记爱国企业家王性尧\*

寿墨卿 魏吉甫

王性尧，浙江镇海人，生于1905年，卒于1968年。解放前他从事提倡国货运动，反抗日本侵略，有将近20年的斗争经历，是上海工商界的一位杰出代表人士。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暇东顾，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给我国民族工业以抬头的机会，同时也造成了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有利环境。日本的野蛮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反抗，开始了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变以后，抵制日货运动更加蓬勃开展。但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武力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严厉禁止反日爱国行动。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爱国人士只好改弦易辙，采用提倡国货的办法，以求达到抵制日货的目的。

从事提倡国货运动，在当时是一件相当艰苦的工作。第一，民族工业资金短，技术差，设备陈旧，产品质量低，成本高，在同洋货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第二，多年的洋货倾销造成了消费者“唯洋是崇”的心理，也使经营洋货的商人造成了“唯洋是营”的习惯。民族工厂的产品到不了消费者手里，打不开销路。

---

\* 王性尧，原任大中华火柴公司总务科副主任，国货公司联合办事处主任、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副经理。曾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

第三，我国管理进出口贸易的海关，当时掌握在帝国主义侵略者手里，洋货可以任意进口，进口税率有利于洋货的倾销，起不到保护民族工业的作用。第四，政府对民族工业漠不关心，金融机构也不给以帮助和支持，听其自生自灭。第五，“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商人借助武力保护，进行走私漏税勾当，在中国市场上廉价倾销，使中国国货受到更严重的打击。

在这种艰苦环境下，虽经志士仁人奔走呼号，但提倡国货运动收效甚微。这时，一位金融巨头、当时上海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嘉璈）先生，投身到提倡国货的事业中来。

“九·一八”事变时，张公权适在东北。目睹国土沦丧，戚然心忧。回上海以后，“即决心提倡农村贷款与提倡国货两事，以补偿东北出口之损失。”

1932年3月，他首次发起“星五聚餐会”，请王性尧担任总干事，邀集上海实业界人士每星期会餐一次，商讨提倡国货的有效办法。接着又于同年8月成立了中华国货产销协会，由张公权担任理事长，聘杜重远担任总干事，王性尧被推为理事之一。协会在上海设立了国货介绍所，1934年又扩充为国货公司联合办事处。

当时王性尧是火柴大王刘鸿生的一个得力助手，担任着大中华火柴公司总务科副主任职务。张公权慧眼识英才，把他从刘老板手里拉出来，请他担任国货联办处的主任。

国货联办处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国货界各方面的力量，以中国银行为后盾，采取产销联营的办法，建立国货工厂自己的推销网，在全国重要城市创立国货公司和国货商店，经营门市零售业务，使国货能够与消费者直接见面，从而打开销路。这个联办处只是一个为产销双方服务的组织，本身并无资本。它一手拉住上海国货工厂为各地国货公司提供大量寄售商品，使国货公司能够以较少资本经营大宗业务；另一方面又拉住中国银行，给提供寄售商品的工厂贷放资金，便利周转。这是一种新颖的经营方式，

需要有开创的精神和特殊的经营才能。王性尧和国货联办处的同仁们不负众托，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在全国重要城市创办了国货公司11处，为国货产品打开了销路。由于国货公司的示范，许多洋货商店也转而经营国货，从而建成了广泛的国货市场。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王性尧等经过多方联系，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吴鼎昌的支持。经过悉心筹划，1937年5月，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成立了，官商合办。额定股本200元，实业部投资1/3，200多家国货工厂、国货公司和银行投资2/3。这个公司以提倡国货、投资开办国货公司为宗旨。只准国货工厂和提倡国货事业单位认股，不准个人投资。公司由吴鼎昌担任首届董事长，蔡声白和王性尧分任总副经理。成立以后，发展很快，但不久“七·七”事变发生了。国土沦丧，河山破碎，各地国货公司也遭到毁灭性的摧残。随着国民政府的迁移，国货联营公司也将一部分业务迁到重庆，在抗战后方继续开办国货公司，并接受国民政府经济部的委托，承办日用品平价供应工作。从1934年起至抗战胜利止，各地先后成立了22处国货公司。其中1938年成立的香港中国国货公司，是香港地区最早成立的中国国货公司，至今已有47年的历史，营业兴旺，为香港各家国货公司之冠。

抗战胜利以后，王性尧满怀信心地从事各地国货公司的恢复工作。他原以为日本侵略势力被赶走以后，国货事业可以大放光明。不料前门拒虎，后门进狼。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却来了美帝国主义。大批美货潮水般地涌进我国市场，经过八年抗战已经破残不堪的民族工业濒临破产停业的边沿。接着，内战又起，经济混乱、生产停顿、民不聊生。到内战后期，通货急剧膨胀，物价直线上升，引起抢购风潮，各地国货公司的存货被抢购一空，遭受了巨大损失。国民党政府仍不惜民困，又滥发金圆券，强迫收兑黄金美钞。转眼之间，金圆券又成为废纸。弄得人心离散，民怨沸腾。王性尧目睹危局，丧失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最后一点信心。

解放以后，王性尧积极靠拢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孜孜不倦地学习《共同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如饥似渴地吸收革命理论。他聘请了一位大学教授来讲解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课程，他和国货联营公司职员一起听课、学习和讨论。

1949年“七·一”前夕，陈毅市长在逸园举行盛大庆祝晚会。王性尧和各界知名人士被邀参加。他听了陈毅市长和宋庆龄先生的讲话，深受感动，增进了跟共产党走的信心。

回顾走过的路，他说：过去在帝国主义经济压迫下，为抵制外货、挽回利权，我们提倡国货，工作相当艰苦。当时的国民政府还警告我们，不许公开号召抵制外货，如果引起国际交涉要由我们负责。我们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日本侵略军一入侵，国货公司被日军烧的烧、抢的抢，损失惨重。解放了，我们的国家独立了，帝国主义被驱逐了出去。没有国家的前途，就没有我们个人的前途，我们的事业也没有保障。

1951年11月，国货联营公司经过多次申请，在私营商业中首批实现了公私合营。此后，它成为轻工业品出口联营的一个重要组织，不断扩大国货外销业务。王性尧深有体会地说：“过去要爱国，非但得不到保障，还有种种阻碍，这条路没有走通。现在我们的国家朝气蓬勃，突飞猛进，我没有理由还留恋过去。”

早在国货联营公司实行公私合营以前，武汉国货公司经理魏吉甫在取得王性尧同意以后，于1950年2月与有关方面取得协议，把该公司全部人力物力及设备一并转让给国营企业，为国营百货公司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根据武汉国货公司的先例，王性尧指示各地国货公司先后完成了转让手续。

解放初期，城乡交流不畅，工商界信心不足。为了响应政府扩大物资交流的号召，王性尧于1950年8月带领上海轻工业厂商代表团赴汉口参加中南区物资交流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用生动事例证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

顾、劳资两利”政策的正确性，博得了到会人士的赞许。大会期间，上海代表团消出了大量轻工业产品，购进了棉、麻、蛋品、桐油、芝麻等工业原料，既活跃了城乡经济，又提高了工商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1953年10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召开了会员代表大会。王性尧代表上海市私营商业向大会作了发言，对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表示衷心的拥护。他说：“私营商业应该在服从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原则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多种形式的道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1955年11月，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前夕，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召开了第一届执委会第二次会议，讨论毛主席关于工商界“必须掌握自己命运”的教导。王性尧在会上作了热情的发言。他说：听了毛主席的教导，我非常感动。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压迫下，我们国家掌握不了命运，我们个人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现在“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之下，轰轰烈烈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将使我们自己的国家一年比一年富，一年比一年强，一年比一年有发展。把全国人民的生活逐步提升到最高水平，是完全有把握、有保证的。这才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国家掌握了命运，国家有了光明前途，人民就有充分保障。”他最后表示：“我现在是两个公私合营企业的私方负责人，又是工商联委员、人民代表，我不但要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努力尽责，积极发挥带头模范作用，还要在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下，肩负责任，分担工作，来推动工商业者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以符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和期望。”

1985年

# 曲曲折折 走向光明

汤蒂因\*

## 解放前的风风雨雨

我出生在封建意识浓厚的旧社会，那个年代妇女地位很低。我一心想冲破这重男轻女的牢笼，争取经济独立，就在1930年（14周岁时）考进一家文具商店当女店员。

我勤恳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总算学会了生意经，第二年老板升我为门市部主任，第三年升我为进货部主任。我正在对自己的职业充满信心的时候，没想到老板提出要我当他的“小老婆”。这大大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宁做天上鸟，决不做地下小”，愤然离职。我当时认为只有“向上爬”当老板，有了钱，有了权，才能扬眉吐气，达到男女平等。于是我就在1933年开设一个现代物品社，做文具批发生意，并逐步有了发展。

可是，没有几年，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伸到上海。1937年“八·一三”，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生意不能做了。

1938年，我到了昆明，开了现代物品社昆明分店。一次我有100多箱货物要经过越南海防运到昆明，日军把滇越铁路炸断了，运不进来，后来日军占领了海防，这批货全都损失了。我在昆明辛辛苦苦干了三年，最后落得“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我只好回到上海。

---

\* 汤蒂因，曾任上海绿宝金笔厂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建国后曾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民建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制笔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市制笔工业公司顾问。1983年逝世。



1944年我开了个门市店，主要经销绿宝金笔。抗战胜利后，市场上美军剩余物资充斥，派克金笔满天飞。我们的生意一落千丈。

国民党政府腐败，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那时有句话叫“工不如商，商不如囤”。1948年，国民党发行金圆券，中央银行把黄金白银照牌价收购以后，又不给我们做金笔笔尖的原料，卖出去的东西连本钱也不够，资金周转不灵，生意奄奄一息。

我从1930年上柜台当店员到1949年差不多有20年，我自己总结了一句话：“解放前20年，风风雨雨，历尽沧桑。”

###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受到教育

1952年10月，我参加了第二届赴朝慰问团。有一天，我们到高射炮连去进行慰问，领导指定我在大会上做慰问报告。我感到很紧张，对副团长说：“‘三反’、‘五反’刚刚结束，上海有个不法资本家王康年，卖假药，坑害志愿军。如果志愿军听到我是工商界代表，一定会引起愤怒。”副团长听了哈哈大笑，他说：“你是爱国的工商业者，为什么要把自己与不法资本家混为一谈呢？要理直气壮地把工商界如何积极生产支援前线，踊跃捐献飞机大炮的情况向志愿军汇报。”我到了高炮连，会场布置在野外，主席台上面有松林。志愿军同志一排一排地坐在山坡上，每个人摘了一枝小松举在手里，从上面看起来，象是一片松林。有了这片松林作掩护，我们就可从容地开会了。我说：“我以上海工商界代表的身份，光荣地来到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前线，向我们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表示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下面热烈鼓掌。我说：“这两年我们同心协力，积极生产，取得辉煌的建设成就。特别是去年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回国后，号召我们工商界积极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前线，我们上海工商界积极响应，已超额完成了397架战斗机的任务。”全场掌声震动，战士们齐声高呼：“感谢祖国大力支持！”“向上海的爱国工商界致敬！”“我们保证以更大的胜利

来回答！”最后在宴会上，首长和英雄代表向我敬酒采了，他们说：“为祖国的爱国工商界干杯！”使我激动万分，我决心要做一个真正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工商业者。党给我这样好的机会到朝鲜去学习，使我受到一次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实际教育，终生难忘。

### 我怎样渡过“五反”这一关

1952年“五反”运动展开了。大街上、店铺里都贴上“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标语，马路上也到处是横幅：“喂！你坦白了没有？”等等，使我心惊肉跳。在厂里我写字台后面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打倒雌老虎！”我又怕又怨。我的好友毕子桂（党员），一直叫我不当老板，我没有接受，当时是财迷心窍，想不到会有今天。我本来是职工，可以当武松，而现在是武松不做当老虎，要挨打了。市委统战部有位董慧同志来看我，她说：“你不要顾虑，只要老老实实坦白，早一点过关，你可以争取立功去帮助别人。你是民建会骨干，要带头啊！”我就想，我怎样坦白呢？我看别人象在“挤牙膏”那样，今天过不了关，明天过不了关。那时有句“竹筒子倒豆，一下子倒光”的说法，我就想办法来个“倒轧帐”。从1949年到1952年，我厂一共赚了10亿元，就是现在的10万元，我去掉所得税和职工福利，大概还有5万元，我就这呀那呀交代了。这样一交代，小组认为我只有2000元资本，一下子交代了5万元，也差不多了。于是我一下子变成“五反积极分子”了。以现在的尺度来衡量一下，我那时候所谓“五反积极分子”也“左”得很哪！

当时中央规定工商企业有五种类型：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在大会上，工会主席叫我自己报是什么户。我想严重违法户我不至于，基本守法户也过不了关，我来个半守法半违法户吧。想不到工人代表批判了一通之后说：“我厂资本家汤蒂因坦白基本上彻底，对生产还较负

责。建议政府对她宽大处理，我们建议评为基本守法户。”我当时听了这话，泪都掉下来了，工人阶级真是大公无私。更使我感动的是，厂里开了一个团结大会，工会代表同我握手说：“党的政策就是这样，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结，希望你更积极地搞好生产。”后来，增产节约委员会来个定案通知书，我一看是守法户，真是喜出望外。退赔数字核实为2万多元。偷税漏税、虚报成本我的确有的。例如：我一家三代人，开支很大，坐汽车、住洋房都用厂里的，就是把盈余减少，所得税也逃掉了。这些费用都放在成本里，那成本是虚假的，所以经过核实是2万多元。党的确是实事求是，做到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把这通知书，配上很漂亮的镜框，挂在办公室里。

接着，北京又来个通知，叫我参加全国工商联的筹备代表会议。路经南京，我们的陈毅市长在“五反”运动之后到南京军区去工作，他在玄武湖请我们上海、江苏、浙江的代表吃饭。那地方风景很美，荷花清香。陈毅市长穿着白色短袖衫，拿着大芭蕉扇进来了，打着哈哈说：“各位先生，你们受惊了。今天略备便宴，为你们压惊”。那时候，我们犹如惊弓之鸟，运动刚刚结束，叫我们上北京开会，我是带了检讨书去的，不知前途怎么样。陈毅市长讲：“你们对‘五反’大概还不够明确吧？不是这时候要消灭剥削制度，也决不是要你们的钱，主要是调动你们积极的一面，清除你们消极的一面。‘五毒’对国家对人民都是有害的，所以要搞这场运动。现在‘五毒’清除了，你们不要垂头，要努力学习，积极工作。我们共产党和你们是朋友嘛！”这“朋友”两字，本是很普通的名词，但在“五反”运动刚结束的时候，从陈毅市长口中说出，这分量是很重的，使我们感到很亲切，一阵暖流涌上心头。代表们好象看到安民告示，都感到心情舒畅，六神有主了。

### **党指引我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

1953年冬天，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工商界代表大会。在党中央

领导同志接见的時候，周总理问我：“你打算公私合营吗？”我说：“厂太小了，恐怕不够条件。”总理说：“不论大厂小厂，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我们都欢迎。”我就同北京绿宝金笔厂分厂的厂长汪凌志（也是民建成员）商量，向北京市国营兴业投资公司提出合营要求，被批准了。回沪之后，我在劳资协商会议上提出，希望上海厂也申请公私合营，工人当然同意支持。于是我就写了申请书，1954年夏天被批准。政府派下来的公方代表当厂长，我被安排为私方经理。

1954年9月，我又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会议的代表，我既感到光荣，又感到惭愧。我对党对人民没有什么贡献，却得到这样高的荣誉，这是我做梦也不敢想象的。在大会期间，我又见到周总理，向他汇报我两个厂都已被批准公私合营了。总理说：“很好，但是你不能光是自己厂合营就算了，应该带动同业争取全行业公私合营啊！”我说：“我们这个行业是个穷行业，多是小户、困难户，要公私合营，条件太差了。”可是总理说：“越是穷，越是要革命啊。条件差，可以创造嘛。”这句话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力量。我一回上海，就找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宁思宏（关勒铭金笔厂经理）、副主任委员周子柏（金星金笔厂经理），还有周井庭（华孚金笔厂经理）商量，申请全行业公私合营。申请书中说，我们行业是个小行业，但是都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虽然条件差，我们要创造条件，争取公私合营。我们自己讲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久，市委陈丕显书记和市第一轻工业局梅洛局长找我去谈话，他们问：“公私合营是你们几个人要搞的，还是全体同业都要搞的呢？”我说：“大家都要搞，因为穷，大家希望早点走社会主义道路。”梅洛局长讲：“你们鸡毛也要飞上天了。”1955年12月5日，我们制笔工业全行业被批准公私合营了。庆祝大会上锣鼓喧天，职工、资本家和家属都喜气洋洋，纷纷提出保证书、决心书。大家高兴地说，旧社会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新社会是大船带小船，一起开向社会主义。党的政策真是普渡众生，同

登彼岸。

1955年，中央轻工业部还批准了上海市第一轻工业局成立上海制笔工业公司，这个全国第一个专业公司是一个试点。国家安排我为公司的私方副经理，以资本家安排为国家企业的经理，也是一个试点。有一次毛主席见到我的时候，叫我：“金笔汤！你要当好社会主义公司的经理啊。”

1956年春，我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一次会议休息中间，邓颖超大姐带我去见毛主席，他一见我就问：“金笔汤！你们制笔工业全行业公私合营有强迫命令吗？”我答道：“我们学习了主席关于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教导，都是自愿的。”主席又问：“目前还有什么问题吗？”我当即讲到家厂不分的小厂有两个问题：一是老板娘要求带进合营厂；二是清产核资，这些厂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分不大清楚。主席说：“清产核资时，生活资料要划得宽些……小厂的老板娘要带进合营厂，不要影响他们原有的生活。”接着，还关照我说：“你就是关心小的、女的私方人员。要多做调查研究，提出解决办法，供政府参考。”听了毛主席这些话，我心里真温暖极了。

### 在农村劳动中的感受

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刚刚开始，我接到人大常委会的通知，要我参加人大代表团到芬兰去访问。出国访问是高兴事，但是听说民盟罗隆基曾到罗马尼亚去访问，回国一下飞机，就揪到大会去批斗了。我出去之后，回来又会怎样呢？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代表一共10人，4个是党员，6个是民主党派人士，以赛福鼎同志为团长。我们经过苏联时，驻苏大使刘晓同志在宴会上向外国朋友介绍说：“这是汤蒂因同志。她是我解放前的老同业。”原来，刘晓同志解放前是以关勒铭金笔厂的副经理身份作掩护、搞地下工作的。这次宴会，驻苏联各国使节都来参加了，他们听到我是一个女资本家，很奇怪，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怎么资本家能当

上人民代表？还可以出国访问？因此，我就成为被访问的对象了。他们听我讲了自己的经历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体会，都为我高兴，还说：“你是幸福的资本家。”

1958年，上海市委统战部组织干部下乡劳动锻炼，我们工商界有46位同志参加，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可是，这“三同”真不容易。先说同吃：我住在农民家里，房东一家祖孙三代人。青菜、麦片饭我都可以吃，可是那汤碗里，只有一只调羹，你也喝，他也喝。他们叫我喝，并说：“汤同志你姓汤，怎么不喝汤？”我说：“我向来不爱喝汤。”我怎么也喝不下去，因为觉得太不卫生。再说同住：我住的农民房东家的小女儿的铺与我面对面。我在自己的一面墙上糊上了牛皮纸，干干净净的，可却没有给对面她的墙上糊纸。他们一家对我可好了，使我越来越惭愧，觉得自己太自私了。后来我帮她扫盲，使她认识了300来字。这是由于我对农民的感情有了变化。至于同劳动，农民认为很简单的劳动，可是在我就不简单。除草、锄地、拔棉花杆等等都感到腰酸背痛，力不胜任。因此，人在乡下，心在上海。我们有两句话：下乡好象背纤，很慢很慢，回上海象射箭，很快很快。改造真是不简单的。但下乡一年多，随时随地可以找到与劳动人民的差距，对劳动可贵、剥削可耻，有了体会。

### 十年动乱感慨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认为这次运动是对文化界、教育界、学术界的，我是个小学生，文化也没有，与自己不搭界。不晓得结果要追到历史根源、思想根源、阶级根源呀，就追到我们的头上。那时候，民建没有了、政协没有了、统战部也没有了。我听说，政协门口有张大字报：“政治岂可协商？”民建会门口有大字报：“我们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你们还要民主建国，就是要复辟。”所以我们一切活动都停下来了，我到厂里劳动。

这次下厂，思想很紧张。生产组长徐师傅说：“你不要紧张啊！不懂就学，我教你，凡是人做的活总是学得会的。”因此我就决心向她学。我分配在装配车间，有20多道工序，我有10多道都学会了，都是老师傅教的。更使我感动的是，有一次我搞抛光笔项，那道工序把抛好光的笔项洗清了，要放在甩水机内甩干。当我把甩干的笔项拿出来后，忽然小组长叫我，说：“现在甩水机马达坏了，你知道吗？”当时情况很紧张，“造反派”头头都来了，七嘴八舌地要我老实交代，是否在搞破坏？我说：“我刚拿出来，马达怎么坏的我不知道。”后来幸亏有一位老电工来检查说，这是开关失灵了，这样我才放下心，但已经吓得要死了。在紧张的运动中，我看到老工人是实事求是、大公无私的，对我教育很深。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的那天下午，我侄子回来对我讲：“娘娘，外面在打倒‘四人帮’。”我说：“你不要瞎讲啊，出了毛病，又要查根源，查到我的头上，我吃不消。”他说：“你不信，可以出去看看大字报。”我就在当天下午出去看了，满街的大标语，果然是“打倒‘四人帮’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而且在名字上还打上红××。我想，过去只有在我们的名字上打红××，现在这些人也打上红××了，难道这是真的吗？还有些半信半疑。第二天一早，我也呆不住了，走到大街上，只见游行队伍象潮涌，敲着锣鼓，放起鞭炮，不断高呼口号。我想我已经10年啦，只听别人高呼“打倒反动资本家汤蒂因！”今天也有这么一天，真是大得人心，大快人心。我精神振奋，感到春天又来了，我们得到第二次解放。

1979年，我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6月15日这一天，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邓小平主席宣布了我们国家阶级状况起了根本变化，我们工商业者绝大多数有劳动能力的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我们资产阶级的帽子摘掉了。

经过30年的改造，从剥削者到半公家人，现在成了社会主义

劳动者。因此我总结了一句话：“解放后30年，曲曲折折，走向光明”。

1982年



##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银行家徐国懋\*

吾新民

徐国懋，1906年生于江苏省镇江市。父亲是一个驳船主，家庭不富裕。他从中学时代起就过着半工半读生活，以后升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四年级时，因为英语成绩突出，学校破例请他担任一年级的英语教师。1928年他大学毕业，在毕业典礼上除学士学位证书外，他还得到了学习成绩优秀的奖章和华东四大学（圣约翰、金陵、沪江和东吴大学）英语辩论比赛冠军的奖状。大学毕业后，他到美国进约翰·霍浦金斯大学研究院攻读政治学。1932年毕业，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到金陵女大担任政治学教授。

1934年，徐国懋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专员室主任。后来，经友人引荐，他与周作民见了面。两人谈得极为融洽，周即邀请他到金城银行工作。1936年到1939年他担任金城银行汉口分行副经理，1940年升任西南区行副经理兼重庆分行经理。抗战胜利后任上海总行经理。

这时，徐国懋经王文山（金城银行南京分行经理）介绍，向陈纳德的民用航空公司投资15000美元，并担任该公司董事。不管实事，只是每月领取美金1000元的酬劳而已。

1947年初，徐国懋随周作民去美国。船抵旧金山码头时，一批美国记者拥上前来采访，周因不谙英语，嘱徐代为接待。记者

\* 徐国懋，曾任金城银行总经理。现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董事、上海金融学会副会长、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会长。

问，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统治中国？又问其对当时的美援有什么看法？徐就参照当时国民党报纸的宣传口吻说，国民党政府虽然腐败无能，但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希望美国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并促其革新。这些谈话，第二天旧金山报纸就登载出来。徐国懋对此事至今还深感遗憾，觉得他当时对中国共产党实在缺乏了解，对国民党政府还存在幻想。

1948年10月，周作民离沪去香港，叮嘱徐国懋留在国内，对徐说：“共产党来了以后，如果私营银行一家都不能存在，那我也没有话可说，如果还存在两家私营银行，我希望金城银行是其中之一。”徐国懋受周之托，准备留在上海坚持，但是他对共产党还心怀疑惧。1949年初，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和上海参议会议长潘公展邀集上海工商界人士刘鸿生、吴蕴初、徐寄庠、戴立庵、徐国懋等人谈话。潘公展声言时局紧张，逼迫他们赶快离开上海，并说，如果不走，将用飞机把他们送到台湾去。徐回银行和副经理殷纪常商量，殷劝他去香港避避风头，顺便向周作民请示今后行止，争取早日回来。这样徐国懋就在1949年5月初离开上海到香港去了。

徐国懋到香港不久，赵志世代表陈诚来邀徐去台湾，民用航空公司的副总经理韦乐尔和王文山也邀他到民用航空公司工作。但是他在金城银行工作了10多年，已有深厚感情。何况他不想再寄人篱下，更不愿流落到台湾，所以一一婉言谢绝。

他在香港遇到的第一个上海来人，是大中华火柴厂总经理刘念义，刘是来动员他父亲刘鸿生回国的。徐听到刘念义说，上海局势很稳定，工商业照常营业，人民安居乐业。不久英商安利洋行经理麦克也从上海到香港，他对徐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进上海时虽然天下着雨，为了不惊扰人民，晚上都睡在马路旁，这样的军队是世界上少有的。刘念义和麦克的介绍使徐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后来章士钊、黄绍竑受中央统战部委托来到香港，约刘鸿生、吴蕴初、傅汝霖、荣尔仁、刘丕基、戴立庵、徐

国懋等人谈话，向他们介绍解放后国内的新气象，阐述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劝他们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徐国懋有了回国的打算。他和周作民商量，周也力促徐回国主持行务。

徐国懋回到北京，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初时，徐不免有些拘束。周总理问他的学历、经历，谈到许多共同的熟人。周总理风趣地说：“他们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所以我们也是朋友。我们可以象朋友那样坦率交谈。”很快徐就不再感到拘束了。周总理告诉他：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土改，土改以后我国经济必然要发生很大变化。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还要发挥民族工商业的作用。希望你告诉香港的朋友，劝他们回来参加祖国建设。周总理还说，工商界人士过去和国民党政府有这样那样关系，我们是能够理解的，只要他们回来，就一概既往不咎。徐回到上海，受到总行副经理殷纪常和银行职工的热烈欢迎。他去拜访了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也受到了热情接待。徐就把回国以后的所见所闻和金城银行的业务情况，写信向周作民汇报，并敦促周作民早日回国。

解放以前国民党政府通货恶性膨胀，造成金融业的畸形繁荣。解放以后市场投机因素消失，金融业务清淡，金城银行亏蚀尤多。1950年夏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讨论了私营金融业的前途问题。大家认为金融业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私营金融业必须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走联营合营的道路。会后徐国懋去香港向周作民汇报了会议情况，并要求调回外汇以解决开支需要。由于周作民一时不能回国，任命徐国懋担任金城银行总经理，并且责成他回国筹备公私合营。当时徐敦促周作民回国，周说香港分行业务不振，需要他在港设法维持，故未成行。徐国懋回上海不久，接到周作民来电，说已与香港中国银行经理郑铁如商妥由中国银行给予支持，但需经北京总行同意，要徐去北京找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南汉宸商量。徐就立即上京，面见南汉宸。南向徐说，周作民愿意回国，我们热忱欢迎。当场决定电告香港中国银行，划给金城银行港币500万元，作为定期存

款，以解除周作民的后顾之忧。徐将北京晤谈经过电告周作民，周作民喜出望外，深深体会到政府欢迎他回国的诚意，乃毅然于1950年秋启程回国。周是老一辈银行界回国的第一人。他到北京时，李济深、黄炎培亲自到车站迎接，并立即受到周总理接见，不久又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

周作民回来后，徐国懋就协助他在金城、盐业、中南、大陆、联合等五家银行的上层人士中积极活动，提出北五行公私合营的建议。最初受到一部分人士的反对，他们就反复做说服工作，终于取得大家同意，在1950年冬成立了公私合营北五行联合总管理处。除核定五行原有资产外，由中国人民银行投资500万元，由周作民担任董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副行长谢寿天担任总管理处主任，徐国懋、谈公远担任副主任。1952年冬全国私营金融业全行业公私合营，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和联合总管理处，周作民担任副董事长，徐国懋担任副总经理。

金城银行公私合营以后，徐国懋在机构调整和人员安排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后来在主持金融研究室工作中，又在编篡旧银行、钱庄的史料方面作了许多贡献。由于他在旧社会的经历，特别是前面谈到的他在1947年赴美时对外国记者的谈话和参加陈纳德民用航空公司一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受到了批判。但他始终记住周总理所说的，对旧社会的经历既往不咎，只要坚持为祖国为人民做好事，终究会得到人民的信任的话，对共产党的信心始终不动摇。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和两个儿子先后得到平反，发还了查抄财物，补发了工资。他的大儿子是美国一家很大的建筑公司的副总经理，一再来信请他出国。1981年2月，他取道香港赴美探亲。出国前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张承宗特地设宴给他送行。当时他问张：“我在台湾有许多老朋友，这次去美国如果遇到这些人应该如何对待？如果他们邀我到台湾去，我该怎么办？”张部长对他说：“我们相处这么多年，对你是完全信任的。老朋友还是老

朋友，遇到时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要有任何顾虑。如果他们邀你到台湾去，你也可以去，但要他们保证你的安全。”共产党对他的信任，使他非常感动。他去美国5个月，先后到旧金山、洛杉矶、纽约、华盛顿等十多个城市，遇到的亲戚朋友有200多人，许多人已加入美国籍，不少还是亲台湾的。他们要徐谈谈国内的真实情况，徐就现身说法，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向他们介绍祖国解放以来的巨大成就，和粉碎“四人帮”以后各方面的新气象。这些人和徐谈话后说：“看到徐某人能自由地到美国来探亲，看来国内的政策的确是改善了。”他的儿子再三要他留在美国，有些老朋友劝他说：“你儿子在这里很得意，做了大公司的副总经理，收入很多，你就留下享福吧！”但是徐坚持要回国。不少人说：“看到徐某人坚持要回去，看来国内形势确实很好，祖国前途大有希望。”

徐国懋从美国探亲回来，体会到自己在团结海外侨胞和台湾同胞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更加精神振奋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为祖国统一大业而到处奔走。

1983年

## 加强海外亲友联系，尽心竭力为“四化”

荣漱仁\*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党中央和政府部门领导同志，一再指示我们，必须重视港澳同胞的作用，重视和发挥遍布世界各地3000万华侨的作用，搞好对外开放工作。

30多年前，我们荣氏家族和我丈夫杨氏家族，不少人出走异国，遍及港、澳、台以及欧美很多国家和地区。其中有的人拥有财力、有的人是技术专家和具有经营管理才能的企业家，还有的人是享有名望的学者。我是全国侨联委员，又是上海市工商联对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我应该遵循党和政府的号召，与他们加强联系，增进友谊，做我应该做的工作。因此，这些年来，我热忱地接待了来自英、美、法、日、加拿大、联邦德国、巴西等国以及港澳地区来沪探亲、观光、讲学以及洽谈贸易经济合作的亲属好友，近300人次。在我三次偕同丈夫出访国外时，我总是千方百计的走访他们，把国家这些年来的变化，一桩桩一件件地告诉他们，向他们解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消除他们的疑虑，晓以炎黄子孙的责任，推动他们为祖国四化作出贡献。

早在1978年，我就支持在香港经商的三儿杨世纯为上海引进生产电子手表的技术和设备，将一个扑克牌厂改建成了手表厂。当年改建，次年投产，生产了畅销国内外的金雀牌电子手表，成

---

\* 荣漱仁，曾任广裕纱布厂经理、仁裕工业原料行经理。建国后曾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上海市工商联顾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普陀区政协副主席、全国侨联委员、市妇联执行委员、市女青年会会长。1984年逝世。

为上海最早的补偿贸易项目。同年，与我阔别多年的女儿杨世缙全家来上海探亲。我女婿王元瑞博士是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教授，他在沪期间三次应邀到上海交大讲学，赠送了先进的科技书籍资料与该校，并同国内的有关专家、教授进行了技术交流。我的四儿杨世绶，近年来在美国数次接待了湖北省的经济技术代表团。他曾代表某财团，以新建不久价值2000万美元而在国外因故停产的化工厂赠予武汉市，他还引进最新技术，与武汉水泵厂签订了生产微型计量泵、保证年返销量的合同。

我看到儿女们能为祖国的四化大业出力，从心里感到宽慰。我总想，我已是古稀之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主要是靠年青一代去完成。侨居在海外的孩子们，只要他们能够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这便是我做为母亲、做为老一辈人的真诚心愿。

1980年以后，我与爱人杨通谊三次自费赴美。在美期间，遵照我丈夫的姑母杨令菲女士在美逝世时的遗嘱，将收藏宝玉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馆，将字画、诗集、著作献给故乡无锡市。我们聘请律师，奔走交涉，颇费了一番周折，终于将姑母珍藏的玉器、文物运回祖国，献给了国家，受到国务院文化部的表彰。同时，我们又将姑母留给我们10万美元的遗产，全部奉献国家，作为杨令菲文教基金会的基金，用以发展祖国的文教事业。在美期间，我们还促成堂兄荣辅仁，将他在上海虹桥路上占地数十亩的私人花园，捐献给上海科技协会，作为建立上海科技中心大厦的基地。这一义举，在美国赢得了王安、贝聿铭、袁家骝、顾毓琇、方闻等著名美籍华裔教授、科学家的赞赏和支持。

看到侨居异乡几十年的亲友，有如此爱国热忱，不仅使我深感欣慰，并且使我更进一步看到，他们所以能激发出如此大的爱国热情，为祖国尽力，是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以后，我们国家所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感召，是党的政策无比正确的结果。有一次，我得知一位林老太太在泉州住房十分困难，至今还居住在非常简陋的小屋里，生活非常艰苦。林老太太在海外

有很多亲友，又大多是在国外很有地位的嫡系亲属，她的生活费也是海外亲友寄给她的。对她的住房政策不落实，对海外影响很大。我就写信给中央统战部，得到重视与支持。去年6月，为此事我从上海赶到福建看望林老太太，并与晋江地委统战部取得联系。他们了解这一情况后表示尽快解决。最近，我就收到林老太太和她的亲属来函，表达了对党的感激心情。

这几年来，我还深深体会到，要做好海外亲友的工作，首先要将海外亲友在国内的亲属工作做好。我周围有许多侨眷，同我常有往来。1979年，我所在的吴兴里委办了一个“侨眷学习小组”，要我负责。每次学习，我都把姐妹们召集到我家中来，不拘形式，让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效果很好。几年来，大家纷纷动员自己的海外亲属回国讲学，旅游观光，洽谈贸易，为祖国四化建设出力。近年来侨眷小孩“入托难”的问题愈来愈突出，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我虽然几次在各种会议上、或口头上或以提案方式大声疾呼，仍然得不到及时解决。于是我就把我们办托儿所的设想，告诉侨眷学习小组姐妹们，得到她们一致赞同，并请市、区妇联、侨联领导支持。经街道里委干部一起向房管部门申请，我们得到了房子。我就亲自到社会上招聘有经验的幼托教师，亲自上街去采购幼儿玩具和用品，出资请人修房子、做桌椅，不到20天“侨星”托儿所就办起来了。托儿所办起来后，就成一桩心事，日日挂在我心头。我亲自过问所里的教学计划和孩子们的营养、卫生、饮食。“侨星”托儿所办起后，在附近居民中、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有位来交大工作的美国女教授，也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侨星”。她说：“儿子托在这里，我为中国教育事业服务可无后顾之忧了。”还有一位在香港的侨胞，三番五次地来电话，要她父亲将她寄养在上海的儿子送到托儿所来。我们都满足了她们的要求。

再者，我们吴兴里委从1981年起，每逢暑假便把家中无人照看的一至四年级的小朋友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暑假儿童班，对此



我十分支持与赞同。我主动承担了一部分聘请辅导老师的费用。为了把孩子们的暑假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我出资租了两辆装有空调的大轿车，冒着盛夏炎热和孩子们一起到佘山开展夏令营活动。这几年来，我为普陀区妇联举办儿童福利事业、无锡市儿童乐园、中国少年儿童活动基金会，献资捐款。我深深感到，爱下一代，就是爱国家，爱未来。这也是支援国家建设的实际行动，我引以为荣。

我已年近70，在这垂暮之年，有幸看到开放、改革之风吹遍全国的盛世，感到无比振奋，无比鼓舞。近年来，我尽了绵薄之力，做了一些我应该做的事，万万谈不到是我个人有什么成绩和贡献。虽然，我历届被评为全国妇联“三八”红旗手，但我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主要的是各方面对我的支持，是党的路线和政策无比正确的威力。

1983年

## 三十二年来的经历

杨少振\*

我17岁的时候，从故乡江阴来到上海，进入正泰昌华洋杂货号做学徒。不久正泰昌的资本家投资设厂，我就转入正泰橡胶厂，到1937年升任营业主任，1941年又升任副经理。我并不是出生在资本家的家庭，也不是正泰厂的大老板，但由于工作需要，我渐渐成为掌握正泰厂实际全权的总管。从表面上看，我个人在旧社会的事业不算不顺利，把一个设备简陋、规模很小的厂子，发展到拥有5个制造厂、1个总公司、10个分公司（发行所）、职工达5000余人的大型企业。“回力”牌的商誉，在橡胶制品行业中，声势磅礴，举足轻重。但是实际上，在三座大山的压抑下，我20多年的惨淡经营，饱经风险。

### 下定决心迎解放

1949年初，解放大军即将渡江南下，我厂的主要负责人，也和一般工商业者一样，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缺乏足够的认识，忧心忡忡。正泰厂本来在台北设有分公司，不少亲朋劝我把厂迁往台湾，国民党政府也动员我们把正泰厂的机材物资用登陆艇运去台湾。其后又有英商裕通泰洋行，因正泰厂在国外有大批机器订货，而“回力”牌产品又在国外颇具声誉，曾三次派人来，拉拢我们去香港合资设厂。

但是为什么后来我和正泰厂的其他负责人终于下定决心，不

---

\* 杨少振，曾任上海正泰橡胶厂副经理。现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正泰橡胶厂顾问。

搬不跑，迎接解放呢？

当时我的思想是复杂矛盾的。我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成风，贿赂公行，从内心感到厌恶。跟他们跑，在政治上是死路一条，在经济上难免要被官僚资本染指。记得抗战时有一个工商橡胶厂跟国民党政府跑了一阵，到头来被官僚资本吃掉了。又想到国内市场范围大，香港、台湾范围小，自己经营大厂惯了，到香港买一个小厂，没胃口。跟外国人合作，难免要被外国垄断资本家吃掉。再想到正泰厂这个大摊子，有一批跟我共过患难的同事，要带一批人走，搬迁谈何容易。我跟正泰厂大老板洪氏兄弟，也存在互相牵制，如果让他们跑，把我留下来，厂里的资金势必被他们抽走，我不愿意。反之亦然。

有一天，我在办公室的抽屉里，发现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递给我的宣传材料，阐明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十六个字，颇具吸引力，暗合我的心意。特别是天津解放后，1949年3月24日上午，天津正泰厂发行所主任俞水心给我打来长途电话说：“天津情况很好，局势已趋安定，大中华的天津分厂已准备复工。”这个消息，使我相信共产党大公无私，解放军纪律严明。

就是这天下午，我持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军事法庭的传票出庭应讯。不料国民党法官以正泰厂购买飞机用汽油的罪名把我当庭关押入狱。正泰厂为了营救我，托人向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王辉亚疏通，前后被敲诈去的赔款达黄金400多两。试想盗卖飞机用汽油的是他们这些人，利用军法勒索财物的还是他们这些人，却贼喊捉贼，搞出一场蓄意敲诈的骗局。

我在监狱里，碰到几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向我宣传解放军势如破竹的大好形势，共产主义决不是“共产共妻”，而是“共同生产”等。这些话使我放下心来。

我出狱后，上海解放已经指日可待。这时国民党上海市长还发来请帖，向正泰厂摊派巨款。由于上海解放得快，他们来不及

最后捞一把就仓惶逃遁了，正泰厂也幸免了一次搜刮。

我们下定了不迁厂、不逃跑的决心。我分电各地分公司，特别指示当时尚未解放的汉口、长沙、广州、台北等地分公司，如与上海总公司失去联系，所有货款一概汇交广州分公司，换成黄金、港币存储，电促台北分公司张功孚乘飞机送回黄金500多两及大量美钞。1950年3月，又派人去香港，把原向英商订购已经运到香港的大型炼胶机和密闭式炼胶机，以及存储在港的原材料，全部运回上海，并将存港资金一并采购原材料运沪投产。这些物资和资金价值约合100余万美元。

### 暴风骤雨的洗礼

上海解放之初，无锡申新三厂厂长谈家振来上海，和我谈及无锡的情况，提到要按照共产党的政策，处理好劳资关系，否则会犯错误。我对“劳资两利”，自认为是理解的，但一接触到实际，又露出旧思想。正泰厂的工会筹备会成立，提出要发每人10块银圆的胜利奖金，我认为没有这种例子，就拒绝了。他们把我包围起来，要我答应。我气愤地说：“你们是国家的主人翁，厂里流动资金不多了，将来生产怎么办？”他们说：“不要紧，我们会克服困难的。”我只得勉强签订了协议。当天，上海市劳动局和工商局发来通知，不同意这个协议，关照我不能发。第三天，劳动局代表要我们到市总工会去协商。总工会主席刘长胜出来说：“你们应该好好协商。”但是厂里也有实际困难，一次要拿出5万块银圆，不是小数目。后来政府照顾，收购正泰厂一批轮胎，这笔奖金总算照发了。我心里想，这件事是你们出来打岔，要我们再协商，经过吵闹一阵，结果还是拿出来，共产党的干部办事能力不行。此后，厂里的纪律有点混乱，劳资纠纷不断发生。接着就是年终奖金的协商。厂工会提出，工人发35天的年奖，我同意了。又提出职员按过去升薪惯例，应加发两个月双薪，我正在迟疑考虑中。不料厂工会又带领工人来争取，提出职员工人同样加发两个月。这样

一来，厂里经济有困难，总工会也关照我不能答应，日夜谈判，吵闹不休。适逢1950年“2·6”轰炸，全市停电。厂里停产，工人群众更有时间来吵年终奖了。后经劳动局、总工会出来解决，结果是：全体工人、职员年终奖一律是35天。由于资本家处理不当，应罚一个月，全体工人、职员实得年终奖一律65天。那时候搞劳资协商，我要看总工会干部的脸色行事，自己不能作主。这些事反反复复，我真觉得有些懊恼。那时候舟山群岛还未解放，一些亲朋认为这样下去，正泰厂一定要吃光用光，劝我离开上海。我想如果我一走，厂一定要关门，我还是应该挺下去再说。现在想来，全国刚刚解放，过去工人受尽了气，过着艰苦生活，现在翻身了，有时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也是难免的。在共产党领导下，最后处理问题总是实事求是的，决不会让厂关门。现在想来，我在困难时期坚持下来，是走对了。

那时，我为争取做到劳资两利，尽量满足职工的福利要求，每人每年有4双福利鞋，每天供应高级面包点心，每人2只，全厂要1万多只。又花100多万元大造工房。在本市设疗养所，还拟在杭州设休养所。但是，有些人反而说，这是资本家腐蚀工人的小恩小惠。记得有一次报纸登出一条消息，说正泰厂的解放鞋，只穿一个星期，沿条便脱胶，说是“礼拜鞋”。其实这是操作不慎的质量问题，应该改进技术，并向消费者道歉和赔偿损失。但是车间里也有部分工人说，这是报纸破坏正泰厂工人的名誉，要去请愿抗议。有人说这是资本家策动的。我当时很想不通，为什么工人的事，都要算在我们身上？但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对于这件事作了适当的处理。

1951年，正泰厂帐面盈余1400多万元，应交所得税400多万元。实际上有些高估虚盈。这时“三反”、“五反”运动已经开始，国家停止收购产品，厂里流动资金更加拮据。欠交所得税每天的滞纳金要10000多元，税局催交甚紧，厂里生产也不正常。接着“五反”工作队下厂，我厂有些资本家感到惊慌失措，但我却

自以为“五反”内容与我无关，我一样都不措界。随着斗争逐步升级，我也不能不受到冲击。有一个资本家为了开脱自己，胡乱交代说正泰厂是敌产，日本人拿多少条子给正泰买房子；又是行贿，又是逃避资金。工作队来问我，我说我没有经手，“敌产”、“行贿”要有证据呀！一天晚饭后开大会，有一个人跑上台去揭发我，说就是我叫他去行贿某干部的，送了一宅洋房等等。我心里想，这个人说得太奇怪了，洋房在什么地方？总不能放在荷包里？这种揭发连一些常识都没有。但是大会还是宣布我抗拒交代，把我关押起来。我看到有些人胡说一阵，就过了关，甚至还有人拍手欢迎，于是我也照样，交代暴利300多万元，这本是我胡造的。没有几天，正泰厂一个资本家带信给我说，他们已交代了1400多万元，要我照信交代。我就依样画葫芦，要我怎写就怎写，照信抄一遍，索性把正泰厂的盈利都算作偷工减料，也交代了1400多万元。但是，二三个月后，又一次证明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1952年8月，法院开庭，庭长韩学章，陪审是工商联的胡子婴和严谔声。法官当庭阐明党的政策：“究竟有没有敌产？有没有行贿？你要实事求是地讲。”这句话说到了我的心里，增强了我的勇气，我说：“全部没有。”同年10月开庭宣判，“敌产”、“行贿”、“逃避资金”等都不再提了。

### 光明灿烂的大道

“五反”运动后，正泰厂的轮胎产品，由交通部加工订货，胶鞋产品，由中百公司包销，生产有所恢复和好转，帐面也有盈余，但流动资金仍然短绌。其时，私营企业条例公布，有“四马分肥”的办法。1953年工人提出要分红，我认为正泰厂实际情况，没有条件分红，劳动局也关照不分，厂工会坚持要分，结果我没有接受上次的教训，同意分了，受到劳动局的批评。那次分红，股东一份全部转作增资，企业增资和公积金都是一笔负债，收在帐上，但职工一份却要现金支付。我在几面夹挡之下，反复

思考，觉得通过加工订货和包销，企业经营初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为企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正泰厂要真正求得发展，还得解决生产关系的改革问题，唯一出路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早些公私合营。

1952年11月，我申请公私合营。区委通知我们：“要拿出信心搞好企业，不要急于合营。”那时正泰厂其他资方人员都吓得不敢出面，我觉得不能有丢包袱的思想，只能积极经营好企业，为合营创造条件。1953年我在民建会的启发下，再次申请公私合营，同年11月得到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成为上海橡胶工业第一批被批准的公私合营企业。市委领导对正泰厂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表示欢迎，并征询我们有何要求。我们开董事会讨论，当时资方人员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丢包袱思想，愿意让位，最好股票你拿去，名字也改掉，因为“五反”时股东也受了影响；另一种是挑轻担思想，虽然留恋私营，但肩膀吃不消。因此董事会的决议，要求合营后私方不任正职，私方代理人酬金不作投资。

1954年2月1日，是正泰厂正式公私合营的日子，在天蟾舞台举行大会，全厂职工情绪振奋，热闹非凡，有关部门都前来祝贺。政府任命私方代表都担任原职，成立以我为主任的清产核资委员会。那时私方代表都主张财产估价宁低勿高，免得背上“盗窃国家资财”的包袱，所以盘估下来，只值200多万元。公方领导知道后，表示不同意，认为根据共产党的政策，应该实事求是，评议核实加码，核定净值1200多万元。所有退赔欠款转作国家投资，公股占2/3，私股占1/3。

合营以后，企业面貌大为改观，工人干劲倍增，生产上升很快，厂里的资金充裕起来，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1955年1月，一个雨雪纷飞的寒冷冬天，陈毅市长亲临正泰厂视察，同来的还有陈丕显书记。那时陈毅市长已在北京担任副总理，国务很忙，抽出时间关心正泰厂的生产发展和我们工商业者的学习进步，诚挚之情，至今感念。那天全厂党政工团都参加

了接待，陈毅市长和我们一一握手。我还记得他谈笑风生，亲切而又爽朗地对我们说：“中国的民族工业经过三座大山的压迫欺凌，经过敌伪时期的掠夺摧残，民族资产阶级把这个厂保留下来是不容易的，希望你们遇事要好好商量，把企业办好，把生产搞上去。”接着上海市委召开了两次座谈会，正泰厂全部私方董事、原工商业者、工程技术人员和高级知识分子都去参加。陈毅市长亲自主持，他说：“你们是公私合营的带头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今天开座谈会，不是要听你们讲好话，主要是听听存在的问题，你们可以畅谈亲身体会，现身说法，你们有啥事需要解决，可以来找我。”陈毅市长肝胆照人，语重心长、循循善诱的讲话，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历次的政治运动，给我教育很深。如1955年的肃反运动，有人检举正泰厂的回力球队是反革命组织，事后澄清了。1957年的大鸣大放、整风反右，在民建会讨论时，李康年提出要定息20年，全部赎买，又提出正泰厂清产核资偏低，庄怡生要我带头为“五反”的事鸣放。我经过几年的学习，自认为思想认识有所提高，所以当时我即表示，定息7年的赎买政策是好的，正泰厂的核资是公正的，“五反”是教育运动，对我有好处。

在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各方面的“左”倾思潮逐渐发展。我有这样的感觉，一方面我做了一个服从公方领导，守职尽责的人，言论上没有出轨，行为上没有违径，侥幸没有犯严重错误；但是另一方面，我逐渐变成一个谨小慎微的人，随员就班，看报聊天，尸位素餐，无事可做。我认为公方经理把生产抓得很好，我也毋需过问，在企业里坐冷板凳，做石狮子，也心安理得。因此在较长时间里我对企业很少建树，只希望早点退休，我想个人的历史任务大概完成了。

### 十年浩劫的创伤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认为这是文艺界的事，跟我搭不



上界。没想到开群众大会，本来是声讨邓拓，结果却是声讨到我头上来了。平心而论，正泰厂的劳资关系长期以来处理得还好，合营以后公私关系也还正常，职工对我也没有什么恶感。据闻这次运动开始时，有许多工人替我讲话，不赞成把我作为运动对象，但受到工作队批评，说“天下乌鸦一般黑”，资产阶级没有好人。工作队找我谈话说：“你的恶势力很大，必须交代问题。”接着他们组织全厂职工写揭发我的大字报几千张，如某人是杨的走狗，某人曾借厂里一部汽车运杨母棺材，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棺材游行”，连1933年我还是一个普通职员时，老正泰厂发生蒸缸爆炸事故，也算在我头上，等等。一时空穴来风，天旋地转，搞了1个多月，后来愈演愈烈，连办公室也都禁止我进入。

1966年8月30日夜里，红卫兵几百人来到复兴中路我家里抄家。七天八夜，他们穿墙凿壁、翻箱倒篋，连花园里也掘地三尺，还用抽水泵抽干井水，据说捞出一把短刀，作为我私藏凶器，图谋不轨的罪证。抄去所有衣饰财物，箱笼家具，以及粮票几百斤。房子查封，我被扫地出门，全家十多口人，只得挤进阿哥家里去暂住。工资扣减为每月69元2角的生活费。

后来，我被勒令到车间劳动，我想能到车间劳动，俯首帖耳做辅助工，倒也定心。但事情没有这么便宜，还是日日夜夜要交代问题，每天早晨上班直到半夜一二点钟，疲劳轰炸式的逼、供、信，要我交代历史，交代神话式的所谓“抓共产党人”的问题。在那两个多月中，我每夜要写一二张交代稿，但是，我有什么可交代的呢？只得虚构一些乌有子虚的故事，又写了些例如用厂里的墨水写信，打电话忘了付费等鸡毛蒜皮的问题，用以应付日子。后来在群众大会上，我被定为“反动资本家”。我虽处在这样逆境，却没有消极躺倒，从没有想到要自绝于人民。我暗自思忖，共产党总是实事求是的，不会冤枉好人，颠倒是非，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这是我过去几次运动中所总结出来的经验。

1968年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我这个“牛鬼蛇神”，再度“演

出”。遇到别处批斗四类分子或公安局判处罪犯时，我多次被叫去陪斗。

1969年，“四人帮”在北京炮制了一个“六厂二校”的经验。据说有个北郊木材厂，有几十个资本家，其中有一个是反动资本家，有两个是不戴帽的反动资本家，他们具备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和严重政治历史拒不交代三个条件。张春桥亲自出马来上海抓试点，因为陈毅市长曾经说过正泰厂是民族资产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典型，张春桥为了反对陈毅市长，就存心把正泰厂打成反面典型。一时声势汹汹，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正泰厂的试点结论，资本家十人，杨某是“反动资本家”，另一个是不戴帽的反动资本家，其余的是一般资本家或资方代理人，还有什么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等。据说张春桥这个决定要报到中央去批，后来一直没有批下来。事实上那三个条件，对我都是硬装榫头，一条都装不上。

1971年8月25日，王洪文在上海搞了一个万人大会，一个所谓落实统战政策，其实是破坏统战政策的大会，宣布典型的正泰厂资本家的工资标准，有的人稍微提高了一点，可拿100多元，但我还是69元2角，别人的抄家物资，可发还一点低档生活用品的价款，但我一点也拿不到。同年9月林彪叛逃，坠机丧命，但“四人帮”还在台上，我当然还是原封不动，仍是“牛鬼蛇神”。1974年搞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时，我在车间劳动，不许我帮同做班组核算，说是怕“反动资本家”搞破坏。1976年元月周总理逝世，同年9月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这个人民的“敌人”，要被关进防空洞里，严加管束。浓云密布的漫漫长夜，“史无前例”的十年，无可奈何的委屈和迫害，创巨痛深，不知何时才能见到阳光？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不是共产党的政策，我是守法的资本家，党的实事求是的政策，一定会使我有重新出头的日子。

### 党的政策暖人心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万

恶的“四人帮”，白骨精和那些真正的牛鬼蛇神终于现了原形。人们从迷雾中走出来，看见了灿烂的阳光。1979年1月，共产党落实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归还抄家物资，恢复和补发扣减的工资，我亦有幸以垂暮之年，身沐雨露之恩，恢复了名誉。1979年5月，厂党委批准了我的退休申请，以后又挽聘我担任正泰厂顾问。1980年底，厂党委召开全厂大会，宣布给我彻底平反。

一个人的荣辱得失，虽然算不了什么，但是从一滴水可以见太阳。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众多人得到公正的待遇，温暖了人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我和许多原工商业者一样，被宣布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翁，我参加了工会，并当选为职工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多年来的夙愿实现了。过去我“身经百斗”，不曾流过眼泪，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我抑制不住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迷离老眼，满含着幸福的泪花。

1982年

## 爱国之心象冶铁炉一样熊熊燃烧

严开镐\*

我是旧社会过来的一个民族工商业者，一生从事铸造工业。解放前我怀着实业救国的愿望，先后集资开办了三家工厂，有的毁于日军侵华战争的炮火；有的因农村破产，缺乏销路而停业；仅存下来的华丰钢铁厂，也因产品积压而周转失灵，最后濒于奄奄一息、无法维持的地步。解放后经过加工订货，公私合营，到最后转化为完全国营，企业欣欣向荣，我个人的技术也得到充分发挥。我一生的经历，充分说明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民族工商业者的光明大道。

临近解放，上海有许多民族资本家逃往香港和台湾。当时我对共产党来后将会怎样对待民族工商业者心中无数。但我想，我没有多大资本，逃出去也没有什么前途。我爱祖国，不想到外国去做“白华”。再说华丰钢铁厂是我一手创办的，好几年惨淡经营，达到现在这种局面也不容易，我实在舍不得丢弃它。所以我宁愿守着工厂，留在上海，迎接解放。谁想解放以后华丰厂竟如枯木逢春，从破产边缘得庆新生。

上海解放不久，华东工业部代淮南煤矿招标购买大批管子、配件。我开好核价单前去投标。不料上海各五金商号所开标价，竟比我们要低30%，眼看这批定货要落到人家手里。令人感动的是华东工业部热情扶持民族工业，汪道涵部长亲自询问了我厂的情

\* 严开镐，曾任上海华丰钢铁厂总工程师。现任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顾问、上海市机械工程学会理事、上海市金属学会理事、全国铸造学会理事。

况，认为我厂确实具有生产能力，问题是管理费用过高。他指示我回厂去和工人同志研究出一个提高产量，降低成本的办法。只要华丰厂的货价能够减低到和五金商号一样，就把这批定货交给我们。我回厂以后立即找工人代表协商，他们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接受国家定货，决心努力生产，一定能够大幅度提高产量，大大降低管理费用。我向大家宣布，如果生产能有盈余，就将利润的30%提作职工的奖金。我们终于把这批定货接了下来。工人生产积极性十分高涨，月产量从12吨提高到80吨，最后不但没有亏本，而且有盈利。我们既完成了淮南煤矿的定货，还把解放以前积压的大批铸件全部脱售。这件事使我体会到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政策的英明和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才能办好企业的道理。从此以后，华丰厂坚持接受国家的加工定货，企业经营一帆风顺，生产不断增加，年年有盈余。

1950年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各方面对马铁铸品的需要大大增加。华丰厂规模较小，产品满足不了需要，要进行扩建，工厂又没有资金。不久，我们又接到南京汽车厂大量定货，鉴于我厂需要扩建而又缺乏资金的情况，该厂提出双方合营的设想。我想解放以前，华丰厂的主要困难就是资金短绌。我是个技术人员，但是终日为调头寸、找销路而到处奔忙。如能公私合营，销路有了保障，资金不用发愁，不是可以实现我过去发展民族工业的愿望了吗！我就去找华丰厂股东严庆祥商量，取得他的同意，提出了公私合营的申请。经政府批准，华丰厂在1951年正式公私合营，是上海最早公私合营的几家工厂之一。华丰厂公私合营以后，生产不断发展，连年都有盈余，私股利益也有了保障。这一年中，我参加了中国民主建国会，接着担任了上海市铸锻业同业公会副主任委员，还光荣地被推选为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从此，我更加诚心诚意靠拢党、相信党，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公私合营以后，我从繁重的管理工作摆脱出来，专心地钻研

铸造技术。当时我们厂铸造的马铁，是半黑心半白心的，质量不够好。经过反复试验，首创“不填料退火工艺”，铸造出了优质黑心马铁，不仅缩短了退火时间，节约大量用煤，还增强了产品的表面光洁度。这项成果受到了科技界的重视。上海交通大学增设锻造专业时，聘请我为兼任教授。后来上海组织双轮双铧犁公司，我被聘请为技术顾问。当时上海的铸造厂，除华丰厂已公私合营以外，都是私营工厂，产品质量都不够好，我就公开技术，在私营铸造厂中推广“不填料退火工艺”，还一家厂、一家厂地帮助他们改革工艺，铸造出优质黑心马铁，保证了制造双轮双铧犁主要配件的需要。经过大家的努力，造出几十万套双轮双铧犁，为发展我国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

当然，我思想改造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我思想上有过波动，有过苦闷。“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有人说，共产党要彻底清算资产阶级了，我心里深感不安。我最初在厂里参加“五反”的学习，后来参加了市委组织的全市303户工商业者的学习，提高了思想认识。最后不但我个人被保护过关，华丰厂也被评为完全守法户。共产党要清算的是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并不是要清算资产阶级的财产。通过运动，我认识到共产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的。“反右”斗争中，许多工商界朋友被划为“右派”分子，我虽然幸免，但从此小心翼翼，生怕犯了错误挨整被斗。1954年华丰厂实行“一长制”和总工程师负责制，领导上把我过去的一个学生（共产党员）提拔为总工程师，安排我作技术科内的马铁专业工程师。我觉得党的政策变了，将我们工商业者弃如敝屣了，认为自己前途暗淡无望了。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成立了上海市铸锻工业公司，我被任命为公司副经理，分管技术工作。这一安排使我认识到过去患得患失的错误，共产党总是重视我们工商业者，要发挥我们一技之长的，我的积极性又调动了起来。当时上海有八家铸铁厂，组织上分别属于冶金、机械、纺织、轻工等局领导，各厂的锻铸技术也各不相同。我想如能把各

厂组织起来，经常交流技术经验，就可以取长补短，提高全行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我把这一设想向领导汇报，建议由铸锻公司负责组织市属各厂对口检查，交流评比。经机械工业局批准后，由我带领检查团到各厂，总结生产技术经验，拟订评比标准。我组织技术人员轮流到各厂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往往是一早到工厂跟班劳动，晚上开会进行研究，发现问题就及时帮助解决。如熔炼铁水，各厂配料成份不一，退火工艺不一，因此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我们综合各厂数据，选出最优配料比例和最适宜退火工艺，进而制订统一的生产工艺，全面提高了产品质量。1962年全国第一次马铁技术交流会上，上海就介绍了针对我国焦炭含硫量高的特点，采用科学选择配料和工艺的最优数据、统一熔炼的方法，炼出高硅低碳高硫马铁的经验。会议决定将上海经验在全国推广，会议以后各地马铁厂纷纷来上海参观学习。对他们提出的技术问题，我们都竭诚协助解决，有的还派人去就地帮助。

随着我国生产建设的发展，我创办的华丰钢铁厂的规模也不断扩大。职工从解放时的160人，增加到2000人；年产量从解放时500吨左右，增加到16000吨，这是我在解放前做梦也想不到的。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我也遭受了冲击。在隔离期间，我经常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我想我虽然属于资产阶级，但一向是爱国的。我在旧社会办企业，也受到三座大山的压迫，当时那种满目疮痍的情况，至今还记忆犹新。解放后我相信共产党、靠拢党、感谢党，是共产党给了我光荣的社会地位，使我有机会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我感到莫大幸福，而且也为此付出过辛勤努力。怎么现在都一笔勾销了呢？但我相信共产党最后总会给我作出正确结论的。1976年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也从逆境中重新解放出来。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落实了各项具体政策，三中全会以后，“脱帽加冕”，我们民族工商业者和工人农民一样成为我们国家的主人。

目前，我担任着上海市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顾问、上海市人民代表。因我年老体弱，每星期只有一天到研究所办公，但我在家里仍经常阅读国内外有关铸造工业的技术资料，发现有新的先进工艺，就提交给工艺研究所的同志们研究。

共产党对我们有一技之长的工商业者十分重视。全国铸锻技术方面的会议都特邀我前去参加，人们对我极为尊重，称我为马铁制造专家。许多参加会议的人是我教过的学生，我为能给国家培养了一批马铁铸造人才，感到非常欣慰。我的侄子严国粹现任华丰钢铁厂副总工程师，另一个侄子严国基担任亚生马铁厂生产副厂长，我的儿子严国坤现任南京线路器材厂工程师，他的专业也是马铁铸造。我从事马铁铸造几十年，现在也后继有人了。我虽年事已高，但我那颗热爱祖国的心，仍象冶铁炉一样在熊熊燃烧。

（吾新民整理）

1981年



## 从“敲门”到“升堂入室”

张善章\*

我今年75岁。从16岁那年到上海南市元大药材行当学徒算起，到今年恰好60年。

企业公私合营时，我被安排为上海市药材公司副经理，与党员经理的合作共事，关系一直很好。我刚进公司时分工管采购。有次《新闻日报》要公司写一篇关于上海市对全国中药材的集散作用的文章，中共党员经理对记者说由我出面写，还关照有关科室的同志为我提供材料。在报上写一篇关系到整个上海中药业的文章，对一个私方经理来说，当然不是一件小事。这说明公司党组织在贯彻党的统一战线中是尊重我的。我在旧社会是个小药材批发行的老板，虽然有些业务知识，但毕竟没有经过大世面，所见有限。到了新社会，当了国营公司的副经理，又是在上海这样的中药材的集散中心，我见到的世面就大了不知多少倍。所以，我有较多的业务知识，并且可以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很大部分是在1955年至1965年这10年间学来的，也就是共产党把我培养出来的。

“文化大革命”中，有件事使我一生难忘。那时，我在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一位干部来探望了我。我心里很明白这表明共产党没有忘记我。

以后，我在仓库劳动了10多年，一直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1977年底，上海市举行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那时我还在

---

\* 张善章，曾任上海市药材公司副经理，现任上海市药材公司顾问。

仓库劳动。有一天，仓库党支部书记对我说：“老张，有件事情要通知你，希望你听了不要紧张。”我摸不着头脑，但听到叫的是“老张”，不象过去10多年那样直呼我的名字，明白不是很坏的事情。接着书记交给我一封信，信封上印着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的红字，通知我当选为本届市人民代表（我是上海市历届人民代表），我拿着信，不禁泪涕滂沱。共产党没有忘记我，共产党使我重见天日，我一定要报答。

1978年，公司不要我在仓库劳动了，调我到储运科工作。科长对我客气了，但只是让我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掬电风扇，却不让我工作。

国家不是要建设四化吗？为什么不要我工作呢？当时我不了解“左”的错误还在起作用，心情是苦闷的。有一次，上海工商界座谈讨论究竟怎样才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说：“很想把我吃奶力气使出来，可是我有力无处使，有些干部心有余悸，怕使用资本家，甚至至今还怕接触资本家。我现在感到‘爱国有心，报国无门’！”那时民建中常会、全国工商联办的刊物上，登了一篇短文，标题是：《只要爱国有心，何愁报国无门》。我看了很受启发。我想有些干部心有余悸，不敢认真贯彻共产党的政策，把门关起来，不要我们工作。既然如此，我就去敲门，让他们知道我要进来。

我跑到公司的一位党委副书记那里去“敲门”。我说：“希望能让我在中药旺季供应到来之前到各中药店门市部去看看，包括看看他们的橱窗。如果我一个人不适宜去，请派一个联络人员和我一同去，发现问题，我向你汇报。”

副书记感到为难，回答说：“你虽然已回到储运科，可是还没有安排职位。即使派一个联络员同去，你也没有身份向药店提问题。如果你一定要去，可以用顾客的身份去看看。”

我想，我没有敲准门！不过，副书记既然这样说了，也就是允许我可在工作时间到各中药店去看看，这等于给我开了一道门

缝，也是一种支持。那是1978年9月间的事。

从那年国庆节开始，我花了10天时间，跑了上海市黄浦、静安、虹口、杨浦、徐汇、南市等10个区的大小58家中药店。因为我是“顾客”，只能看看橱窗、店容。但光看看这些，也能发现很多问题。十年内乱中，林彪、“四人帮”把中药行业也糟塌得令人触目惊心。譬如原来的雷允上北号（在上海河南路桥附近），里面摆的都是红木柜台，这种古色古香的柜台，大约也被当成“四旧”横扫了。我去看时，招牌改为“虹口中药店”，里面摆的5只柜台只是个样子，又破又旧，店外墙上的石灰都剥落了。有家药店，大橱窗里挂着两块红布，一块画一把草，一块画一根针，此外什么也没有了。中国几千年来相传的中药宝库，如今好象只剩下一把草、一根针。我把10天来当“顾客”的所见所闻，分类整理，提了20多条意见和建议，写了一份近一万字的调查报告，向公司党委汇报了整整一上午。其中除了建议改正上述那些中药店的乱七八糟的情况外，还提出了上海的胡庆余、雷允上、蔡同德、童涵春“四大户”名牌药店，应当恢复。因为从那时开始，已经有些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回来观光。他们一到上海，很多人到处找这“四大户”，要买他们的药，但现在不但药买不到，连招牌都不见了，非常失望。过去，这四大户每年可以赚很多外汇，现在赚不到了。汇报以后，我向公司党委说：“这些意见我都提了。但我得郑重声明，我主张的只是恢复‘四大户’的招牌，不是恢复它原来的所有制。‘四大户’还是社会主义的。”

这些建议很快就起了作用。上海中药店的门面、橱窗渐渐改变了十年内乱中的旧面貌。我大为兴奋，现在已经敲开了半扇门，不只是一条门缝了。

1979年初，我退休了。退休之后干些什么呢？我发觉我们药材公司的经理是个明白人，他很重视我们的建议，一字一句加以认真研究。因而退休之后，我邀请几位老同行，共同研究起草了一份关于防止中药材霉烂变质的材料，共3万多字，分送给公司

党委和有关部门参考。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共产党和政府打开了双门，热情欢迎我们进去。1979年我们药材公司的民建、工商联基层组织提出为四化服务的打算，引起公司党委的高度重视。经过党委的研究，向我们提出10多项专题项目，例如珍贵药材、包括牛黄、麝香、犀角、猴枣、羚羊、珍珠、熊胆、人参、鹿茸的优劣、真伪的鉴别和加工技术；枫斗、玉桂、厚朴、黄芪、当归等70多种主要药材的鉴别和加工经验；门市饮片的同药异名和保管方法等等。这等于共产党出题目，我们做文章。我组织了60多位原来的老同业，按中药业的药材、饮片、参茸三个部类分成三个小组，按专题落实到组，又按品种落实到熟悉某项药材的行家。这是个巨大的细致复杂的任务。10多个专题总共写了10多万字。有的领导同志看了，认为这是中药业百年历史的总结，有抢救国宝，免于失传的重要意义。后来，我又作些专业调查，组织力量，另外写一份《中药门市服务手册》。公司党委热情支持。从1980年初开始，我邀请20多位在中药门市店有几十年服务经验的老同志，先后开了10多次座谈会。决定继续从调查研究入手，遍访了上海几个闹市区的中药店，先把中药行业的青年接班人在业务知识和技术上存在的问题搞清楚，然后推定11位行家执笔，写出了一份5万多字的手册。内容分：服务态度、服务质量、业务知识三大部分，共35个专题。公司党委看了，亲切地说：“你们写的这份《手册》，不仅可以作为当前向中药店职工进行宣传教育的材料，而且可以作为今后制订中药门市店的规章制度和店员守则的一项主要内容。”后来，中国药材公司派代表向各地收集中药材的历史经验资料，看到这份《手册》，大为称赞：“这是从你们脑袋里挖出来的宝藏，非常珍贵。我们总公司要把它编成书，分发给全国，作为培训中药工的教材。”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们的工作越做越广，也越做越深。有一次，我们接到几位中医师和科研人员的信，对中

药业提了许多意见和要求，并且说明，这些意见和要求已经分送到全国医药有关部门。我们一看，马上明白，这关系到全国中药材的产供销、经营管理、生产技术等等，是个更全面的咨询课题。于是马上就向公司党委提出，让我们对中药行业的有关业务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研究，而这个调查研究，首先得从了解公司内部的业务情况做起。看看从公司到门市店在业务上究竟存在哪些问题。这个要求，得到了公司党委的全力支持。公司指定各有关科室、中药技校、中药研究室、中药厂、仓库、各区药材公司、切制厂、供应站、中药店等总共31个单位，向我们提供情况，凡是我们要了解的业务上的问题，把情况如实告诉我们。有了党委的支持，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开了7次干部和职工座谈会。研讨的问题包括中药材的种植、采购、供销、储运、质检、科研、加工技术、业务计划、财会以至市场和价格等等。在座谈会上都详细地反映了情况，有的区公司干部还事先准备好发言稿。这使我非常感动，受到深刻的教育。我想，过去干部和我们资本家是两家人，他们怎么肯跟我们讲自己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呢？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策落实了，特别是党中央宣布我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和劳动人民成了一家人，是自己的同志，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现在不仅仅是对我们“双门大开”，而是让我们“升堂入室”了。

1983年

## 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

周叔弢\*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成立30周年了。回顾历史，我的内心感到无比的兴奋。30年来，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商联各级组织协助共产党和政府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组织推动广大成员参加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现在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来从事工商业的人士，绝大多数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并正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30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紧跟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才能和旧中国那种贫穷落后、悲惨痛苦的过去诀别，在今天气象万千、生气勃勃的新中国过着幸福生活。

30年来历史的事实证明，我们民族工商业者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是在曲折、反复中前进的。我们工商业者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自我改造道路上有所前进，都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的结果，是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极为精确地论断：“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

---

\* 周叔弢，原任青岛华新纱厂常务董事、唐山华新纱厂经理、天津华新纱厂经理、天津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曾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天津市副市长、天津市政协副主席。1984年逝世。

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个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工人阶级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有益的配合作用”，是指我们队伍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说的，我认为，工商联在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和平改造政策，团结和组织工商业者进行自我学习和自我教育，并推动成员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作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是不小的。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在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实现祖国统一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三大任务而斗争。

全国工商联恢复活动后，短短几年内的实践证明，无论在协助共产党和政府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充分调动广大成员的积极性，适应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新形势需要，开展经济咨询服务，专业培训和对外联络工作等方面，以及组织成员进行自我学习和自我教育方面，都继续作出了不少成绩。具体表现在我们全国原工商业者，在共产党的关怀和领导下，在全国工商联的帮助下，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积极主动地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了不少贡献。“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我今年已九十有二，决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追随大家，贡献一切力量！

邓小平同志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胡耀邦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上下、各行各业发出了建国后第二次重新学习的号召，并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起来，长期坚持下去。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全国工商联在组织全国工商界学习，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方面是有优良传统的。在

最近召开的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中，不少同志感到，我们原工商业者进入劳动人民的行列以后要重新学习。孙起孟同志提出，要注意邓颖超同志在开幕词中指出的两个“联系”，即“自觉地把自已从事的工作同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联系起来”，不断地更新和发展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在纪念全国工商联成立30周年的时候，希望我们全国原工商业者都要积极响应共产党提出重新学习的号召，在全国工商联的组织下，严格要求自己，在自愿的基础上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虽年迈，一定要追随同志们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让我们以努力学习、积极服务的实际行动纪念全国工商联成立30周年！

1983年



## 在接受改造中发挥自己的才能

黄兆贵\*

### 处逆境求生存

1937年，我从中学辍学进了家里开办的亚光电器厂。父亲对我要求很严，让我和工人一起干活，从头学起，以后也慢慢帮助跑些买卖上的事。我上了三年夜校学日文，后来能够看一些外国技术书籍，还到一位家庭教师家专门学习电机理论基础课程。21岁的时候，我当了厂里的副经理。

当时日本人占了天津，我们成了亡国奴，我心里很难过，也恨日本人。但是，为了养活一家人，又不得不把厂子维持下去。因为我会日文，所以厂里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事就都由我出面，因此常到日本商人家中应酬。

有一次，日本人叫我去修理一台500千瓦的电动机。虽然我知道那是日本人开设的钢厂里用的电动机，修好了是用来造枪炮打中国人的。可是，那时一来害怕日本人的势力；二来也贪图钱，他们出的修理费也不低，就干去了。那是我亲自干的，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莫及！

有一次，天津铁路局警务段的日本人来到我们厂，问一个叫山本的日本人是否到我们厂来过，我大哥说不知道，马上就被他们抓到警务段，又是打，又是骂。结果拿出2000元钱，才被放回来。那时对他们，我们是只得应酬奉承，否则你就无法生存下去。

\* 黄兆贵，曾任天津亚光电器厂副经理。现任天津市人大代表、天津市变压器厂副厂长。

日本投降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国民党忙于打内战，搞得市场萧条，商业凋零，我们厂也处于苟延残喘的状态。我看办厂子在当时无利可图，就和六七个人合资办了个“永丰和”五金行。为了免受官府欺压，在社会上站住脚，我们和一个国民党十一战区监护团副团长冯玉林拉上了关系，拉他当了股东。从冯那里，我们接受了国民党十一战区后勤的订货，为他们做了几千把军用镐把。在那时，为了赚钱，我们什么生意都干。

### 见到了解放军认识了共产党

1948年天津解放前夕，我们由于听信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提心吊胆，顾虑重重。我带了几台大型电机去上海。但上海也不比天津保险，好多资本家都在准备跑到外国去，而且上海的房价贵得惊人，一所够我们家住的房子，光“兑底”就得一百四五十根金条，合一千四五百两，而我带去的几台大型电机一共才卖了十几根金条。上海已是这样，外国更不用说了。没有办法只好又回到了天津，心想，死就全家死在一起吧。

解放后，我们亲眼看见了解放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那时候，由于国民党的长期搜刮，天津人民生活很困难，一般工人玉米面窝头都吃不饱。解放军来了后，大力帮助工人，发救济粮、救济款。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才使我慢慢不再相信国民党的那些造谣宣传。但是，共产党会怎样对待我们这些工商业者、小资本家呢？虽然解放军也出了安民告示，说是要保护工商业，但我心里总是忐忑不安的。

到了1949年底，天津的市场就恢复正常了，做生意的仍然安安稳稳地做生意，工厂、店铺，越干越红火。我们亲眼看到了政府保护工商业政策的可靠，慢慢放心了，办厂的劲头也越来越足。那时，我想的是把厂办好，多赚钱，发展大些，家里也好过舒服日子。另外，我还想在技术上出点名。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对厂子抓得很紧。当时，由于全国都在恢复生产，大搞建设，对

电机、变压器的需要量很大，厂子也忙，我天天都干10多个小时，产品还时常脱销。到1950年，我们就专门生产变压器了，年底，厂名改为“亚光变压器厂”，我任技术厂长，大哥管经营上的事，三哥在区工商业联合会参加社会活动。

当时厂子赚了不少钱，并添置了一批设备，工人也增加到50多人。

### 为赚钱想法搞好劳资关系

1951年，我们给保定发电厂做了一台1500KVA的变压器，电压是3.31千伏、10.4千伏的。那个时候，这么大的变压器我们没有做过，天津市的电器行业也从来没有做过，上海的生产水平比天津高，也只不过能做100KVA左右。我们想办法做成了，是我独立设计的。市委对此很重视，那一年评我们厂为一等模范厂。当时天津私营工厂被评为一等模范厂的只有两家。在市委召开的劳模大会上，给我们发了一面锦旗，上面绣着几个大字“劳资团结创奇迹”。对我个人、对我全家来说，这个鼓舞是很大的。

那一年，生产发展快，利润也赚得多，后来资本家都说那是“难忘的黄金时代”。

当时我觉悟比较低，不懂得接受工人阶级的监督，也不懂得私营经济应该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发展，只是想和工人搞好关系，少找麻烦，目的还是为了多赚钱。当然在作法上也采取了一些对工人有利的措施，如在劳资协商时，对工人的要求尽可能地让步，厂里拿出钱来，给工人搞福利。记得比较清楚的是，我们厂的工人办了个舞会乐队，厂子和工会拿钱买乐器，全天津都知道这个亚光变压器厂的乐队，哪里办舞会就请他们去伴奏，工人挺高兴，我们脸上也光彩。

那时认为厂子是自己的，赚钱多了，我们理应支用。所以全家的开销仍然随便从厂子里拿，从未记过账，一家几十口人花钱也没有限度。可是工人的工资还相当低，熟练的师傅一个月工资

40至50元，徒工工资10余元。

###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

1952年，三五反运动开始了。1月份听了动员报告后，没引起我足够的注意，认为这和我没多大关系，思想上毫无准备。2月份，运动深入，搞到了我们头上。“五反”工作组开会批评我们，叫我们交代“五毒”行为。当时，我厂偷工减料的行为是有的。比如变压器内部的线圈层绝缘用一般牛皮纸代替电缆纸，用马尼拉纸代替电工绝缘白板纸，目的是为了多赚钱。这样线圈的绝缘耐压性能降低，产品质量下降，给用户造成损失。另外，有时也用废旧材料冒充新材料。这些都是“五毒”行为，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在作怪，应该受罚。但是，我却认为共产党是变相没收我们的厂子。

那时形势很紧张，报纸上、广播里天天在揭发某某厂资本家犯罪，某某资本家被捕法办。我们十分害怕，甚至准备进监狱，连衣服都整理好了，准备法院一来人就跟着走。

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也就随潮流了，信口开河地交代了20亿元的赃款。其实那时厂子的全部财产算上厂房，也就值20多亿，光想着过关，厂子也不打算要了，稍有点联系得上的事就“坦白”交代。运动末期，政府认真算了账，定了罚款3亿元，我们定为“基本守法户”。

以前，我总认为政府要整资本家，心想：不就是因为有钱才挨整吗？交代的时候，就尽量往多说，把钱交出去就完了。所以，在一段时间中我想辞职，凭自己的技术去找碗饭。因此我在报上登了广告，应聘专业技术人员。结果，中共区委书记王郁文知道了，他批评我：“三五反运动没把你教育好，倒把你教坏了。你只要好好经营，发挥专长，前途是光明的，怎么能自己躺下不干呢？”后来实际情况证明他的话是对的。

“五反”中，最使我受教育的是那样一件事，当时天津自行

车厂生产的车子零部件淬火技术不过关，他们准备搞一种盐溶炉淬火的新设备，把制造这种盐溶炉变压器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一边接受批斗、过关；一边设计、搞试验，3个月内就试验成功了。不仅解决了天津市的自行车质量问题，而且这一技术推广以后，全国许多行业都来学习，订购这种盐溶炉变压器，所以，我们也为全国的工业发展作了一点贡献。对于这一点成绩，区委不止一次在南开区对资改造会议上公开进行表扬。我的大哥还接到了毛主席签名的请帖，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见到了毛主席。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了政府对工商业者政策的伟大正确。

回顾那一段经历，觉得在我这一生中，变化最大的就是那几年。刚解放时，我害怕共产党，害怕解放军，立场是站在人民反面的。可是慢慢地，共产党、人民政府使我懂得了：在咱们中国，只有靠共产党领导才有前途，国家才会兴盛，人民才会幸福。自己变得信赖党和政府了。从解放前，一直到“五反”以前，我一直是一个只知道发财赚钱的人，学技术、长知识，也无非是为了多赚钱，扩大自己的厂子，过好的生活。可是解放才3年，经过党和人民政府的教育，我就懂得了一个人光为了赚钱活着没有意思。无论是技术上，还是企业上，得为人民做点好事。尤其是在技术上做为一个专搞变压器的，自己在那时还是总想搞出点名堂来。这种想法，已经不是单单为了赚钱，还有了为党、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做点贡献的成分。经过三五反运动，我看到了成天算计赚钱发财的危险性。一个人如果成天想着发大财，弄不好就要跌大跟头，对人民犯下大罪。

### **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三五反以后，就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了。我们那时是和天津信托公司、天津交电公司联系加工订货，厂子发展到了100多工人，机器设备也增加了。1953年厂里给工人建筑了20间宿舍。工会提出设一个公方厂长。这种情况当时在天津还很少，很多资本

家都怕影响资方的三权（人权、财权、工厂管理权），不同意。我们的想法不同，我们认为有一个公方厂长，对于解决公私关系、劳资关系都有好处。一来，政府有什么政策规定，对我们的经营有什么看法，我们可以通过公方厂长尽快了解；二来我们的一些想法也好和代表政府的公方厂长及时商量。特别是在劳资关系上，我们可以避免和工人直接接触。这样，在经营中省掉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从那以后，厂子在管理上也改变了，首先给我们兄弟三人都定了工资，从此不再随便到厂里支钱用了，家里人由厂支付一部分生活费，弟兄几个分开过了。

在1956年全行业合营以前，我曾经想说服大哥，和中国建设公司（国营）合起来，按“四马分肥”的办法分红，脱掉“虱子袄”图个一身轻快。可是大哥不愿意，他觉得办厂那么些年了，很不容易，对厂子有感情，不愿意交出去，结果没合营。到了1956年我厂在生产上也遇到了困难，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终于到来，当时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厂里原材料不足，任务少，利润低，每月开支和发工资都困难了。所以，大哥也改变了思想，我们随着形势走，自然而然地就合营了。合营后，我仍当技术副厂长。

合营后，我松了一口气，认为资本家这顶帽子总算是摘掉了，我也是一个靠劳动吃饭的劳动者了。1956年，我想入工会，没实现。我当时不懂，为什么不能入工会？后来通过学习才使我懂了，成份是不随企业所有制的改变而改变的。

总之，通过党和政府的教育，我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道路是非走不可的，让人推着走，不如自觉跟着走。因此，自己比较顺利地过了社会主义改造关。

### **获得荣誉鼓起干劲**

刚合营时，就赶上天津市委重点抓60万台双轮双铧犁的生

产。市委要求我们在20天内完成4台盐溶炉变压器和2台中温炉变压器。按照我们厂的生产能力，一般情况下需要2个月左右才能完成，所以自己觉得没有把握。但是市委工业部领导对我说这是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为支援农业而下达的任务，它关系到工农联盟。我想这是党和政府对我的信任，也是我为祖国贡献才能的时候了，于是我就动手搞设计。经过一个通宵完成了图纸设计，第二天开始投入生产，15天拿出了产品。那时候工人的干劲很大，吃住都在车间里，我为了保证任务的完成和质量上不出问题，也和工人一起干，一直到产品出厂，向市委报了捷，才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事，我们厂、我个人都受到市委的表扬，报纸上也刊载了我们的事迹。这年11月份，我还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和毛主席、刘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合影留念。这在我一生中是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了。

在我当技术副厂长的一段时间里，有职有权，技术上的事我能作主，所以工作起来心情舒畅。我搞出了很多新产品的的设计，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

1957年，在天津的工业展览会上，展出了我们厂生产的1800千伏安变压器。毛主席在视察这个展览会时，很仔细地看了这台变压器，并且详细地询问了变压器的生产过程。当他得知我们厂是一个100多人的小厂时，赞扬我们是小厂办了大事业，小鸡下大蛋。在这一年，我被选为市人民代表和市政协委员。

1958年11月，我被任命为工程师，虽然不再担任副厂长职务，可是由于我能专心搞技术，所以还是高兴的。

### **政治运动的风暴迎面扑来**

在“整风”、“反右”运动中，父亲病危，我很焦虑，对运动无暇顾及。一个记者找我，问我对公私合营企业中领导权问题的看法时，我说，我认为在现阶段，企业中私方人员的威信下降，真

正有力量管好企业的是公方，是国家，特别是工人们都比较倾向于听国家的，听公方的。在这种情况下，私方人员应该有自知之明，同时，国家的计划经济领导私营经济这也是大势所趋，是历史潮流，不应该退回到资本家管理的旧时代去。

然而，政治运动的风浪到底还是冲到我头上来了。在“四清”运动中，我就被扣上“反动资本家”、“反动技术权威”的帽子，长期挨斗。“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抄了家，把我下放到砌炉组干活，四十六七岁的人和小伙子一起搬砖砌瓦，时常还要挨批斗。这样的日子长了，也就悲观起来，我认为可能熬不到头了，甚至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但是，有些事情鼓起了我生活的勇气，在多次批斗中，工人们了解我这个人，所以从未打过我，私下还对我表示同情。可见工人是通情达理的，对于好、坏、善、恶，心里是有数的。因此我也就坚持下来了。

那种日子一过就是6年。6年中，我没有放弃技术，怀着对祖国工业发展的信心，我一直不断地钻研技术，只要一有空，我就找技术书籍来看。1972年8月，厂领导把我调到天津电机变压器修配厂做工程师。最初我有顾虑，觉得干砌炉工也习惯了，不操心，吃得香，睡得好，身体还结实。经过多次动员，我才答应了。

初到厂时，由于“四人帮”路线的干扰破坏，生产很不正常，产品质量低劣，变压器渗漏严重，可是自己对这些现象无能为力。工厂安排我管试验室工作，我也只能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些工作。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情况就改变了。自己也懂得了为什么那几年生产情况那么糟糕。过去人们的思想被“四人帮”搞乱了，只顾产值不顾质量，以致我们厂的产品在1976、1977两年全国变压器质量评比中都是等外品。

1978年，领导为了解决变压器质量问题，给我配备了一位技术人员专门抓质量管理，两个多月后，出了10台315千伏安变压



器，正赶上全国质量检查，被评为一等品，占全国第一，一直保持到现在。

### 在有生之年要为四化多做贡献

1980年“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我的那些污蔑不实之词被撤销了。

6月份，重新任命我为技术副厂长，负责抓全面技术管理。现在工厂管理上实行厂长负责制，我工作起来有职有权，心情是舒畅的。恢复工作后，我着手抓110千伏变压器的质量管理。这种变压器电压高，容量小，制造过程工艺要求高。几年来，合格率一直在40%左右。我主动召集工艺人员、设计人员分析原因，找出差距，改进措施。到6月底，产品一次合格率就从过去的40%提高到80%，今后我要继续改进不合理设计部分，争取实现一次合格率提高到100%。

现在，虽然我年龄大了，但是心情舒畅，仍然想搞点成果出来。我们准备吸收国外变压器的充氮技术，提高抗短路事故性能，另外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变压器铁损耗低的特点，用新的结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性能，来创出具有我国的特点的新型变压器，争取在短时期内打入国际市场。

回顾一生的经历，虽然受到一些波折，可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使我由一个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这过程中，党对我的关怀和鼓励使我能够永远“向前看”而不气馁。我认识到：每个人对于祖国，都有他自己的责任和作用，所以，我们应该认清自己对社会的价值，为祖国、为人民尽到责任，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作用发挥出来，为四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祖国就会更加美好、繁荣和富强。

1983年

## 银发童心办“兰园”

戴 翩 英

我们这个集体中的成员，可以说都是天津市工商界妇女的知名人士。她们是左道腴（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叔弢的夫人）、马淑贞（天津李善人后代家属）、李慎之（天津华新纱厂、中天电机厂股东）、沈恩秀（天津达仁堂乐家家属）、胡静云（天津大明公司股东）、田盛华（天津副市长姚峻夫人）、李绥生、王文娟等几位大姐。这些位大姐，最年长的有80多岁，最年轻的也近60岁了。我叫戴翩英，我爱人毕鸣歧生前曾任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

为了响应市政府关于动员社会力量，兴办托幼园所，解决“入托难”的号召，1984年初，我和姐妹们，经过共同研究，自筹资金，开办兰园保育院。这所保育院建筑在体院北新建居民楼区，占地1400平方米，是天津解放以来设计建造专供托幼使用的较大建筑之一，可收托3岁以下幼儿200名，也是全市一个较大型的托幼机构。我们几位大姐，虽然在50年代办过托幼园所，但筹办这样较大型的保育院，深感经验不足。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建园资金，我们把儿童服装厂盈利4万元拿出来，做为建园资金，这笔资金也是来之不易的。

早在1980年初，我们就响应政府关于扩大就业门路，安置待业青年的号召，应伊利大姐（王光英夫人）和我们几位大姐共同商议，自愿集资办起了建联儿童妇女服装厂。一方面是为扩大青年就业门路，另一方面，想为美化儿童的生活尽一点力。

为了把这个厂搞好，几位大姐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从筹办

到开工后的三年里，我们分工定期到厂里协助厂长搞经营管理。为了搞好生产管理，大家不怕辛苦，不要报酬，经常外出跑路，有时还得去挤公共汽车。大家热情很高，但是究竟年岁大了，身体经不住磕磕碰碰了。但看到我们亲手办起的童装厂，一天天在发展变化，每个人的心眼里都是美滋滋的。目前，这个厂有了固定的厂房，逐年增置电动的各种缝纫机器有40多台，产品已成为天津三大商场的畅销货，还打入北京和东北等地区的市场。建厂至今安置待业青年近百名，连续四年被评为市级“三八”红旗集体。

资金问题解决之后，当时保育院的房子虽然盖好，但院里院外还是杂草丛生，楼群工地上的废土瓦块还未清理，交通不便，电话不通，新楼群的居民搬来的也还不多。要把一千几百平米的空楼房装修成可以收托200名幼儿生活、学习、游戏的园地，确实要费一番心力。我们成立了筹备组，在那从春到秋几个月的日子里，我们几个人真是顶风冒雨，不避寒暑地跑，几乎天天要到保育院上班。我们同原建筑部门联系，改动了一些具体设施，使之更适合托儿使用；我们从园林部门请来师傅进行环境美化；在市儿童医院的协助下，招聘从该医院退休的老护士担任我园的业务主任；与市儿童保健所签订合同，为我园建立儿童健康档案，做到小病不出园；聘用了以国办保育院退休的老师来园工作，对新招聘的青年保育员进行认真培训。李慎之大姐亲自制定了保育院的各项规章制度等等，以上这些工作，整整忙了4个月。熟人见面，都说我们“跑瘦了，晒黑了”。也有的说我们是“放着清福不享，何必自找苦吃”。更多的同志则鼓励我们说，这几位老大姐不顾年老体弱，为儿童福利事业出来奔波，是高尚的爱国行动。

1984年初秋，开园典礼那天，副市长姚峻，市人大、市政协、市妇联、市委统战部的领导同志出席，并为开园剪彩。1985年春天，保育院的工作得到进一步肯定，受到了幼儿家长的赞扬。天津市人民政府奖给我院一面绣着“为职工分忧，为孩子造福”

的大幅锦旗。电视台还用“她们都有一颗童心”为题作了专题报导。这对我们都是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有一件事，在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有一对年轻夫妇，他们的孩子在我园入托。在一次接孩子时，他们碰到了我。他们说：“戴奶奶，您还认识我们吗？50年代，我们就是从您办的托儿所里长大的，现在我们的孩子，又请您来抚养了……。”看着眼前这两代人，我的心里充满了激情，久久不能平静。这些话，说得多么有感情啊。这是对我们的无限安慰，也表达了职工对儿童保育事业的殷切希望。每当坐下来认真想一想，这些年我们每作一点工作，取得点滴成绩时，党和人民都给予我们很大的鼓励。我联想到在1956年合营高潮时，我和其他9位大姐，曾代表天津市的工商界妇女到北京向党中央报喜，受到了毛主席、党中央和国家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我们一生也忘不了这幸福的时刻。几十年来我们在党的领导和长期教育下，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尽管在十年浩劫中都受到了很大冲击，但跟党走决心一直没有动摇。现在我们虽然年龄老了，身体弱了，但为四化贡献的劲头不能减。

这些年来我们虽然作了一点工作，但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今后我们决心在党的领导教育下，以有生之余年，为四化建设特别要为儿童福利事业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1985年

## 我们的最大心愿

蒲洁修\* 孙孚凌\*\*

自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发生根本变化，我们工商业者已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国家的主人。我们与共产党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亲近，心情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舒畅。目前，北京市的工商界同志在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政府和政协担任领导工作的有22人，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常委有249人，在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为数更多。全市4000多工商界同志，除在职的在各自岗位上努力工作发挥专长外，年老退休的同志也过着幸福的生活，其中不少同志还积极参加各种类型的经济咨询服务、专业培训以及兴办集体事业安置待业青年的工作，有些还参加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智力支边，都作出一定的贡献。

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我们的同志中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迹，涌现出不少先进人物。1984年有160余人被评为各级先进工作者，有的单位被评为先进集体。妇女同志也大力支持亲人为四化服务，有一些人被评为各级“三八”红旗手和“五好”家庭。

---

\* 蒲洁修，曾任重庆大同制革厂厂长、重庆益民织造厂厂长兼工程师、北平工业试验所工程师、北平振北制革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兼工程师。现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顾问、民建北京市委主任委员、北京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孙孚凌，曾任北京福兴面粉厂经理。现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民建北京市委副主任委员、北京市工商联主任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我们大家深感，祖国的繁荣富强是全国人民，也是我们原工商业者的共同意志和共同愿望。如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无比正确，国家形势一天比一天好。我们人虽老了，但还有一点余光余热，绝不能放过这个为国效力的大好时机，我们要以有限的生命贡献给无限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这是我们大家的肺腑之言，也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追溯几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我们深深体会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我们就不能顺利地走向社会主义光明大道，成为社会主义祖国的主人翁。中国共产党提出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长期的方针，并重申了要在国家建设中加强与民主党派的长期合作。这是共产党对我们的莫大信任，使我们更加热爱共产党，坚决同共产党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为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为实现对外开放、各项体制改革和在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而竭尽全力奋斗到底。我们一定要联系实际，认真学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领导人的论著，更加自觉地进行自我教育，提高认识，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

1983年

## 挣脱羁绊的骏马

——记同仁堂药店经理乐松生\*

何婉言

原同仁堂药店经理乐松生，是我国中药界一位很有名望的人物。

北京同仁堂创建在清朝康熙七年，距离今天已经有300多年了，所以又叫“乐家老铺”。1861年后，这个铺子实际上成了清皇室的御药房。解放前夕，开始由乐松生经营，他是同仁堂的第七代经理。

解放初期，一些资本家受反共宣传的影响，害怕共产党。乐松生尽管在解放前夕接到共产党对于民族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的文件，但心里总是忐忑不安，半信半疑。同时，他也想过，乐家世代经营工商业，自己又没有参加过伪政权，怕什么呢？正当他心情矛盾，踌躇观望之时，同仁堂发生劳资纠纷。他硬着头皮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与职工代表进行谈判。出乎他的意料，双方竟达成了协议，并在劳资联欢会上，被职工代表推为同仁堂经理。这使他相信了共产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从此，他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全体职工的努力，积极从事药材经营，为人民健康服务。1953年“五反”时，同仁堂被评为完全守

---

\* 乐松生，曾任北京同仁堂国药店经理、天津达仁堂国药店副经理、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民建北京市委副主任委员、北京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政协委员。1967年逝世。

法户。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乐松生学习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思想斗争激烈。他清楚地记得，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时期，同仁堂经常受到汉奸、特务的敲诈勒索；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政府乱发金圆券和实行无理“限价”，使同仁堂破败衰微，奄奄一息。他也深深感到，同仁堂过去尽管有其经营管理上的特点，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病，经营管理混乱，生产效率低，封建性的生产关系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他渐渐明确了厂店合一的小生产方式已显得很不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势在必行。

1954年，在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他带头申请公私合营，是首都也是全国中药界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一家。他的沉着果断和注重实效，获得了舆论和各界的支持，在北京工商界引起了很大震动。当然，他也遇到来自右的方面的反对甚至辱骂。当时一些对共产党的政策不理解的资本家说：“乐松生出风头，弄个一官半职，出卖了我们”。然而，乐松生毫不动摇。他理直气壮地说：这是顺应时代潮流，不能墨守成规。接着，他利用各种机会向持不同意见的资本家讲道理，用质朴而深刻的语言，批评一些资本家对公私合营优柔寡断。他指出，促使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关键是私营企业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的胆略和风采博得了人们的赞赏。解放初期，40多岁的乐松生，被一些人赞誉为“挣脱羁绊的骏马”。

乐松生亲眼看见，公私合营使古老的同仁堂开始了新的生命。企业的性质变了，经营的目的不再是为了高额利润，而是为了广大人民的需要；生产关系变了，职工成了企业的主人。在北京同仁堂公私合营庆祝会上，乐松生兴奋地说：同仁堂将进一步为国家和人民服务，在制药技术上一定会得到科学技术的援助。这样，同仁堂数百年积累下来的制药技术、经验，可以精益求精。



乐松生曾被选为全国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1955年被选为北京市副市长。然而在成绩和喝采面前他并没有陶醉，也不炫耀自己的成绩，而是竭尽全力继续工作，继承中药传统遗产，进行中药改革。

总结经验，培养后继人材，是乐松生改善同仁堂经营的着眼点。在他的倡导下，同仁堂开办了技术课，由老药工向青年工人传授经验。同仁堂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培训的那批年轻人，现在已经成为同仁堂的业务、技术骨干。

乐松生在从事中药事业的生涯中，十分强调药店的社会责任感。他说：“一个药店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离开了社会和人民，还有什么价值呢？”“中药是中华民族国粹，是国家的一宝。为了发扬祖国传统医药，制药厂必须开发中药，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中药，使之造福于人类”。历来，中药一般为汤剂和丸药，群众服用麻烦，也不便于保存和携带。能否将中药西制呢？解放初期，彭真市长曾鼓励乐松生试办中药提炼厂，改进中药的制造。起初，乐松生考虑到缺乏技术、设备而不敢尝试。在彭市长的不断鼓励和督促下，他树立了信心，邀请北京大学药系郑启栋教授等成立了国药改进研究室，试制成功银翘解毒片、香莲片、女金片、黄连上清片等。1956年，在乐松生主持下，正式成立同仁堂中药提炼厂。这是全国第一个生产中药片剂的厂家。

如今，同仁堂中药提炼厂已发展成为拥有现代化设备的工厂。当人们看到一批批精制的中药片剂销往祖国各地，销往国外和港澳地区时，怎能忘记乐松生改革中药的功绩呢？正象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鹏飞在同仁堂开业315周年纪念会上讲的：乐松生为祖国医药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1985年

## 献给新中国的一份薄礼

### ——记陈荫棠\* 解放初期的一段往事

寿乐英

初冬的北京，气温已经较低了，在西城马相胡同一座普通的民房内，我们访问了原北平大华窑业公司（现大华陶瓷厂的前身）总经理陈荫棠老先生。

温暖如春的住室内，今年已届93岁高龄的陈荫老，面色红润，精神矍铄，思维仍很敏捷，也十分健谈。当我们拿出从图书馆复印的1949年4月25日的《人民日报》，把上面关于《大华窑业公司正确实行劳资两利，生产获得迅速发展》的报道指给他看时，老人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了。在此之前，因为缺乏资金和铁路中断，运不进原料，大华窑业公司停工已达7个月之久。解放了，该怎么办？由于受到侄子陈卓毅等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帮助，陈荫老早就听说共产党是真心救国爱民的，对党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政策也打心眼里拥护。特别是他亲身与共产党、解放军打交道的一件事，更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那是1948年的秋天，北平郊区已经解放。他办的大中染织公司地处北平西郊，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207师正驻扎在那里。解放后，工厂生产照常进行，没有受到丝毫影响。部队同志几次来

---

\* 陈荫棠，曾任沈阳纺织厂厂长，肇新铝业公司总经理，志诚银行董事长，北平大华窑业公司总经理。现任北京市工商联顾问。

工厂参观，提出为了生产军需品，希望能合作办厂。征得他和股东们的同意后，部队投入了一半资金，派人进厂实行共同管理。部队同志待人和气，办事公道，遇事注重民主协商，使他感到共产党确实和国民党不一样。

为了支援解放战争、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陈荫老积极筹备复工。缺乏资金，他变卖了房产，还四处奔走向亲友借款。不少亲友知道他在解放前的两年，为了维持大华窑业公司的生产，曾经卖过一处房产。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物价飞涨，商业萧条，民生凋敝，那笔款项仅一年多就赔累大半。这次见他又要卖房产，亲友们纷纷劝阻，但怎么也说服不了他，气得骂他得了“疯病”。有人预言：“他办厂的苦头还没吃够，这一次非坑家破产不可！”然而，陈荫老却坚信，新的时代开始了。

他凑到了110两黄金，自带行李住进了工厂。2月4日，工厂正式复工。他对工厂管理进行了一些改革。首先，废除私方说了算的经理制，成立了有工人参加的厂务管理委员会，统一领导厂内的各项事务。其次，适当增加职工工资，逐步改善职工福利事业。当时已年近花甲的陈荫老，住在一间破旧的办公室里，与职工同灶吃饭，取消了原先厂里职工分为四种灶的制度。他还自动把自己的工资由原来的500斤小米，减至250斤，只相当于厂内中等的工资水平。这些行动，得到了职工的一致称赞。解放后，企业内从未发生过劳资纠纷，职工的积极性普遍高涨。政府还贷款帮助工厂新建了瓷窑和原料场，增加了工人，使生产获得了迅速发展。

当时任全国总工会负责人的李立三同志在材料中得知了这些情况，于4月下旬亲自来到公司调查访问。李立三同志详细询问了他是怎么想起和工人共同管理工厂的，表扬他的思想进步，说这一做法对工人和资本家都有好处，是劳资两利。还向职工代表提出，经理的工资不能太低，建议做适当调整。5月1日，李立三同志发表了《关于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政策的几点说明》的文章，其

中把大华窑业公司作为正确实行劳资两利政策的典型作了详细介绍，号召各地私营企业的工人和资本家向他们学习。

访问结束时，李立三同志勉励他说：“你是个事业家，今后按照现在精神继续努力，在发展中国工业的事业上一定会有很多建树的。”

他感到，自己积极组织复工生产，不过是向新中国献上的一份薄礼，就受到共产党和政府如此的信任和鼓励，真是莫大的光荣。由此，他也看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工业振兴的美好前景。

在搞好企业经营的同时，他还积极参加民建会、工商联组织的学习和工作，认真领会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自觉加强思想改造并推动广大工商业者走社会主义道路。1954年，他的企业申请公私合营得到批准，他本人担任了大华陶瓷厂副厂长。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时，他把在东北各企业中的个人资本约150万元自动放弃，捐献国家。

回首往事，陈荫老感慨地说：我是学工的，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在东北办了十几个企业。以后来到北京，开办了大中染织公司、大华窑业公司、大隆建筑公司和华兴制棉厂。厂名中含有“中华兴隆”四个字，寄托我渴望国家富强的愿望。但是，如果有人问我，在旧中国，你的实业救国之路走得怎么样？我会答复他：你纵有天大的本领，就是累死，也不会有多大发展。我的亲身经历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中华兴隆的美景。

1985年

## 爱国实业家刘国钧\*

江苏省民建、工商联

刘国钧1887年4月2日出生于江苏省靖江县。家境贫寒，自幼失学。16岁到常州奔牛镇一家杂货店当学徒，后来自己独资开设杂货店，几年之间积聚了一笔资金。

1915年，在全国人民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的运动中，刘国钧和友人合资开设大纶机器织布厂，从事织染工业。两年以后，因股东内部纠纷，刘国钧拆伙退出。1918年，他独资开设广益布厂，以后又增设广益二厂。1924年，他赴日本参观考察。回国后，改变经营方向，由原来的织斜纹布、白平布为主，变为以生产色布为主。1927年，他将设备陈旧的广益布厂收歇，集中资力更新广益二厂的设备，成本降低，质量提高，品种增加，获利极丰。至1930年，除去固定资产以外，单是流动资金已有20余万元。

大纶自刘国钧退股后，增加纱锭设备改为纺织厂。但因经营不善，又值中外纱厂竞争激烈，历年亏损，难以维持，有意出盘。一般资本家不敢投资，但刘国钧雄心勃勃，以40万元的代价承盘下来，改组为大成纺织染公司，资本55万元。除招进一部分外股外，他自己投入巨额资金，自任经理，于1930年正式投产。由于经营有方，任用得人，同时改进设备，降低成本，在两年之

\* 刘国钧，原任常州大成纺织染公司总经理。曾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民建江苏省委会常务委员、民建常州市委员会主任委员、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大代表、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

内获利五六十万元。1931年增资为100万元。1932年把广益厂合并进来，改为大成二厂。1934年又筹建了大成三厂。1936年他向汉口震寰纱厂投资，改之为大成四厂。这样，到1937年，大成的注册资本已增到400万元。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国钧把部分设备运到上海租界，开办安达纺织公司；部分设备迁到汉口，后转运重庆，开办大明纱厂。常州沦陷后，大成三个厂或被毁或被占，损失严重。

1944年，他看到日寇败局已定，就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在美国订购了7万纱锭，为战后的生产发展作了准备。1945年日寇投降后，他从美国回来，积极恢复大成三个厂的生产。

解放战争后期，刘国钧看到国统区通货膨胀，市场混乱，就派儿子刘汉堃去香港，将全部私人外汇和大成的部分资金都转了出去。1948年底，他去台湾，带去200台布机和部分原料，准备在台湾建厂。当时，他的心情摇摆不定，既恨国民党，又怕共产党。考虑再三，决定去香港暂避。到港后又曾去过一次台湾，他看到台湾情况很乱，又把运台物资运回香港，投资开设了一个纱厂，定名“东南纱厂”。

刘国钧准备长住香港，但怕大陆解放后共产党要收回香港。因而他又在美国买了10万美元公债，存了20万美金，甚至还向巴西一个橡胶园投了资。不过，他念念不忘国内事业，希望共产党来了能让他仍在常州经营他的大成。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常州解放。刘国钧在香港听到国内的情况很安定，他在常州的几个厂都照常生产，安心不少。他当即汇回了一部分外汇，作常州三厂的周转之用。当时有人劝他回大陆，但他迟疑不定，没有立即成行。

1950年初，刘国钧得知在大陆的大成公司负责人刘靖基被特邀为苏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内心触动很大，悔不该当时远走香港。他随即偕同夫人回到上海，并去北京与黄炎培等人会面。中央首长接见了她，他非常高兴。回到常州后，看到大成三个厂

都在正常生产，秩序比解放前还要好。工人对他还是很尊重，为他开了盛大的欢迎会。常州市诸葛慎市长还特地请他吃饭，欢迎他回常州办实业。这样，他感到共产党在重视生产，和自己的志愿相吻合，因而取消了回香港的念头。

1951年，刘国钧被特邀为第二届苏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在无锡开会时，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和他长谈了两个小时，他更感到共产党非但不可怕，还大可以交朋友，就表示愿意把自己事业的重点放在常州。同年3月，刘国钧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并负责筹建民建常州分会。该分会于同年6月正式成立。在筹备期间，他除资助筹建费用外，还积极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六一”号召，推动常州工商界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共捐献飞机12架，其中大成认购了3架多一点（合50亿元旧人民币），刘国钧个人认购了26500万元。

1951年底全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刘国钧被从上海叫回常州，检查交代。开始时他处之泰然，以为他个人和大成厂都不会有偷税、漏税和盗窃国家资财等不法行为。后经检查，发现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不过当时政府对他是保护的，没有让他和工人直接见面。最后根据他本人所交代的100亿元，核实为20亿元（旧人民币），评为一类守法户，还在厂内开了劳资团结大会。刘国钧感觉到共产党办事是实事求是的，对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53年9月，中国共产党宣布了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号召资本主义工商业走公私合营道路。当时刘国钧看到大成的三个厂，在解放时已拥有纱锭74300枚，布机1780台和日产5000匹的印染设备，解放以后全部接受加工定货，走公私合营道路将是必然的趋势，而且如能转为公私合营，发展前途将会更大。他本着一片爱厂、爱国之心，决定努力争取早日实现公私合营。他召集大成三个厂的全体代理人开会，在统一了思想以后，即向政府提出要求公私合营的申请。1954年4月得到政府批准，大成公司成为江

苏省在总路线公布以后第一个实现公私合营的企业。合营以后，除由公方代表田诚担任董事长外，由刘国钧和刘靖基担任副董事长。政府并任命刘国钧为总经理。

大成公司的公私合营对全市工商业者有较大影响。刘国钧看到大成在公私合营以后生产发展得更快，心里十分高兴，到处宣传公私合营的优越性。

1955年，他在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中执委扩大会议上发言说：企业改造已基本完成，关键问题是工商业者的自我改造。人的改造比企业改造要难得多，改造决不是改头换面，象梅兰芳上舞台那样，男扮女装，在台上是天仙美女，在台下仍是男子，这不是真心的改造，是乔装改扮，进不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洗心涤肺，脱胎换骨。据说，后来关于工商界改造要脱胎换骨的提法，就是引用他的话。

1956年初，常州市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在红星戏院的庆祝大会上，刘国钧与市总工会主席汤永安热烈拥抱。他说，他比在美国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时还高兴。他认为，由国家经营，中国工业一定要大发展了，只要大家同心协力，做一个世界强国是没有问题的。

在此之前，刘国钧还于1954年把小儿子刘汉良召回国内，希望他为国家贡献才能。1956年，刘国钧调南京任江苏省副省长，省民建、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不久，反右斗争开始。有人一再动员刘国钧揭发钱孙卿。刘国钧说：钱孙卿对我虽然不服气，说我当副省长是土包子作皇帝，但人与人之间总有谈心的时候，这些话都要端出来的话，今后还有什么朋友？运动中，大成系统有多人被划为右派，使刘国钧深受震动。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刘国钧捐献了数万元，支援各地办工业、办托儿所等。在江浙两省民建、工商联负责人开会研究工商界应如何对待城市人民公社的问题时，刘国钧说：我是不会



说违心之论的，至少是不想说。我看城里办公社不是前进，资产阶级不能参加，叫他们做什么？不是社员，也不能进敬老院，样样要配给，资产阶级有了钱没有用，饿死他？我看这个章程，毛主席是不会赞成的。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市场物资供应紧张。刘国钧的生活虽由政府特殊照顾，但家乡的亲戚常到他那儿吃、住、借钱，搞得他家的粮食也很紧张，一个月要有几天靠胡萝卜补充。刘国钧天天想着如何使国家渡过难关。例如，他提出由他私人投资造一个旅馆，实行高价收费。还建议到香港进口食品，建议养兔，等等。1960年到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他听说国家财政紧张及各地的困难情况，内心焦虑，晚上迟迟不能入睡，半夜里爬起来和他的夫人议论如何克服困难，还打电话给住在另一房间的巢福偕，询问自己想的办法好不好。后来，国内情况基本好转，刘国钧看到共产党能把那样大的困难克服，内心深感信服，对“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称赞备至。

1962年，政府号召工商界通过民办学校等办法协助国家解决学生的就学问题。刘国钧从定息中支取了80万元，分别捐献给江苏省和常州市作办学经费，以后再没有领取定息。

刘国钧的企业全部公私合营以后，他认为，自己一生中取之于民的已还之于民，只是在香港还有个东南纱厂，自己投资了500万元，应在生前想办法拿回国内。1962年，他偕夫人赴港，在东南纱厂饭厅召开职工大会时，他站在饭桌上向职工讲话，宣传国内的社会主义制度好。回来时，他带回了120万元的肥料款。

“文化大革命”中，刘国钧也受到冲击。看到经常接见他的省党政领导人江渭清、彭冲等都受到冲击，自己的孙子在学校被同学打“狗崽子”轰了回来，家庭经济也发生困难，一时思想上很迷惘。他说：“想不到活到80岁要过这样的生活。爬上资产阶级地位不容易，要消灭资产阶级，这个关也不容易。”他又说：“真正的共产党员被斗、被赶下台，现在的做法是不象共产党员做的。”

1973年，经政府批准，刘汉良夫妇及子女出国，临行时，刘国钧叮嘱儿子：每年回来一次，不要断了国内的路，不要入外籍，到死做个中国人。

后来，省委统战部恢复组织省级民主人士进行学习，刘国钧积极参加，家也搬迁到梅园新村居住。常州的住宅由政府帮助做了修缮。他感到共产党的政策逐步落实，心情渐趋舒畅，亲笔写了一副对联：“人老心不老，永远跟党走。”1975年，他继续当选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衷心感激共产党对他的关怀、照顾。但是，他对“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也深感不满，曾对人说：张春桥、江青路子不正，是做不成大事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刘国钧感到国家有了希望，心情很愉快。

1977年12月，刘国钧担任了江苏省政协副主席，1978年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3月8日，不幸因病逝世，终年90岁。

寿乐英整理

1985年

## 难忘的话语

陈 遵 衡\*

在全国人民向着四化胜利进军的号角声中，迎来了国庆35周年。象一个人，祖国度过了幼年和青年时期，经历了胜利的喜悦和挫折的焦虑，而今终于排除万难进入了壮年时期。花红叶茂，生机勃勃，硕果累累的丰收已经在望，令人心花怒放！

35年，自己随着祖国一同前进，走过了一条曲折而又光明的道路。有过欢乐，有过哀愁，但毕竟跟着共产党走过来了。力量的源泉有各种因素。回首当年，归根到底，来自对祖国美好前途的追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

记得在1951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在原国民党总统府西花园中，陈毅司令员会见黄炎培、姚维钧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当时我担任南京市工商联主委和民建会筹委会召集人，也带着自己的小女孩陪同在旁。陈毅司令员目光和藹，谈笑风生，和黄任老相谈了个把小时。陈毅司令员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这是蒋介石的总统府，他想千秋万代，但是，所作所为不得民心，统治了二十二年，还是垮了台。我们共产党，小米加步枪能够取得胜利，因为维护人民利益，得民心。”谈完，他环顾左右，笑呵呵摸摸我的小女孩久棣的头对我说：“这是你家的小朋友？”我说：“这是我的女儿。”陈毅司令员接着说：“等到她们这一代上来了，中国就大不一样啰！”这段话，当时我听得入神，印象深刻，至今还记忆

---

\* 陈遵衡，曾任南京有恒实记面粉厂副厂长。现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顾问、民建江苏省委员会主任委员、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省政协副主席。

犹新。它为我的点滴进步，为我后来逐步树立“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起了启蒙和催化作用。

当时听到陈毅司令员的话，我立刻就联想到解放军进入南京时的严明军纪。解放军来到我任副厂长的有恒面粉厂时，不但秋毫无犯，而且主动贷款、拨给小麦，使奄奄一息的面粉厂恢复了生产。其他有利国计民生的工商企业都在共产党帮助下开始复苏。我这个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夹缝中生存下来的民族工商业者，直觉地对共产党有了好感，深深感到陈毅司令员的话，言简意赅，说得对，说得有道理，共产党得到了民心。我开始进一步盼望共产党能把国家治理好。

事实证明，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站起来了。35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我们的祖国和我个人却发生了多么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我女儿从体育学院毕业以后，也正在为我国的体育工作贡献力量。我们的祖国，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变成了屹立于东方的大国；从“东亚病夫”变成了今年奥运会上夺取了15块金牌的骁勇健儿，从劳动人民啼饥号寒变成了10亿人口丰衣足食；还有那长江大桥、葛洲坝水利工程，……数不尽的光荣业绩。陈毅司令员的话，实际代表了老一代共产党人的心声：我们能够破坏一个旧世界，也能建设一个新世界。回忆起陈毅司令员的话，音犹在耳：“大不一样喽！”今天终于实现了，而且还将继续实现下去。尽管我们过去有过挫折反复，不管我们前面还有多少艰难困苦，但是，致力四化、振兴中华，已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人民凝聚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我们已经取得了历史上任何时期不能比拟的成就。

当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改革浪潮正在一浪高过一浪，四化大业正在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憧憬未来，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更伟大的成就。今天和昨天比，中国已经“大不一样”，明天和今天比，中国将更加“大不一样”。

环顾神州大地，四化战鼓正催人奋进。自己虽然两鬓斑白，

但壮志未已，余热能发，余勇可嘉，想起当年陈毅司令员的一席话，更加感动，倍受鼓舞。过去鼓舞了我跟着共产党前进，今后还将鼓舞着我，永远跟着共产党在四化征途上前进。

1984年

## 改造了企业，也改造了人

吴春达\*

解放前后，我是个经营纸张的批发商。那时我仅25岁，但已老于世故。企业是我们兄弟四人合资，因怕树大招风，我们商定把一部分资金和职工分散到上海，开设分号。“五反”运动中，批发商投机倒把的故伎被揭露，但共产党向我伸出了挽救的手，评我为基本守法户。批发商改造后，我们兄弟在杭州的企业资金，分投到两家比较大型的零售商店中去。政府还委派我担任其中一家的经理。当时我主张在纸张的货架上设计了多层的活动抽板，使各种规格的纸张得以分别陈列出来，既方便供应，又可减少破损，得到了市文化用品公司的物质奖励，《浙江日报》还作了鼓励性的报导，这是我走上社会主义光明大道的开始。

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在共产党的关心和安排下，我先后担任了文化用品公司批发部副主任和市百货公司副经理。在工作中我逐步意识到，只要能为人民做点好事，是会受到人民的热情欢迎和支持的。这个念头，为我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也为我的政治思想改造创造了条件。它既符合国家的利益，也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

这个想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了新的内容。几年来我曾几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还被选为杭州市的人民代表。1980年底领导上把我从企业里调到民建、工商联工作。30多年来，我把这个“改造了企业，也改造了人”的历程，分为三个

---

\* 吴春达，曾任杭州复大纸行负责人。现为杭州市人大代表。

方面进行回忆对比：首先，我对比了30多年来新中国的欣欣向荣与旧社会的黑暗日子，使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思想上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其次，对比了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与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使我对真假马列主义提高了识别能力；第三，对比了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短短几年时间里在政治经济上出现的喜人的大好形势，与这以前在两个“凡是”的“左”的指导思想下的徘徊不前，使我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的正确，有了明确的认识，从而鼓舞着我沿着十二大指引的方向，为振兴中华、实现四个现代化竭尽自己的微薄力量。

30多年来，我在“改造了企业，也改造了人”的历程中，能够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开始联系起来；把祖国的今天和祖国的明天开始联系起来，前者使我不再心有余悸，不再存在后顾之忧。后者使我对实现祖国80年代的三大任务满怀信心，我们有充分依据，可以通过团结奋斗，到2000年实现工农业生产的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这对我的工作、学习和思想改造，增添了新的动力和活力。

1983年

## 有比较才有鉴别

吴慎裕\*

苏联有部小说，叫《苦难的历程》，描写俄国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的巨大冲击波下，如何从迷惘、彷徨终于走向革命的过程。35年来，我们这些原工商业者也有个历程。生产资料私有制被消灭，对资产阶级来说，当然是“苦难”的；但作为这个阶级的人，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帮助之下，却从剥削者改造成劳动者，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同登了社会主义“彼岸”，这个历程又是十分光辉的了。

解放前，我在上海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纸老虎”。国民党政府搞限价，说我的纸号“囤积居奇”，逮捕了我。我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在一起被关了70天。出狱后，我和小杜接触较多，他多次劝我去台湾，我叔父也早做了走的准备，当时共产党及时向我做了工作。我吃过国民党的苦头，共产党却欢迎我留在上海，我感到应该看一看再说，于是未去香港，也未飞台湾。

上海一解放，看到共产党关心国计民生，我响应了党的恢复生产的号召，把当时已经停产10年的江明纸厂修复了（当时国家急需白报纸）。1950年华东地区召开纸张会议，我受到表扬。

当时有两件事我至今未忘。有位工商业者从香港回来筹建合众纸厂，遇上一件案子的牵连。我向当时上海市工商联秘书长胡子婴反映了真实情况，次日他就平安无事了。碰巧那时又因限电，

---

\* 吴慎裕，曾任上海志成新纸号经理、镇江大东纸厂厂长。现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民建镇江市委员会主任委员、镇江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合众纸厂无法开工，我又通过市工商联向工商局反映，第二天厂里就通了电。这两个难题，我没请人抽一支烟就顺利解决了，要是在旧社会，我想起码要花不少条黄金。这提高了我对共产党、人民政府的认识，激发了好感。

“三反”、“五反”期间，陈毅市长派周而复同志在陕西北路市民建会内，召集了10多个行业的20多位代表（我是造纸业代表之一），讲明了方针、政策，使大家的心情安定下来，对运动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和态度。经过“五反”运动的教育，我说服了叔父去港调回资金90万元，筹办新厂——大东纸厂。新厂建在哪里呢？政府要我建在可以就地取材、便于销售的镇江。但镇江我却人地生疏，亲友、同行都劝我把厂建在上海。有个熟悉镇江的情况的同业还告诉我过去那里两家造纸厂亏本夭折的教训，劝我不要重蹈覆辙。但华东工业部领导同志说服了我，我毅然决然到镇江筹建了大东纸厂，一年后就投产了。

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我被任命为大东纸厂厂长。我向上级建议，调用上海、苏州、丹徒30多家公私合营纸厂闲弃的打浆、造纸、切纸等设备，无须国家投资，即可使大东的生产扩大6倍，得到省、市领导同意。我带人到苏州、上海，拜会过去的老同行们。他们都和我一样成了公家人，听了来调废旧、闲置设备为社会主义立功，都热情地摊开帐本，打开仓库，并帮同出主意，随选随运。当然这件事是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的，不到两个星期，在14家纸厂中配齐了可年产6千吨纸的旧设备。记得我到的第一家是苏州1919年创建的盛华纸厂，朱葆良同志让我从仓库里把两只1939年他从日本进口，却睡了20年觉的烘缸调走。在旧社会，同行是冤家，调走自己的设备去增强对手的竞争能力，是根本不可想象的。然而，一旦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旧时代不可能的事也办成了。我认为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反映。

省、市领导听了我的汇报，立即应我要求，调4名工程师帮

助设计，当年投产1台，第二年又上2台，这样就使1958年大东纸厂的生产出现了真正的跃进。例如1956年产量是1400多吨，到1959年达到8400多吨了，利润在同期从19万元提高到220多万元。那一阶段尽管我的个人生活远不如我在上海时优裕，工作辛苦得多，但却是我从事造纸工业最有成就，也最为开心的时期。我由衷地感到共产党指引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我决心走下去。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落实了对原工商业者的各项政策，庄严地宣布，资本家阶级中绝大多数人已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党和人民给了我极大的荣誉，重新任命我为大东纸厂副厂长，1983年春，我又被选为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大东建厂30周年时，同志们问我有何感想？我说，“我经历了新旧两社会，饱尝过亡国奴的痛苦，也深受过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新旧社会孰优孰劣，我是深有体会的。现在大东纸厂真是青春焕发，今年要生产13000吨纸，产值达2300万元，利润达350万元。我觉得自豪的是，每一吨纸里有我的一份汗水，每元利润中有我的一份价值，我为振兴中华尽了一份力量。”

1983年

## 经历三次考验，走上新的征途

谈家骏\*

### 解放的考验

我今年80岁了。解放前，在无锡从事机器翻砂制造工作。当时在三座大山压迫下，我们这个行业总的说大多气息奄奄，朝不保夕。我经营的合众铁工厂因制造的“合众式冷进车”（柴油内燃动力机）已驰名大江南北，境况较好。解放前夕，我是无锡机翻业公会理事长，当时对共产党将何以对我，心中无底，十分不安。有个同行劝我关掉工厂，远走高飞。这时我接到地下党的一封信，叫我不必惊慌，不要出走，把工厂保护好。面对事关企业和个人前途的抉择，我想共产党所以能够节节胜利，一定是深得民心。老话说，“国以民立”。老百姓是立国的根本，理当爱护，象我这样一个有一技之长，有一定业务经验的人，大概不至于对我太难堪吧。于是我和二弟谈家骧等开了个家庭会议。我们想起在日寇侵华时，出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我们的工厂（部分）随军内迁，历经千辛万苦，机器设备沿途散失殆尽，但到了所谓“大后方”却呼号无门，国民党根本不管我们死活。想起在“八年离乱”中全家转辗万里，老娘因经不起风霜病死在广西金城江；仅有的一个幼女在湖南衡阳被恶性疟疾夺去了生命；妻子在1942年因敌机的狂轰滥炸吓得至今病瘫在床上。一幕幕悲

---

\* 谈家骏，曾任无锡合众铁工厂厂长、无锡机翻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主任委员。现任无锡动力机厂副厂长、无锡市第二工业局副局长。

惨情景如在眼前。前车之覆，创深痛巨，一致决定维护工厂，留在无锡等候解放。

1949年4月，无锡解放了。我事先接到了参加人民解放军入城市式的观礼券，目睹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军纪严明，入晚露宿街头，解放军干部一身上布军服，待人和霭可亲。这同国民党军队的亦兵亦匪，国民党官员的骄奢淫逸，是多么鲜明的对照！从此，我对共产党的疑惧心理开始消除了。根据领导的指示，我当天回去就关照本厂职工和全体同业照常开工，继续生产。在共产党的指引下，我终于经了解放的考验。

### 合营的考验

无锡市旧机翻业有三个特点：底子薄，设备差，夫妻老婆工厂多。虽号称260多家同业，实际上多数是搞些修修配配的穷烂摊子。解放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根据“四面八方”政策，辅导同业私私联营，采取加工订货等多种措施，各厂得以迅速发展。在这期间，我也积极响应共产党和政府的号召，在推动同业搞好生产经营、投入三大运动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受到有关部门的嘉勉。

“五反”运动，对我们工商业者来说，是又一场新的考验。那时，我既是“私私联营”的“合众”厂长、“机一联”主任，又是同业公会主任委员，既要身先同业，又要带动同业，工作十分艰巨，而责任很大，我一度产生了脱去“湿布衫”的思想。在这进退两难的重要时刻，共产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颁发了工业企业公私合营暂行条例。接着，又传来了毛主席“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谆谆教导，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认识到自己作为行业的负责人，应该配合政府，带动同业把企业推上公私合营，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在市委工作组的帮助下，我们开源节流，努力发展生产。又用大同行带小同行的办法，互助互济，克服困难，赢得了中小同业工厂的积极响应。

大家说：“旧社会大吃小，新社会大带小；旧社会人吃人，新社会人帮人，真是两个社会两重天！”根据自愿的原则，在“机—联”的倡导下，我们机翻业同业终于在1956年1月迎来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从此，整个机翻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面目为之一新。穷厂烂摊子成为重工业大工厂，资本家成为半公家人，产品向高精尖发展，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兴旺景象。全体私方人员都按照各人的专长，得到了适当的安排。我也被安排为无锡动力机厂副厂长，半年后又任命为无锡市第二工业局副局长。我经过进退曲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同业一道，使企业从私营到合营，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 **“文革”的考验**

在十年内乱中，由于我经过了共产党17年的教育、帮助，尽管思想问题不少，但毕竟有些根基，对于党和社会主义的基本信念没有动摇。我认为，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国共产党是久经考验的党。乌云蔽天是暂时的，终将过去。因此，我在劳动时，利用废旧材料，搞了一二十个有利于生产的机械部件和专用工具，得到干部、群众的赞许。他们悄悄地叫我“老谈”，可见群众是眼明心亮的。

### **在四化的征途上**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展了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这也是我早已心向往之、梦寐求之的愿望。我生于农村，自小务农，读书不多，但目睹在列强欺凌下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也有点小小的抱负。1920年，我怀着对父母有所报答，对社会有所建树的心愿，先去上海学“外国铜匠”，后在无锡一家机器厂当领班技师。继而，同二三友好创办了合众铁工厂，一度在同业中崭露头角，满以为从此有可能同舶来品争一日

之短长。可是，在反动统治下，几经沧桑，一腔所谓实业救国的热忱，终成泡影。今天，我能够在晚年和全国人民一道，参加四化服务的行列，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现在，我兼任市政协工业组组长和民建、工商联机械工业经济咨询服务组组长。我们的宗旨是，面向中小企业，着眼技术改造，讲究经济效益，为四化作出一些实实在在的贡献。一二年来，我们为接受咨询服务单位解决了一些技术难题，得到了他们的尊重和欢迎。

技术咨询，是要费些心力的。有些亲友关心我的健康，劝我说：“老寿翁80岁了，该享享清福了”。我的想法是，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中，我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大海正是一滴滴水汇集而成的，我应当为振兴中华尽我这一滴水的责任。

孙兴章整理

1983年

## 没有人民的政权， “实业救国”只是空谈

周志俊\*

我出生在封建家庭。祖父周馥（清末两广总督）、父亲周学熙（民初财政总长）均属显宦。清末，目睹国势陵夷，外侮日亟，盛传瓜分之说。我父亲年未40，即在北洋政府服官。在日本维新之际，他曾去东洋考察，时值日俄战后，以岛国战胜强俄。究其原因，以兴实业、办学校为富强之本，而尤以实业为教育之财源，故对实业救国之说，一生服膺不懈。他首先办北洋工艺局、实习工厂、高等工艺学堂，推广新政；同时创办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京师自来水公司。后来时移世变，北洋新政化为云烟，独民族工业的启新洋灰与滦州矿务两公司勉能维持。民国后，创办华新纱厂以振兴华北棉业，并计划开办长芦棉垦未能实现。其平生虽有所建树，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重重压迫下，难酬实业救国之初衷，更不能挽回国家之颓运。惟其百折不挠的精神，在我思想上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我20岁时，未完成学业即到青岛，在父亲指导下，我创办青岛华新纱厂。先后共历20年，在9家日本纱厂包围之中孤军奋战，稍有成就，殊非易事。不幸中日战事发生，青岛沦陷，覆巢之下无完卵，华新亦终难保全。这说明没有人民的政权，就没有强大的国防，所谓实业救国

\* 周志俊，曾任青岛华新纺织染厂董事长、上海信和纱厂董事长、信孚印染厂董事长、信义机器厂董事长、西安电机厂董事长、新业制酸厂董事长兼总经理、新成电机厂董事长。现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顾问、山东省工商联名誉主任委员。

只是空谈。这是我第一次所受的打击。

我在战事起后，避居上海，曾携带华新纱厂一部分机器到沪，拟溯江西上到重庆办厂。但国民党节节败退，南京上海相继沦陷，江运中断。只得留在上海托庇租界，在日寇势力包围的“孤岛”中创办信和纱厂、信孚印染厂、信义机器厂。1940年我去香港筹办了安华贸易公司，购进大批卡车，开辟滇缅路运输，拟将上海纱布运销内地，支援抗战。翌年，我回上海遭匪人暗算，枪伤膀胱，几至丧命。国破家亡之后，生命难保。不久太平洋战事发生，日寇进入租界，信和纱厂既被敌人军管，滇缅路卡车货物也全遭掳掠，损失惨重，所谓实业救国至此已途穷路末。这是我第二次所受的打击。

但我仍想另筹资本为战后复兴之计。当时伪币贬值，证券为群众所欢迎，我遂发行股票吸收游资以扩大个人事业，创办了久安实业公司、久安地产公司、大沪百货公司等。但以经营不善，投资分散，徒有久安集团企业的虚声，没有积累雄厚的资本，未能达到初愿。后来日寇在太平洋战区节节败退，我认为胜利在望，可以大显身手，复因平日认为资金须与技术结合才能发展，乃成立久安设计部，罗致留沪的专家学者，如黄伯樵、徐凤石、陈聘丞、陈驹生、孙云霄等人，由郭学群、孙师匡负责联系。首先着手于机电工业、化学工业的设计。胜利以后，根据久安设计部的蓝图，我创办了新安电机厂、新业制酸厂，惜资力所限规模不大，而且在国民党反动政权下处处碰壁。所谓实业救国，实际是反动政权下的牺牲品，我所办的信和纱厂、华新纱厂均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这是我第三次所受的打击。

解放后经过共产党的教育才知道，在三座大山压迫下所谓实业救国不过是一场梦幻。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对我垂危的事业支持备至，上海信和纱厂、青岛华新纱厂均由国家投资恢复生产，转危为安，成了老合营厂。到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时期，全国工商业者敲锣打鼓欢迎合营。我从老合营厂尝到甜头，因将



我所有其他企业一齐参加合营，当时心情舒畅，睡梦也香甜了。古人云：自古无不败之家。我在上海青岛看到的私人企业很少能传到三世的。现在能归国家主持，由全民作后盾，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作为创办人是何等的安慰！我这几十年的经历，雄辩地说明所谓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都是空谈。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人民政府，才能使经济和教育有长足的进展。

我今年86岁，回顾过去辛苦备尝，终日在惊涛骇浪之中，甚至险些以身殉厂，现在才登上光明幸福之乐土。想一般有心之士，从旧社会来者当有同感。

1983年

## 要以实际行动热爱祖国

荣广宏\*

30年来，我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我对爱国和爱社会主义两者关系的认识，是逐步提高、逐步加深的。对我来说，从过去的“实业救国”，到现在的“振兴中华”，是寻求爱国之路的过程，也是我的世界观转变的过程。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志的中华儿女谁不爱祖国的锦绣山河。我在青年时代也有过“实业救国”的理想，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这一理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就以我经营过的棉纺织业来说，既受到帝国主义的掠夺破坏，又受到官僚资本的压迫勒索（如发行金圆券时勒令上交黄金美钞，厂内的纱布物资随时有被没收的危险等），真是风雨飘摇，朝不保夕，自身难保，哪有什么可能侈谈救国。

解放初期，我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有怀疑，后来看到解放军进城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纪律严明，看到人民政府使混乱的市场迅速稳定、生产正常，才逐渐安下心来。通过学习，我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之所以敢欺侮我们，其根本原因，一是旧中国社会制度的腐朽，二是我国经济的落后。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根据我国的国情，制定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从而稳步地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工商联组织的教育和帮助下，我逐步认识到，爱国就必须爱社会主义。我把企业在解放前向瑞士订购的新纺机运进国内，并于

\* 荣广宏，曾任无锡振新纺织厂总务科长兼统计科长。现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民建安徽省委会副主任委员、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提前实行了公私合营。

当时，根据全国一盘棋的布局，为了发展内地工业，人民政府与我厂协商把进口的新纺机支援安徽，并希望我到安徽工作。这确是对我能否以实际行动表现爱国精神的考验。经过反复考虑，我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服从了国家的需要，将全家搬到合肥，至今已27年，安徽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亲眼目睹安徽的巨大变化，昔日凤阳花鼓中描绘的悲惨景象已经绝迹。特别是近几年来，党的农业政策使安徽农民喜气洋洋，迎来一个又一个丰收。安徽工业发展也初具规模，以棉纺工业为例，解放初期只有2万枚破旧的纱锭，现已发展到70多万枚。这样几十倍的增长，在旧社会是梦想不到的。事实教育了我，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多年来，共产党的教育和无数事实使我认识到，我个人的命运与前途，是和社会主义祖国的命运与前途结合在一起的。由于这个信念，使我比较顺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经受了十年内乱的严峻考验，终于使我从一个资本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我们工商联的同志大都熟悉中国的市场情况，有较丰富的做经济工作的经验，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我虽年事已高，但一定矢志爱国，忠贞不渝，为振兴中华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83年

## 我转变的开始

胡庆照\*

我家在安庆，以产制蚕豆酱的胡玉美酱园起家，也算是名门望族。我的祖父是清朝的“县太爷”，父亲是老同盟会员，后来是国民党政府的法官和刑法教授。我在幼年就受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教育和影响。我同祖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较多，他督责尤严，所以我思想上封建的东西要比资本主义的东西更多些。中学时代，我受过共产党的影响，读了一些进步书刊。但从21岁起，就以胡氏家族的长子长孙的资格，成为企业的实际负责人。这一时期，我一方面想当大老板，一方面又同情革命。抗日战争时期，企业毁了，家也散了，我靠着自学的会计学、经济学方面的知识，跑到国民党鬼混了10年。由上尉军需至后勤中、上校；“官”至行政专员级的“粮道”。这10年，为了自己的生存，我滑得象条泥鳅，人家送我的诨号是“油浸枇杷核”。但尽管很“油”，1947年我仍被认为是国民党的“异党分子”，“官”丢了，被软禁，经济上又受了骗，破了产，受到双重打击。翌年，在码头工和船工的帮助下，我逃出了魔掌，来到南京。开始，我还幻想“东山再起”，但终被发现，再度“潜逃”，幸而有共产党同志的维护，接到上海解放。

1949年6月，我回到安庆，开始时以各界人民代表的身份，参加反霸斗争和民主建政，受到了一些锻炼。同年9月，共产党让我带着一个小组接收了怀宁县商会，开展税收民主评议和筹

---

\* 胡庆照，曾经营安庆胡玉美酱园。现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奇成立市工商联。当时我是以立功赎罪的心情去完成工作的。市工商联成立后，共产党叫我担任了秘书长。为此，我由衷地感谢共产党对我的不咎既往和信任。特别是我过去为国民党出过力，到头来落个“异党分子”的罪名，解放后却在共产党领导下，有了自己的立身安命之所，更是激动。由于在市工商联工作，我与工商、税务两局的同志接触较多。这两个局负责同志和当时的统战部长以极大的热忱，帮助我，教导我，真是肝胆相照，处处关心。由于他们的热忱，我决心把在旧社会的处世之道，统统收起。后来，中共安庆市又叫我参加各次运动的领导工作，经过学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我分清了是非界线，开始认识到要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我在怀仁堂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的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教导。1954年1月，政府接受了我申请，把生产资料交还了人民，接着我同叔叔又把藏书、碑帖、字画、花园、祠堂等等献给了国家。从此我开始了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转化。

1983年

# 一轮皓月当空

沈翰卿\*

30年来，我们民族资本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绝大多数人由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谱写了新的篇章。随着社会阶级关系发生根本变化，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现在我们正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这是我们的光荣，就象一轮皓月当空，引起举世瞩目。

我的前半生是在旧中国渡过的。从经营一个小店开始，我利用与外省业务联系的优势，惨淡经营，业务逐渐扩大，资本积累逐渐增多，市场声誉日高。到日寇侵华前，我拥有沈开泰、沈三阳两个商店。然而，希望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不过是一场春梦。正当我的事业欣欣向荣时，日寇的铁蹄闯进了中国的大门。为了避免财产毁于一旦，我采取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将企业分散四处：上海、赣州、吉安和金华。结果，日寇窜到哪里，那里的财产就被洗劫一空。最后就剩下我自己所在的上海一处，元气大伤，而上海也是在敌人的租界里，朝不保夕。日寇投降后，我返回南昌，着手复兴家业。经过几年的经营，到解放前夕，我的家业发展为四个企业，即沈三阳、沈开泰、荣真酒厂和新生酱园。我本想“大展宏图”，但是官僚资本的企业公开扬言，不搞垮我的企业决不罢休。民族资本是无法与官

---

\* 沈翰卿，曾经营南昌“沈开泰”、“沈三阳”商店和荣真酒厂、新生酱园。现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民建江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省政协副主席。

僚资本相抗衡的，我的企业处于岌岌可危的境遇。

1949年5月，霹雳一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解放了南昌，推翻了旧政权，打倒了官僚资本。我个人和企业也得到了解放，获得新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帮助下，我在后半生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幸福康庄大道，然而前进的道路仍是曲折的。

“三反”、“五反”运动中，我的企业同其他民族资本家的企业一样，暴露出了私营企业的腐朽性，经营管理落后，劳资关系紧张。国民经济的计划性和私营企业的盲目性不相适应的矛盾，十分突出。我的四家企业有工有商，更难处理这个问题。虽然我有多年经营企业的经验，但在新的问题面前，却束手无策。“出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在这时，共产党和政府鼓励我们走公私合营的道路，并组织我们到东北参观学习。在工商联的指导和帮助下，我懂得了企业公私合营的优越性，认识到公私合营才是私营企业的一条好出路。实行公私合营，不仅可以克服私营企业自身的种种弊病，更重要的是符合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是利国利民利己的大好事。因此，在1951年我向政府申请将我的四个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得到了市人民政府的批准。合营后，企业的发展出乎我意料的好。对于一个工商业者来说，企业是自己奋斗的基础，如何经营好企业，是每个工商业者煞费苦心的事。在不同的社会制度里，他们都有自己的打算，但每个企业都会有一个归宿问题。在旧社会里，残酷竞争、尔虞我诈、大鱼吃小鱼。“开铺不过三代”，这是一种必然的归宿。而在新社会，大家都在共产党和政府的教育和帮助下，把自己的企业纳入国民经济的计划轨道，使个人成为公家人，前途是光明远大的。我庆幸我的企业找准了方向，有了一个既光明而又理想的前途。

公私合营后，共产党和政府安排我担任了南昌市企业公司的经理。1957年，我又被任命为江西省食品公司经理。1958年，我当选为省人民代表，任南昌市副市长。“文革”后，共产党给了我更高的荣誉，我被推为全国政协委员，被选为政协江西省委员会

副主席。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我是一个普通商人，无论是从政治资历还是从文化水平来说，都够不上享受这么高的荣誉和肩负这么重大的责任。这全是共产党和政府对我的关怀。共产党和政府不仅委我以重任，而且还帮助我干好工作。在我所工作过的单位的许多党员领导干部，对我都是开诚相见，推心置腹的。他们既是我学习的楷模，又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们在政治上关心我的进步，在工作上对我热情帮助，在生活上处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每念及此，都使我感到肃然起敬。

现在，我已年逾 8 旬。由于共产党的信任，我继续担任着五届省政协副主席，并选为省民建会主任委员。我常这样想，我翰卿何德何能，享受这么高的荣誉和生活待遇，还不是全凭共产党和政府的教育和关怀？自己又为共产党为人民做了一些什么呢？思之常感内疚。惟在有生之年，倾我余热，为人民工作，以报答共产党的大恩大德。

1983年



## 共产党的政策暖人心

卢广绩\*

解放前我是东北沈阳商会理事长。1948年11月沈阳解放，我被留用在工商联工作。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做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后来，在解放大军南下及建国之后的抗美援朝运动中，我们沈阳市私营工商业在购买公债、交纳税收、捐献、救济等各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得到了党和政府的赞许。1936年西安事变时我与共产党有过一些接触，但不了解党的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解放以后，经过学习，我懂得国家对民族工商业，采取团结、教育、改造与赎买的政策，坚定了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1953年，全国工商联成立。1956年初，全国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不仅基本解决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且使我们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经营管理的技术才能。我们工商界有不少人被安排为省、市、县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有些在国家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我也被安排为沈阳市副市长。我深深感到，我国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辉煌胜利，确实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没有枪声，没有流血，没有引起社会动荡，生产上不但没有受到破坏，反而有了增长，全国工商业者兴高采烈、敲锣打鼓地来接受这场历史变革。这真是中

---

\* 卢广绩，曾任沈阳商会理事长。现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顾问、民建辽宁省委员会主任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

國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的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1983年

## 为兴办集体企业安 置青年就业贡献力量

成盛三\*

1980年，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要求各地两会组织和成员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协助政府做好安置青年就业工作。当时，我正在北京开会，听到这个精神后，我想两会成员有较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和专业技术专长，如果把他们组织起来，创办集体企业，是可以扩大就业门路的。我回省后，及时与省两会其他领导同志进行了研究，并把我的想法向省委主管统战工作的书记和省委统战部领导作了汇报，得到了鼓励和支持。

1980年11月，我们创办了“吉林省长春市工商联联营企业公司”。公司创办之初，遇到了不少困难，首先是资金问题，我和大家商量，采取借资的办法。我把自己公私合营后没有领取的6万元定息拿出来。省及长春市两会的部分领导同志也拿出16500元，这样共借资76500元。其次是场地问题，我动员省两会机关腾出一间办公室，既作公司办公室，又作营业室。第三，物色经营管理人员，我亲自请了四名成员负责公司经营管理工作。我被推选为公司的董事长。在聘请公司经理、副经理的时候，有的同志有顾虑，怕办不好，怕背包袱，怕政策变等等。我同大家谈心，鼓励大家增强信心。我感到大家考虑较多的是经济问题，怕办不好，既赔钱又影响工商联声誉。针对这种情况，我表示，如果赔

---

\* 成盛三，曾任吉林省洮南县盛业商行经理。现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民建吉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吉林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了钱，就从我借的6万元中支付，大家借资的利息照付。同时，向大家分析工商界成员的特点和优势，只要大家全心全意地为协助政府安置待业青年服务，是一定能办好的。这使大家解除了顾虑，公司办起来了。

公司开办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许多待业青年的家长给我写信，要求帮助安排子女就业，我面对这一封封充满信任、深情朴实的信，心里很不安，更感到协助党和政府广开门路，安置待业青年义不容辞。我和公司领导反复研究，提出采取自办和联办相结合的方法，本着先小后大、先易后难、边办边发展的办法进行，争取多安排一些青年。为此，我同有关同志看了近百个场地。后来，一些经营不善的集体企业主动找上门来提出搞联合，他们出场地，我们派管理人员，联合经营，相继办起了日杂商店、百货商店、食品厂、五金建材商店等。为了进一步扩大规模，在省人大的支持下，我们拆了省人大围墙，又修建了副食商店和印刷厂。到目前为止，公司已有2厂、7店和1个批发部，共安置青年280人，实现利税482万元。有些同志说我为安置青年就业操碎了心，费尽了力，这是大家给我的鼓励。我感到，我们能协助国家安排一个青年就业，就给国家减轻一分负担、给社会多增加一点安定团结的因素，也尽到了我们作为国家主人翁的一份责任。

我社会活动虽然很多，工作很忙，但总要抽出时间，到公司看一看，了解企业情况。我每天早上都习惯听中央电台的新闻节目，对于有关企业经营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都及时向公司领导宣传，强调办企业要严格遵守国家政策法令，不能单纯追求利润，“向钱看”。1983年春节前夕，长春市土副产品价格上涨，市政府为了稳定市场物价，对5种商品规定了统一牌价，其中花生米每斤定价1元。当时有些单位感到无利可得，不肯出售，公司个别别人也有惜售思想。我马上告诉公司：坚决按市政府的规定办事，把购进的12万斤花生米投入市场，敞开销售。这不但起到了平

抑物价的作用，而且还满足了节日市场的需要，有关部门对公司给予了表扬。

我总是把公司的事情当一项事业挂在心上。有一天夜里，我被暴雨惊醒，想到公司新进的一批染料放在仓库外面，如果漏进雨水，染料就会失效。我唤醒老伴，同我一起，打着伞冒雨赶到公司仓库，唤醒守夜的同志用苫布把染料盖好，我才放心的离开。我这些行动触动了公司经理和有关人员，增强了他们的责任心。同志们关心我的健康，劝我要保重身体。但我总是想，真正的珍惜晚年，就是不浪费比黄金还为宝贵的时间，多为人民做点好事。

青年安置了，不等于完成任务了，更重要的是关心青年的成长，搞好传帮带，培养人才。我经常建议公司注意加强对青年职工的教育，要做到就业前短训，就业后轮训，对青年职工进行职业道德、劳动纪律、商品知识、财务管理、文化补习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训。几年来，公司共举办了各种业务培训班和文化补习班13期，有210多名青年参加了学习，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现在，公司已培养出经理、门市部主任等管理干部22人，会计、出纳、采购员等业务人员84人，为企业培养了一支青年业务骨干队伍。

公司的创办，给了我很大启发。我想，现在有80%以上两会成员都已经退休了，如果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可以创办出更多的集体企业，安置更多的青年就业。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积极推动省内各地工商联创办或合办集体企业。为了帮助各地工商联解决办企业资金问题，我亲自与省劳动局联系，先后借了安置青年就业费80万元，转借给各地工商联组织，办集体企业。现在全省共有35个市县（占市县的75%）创办了94个集体企业，安置青年1168人，有247名两会成员参加经营管理工作。几年来共实现税利941万元，加上省市联营公司的部分，总计为973万元。

这几年，我省及市、县工商联所办的企业取得了较好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沟通了城乡经济，活跃了市场，补充了国营经济的不足，满足了人民生活的要求，方便了群众。对各地两会组织的咨询服务和工商专业培训工作，也提供了实践经验，起到了积极作用。我在省两会的同志和成员的帮助下，仅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情，但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我的工作做的还远远不够，今后我决心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教导，“要象春蚕一样把最后一根丝都吐出来，献给人民”，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为振兴中华做出新的贡献。

1985年

# 我做对了

郭守昌\*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是1946年4月解放的。初次见到八路军，我心中很害怕，不知这军队是怎么回事？是否让做买卖？但接触后，给人印象很好，买卖公平，办事讲理，见老人称“老大爷”，“老大娘”，见成年人叫同志或老乡，当“官”的也没有官架子，说话办事，平易近人，不抖威风，和老百姓一样。我在伪满时是被特务、军警欺负惯了的，忽然见到这样规矩的军队，开始还有点不理解。但日子长了，逐步明白了八路军是人民子弟兵，是老百姓自己的兵，是给老百姓服务的兵，我的心放下了。

起初，人民政府积极贯彻党的政策，扶植工商业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加紧修复铁路，恢复电源，使工商业者安心经营，支援前线，积极纳税。社会秩序也很安定。

在日伪统治的14年中，东北与内地消息断绝，我对中国革命形势一无了解，每天听到的都是日伪统治的欺骗宣传。加上我有盲目的所谓国民党正统观念，所以要接受革命道理，改造旧思想，树立新思想，实非易事。共产党耐心帮助我，讲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三位一体，侵略、压迫中国人民的。这同我的遭遇对上号了。伪满统治期间，我曾因“经济犯”被打伤。警察、特务的欺压，更是家常便饭。当时，我只恨国民党腐朽无能。后来日本投降了，我又看到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打内战，节节败退，在齐齐哈尔能看到大批被俘的狼狈不堪的国

\* 郭守昌，曾任齐齐哈尔市德增盛粮油加工厂经理。现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民建黑龙江省委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工商联主任委员，省政协副主席。

国民党俘虏兵，我知道东北快要解放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我认识了许多新东西。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不同的社会制度，还有没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制度。“三反”、“五反”运动之后，我的认识和觉悟又有所提高，那就是“只有跟着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前途”。从此我对自己的那些财产、旧工厂、旧商店、旧作坊关心的程度逐渐淡薄了，而对社会主义光明前途憧憬起来。

我的企业是在1954年10月1日公私合营的。每次我回想到这件事，总觉得这是自己一生中做对的一件最大的事。1956年初，全国各地庆祝公私合营，敲锣打鼓向党报喜的情景是我终生难忘的。因为，从此我们工商业者在党的领导教育下，从“私”字脱离出来，走向社会主义的“公”字行列。这对我们来说是历史性的、划时代的一大步。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大大激发了工人、店员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各厂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1959年，我调到哈尔滨工作。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尽管我们工商业者遭到迫害，但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并无二心。我们被塞到哪里就在哪里认真劳动，工作负责，精神不懈。很多人在企业各个岗位上还起了骨干作用，作出了成绩，受到了正直的职工群众的好评。我想这与党对我们的长期教育是分不开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我们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党的爱国统一战线重放光华。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庄严宣布，我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我们工商业者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多少年来我们梦寐以求的大事。大家欢欣鼓舞，干劲倍增。

据1982年底的统计，黑龙江的原工商业者配合政府兴办集体企业291个，共安置待业青年11315人。在这以前三年，这些集体



企业给国家纳税605万元，给青年开工资1620万元，企业积累1730万元。他们还总结了一套“以守法为前提，以信誉为根本，以改善经营管理为手段，以带好青年并获得经济效益为目的，以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为伟大目标”的办企业的经验，得到了省委书记的高度赞扬。这些都是我们作为国家主人翁，与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在为四化服务中的具体表现。

1983年

## 从太原铁工业的历史联想到的

贾泽卿\*

太原在清末已有了私人资本创办的火柴厂、电灯公司和印刷厂等，到1910年才产生私营的机器铁工厂，最早设立的一家叫玉成永，设备仅有一台旧式6尺皮带车床和简单工具，过了10年才又发展了3家，再过10年（1930年）发展到11家，最“繁荣”时有20多家。这些工厂资金不多，规模小，设备简陋，一般只能铸造些日用品，如炉条、火炉、铸锅和修理马车配套用的一些机械零件，掌柜大部分是手工工人出身。由于这个特点，官僚资本只把那些较大的火柴厂、纸烟厂等吞并了，看不起这些铁工厂，因而它们得以幸存下来。

到了抗战时期，由于战争需要，太原沦陷后，日寇对铁工业却用所谓“组合”的名义，加以控制，威胁利诱使铁工业为其服务。

我自青年时代学习机械，当过轮船的副驾驶员。当时，受实业救国的影响，我认为兴办工业，提倡国货，就可以救国，所以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我抱着满腔热情，从天津回到太原，积极筹办义隆铁工厂。但事与愿违，阎锡山政府不但不支持，反而把40多户私营铁工厂，先是用“合作厂”的名义控制起来，后来由于企业小，过于分散，不易管理，便以阎锡山晋兴修造厂的牌子，把这些小厂集中在一起，为晋兴公司做军用品。采取的办法是半粮半款，所谓“粮”就是豆饼，给工人当饭吃；所谓“款”就是贬值到一文不值的纸币，从此太原的40多户私营铁工业半数

\* 贾泽卿，曾任太原义隆铁工厂经理。现任中国民主建国会山西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西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倒闭，残存的全部为晋兴公司吞并。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人们喜气洋洋，被晋兴修造厂吞并的私营铁工厂全部发还，军管会宣布了党的城市经济政策，消除工商界的顾虑，安定大家的情绪。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共产党和政府对于机器铁工业优先支持照顾。如架设输电线路，帮助解决恢复生产中的技术设备问题，组织加工订货，银行发放低息贷款以增购机械设备。政府还对铁工业的税收采取减、免、缓的办法，一般减20%，特别是对支援农业建设用的水车、农具等采取额外扶植，减40%等等。政府考虑到私营铁工厂设备简陋，技术低，对工时定额一般比照国营增加20%到30%以上，以资鼓励。由于政府采取以上种种措施，铁工业很快发展到47户，这还不包括一般金属修理的铁匠炉、锻、铆、焊等工种72户在内。

当时，随着生产发展，户数增多，出现了铁工业设备不完备，户数分散，难以接受大量任务的矛盾。这一新形势促进了全行业的大协作。在政府的支持下，铁工业组成了全行业的联营社，统一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加工订货，统一分配，以大带小，以先进技术帮后进。如制造样品时，由机械比较完备、成本较低的单位担负，帮助设备技术较差的困难较大的同业，这种互相合作的联营方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成本，从而提高了接受政府的大量加工任务的能力，满足支援农业的需要。这就使我们开始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从太原铁工业的上述变化中，我亲身体会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教育下，民族工商业者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30年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们终于走上了光明道路，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国家主人。回顾过去，我衷心感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决心以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精神，为四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1983年

## 从新乡看祖国

荣玉德\*

旧中国民营企业在三座大山的重重压迫下，大都岌岌可危，朝不保夕。抗战期间，上海的许多纱厂因原料供应紧张、产品缺乏销路，被迫停工，以出售设备维持日常开支。我想了个对策，与友人合作，买下一些纺织设备，到各地开设小型纱厂、布厂，就地收购农民生产的棉花，就地销售成品，用这种办法来求生存。可见旧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确实是在三座大山的夹缝中挣扎图存的。

抗战胜利以后，我以为从此可以安居乐业，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了。我把各地的小型纱厂、布厂的股份，卖给亲友，聚零为整，集中自己的资金，在上海独资创办诚德纺织厂。不料蒋介石不顾民生艰难，发动内战，使我的天真想法又成为泡影。

上海解放前夕，我面临着外逃还是留在国内的抉择。当时，很多人受了国民党宣传的影响，把企业的设备资金转移到台湾、香港、东南亚和欧美等地。有些亲友，也劝我外逃。淮海战役以后，形势更为紧张，蒋家王朝很快就将覆灭。我的企业由于是独资的，去留完全由我掌握。当时，我也受国民党宣传的影响，的确对共产党抱有种种疑虑。但我想到古人所说“得人心者得天下”。我想共产党所以能胜利，就因为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经过反复考虑，我终于留下来了。

---

\* 荣玉德，原任上海益民铰链厂经理、南京新安纱厂经理。曾任中国民主建国会河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省工商联主任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副主席、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4年逝世。

上海解放第二天，我亲自驾车到厂中视察，并安排复工，亲眼看到了解放军纪律严明，不拿人民一针一线。特别是工厂复工之后，我又亲眼看到了人民政府干部廉洁奉公，上海人心安定，经济繁荣，与蒋家王朝的军政人员鱼肉人民完全不同，使我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得民心的道理。

在这个基础上，我开始学习共产党的理论、政策、法令，逐渐提高了思想认识。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号召部分工厂内迁。我认为这个措施，无论从战略上，还是从改变中国工业集中在沿海的不合理布局上，都是英明的。我立刻响应号召，于1949年底同工会主席和一位老工人，一起到内地考察、选择厂址。河南省地处中原，盛产棉花，而纺织厂很少。当时一斤16支棉纱，可以在新乡换3斤1吋长度的棉花。当地有鱼有米，职工在新乡的生活可以优于上海。我们初步选定了厂址，并得到中共新乡市委、市政府的大力赞助，保证供地供电。我们三人回上海后分别向上海市政府、市纺织局和全体职工汇报考察情况，并提出了把上海诚德纺织厂与政府合营，改组为公私合营中原纺织厂内迁新乡的计划。这个计划，在政府的支持下，到1950年5月就实现了。随厂内迁的职工达70%以上。投产以后，产品质量达到国家标准，供不应求。当时新乡棉花价低，生产纱布利润很高。四马分肥，我收入很多，我把这些收入再投资于工厂进行扩建，受到了政府和职工的欢迎。当时我是这个厂的副厂长兼总工程师，负责生产技术，有职有权，心情非常舒畅。

不料，1957年我被错划为右派，副厂长职务被撤销了，总工程师职称虽没有撤销，但已无实权。“文化大革命”中，我再次受到冲击。但我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我觉得一个中国人应该为中国负些责任。在那些年中，我曾先后提出改变电交线路布局，调整电力负荷，降低无功电耗，以及节约用棉等技术措施。三年困难时期，棉花奇缺，我建议用棉杆皮纺纱织布，并相应地增加简单

的设备为棉杆皮织的色布染色，使市场在经济困难中增加货源，又维持了留厂人员的开支。

1973年底领导叫我重新参与技术工作，管理原棉。我到职后，改进了原棉管理方法，提出了新的配棉方案和相应的工艺设计。通过试纺试织，确实能保证质量，每年可节约原棉成本50余万元。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项政策逐步落实，我的问题得到改正，恢复了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的职务，并光荣地参加了工会。我对党更加信任、爱戴。我鞭策自己，要以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更加努力学习，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中原纺织厂开办以来，以生产中支纱布为主，一直没有变化。而河南生产的棉花质量日益提高，以高质棉花纺中支纱，很不划算。我向省纺织管理局申请增加精梳机，以改变产品结构，提高纱支和增加涤棉混纺织纱布，经过组织实施后，中原纺织厂的产值利润比前有大幅度增加。

1980年我被调到省纺织管理局负责进出口业务。当时全省纺织厂需用大批化纤，但供应不足，省里又没有这么多外汇，我向省政府建议，用河南省丰产多余的棉花及积压的麻袋与上海交换化纤。经省领导同意，我到上海和有关部门协商，终于满足了需求，使河南省纺织工业在当年就增加了1亿多元的产值和相应的税利。

我离开学校后，就从事纺织工业，1950年到新乡，至今已34年。我亲眼看到河南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业生产的巨大发展。例如新乡市原来仅是3万多人的小城镇，现在已发展成为有40多万人口的新兴工业城市。中原纺织厂现在已是拥有5万多纱锭、700多台布机的中型厂。我原籍江苏无锡，新乡是我的第二故乡。看到新乡的兴旺发达，也就能看到我们祖国的兴旺发达，我常常为此兴奋不已！

1983年

## 他衷心最感愉快的一件大事

——记爱国企业家李国伟\*

林涤非

李国伟，原名李忠枢，江苏无锡人。他是面粉大王、棉纱大王荣德生的大女婿，也是荣家企业发展中的创业人物之一。

1916年他毕业于唐山工学院，后在陇海铁路做过一个短时期的测量员、绘图员和副工程师的工作。1917年和荣德生长女荣慕蘊结婚，从此和荣家企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李国伟好学上进，工作勤奋，受到荣家的器重，于1918年委以协助荣德生的族兄荣月泉在汉口创办工厂的重任。当时，荣家企业经20年的经营，已有很大的发展。在纺织工业方面，有申新一、二、三厂；面粉工业方面，有福新一、二、三、四厂和茂新三个厂，分设在上海、无锡两地。汉口方面，经李国伟的筹划，于短期内建成了福新五厂，接着又筹建了申新四厂。到抗战前夕，福新五厂日产面粉12000包；申新四厂拥有布机1000台，纱锭50000枚和日产2000匹的全套漂染整理设备。在荣月泉年老退休后，就由李国伟接任了两厂经理职务。

抗日战争期间，李国伟主持汉口两厂的内迁，在宝鸡、重

---

\* 李国伟，原申新第四纺织公司经理、福新第五面粉公司经理、宏文机器造纸公司董事长、新泰企业公司常务理事、建成机制面粉公司董事长、渝新纺织公司董事长、大光化学公司董事长。曾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人大代表，武汉市人大代表。

庆、成都、天水建立福新、申新各分厂。1940年在宝鸡创设申新铁工厂，在成都创设建成面粉厂。1941年又在宝鸡创设宏文造纸厂，同时在宝鸡成立了统管汉口申新、汉口福新和建成、宏文四公司业务的总管理处，由他担任处长兼各公司经理或董事长。

抗战胜利后，李国伟将四公司总管理处迁回汉口，并迅速着手恢复汉口申新、福新两厂的生产。接着，他在上海购进一个敌伪产业面粉厂，改为建成面粉公司上海分厂；又为宏文造纸公司筹建了上海分厂，制造纸板。在重庆，他购进了国民党政府军纺厂的设备，改建为渝新纺织公司纺织厂。同时他将四公司总管理处改组为申新、福新、建成、宏文、渝新五个公司的总管理处，仍由他担任处长，统一指挥，在荣氏企业中独树一帜。

解放前夕，民族资本家的思想动荡不安，企业外迁、资金外流是较普遍的现象。李国伟也不例外。他于1947年在广州创设汉口福新公司广州面粉分厂，又在香港创设香港九龙纺织公司，并在九龙设立工厂。1948年，他将五公司总管理处迁至广州，1949年又迁至香港。但是，他毕竟是个爱国家、爱事业的民族企业家，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也深恶痛绝。他为创办宏文造纸公司上海纸板厂，曾派人赴美订购新式机器。待机器运到时，上海已临近解放，不少人劝他将机器原封不动地运到香港，另作打算。他却不以为然，责成主管建厂的长子李志方，要将全部机器安装好，并说：“即使是奉送也要完整地送。”解放后，该厂于1950年正式开工，每日生产包装纸板40吨，为解放初期的经济恢复作出了一定贡献。

解放后，中共中南区统战部特派孟起处长，偕同汉口申新、福新两厂的副经理华焜卿赴港，向李国伟传达了中国共产党有关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以及解放后汉口市面安定、工商各业受到保护的情况，动员他回汉口主持业务，发展生产。一方面，他感激共产党对他的关怀和保护，同时也认识到自己一生事业都在国内，对个人和荣家来说，都是回汉口有利。因此，他结束了在港的五公司



总管理处，带领全班人马，乘船经天津于1950年元旦回到了北京。董必武副主席亲切接见了她，她以今后努力多做些有益于人民的事业，使她从内心里感到温暖，一扫过去那种无穷忧虑和害怕共产党的心理。

1951年初，他再去香港办理九龙纺织厂的善后时，有人劝他留下来。他毫不犹豫，毅然重回，从此便没有再去香港。

1951年，宝鸡和天水五个厂，均由李国伟向陕西省人民政府工业厅提出申请，首先争取公私合营，改名为公私合营新秦企业公司，成为解放后民族工业第一批公私合营企业之一。

1954年李国伟将汉口申新、福新，上海宏文、建成，重庆申新、渝新，成都申新、建成以及广州福新9个厂都申请公私合营，得到批准。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时，重庆福新也加入了公私合营。至此，李国伟一生在国内所创办的15个企业全部实现了公私合营，完成了由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时，李国伟感到异常轻松，他愉快地说：“我一生所经营的工厂都还之于人民，实是衷心最感愉快的一件大事！”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给予李国伟很高的政治待遇。从1951年起，李国伟先后担任：武汉市人民代表，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第三、四、五届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湖北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武汉市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1956年，李国伟参加以彭真同志为首的人大代表团，访问了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及利亚5个国家，有关方面摄制了《五国之行》的纪录影片。他感到这是共产党给他的一生中最大的荣誉。

1965年，李国伟托请民建中央孙晓村秘书长将所购公债28万元献给政府。经请示中共中央统战部，根据国家政策，未予接

受。他便将这28万元公债加盖“支援建设，放弃兑现”八个大字的图章，以示他捐献给国家的决心。直到1978年10月1日他在北京病逝后，家属清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这笔巨额公债就这样不声不响地献给了国家。此外，他生前还嘱咐过他的夫人荣慕蕴，待到存款发还后全部捐给组织上作为教育基金。他逝世后，荣慕蕴1979年遵照他的遗嘱捐献给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两会30万元。李国伟生前曾经对人说：“生前家财捐献尽，留得清白在人间。”

1985年

# 一个回族企业家的历程

斯 奇

## (一)

回族爱国企业家陈经畬<sup>①</sup>祖籍南京，1880年2月出生于一个织缎手工业者家庭。读过几年私塾，17岁进米店当学徒，后进钱庄当店员。1901年，经表兄金润之介绍，到汉口义盛成广货店管帐，深得股东、同乡马迪臣赏识。1905年，“义盛成”收歇，马迪臣集股5000两银子，开设义顺成广货店，陈经畬由其他股东资助入股，担任经理。由于经营得法，业务日趋发展，十年间成了武汉一家颇具规模的百货商店。

1915年，全国人民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掀起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运动，大大激发了陈经畬的爱国热情。他有感于推销洋货，利权外溢，决定投资兴办肥皂工业。经股东同意，“义顺成”拨款24000两银子，创办“汉昌烛皂厂有限公司”，陈经畬任总经理。

开办初期，该厂为手工操作，设备简陋。主要生产“七星”、“婴孩”等牌子的肥皂。由于同业竞争激烈，质量不够稳定等原因，销路并不好。后来汉昌采取避实就虚方针，不局限于在武汉三镇及邻近地区与同业争地盘，而是深入到华中腹地建立了广泛

---

<sup>①</sup> 陈经畬，曾任汉口汉昌化工厂经理、汉口商会会长、汉口孤儿院院长、南京孤儿院董事长。后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武汉市副市长、湖北省副省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

的销售网，又不断提高质量，销路逐渐扩展。五年以后的1920年，年产已达7万箱，年盈利三四万两银子。

欧战结束后，洋皂又充斥市场。汉昌只得不断改进技术、降低成本，还仿制外商产品与之竞争。汉昌会同其他民族肥皂厂经过艰苦奋斗，抵制了外商肥皂的倾销。

陈经畬还积极开展出口业务，1935年开设“义顺泰”油行，经营桐油出口。汉昌厂也有一部分产品出口。

汉昌厂经20年发展，到1935年资本已增至30万元，并向上海订购了新式制皂机，准备由手工操作改为机器生产。他还向德商订购甘油机，准备生产国防工业的重要原料——高纯度甘油。1938年制皂机安装完成后，日寇已进逼武汉。因运力紧张，陈经畬只能将汉昌厂的部分手工制皂设备和部分员工内迁到重庆建厂。1940年该厂被日机炸毁，被迫停产。陈经畬与主持上海业务的杨叔平商定，在沪标买了无敌肥皂厂的设备，准备在租界内建厂。未及实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占租界，大批原料被日伪征购，损失约20余万元。1944年，原来拆存于英租界的新式制皂机也毁于战火。

抗战胜利，陈经畬回到武汉，以花甲之年，奔波操劳，筹备复业。经多方交涉，以500多万元代价收回被国民党政府接管的汉昌厂机器和厂房，恢复开工。不久又从上海把以前买的机器设备运回，进行半机械化生产。他还雄心勃勃，计划进一步扩大生产各种化学工业用品。但逢全面内战爆发，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工厂的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均受到严重影响，只能靠向银行、钱庄借贷维持。陈经畬的实业救国之志终难实现。

陈经畬深受伊斯兰教义影响，把周济贫苦、恤养孤儿视为己任。自兴办实业有所收益之日起，数十年间，以个人资历并动员社会各界，兴办了多项慈善和教育事业。特别是与好友杨叔平共同出资创办南京、汉口两地孤儿院，先后收养孤儿近2000人。这些孤儿毕业后大多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材。

## (二)

抗战初期，陈经畬曾走访许多旅汉的江苏名流，呼吁对救济江苏难民予以支持。此时，他结识了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在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对共产党的坚决抗战深为钦佩。

他的长子陈元直在大学读书时就与中共有接触，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元直将共产党组织交与的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和解放区的广播抄件送给他看。他都仔细阅读，还查对地图观看战局发展。在儿子的影响下，他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对中共有了进一步认识。

抗战胜利，返回武汉后，陈经畬即恢复了战前他创办的汉口孤儿院，不少中共地下党员曾借该院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任院中教师的地下党员林允中被捕，他还出资协助营救。院生孙道章升入大学后，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校方停发助学金，陈经畬去信说：

“只要你懂得真正做人，行得正，做得对，即使取消公费，我也接济你完成学业。”

武汉解放前夕，一些工商界人士纷纷出走，陈经畬劝阻说：这是国共之间的战争，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无须去港。他和张难先、李书城等武汉地区著名民主人士一起组织武汉市治安委员会，为维持治安、迎接解放做了许多工作。原中共武汉地下市委书记、解放后曾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的曾惇，在回忆解放前的斗争时曾说：“李书城、陈经畬、朱裕璧等社会知名人士曾为掩护我们出过很大力，甚至担了不少风险。他们对党的事业是有贡献的，我们永远不会也不该忘记他们。”

解放后，汉昌厂生产逐步发展，盈利增加，1955年被批准公私合营，后改建为武汉化工原料厂。

对政府给予的定息，开始几年陈经畬以专户存入银行不用，后来他干脆不领，贡献国家。他说，过去总以为办企业的钱是自己克勤克俭挣来的，解放后才弄懂是剥削来的，这笔钱拿在手

里，有如坐针毡一般，早交出一天，早安心一天。

陈经畬以古稀之年，把主要精力投入主持省、市工商界的工作上。他紧紧依靠共产党的领导，认真学习、领会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推动全省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文化大革命”中，陈经畬得到中共党组织的保护，未受冲击。1967年5月29日，陈经畬因病逝世。1979年6月17日，湖北省和武汉市各界隆重举行追悼会，对他几十年来寻求中华强盛、人民富裕的道路，终于在晚年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由旧社会底层的学徒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代表的一生经历，给予了高度评价。

1986年

# 热爱祖国支持革命的 湖北金融家周苍柏\*

林涤非

周苍柏生于1890年，是湖北武昌人。他早年就读于武汉文华书院，后转入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在纽约大学攻读银行系，获商学士学位。回国后在沪汉等地从事商业工作。陈光甫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聘请他在行员训练班任教。因成绩显著，受到陈的赏识，聘他担任汉口分行副行长，1926年升任行长。

国民革命军北伐到达武汉，周苍柏出于爱国热忱，积极支持。当时，银行一度发生挤兑风潮。唯独上海银行在周苍柏的主持下，为维护银行信誉和储户利益，宣布对大革命前的存款一律按现洋兑付。因此，上海银行不仅没有受到挤兑的影响，反而存款剧增，业务更趋兴旺。随后，他又举办仓库、保险、信托、外贸等业务，并积极扶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使上海银行汉口分行成为当地重要银行之一。

周苍柏看到当时许多市民，没有正当的娱乐场所，便想凭着自己的资力，建设一个既为自己也为城市居民大众，寓农垦、游览、娱乐为一体的场所。于是，他以个人资力，在武昌东湖之滨购买了大片荒山、荒地，创设“海光农圃”。圃内栽培大量果树、花草，建有饲养场、粉坊、游泳池。出产草莓、枇杷、水蜜桃、西

\* 周苍柏，曾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行长、湖北省银行总经理。后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省政协副主席。

红柿等水果和除虫菊等药草。农圃聘请了一批农学专家和大学农科毕业生，还吸收了不少难民就业。解放后，周苍柏把“海光农圃”的全部财产、地产捐献给国家，扩充为现在东湖风景区的一部分。看到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起了真正人民群众的公园，他感到由衷的欣慰。

抗战军兴，周苍柏积极运送棉花等物资入川，后就任贸易委员会复兴公司协理，积极开展外贸工作，并在重庆创办了华中制胶厂。1942年，他在恩施就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湖北省银行总经理，随后又负责湖北省平价物资供产处工作。该处附设有桐油、棉花、猪鬃、茶叶等公司，运用省银行资金进行生产与收购，并实行生活用品计划供应，保证了公务人员的生活，也起到了支持抗战的作用。周苍柏还支持家人参加抗战。他的夫人董燕梁十分热心救护伤员的工作，抗战期间曾任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解放后任中南妇联部长、湖北省妇联副主任、国务院参事。他的次子周德佑在中学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旋即参加了党所赞助的应城汤池游击训练班学习。周苍柏从思想上到经济上都是积极支持的。后来，德佑因积极从事救亡工作，积劳成疾而早亡。

抗战胜利后，周苍柏返回武汉，就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署长，主持联合国善后救济物资的分配工作。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将应分配给解放区的救济物资如药品、面粉等如数运给中原军区李先念同志领导的部队。当美国人责问他为什么把物资给了共产党人时，他机智地回答：物资是联合国救济战后中国灾民的，哪里灾民最多、灾情最重，我就往哪里分配，并没有规定说共产党统治区的灾民就不能救济啊！说得对方哑口无言。

周苍柏热爱祖国，有正义感，早在大革命时期就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有所接触，由同情革命逐步走上支持革命的道路。抗日战争时期，他与共产党中原区的领导人董必武、李先念、陶铸、王震等建立了联系，特别是在周恩来同志的指引下，做了不少抗日



救亡工作。他曾多次以银行经理的社会地位和个人资历，不顾个人安危，营救和担保某些被捕的中共党员出狱，并以自己的企业和住宅掩护地下党开展秘密活动。他还在夫人的配合下，冒着风险将中原解放区党的活动经费（黄金）隐藏在家，以利地下党支付。

解放后，周苍柏出席了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返回武汉后，他任中南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南工业部副部长，后又任湖北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他积极工作，为恢复生产、筹建轻工企业做了大量工作。中南大区撤销后，他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省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常委、民建中央委员。1970年病逝于北京。

1985年

## 感受最深的一件事

冯锦卿\*

宜昌是1949年7月16日解放的，当时我经营泰兴土布店。市人民政府为了改变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物价一日数涨的情况，为稳定市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物价涨势虽有缓和，但由于当时大西南尚未解放，国营经济还未完全掌握市场，少数不法商人还在兴风作浪，物价涨风没有平息。到农历腊月下半月，物价又狂涨，大米上涨50%。我经营的土布、对子布，由每对7万多元（老币）涨到9万多元。人心很不安定，到腊月三十傍晚，市民拿着人民币还在抢购物资。

1950年农历正月初三，政府派人到土布业公会，召集主副委、部分委员座谈，讲：一方面给大家拜年，一方面商量什么日期开门营业。有的委员讲：“以往惯例，是正月十五开张营业，今年照例。”还有的委员说：“年底货卖空了，染坊工人过了正月十五才开工，今年要到二月初二，才能开门营业。”政府的工作同志认为：“今年是解放后第一个新年，如果农民过了初三，上街买东西，商店都关门闭户，影响不好，希望土布业、杂货业等能在正月初六开门营业。”委员们说了不少理由，不同意提前开门。政府的工作同志开门见山地说：“你们说了这么多理由，都不是心里的真话，你们是怕物价再涨，卖了货进不来。但我们的看法与你们恰恰相反。人民政府为了制止物价上涨，已采取了许多措施，也准备了大批物资投放市场，如各地市场正式开盘，物价一定会下

---

\* 冯锦卿，曾任宜昌泰兴布店经理。现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民建宜昌市委主任委员。

跌，你们如不信，我们打个赌。”最后商量结果，政府要求我们正月初九开门。

我回店将政府的话思考后，与股东们商量，我当时对共产党的政策是半信半疑的，我说：“共产党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所谓“不可不听”，是因为1946年我在马良坪营业时，与新四军打过交道，知道他们说话算数。如今宜昌解放也半年多了，看到政府办事，都是为人民着想，不讲空话。所以我说：“共产党的话不可不听”；但又怀疑政府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能把物价降下来，所以又认为“不能全听”。股东们商量结果还是决定照政府意见，初九开门营业，不过作了预防措施：开张后，不卖大批货，限定在10匹以内，卖的钱进不到货，就交公债款（因当时我店认购了一些胜利折实公债）。正月初九开门后，政府派员上街查看，见我店开了门，认为听了政府的话（当天余业只五六家开门），价钱按旧年底市场价开盘，卖的钱的确进不到货，只好送银行交公债款。于是我店提前3个月交齐了公债款，受到政府表扬，还登了报。果然正月十五以后，物价逐渐下降，公债折实价又调高，同业中不少户因而吃了大亏，我店是名利双收。这一事实教育了我，幸得听了政府的话，否则和同业一样要吃亏。

此后，共产党和政府认为我店还是听话的，就对我个人加以培养教育。公会许多工作，如评税、建帐、财产重估等，都指名要我出来做，又将我由公会委员补为市工商联执委、常委，使我在工作中受到锻炼，受到教育，思想认识有所提高。

这虽然只是解放初期的一件小事，但却深深地教育了我。当时，我的表现，反映了我的资产阶级立场和思想感情，而这件事使我在以后许多年明白自己为什么应该在实际行动中听共产党的话，照共产党的政策办事。我以后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所以能走得比较顺利，与这件小事有关。

1983年

## 回忆与对比

彭六安\*

1935年，我开始经营航运业，同侵入湖南内河的帝国主义航运势力有着尖锐的矛盾。那时，挂着外国旗帜的轮船横冲直撞，霸占了一些主要航线，凭借其雄厚的资本，用拼班削低运价的手段，同中国民营航运业竞争业务，把我们挤压得喘不过气来，被挤垮的同业每年都有。当时我们只有愤叹“请看中国之内河，竟是洋人之天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们民营航业出于爱国之心，同仇敌忾地承担了紧张的军运；也利用外轮撤走的机会，发展客货运输。尽管在战火纷飞中，船只设备损失惨重（据统计，抗战期间湖南轮船业共损失轮船106艘、驳船59艘、趸船31艘），我们仍然顶着风险，拼命挣扎。

1944年长沙沦陷，民营轮船公司的大部分船只被迫撤往湘江上游。衡阳沦陷时，为了不使船只资敌，我和船员们商量，将所有轮驳自动凿沉于归阳镇的江底。据统计，那次全省民营轮驳共凿沉104艘，占航商全部资产的92%。

以上情况说明，中国人民是不愿做奴隶的，是讲民族气节，坚决抗御外侮，志在振兴中华的。我所建造的第一艘轮船，取名“华胜”。抗战中凿沉，胜利后打捞起来复航，改名为“新华胜”。1946年春我和股友们新组织的一家较有规模的轮船公司，取名

---

\* 彭六安，曾任长湘轮船公司经理、复华轮船公司总经理。现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湖南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复华”。这些名称，主观上都是祝愿中华胜利，期望复兴中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这种主观愿望，不过是镜花水月，无法实现的幻想！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湖南民营航业满以为英、日帝国主义轮船走了以后，我们民营航业会有一个“黄金时代”。谁知国民党反动派借口复员运输，签订了“中美商约”，让美帝船只闯进内河，使中国人民彻底收回内河航运权的愿望又成泡影！国民党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以后，掳船拉差，几无宁日。法币、金元券的贬值，弄得百业萧条，民营航运业也受到损害。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面临彻底崩溃时，途穷路末，竟企图破坏所有民营船舶，其给予民营航运业的劫难，不亚于日本侵略者。

以上是指旧中国的民营航运业说的，至于我个人遭遇也同样悲惨。1937年和1941年，我曾两次被湖南建设厅和第九战区的船舶管理所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入狱，饱尝铁窗风味，虽然花钱费力，保释出来，但心灵创伤很重。抗战期中日本飞机炸毁我永大、湘雄等轮船后，还炸中我在长沙北门的住宅，不仅财产、家具全部炸光，连家属也差点儿遭难。1944年逃难到桂林时，迫于生活，连被子也卖掉了。

长沙解放前夕，我们在革命形势的鼓舞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同海员工人一起，尽力护航保产，迎接解放。我们复华公司以及我担任董事长的长湘、同业、长潭等公司将轮驳船只隐蔽在乔口烂泥湖一带，未受损失。因而长沙解放后，运输业能迅速投入支前任务，及时恢复长（沙）汉（口），以及内河客货运输，维持了水上交通，减轻了当时因铁路、公路运输不畅的困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私营航运业获得了新生，我个人也揭开了历史的新页。由于得到进步人士的指点，我对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有所了解，因而安心经营企业。在工作中，我有机会常同党政军负责干部接触，深为他们所表现的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所感动。看到建国初期国民经济迅

速恢复，财经状况取得好转，并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气蓬勃的景象，我感到由衷的高兴。特别是看到帝国主义船只横行中国内河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令人扬眉吐气，特别痛快。这一切，使我越来越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条真理。

1953年，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我们经营的复华、长湘轮船公司被批准公私合营，与三家同业一起，组成公私合营湖南省湘江轮船公司，随后又于1955年实现了全省轮船业的公私合营，翌年又过渡到国营湖南省航运局。我先后被安排担任湘江轮船公司副总经理、省航运局副局长。在新中国，我不仅亲眼看到了我国内河航运的飞跃发展，而且看到了我国远洋航业、造船业和船舶出口业务的发展。这些辉煌成就，使我深深感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确实是做着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我打心坎里歌颂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

至于我个人的生活，在新中国也感到无比的幸福和安定。我得到了工作和学习的充分机会，并且参加了人大、政协的各种活动。在工作实践和学习中我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使我认识到祖国前途无限光明，我个人的前途也无限光明。特别是当前我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我们为四化服务的新路子越走越广阔，报国多门，大有用武之地。我虽年逾花甲，仍感到还可以做许多工作，如在发展我国航运事业方面，可以尽我所知，为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献计献策。

1983年

## 第二笔财富

陈芸田\*

近几年来，我常常想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原工商业者究竟能有多少作为？在我国，原工商业者的一套经验、知识，包括在三座大山的重重压迫和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的经验，以及进入新社会后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实践，重新学习的经验，都是有用的。

记得建国初期，党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就曾说过：中国民族工商业者有两笔财富，一笔是企业（生产资料），另一笔是他们所掌握的一定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我还记得，陈云同志还曾着重提出，这“第二笔财富”至少不低于他们生产资料那一笔财富。现在，从我们全国各地原工商业者在经济咨询服务、工商专业培训以及对“三胞”和外国工商界朋友的联络工作中作出的成绩看来，证明这“第二笔财富”对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确实有用的。共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把一度没有很好地使用原工商业者，作为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提出来，使我们更加感动，更受激励。

当前，我们在为四化服务中，还会碰到一些困难。为了更好地发挥这第二笔财富的积极作用，我认为我们民建会和工商联首先要切实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同时要切实加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反映会员的意见和要求，进一步协助共产党和政府落实政策，并及时总结、推广服务成果，不断改变社会对我们的观感。从我们原工商业者本身来说，遇到困难，是迎难而上，还是

\* 陈芸田，曾任中州棉织厂董事长、湖南商会理事长。现任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湖南省委会副主任委员、省工商联主任委员。

知难而退，这是关键所在。我自己是过来人。比如，我从1979年冬起，为响应共产党中央对外开放、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号召，在倡议筹组湖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过程中，曾经遇到不少困难，工作几经曲折。首先碰到的是，对创设这个公司究竟有没有必要，在认识上并不一致。经过自春徂秋，将近半年的酝酿，意见比较一致了，但又碰到人员、资金、办公地址等一系列困难。在共产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由于民建、工商联几位退休人员的精诚合作，终于排除各种障碍，打开了局面，取得了一定收获。通过工作实践，我深深体会，在大好形势下，在前进途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或阻力。然而只要方向对头，有了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纵有重重障碍、万千困难，都能逐步突破。而一心为四化，不谋私利，不计个人得失，任劳任怨，坚持到底，一定能获得共产党的信任，做出成绩。

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为了振兴中华，还得有一点不服老的顽强精神。我非常景仰革命老前辈“喜颂黄昏”，“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高尚情操。也钦佩许多老当益壮、淬砺奋发，为四化服务的原工商业者同辈。因此自己虽然长年缠绵病榻，私淑之余，禁不住为四化动脑筋，想问题。常言道：“有志不在年高”。倘若“老”字压头，就会“望秋先零”，百事不可为。

另外，我又体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更新知识，重新学习，甚至从头学起，是我们的重要课题。我们不应妄自菲薄，也切不可妄自尊大，故步自封。这些虽系老话，却是老而常新的。

1983年



# 岁月匆匆六十年，半生碌碌半生甜

朱永濂\*

## 艰苦备尝的前半生

1918年我出生在湖南津市一个贫苦家庭，15岁时到聂庆记布店学徒。经过六年的勤奋学习，一般会计、出纳、采购等业务我基本上都能胜任。后该店关闭，我被介绍到伟章布店当店员。一年后，转到声大布店。该店讲究门面装潢，和气待客，服务态度好，生意兴隆，门庭若市。我因守职尽责，取得经理信任。1938年，武汉沦陷，长沙大火，战争有蔓延津市之势，声大经理将全部货物抽走避难益阳。伟章布店改组，我参加投资，开始走入资本家行列。

1944年，沙市、宜昌相继失守，津市一度形成真空。伟章拆伙，我邀集亲友利用伟章铺面家具，筹组锦纶绸布店。职工店员16人，我任经理。开业不到两月，局势更加恶化，我携带部分货物离开津市拟逃往洪江。我们长途跋涉，不断遭到敌机扫射和军队、土匪的抢劫，资金损耗大半，人也精疲力竭，前途渺茫。1945年8月，日寇投降，喜讯传来，人们欣喜若狂，认为从此可以安居乐业了。在一段时期内，布店业务有大幅度发展。我冒着沿途鱼雷密布的危险，乘轮到武汉转车去上海，采购畅销货物。1946年业务发展到鼎盛时期，估计实存资产增长了一倍半。但好景不长，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一日

\* 朱永濂，曾任津市锦纶绸布店经理。现任中国民主建国会津市市支部主任、津市市二商联主任委员。

数市，卖出商品，转眼就补不进来，店里商品，被贬值通货大量吞没。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部队到处勒索，稍不如意，即遭凶殴。这时，锦纶资金按实物计算不到原有资本的一半。半生希望，到此尽成泡影。

### 观望徘徊的解放初期

1949年7月津市欣获解放，可是我的企业已濒临绝境。共产党来了，到底怎么样？资本家是不是还允许存在？我搞不清楚。尔后，我不断参加了一些政府召集的会议，看到共产党人待人接物，都与国民党作风大不一样，对共产党渐渐产生了好感。共产党对工商业者根据“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执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使我们企业得到发展。不到一年时间，资金恢复到原有的数字。1951年春，市场比较萧条，市委号召各行各业设法渡过淡季，我们及时组织流动贸易小组，送货下乡，达到了渡淡目的。我的这一行动，在全省起到了首创和示范作用。

### 带头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1951年8月，我和工商联部分负责人，在共产党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组织布匹、百货、油盐、药材、香烟、南货7个行业，28户，319人，资金50亿元（旧人民币），筹建公私合营津市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我被任命为私方副总经理。由于我们熟悉商场业务，在全国重点城市遍设采购机构，消息灵通，范围宽广，经营灵活，经济效果很好，资金积累较多。一年以后，曾先后筹建津南粉厂（味精厂前身）、新津螺钉厂，并划出一部分资金充实津东油厂、光明电厂（津市电厂前身），扩大厂房设备，并分出一部分资金筹办五三公司（后为蜡纸厂），充实私营新公益秀油厂。

## 协助政府筹办地方工业

中共中央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公布后，市领导决定抽我出来，集中精力，辅导工商业者进行转业工作。我为筹建电厂到处奔走。当时，全市电力设备仅有90匹小动力一台，无法适应工业的发展。我先后向上海、北京、太原等地求援，购进了一批锅炉和机组，很快改变了我市供电不足的局面。

1954年春节前两天，市委通知我，省五金公司有一个螺钉厂项目，衡阳、津市两地正在争取，要我迅速前往，挂勾力争。我带人前往联系，很快争取了这个项目，随即专程到上海参观学习，了解国华螺钉厂和其他10多家螺钉厂的全部生产过程，订购全部设备，并通知津市选派6名青年进行实习。另一方面在津市建厂房，并聘请两位上海师傅指导生产。经过一段艰苦筹建工作，于同年12月9日正式投产。我先后担任副厂长、厂长。由于产销对路，狠抓了经营管理，一年时间里，设备与厂房投资已全部收回。当年我被评为市先进工作者。1955年至1960年期间，我曾遍访祖国大江南北和一些沿海城市，为蜡纸厂、圆珠笔厂、镀锌厂、缫丝厂、电厂、灯泡厂和棉纺厂等聘请技术人员，联系培训青工，收集各种资料，调拨设备等。我得到共产党的信任，工作极为顺利，热情也高。

## 政治运动中的风风雨雨

1952年全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津市参加运动的工商业者约50人左右。通过深入细致地检查、交代、批判、认识，历时3个月，我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结束时，我被评为基本守法户。这次“五反”运动，使我从思想上认识到“劳动光荣、剥削可耻”的真理，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1957年冬，“整风”、“反右”运动开始，我刚从北京出差回来，在

北京耳闻目睹很多情况。津市“整风”开始时，我心情很紧张。在鸣放阶段，大字报、漫画贴满了整个会场，声势浩大，也有许多意见涉及到我。不久运动转入斗争阶段，接二连三揪出了不少右派分子，到运动接近尾声时，我这一组的成员已寥寥无几了。运动快要结束时，市委调我去搞电厂建设，我遂前往北京联系锅炉等事宜，总算避过了运动的风头。

### 走上公私合营的光明大道

1955年底，津市开始迎接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时，我参加了湖南省工商联召开的二次执委扩大会议，学习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讨论了当前形势和任务。与会委员还着重谈了对和平改造政策的体会和认识。会议期间，省委书记周小舟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我们，并讲了话。我们受到很大启示和鼓舞。

1956年1月6日，市工商联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特召开执委六次（扩大）会议。会议期间，与会成员全体参加了中共市委举行的座谈会。大家踊跃发言，一致认为全行业公私合营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通过这次会议，不出10日，全行业公私合营申请书如雪片飞来，鞭炮声，欢呼声沸腾了津市。入夜，人们还举行了提灯游行。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一盛会，深深感到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平赎买政策的伟大。党和政府对私方人员职务的安排、定息的发放、生活的照顾，无不关心备至，我们心情舒畅地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 在十年浩劫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感到惊心动魄，惊恐万状。始而红卫兵破四旧，继而造反派揪斗所谓21种人、黑七类、牛鬼蛇神、走资派等。我是资本家，当然不能幸免。我写检查，受批判，职务也被撤了，在物资局仓库里劳动，感到“人难为、话难说、事难做”。不久，全家下放在临津文家公社古堰大队安家

落户。亲手实践农活以后，我确实感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滋味了。我于1972年底仍回原单位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虽然遭到许多歧视和冷遇，我仍坚信共产党的领导。

后来，我被安排在物资局轻化建材公司，担负出纳、总务、基建三项任务。虽然事务繁累，我反而感到心情舒畅，好象有使不完的劲，常常工作到深夜。我坚持当日事当日完，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取得了职工和基层领导的好评。

### **蔗境回甘，重建组织**

粉碎“四人帮”后，举国欢腾，苦尽甘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各方面迅速走上了正轨。共产党对工商界政策逐步落实。

1980年2月，我参加了湖南省民建、工商联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听了凌霄新主任作的《坚决跟党走，一心为四化》的报告。代表们欢聚一堂，共商会务，兴高采烈，共同庆贺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省委各级领导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给我们以“难能可贵”的高度评价，要求我们一如既往，坚持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把个人前途和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做共产党的诤友，做四化建设的促进派。这次会议是十年浩劫后的第一次，意义非常深远。1982年元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津市市工商联正式恢复，组成了第五届执委会，同时中国民主建国会津市支部委员会成立，我当选为两会主任委员。同年年底，我代表市两会参加了省两会组织的为“四化”服务成果展览，得到领导和社会的好评。

我在1979年愉快地加入了工会。

### **落实政策，干劲倍增**

1980年组织上调我担任轻化建材公司经理，更加鼓舞我为“四化”效力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我在改善经营管理、健全制

度、增设网点、便民利民、保证物资供应上，做了不少工作。我注意搞活生意，合理运用物资和资金，减少积压。由于同志们的努力，全年公司各项指标提前56天超额完成，被评为全局经营管理的先进单位。

同年8月津市连降暴雨，河水猛涨，公司前面大堤迭出险情，情况十分危急。在局领导统一指挥下，我积极发动群众冒雨抢救物资，首先把剧毒和危险品运到安全地方。晚上洪峰超过危险警戒线，公司前面土堤开始漫溢，如不采取紧急措施，仓库建筑一旦冲倒，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带动职工背来一包包水泥堵塞。当时大雨倾盆，泥泞路滑，我们跌倒了又爬起来干，终于用水泥垒起了一条防浪之堤，把洪水暂时拦在堤外，直到全部物资安全运出之后，子堤才溃决。这一措施争得了时间，使国家财产免受巨大的损失。想起了共产党对我们原工商业者的恩情，哪怕日日夜夜在防洪中得不到休息，顾不上吃饭，累得精疲力竭，也是心甘情愿的。抢险结束后，组织上为我记二等功。当年我被评为津市市先进工作者。

### **大胆设想，勇于革新**

1981年上半年，我在轻化建材公司任职期间，看到市轻化工业需要的盐酸，一贯采用瓦罐装运，运费和损耗惊人，每年折旧要报损10万元以上，而且往往因运输紧张影响生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利用外出机会，到长沙、株洲等地参观调查，回来后向厂里提出了改制盐酸包装的建议，得到了市物资局党组织和厂党委的支持。这年8月，我专程去株洲，在株洲化工厂的支持帮助下，几经曲折终于研制成功2台50吨的橡胶铁罐。从正式装运到当年11月止，已为该厂节约运费和报损费24000多元，每年还可循环受益。这一改革情况，当时湖南广播电台曾作快讯广播。

1980年10月我再次当选为第八届市人民代表。我决心不辜负人民对我的信任和期望，反映人民意见和要求。同年11月我被选

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2月又被推选为湖南省政协委员。我默默自勉：共产党和人民给了我这么多荣誉，我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永远记着党的恩情和教诲。

几年来，我先后向有关方面提出书面提案和建议共达30多件，大多数得到回复和采纳，这使我更加信心百倍。我愿以晚年余热，为祖国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1984年

## 处处以诚相见

熊应栋\*

我原所在的西安大华纺织厂，在解放后的发展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和平改造政策的具体体现。我曾是该厂的负责人，对此体会尤深。这个厂在抗战期间迭遭日机轰炸，后又长期受国民党“花纱布管制”；加上苛捐杂税的压榨盘剥；西安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又将厂里的动力锅炉破坏，真是疮痍满目，气息奄奄。解放初期，我对共产党的政策心里没有底，担心日后不知会落个什么下场！人民政府好象看透了我的心思，处处以诚相待。一面在原料供应、产品销售、资金周转等方面，支持厂子渡过难关；一面鼓励我们加强学习，改进企业经营管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争取光明前途。我是学经济的，对企业管理薄有经验。我从调查研究入手，感到旧式企业那种对工人包伙和工资上的平均待遇亟需改进。政府同意这个意见，派来工作组，帮助劳资双方开好协商会议，改变了包伙制度（把工人的伙食费折合成工资），并实行计件工资。这些办法实行后，企业面貌大为改观。例如，工人对纱锭的看台能力，逐渐由半台增为2台或2台以上；每10小时20支纱的单位产量，也逐步由0.6磅上升到1磅以上；机织能力也成倍增长。其主要经济效益表现为：产品质量提高，浪费减少，成本降低，利润迅速增加，职工个人收入增多，生活福利得到改善。特别是抽出了600多名工人，支援兄弟厂和有关单位；本厂由每班10小时的两班制改为每班工作8小时的三班

\* 熊应栋，曾任西安大华纺织厂副经理。现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民建陕西省委会主任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制，做到了缩短工时，增产还减人。这使全体职工，干劲倍增。生产发展后，工厂扩建了厂房，革新了技术设备，安装了进口的纺织机械。这些事实，使我认识到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党是大公无私、为人民利益着想的。

后来，我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并安排为西安市轻化局副局长。这使我能有更多的机会学习，接受共产党的教育。在担任副局长期间，我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比在大华时重得多了，常想如何才能把工作做好，不辜负党的信任与期望。每当我在工作中发现问题时，就提出自己的想法。凡是对人民有益的，总是受到欢迎和重视。例如当时西安搪瓷厂生产上去了，质量也超过国内先进水平，销路日增。但原料却是进口铁皮，常感不足。我就建议用“以进养出”的办法，请上级增拨进口原料，并准该厂出口一部分产品。省委和轻工部、外贸部想我们所想，急我们所急，最后调拨进口铁皮500吨。这对搪瓷厂职工鼓舞很大，进一步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产品不但满足了国内需要，而且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欢迎。现在该厂产品远销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常感到，我们能比较顺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也是和工商联组织的推动帮助分不开的。当前，我们要尽力把民建、工商联的经济咨询服务，深入持久地开展起来，并以此为中心，带动其他各项工作，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十二大确定的宏伟目标，尽心竭力，携手前进。

1983年

## 八九述怀

傅道伸\*

我生于清朝末年(1897年),当时国弱民穷,灾祸频起,民不聊生。

我一踏进社会,就和纺织业打交道。先是当徒工,以后进了南通学院纺织专科读书,中途又因生活无来源被迫辍学。但我总希望学有所成,为国效力。1919年我同徐特立、李立三等一道去法国勤工俭学,以后还到英国、美国求学,最后在美国读完了大学,取得纺织专科学士的学位。

1923年,我回到祖国,主要从事纺织技术工作。1930年任湘南第一纺织厂工务主任。1933年,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成立,我被延用为专业委员,兼华东地区纱厂调查团团长。1935年,我参加了筹建中国第一所现代纺织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棉纺织染实验馆的工作,并受聘为专任研究员。1937年,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投资纺织事业,我应邀为技术专员,代向国外订购大批纺织机器。抗战时期草创成立的昆明裕滇纱厂、重庆豫丰纱厂和陕西雍兴实业公司等厂的机器,皆系我经手订购。1942年我由香港辗转迁移,来到陕西关中,愿意在支援西北工业建设中为抗日战争稍尽绵力,先后应聘为雍兴公司总工程师、咸阳纺织厂厂长、原西北工学院纺织系教授。1948年,我应聘为雍兴实业公司协理兼办事处主任。时值解放战争,我尽自己所能,

---

\* 傅道伸,曾任咸阳纺织厂厂长、西北工学院纺织系教授、雍兴实业公司协理兼办事处主任。现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顾问、民建陕西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理事会顾问、省纺织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克服各种困难，保护各厂财产未遭破坏，直至人民政府完全接收为止，受到接管的军事代表的赞扬。

回想解放前的几十年，自己虽四处奔波，艰苦备尝，但工业救国之路最终未能走通。

解放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把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推倒了，中国的土地上才有了人民的一切，我也如鱼得水，有了用武之地。共产党对我十分信任，先后让我担任了西北人民纺织建设公司经理兼总工程师、西北大区工业部副部长、西北纺织工业管理局局长、陕西省纺织工业局局长和西北工学院教授兼纺织系主任等职。我积极参加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历任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和陕西纺织工程学会理事长。在行政上，我直接负责和领导陕西的纺织工业建设；在专业技术上，我有充分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的场所，还重新修订出版了拙作《实践纺织学》。

再看看我们陕西的纺织工业。解放前，全省仅有5个规模很小、设备陈旧、厂房简陋的棉纺织厂。拥有纱锭92000枚，布机1300多台。机器设备多是英、美、日的陈旧货，不少已经使用了半个多世纪以上。主要产品只有粗支纱和白平布，质量低劣，品种单调。9600多名纺织工人，劳动条件低劣，生活朝不保夕。整个行业处于风雨飘摇、奄奄一息的状态。如今，全省已有235个各种类型的纺织企业，职工160000人。拥有棉纺锭1010000枚，棉布织机26500台，毛纺锭24600枚，丝织机1000台。其他如机械制造、配件供应等行业也从无到有，蔚为大观。随着生产的发展，全系统的科研、教育事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纺织科研机构和专业院校均已相继成立。纺织产品的花色品种已达5000多种，还试制成功维尼龙、锦纶丝袜和药物袜等新产品。毛纺织厂利用改良国产毛、人造毛等原料，生产了各色毛的确良、啥味呢、派力司等10多种精纺毛织品，有的已畅销国外。这铁一般的事实，说明了一个真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西北 5 省的纺织工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落后到先进，尤其是陕西关中地区已成为全国纺织工业重要基地之一，受到人们的高度赞许。这些成绩，主要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以及广大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果。本人不过有幸参加末议，适逢其会，人生躬逢如此佳境，安能不引为莫大荣幸！

1986年

## 千金难买阶级变

严树棠\*

我今年73岁。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历经34个春秋，沐浴党的恩惠，深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星转斗移，时光流逝，每当我追忆起过往的岁月，心头就洋溢起一种难抑的激流。

旧中国，我同许多民族工商业者一样，曾饱尝辛酸苦涩。我很小就进入陕西泾阳县昌盛西茶店（即湖南砖茶制造厂）当学徒，后入西安同心成茶布庄任司账。1934年秋，我辗转兰州，从事于德义兴钱庄，同时兼营砖茶生意，在风雨飘摇中渡过了10多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又任兰州宝庆祥茶号经理直至兰州解放。其间历尽坎坷，苦撑苦熬几十载，由于反动政府横征暴敛，肆意盘剥，我这个普通工商业者，犹如大风大浪中的一叶小舟，随时有覆没的危险。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开始，我思想上疑虑重重。我是在旧商会做过事的人，顾虑共产党会不会信任我，给不给工作和生活出路等等。正当我们徘徊不定之时，党和人民政府召集我们开会学习，宣传党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号召并扶植我们恢复正常经营，鼓励大家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服务。后来，我又亲眼看到，共产党人说到做到，言行一致，廉洁奉公，真诚坦白，使我疑虑逐渐消失，对共产党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30年来，我终生难忘的有两件大事。一是1956年1月19日，

\* 严树棠，曾任兰州宝庆祥茶号经理、同和钱庄经理。现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甘肃省委员会主任委员、省政协副主席。

甘肃全省私营工商企业顺利地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当时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对我们工商业者量材录用，适当安排。以兰州市为例，当时安排为省商业厅副厅长、兰州市副市长、兰州市商业局副局长各1人；商业方面，安排公司副经理的10人，合营商店经理、副经理、股长、门市部主任的300多人；工交方面，安排副厂长、副经理的6人，科股长、车间主任的29人，其余3000多人也都做了妥善安置，成为国家的公职人员。这是和平赎买政策的具体体现。大家深受感动，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的企业改造成了社会主义企业，人又得到安排，不仅有了工作，生活也有了保障。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史上空前的创举。

二是党的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庄严宣布：我国资本家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我们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夙愿！许多同志激动地说：“千金难买阶级变”，我们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我们自豪呢！

几年来，甘肃省民建会和工商联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遵循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方针，积极展开了工商专业培训、经济咨询服务和智力支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现在举办培训班的有9个县、市，设置了20个专业班，在校学员2300人。有19个县、市成立了经济咨询服务机构，有500多人参加工作，许多咨询项目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智力支边方面，我们已接受了10个县、市的咨询要求，现正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开展工作。两会各级组织和成员，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四化建设中不断地发挥着自已应有的作用。目前，我省两会成员被安排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各1人，省人大代表10人，省政协委员17人。许多同志已成为本单位本部门的业务骨干，有的成为先进工作者和先进生产者。不少退休的老同志，退而不休，重返为人民服务的岗位，热心咨询服务和传帮带工作，为四化出力。这些都具体地标志着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我们一定要以主人

翁的责任感，发挥爱国主义精神，做好我们应做的工作。

1933年

## 愿以有生之年，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韩铁城\*

我父亲是上海一大铁号的独资老板，专门经营进口五金，是德商宝华洋行出品在上海的独家经销商。我出生于1921年，1943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不久，就进一大铁号继承父业。

那时，上海已经沦陷，店中存货为日寇所收购，业务被迫停顿。1945年抗战胜利，欢欣欲狂，我满以为可以重整旗鼓，大干一番。不料国民党接收大员乘机劫收，以胜利者自居，骄横跋扈，不可一世。加之物价飞涨，购买力普遍下降，生意难做，民族工商业奄奄一息，我们的业务萎靡不振。1948年，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元券，强迫收兑白银、黄金、外币，物价暴涨。到国民党崩溃前夕，一根油条竟卖伪金元券300万元，真是天下奇闻！

1949年上海解放了。中国共产党宣布对民族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我先后被选为黄浦区人民代表、黄浦区工商联常委、黄浦区民建支部负责人等。接着国营五金公司成立，我店从国营公司进货，业务迅速发展起来。1954年在市人民政府领导下，上海约有24个批发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有的歇业，也有的转业。为了妥善安排批发商的转业问题，在市第二商业局与市工商联的倡议下，由第二商业局领导组织了一个西北参观访问团。成员有饮食服务业、钢铁五金、纸张、颜料、化工等资方代表。我作为钢铁五金业的代表参加了访问团。1955年7月我们由上海出发，先

\* 韩铁城，曾经营上海一大铁号。现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甘肃省工商联主任委员。



后至洛阳、西安、宝鸡等地，与当地党政部门签订了投资设店的协议。9月底来到了兰州。

兰州是西北重镇，其发展前景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经过协商，我们与当地签订了投资200万元支援兰州建设的协议。1956年初，全行业公私合营掀起了高潮。我们动员部分商业连店带人迁来兰州，计有：信大祥、泰昌等百货业；王荣康、培琪服装业；大中华、悦宾楼、同华楼、葛裕兴、立达西菜社等饮食业；国联、龙象照相馆；国际、登记理发店；意姆登洗染店等服务业。当时在上海成立了迁兰企业工作组，在兰州也设置了迁兰企业接待站。我重返兰州后负责筹组建兰公司。在王君朗市长的领导下，新建了建兰饭店、红光、健康及幸福浴池，东岗、七里河综合市场。我与钱念祖（原建兰公司筹备人之一）被安排在公司任副经理，我负责基建工作。1960年建兰公司与福利公司合并为兰州市饮食服务公司，我担任公司副经理。1980年，我担任甘肃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迁兰企业为兰州市的经济建设尽了一份力量，我自己也从中受到了教育。我作出了一点微薄的贡献，是听党的话，跟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今后，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为四化建设贡献我的一切力量，以报答党对我的关怀和照顾。

1982年

## 愿做新愚公，开拓青海省

### ——访青海省工商联主委廖霭庭\*

克 刚

初秋，西宁古城的天气分外清爽。小院子里秋菊含苞，我们访问了廖霭庭先生。

廖老，是青海省土生土长的有名的商业家。20岁左右就当私营裕兴昌商号的经理，有在多民族地区经营商业的一手本领，发了家，人称“小诸葛”、“廖百万”。解放后，他认真学习，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兴办了我省第一个乳品厂。60年代，在他任省商业厅副厅长时，注意调查研究，并运用自己已经商数十年的经验，提出过多项改进商业工作的建议，有的项目得到了商业部门的赞许和采纳。“文化大革命”中，人们传说着这样一件事：1969年秋，他被分配到“五七”干校黄河渡口看守渡筏，住在河岸上的一顶破帐篷中，生活非常艰苦。可是他从不怨天尤人，坚持锻炼身体，还抽时间到附近地区采集人们丢遗的杏仁。有人讥笑他：“资本家的爱钱本性没变”。他回答说：“杏仁是有用的药材，我需要，国家更需要，弃之可惜！”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和国家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给了廖老发挥才干的大好机会。现在，他虽然年逾古稀，除了任全国和省工商联的职务外，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他说：“党信任我，把我安在这样高、这样重要的位置上，我

\* 廖霭庭，曾任西宁裕兴昌商号经理。曾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顾问、青海省工商联主任委员、省政协副主席。

要做的事很多，但年龄不饶人，体力、精力赶不上，这使我很不安啊！我若有50年代的体力，我不信把事情办不好。”说着，他随手展开一本线装的《陈修园全集》（中医书），说：“我从这里找健身之道，想多活几年，多为四化做点事，多为开拓青海做点事。”说着爽朗地笑了。

他沉思了一会儿，联系自己切身经历说：“人们一定要不断地学习，才能赶上形势的发展。解放前，由于我中了国民党、马步芳反动宣传的毒，把共产党看成‘洪水猛兽’。西宁解放前夕，我把家小分散到牧区、农村，自己带了10斤烟叶，单骑到塔尔寺一个喇嘛家避了7天。心想，等这10斤烟叶吸完，若还回不了家，我就和这烟叶同归于尽！我当时的想法当然是极端错误的。事实上，我在西宁解放的第二天，就回了家，当日就同其他工商业者晋见了党政领导，接受‘爱国守法，积极经营，安定人心’的任务，从此我和广大工商业者一道学习，贯彻执行党对工商业者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现在，我常想，要不是解放，我不会有今天！军阀官僚的横征暴敛可以挤垮我，封建家族的枷锁可以吞没我！还有许多情况能把我致死。总之，我恐怕难以活到现在。

近一个月来，廖老和省民建、工商联的同志全力以赴，协同山东省两会赴青海经济咨询服务团，奔跑于西宁市受咨询的7个工厂之间，接头联系，调查研究，落实项目，力求见效。他说：“山东省的两会同志都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他们有精湛技艺，心怀开拓青海的大志，不远千里，不畏艰难，为大规模开拓青海献计献策，给我们作了榜样。

他还说：“开拓青海，任重道远。我当贡献余热，诚诚恳恳把应做的工作做好。

1983年

# 雄心尚在

童少生\*

回忆解放前，我所想的是实业救国，一心一意思想把民生公司尽量发展起来。认为交通运输搞好了，各项工商企业随之发展，国家就能富强，不再受外国人的欺侮。但事与愿违，到了解放前夕、民生公司已经债台高筑，亏折累累，面临破产的境地。解放后，人民政府立即大力扶持。为了解决资金周转困难，人民银行给我们的贷款数额，居当时对私营企业贷款的首位；为了解决货运不足，政府给我们承运川粮东调任务，同时协助我们大力整顿企业。经过努力，企业逐步扭亏为盈。

公私合营后，民生公司更走上了光明大道。在事实的教育下，我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真理。但认识的过程是有曲折的。合营后不久，过去“我说了算”行不通了，思想上感到不愉快。经过与工商联的同志们交换意见，得到共产党的耐心教育和帮助，使我的认识得到了提高，思想境界开阔了，工作也愉快了。其后，我每遇到思想有些不通的时候，就向工商联组织谈，以求得到帮助，使自己的思想认识一步步地提高。十年动乱中，我虽然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但始终坚信党是伟大的、正确的，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走对了。

我自己这样做，也经常和工商界同志交流心得体会、互相帮

---

\* 童少生，原重庆中华国货介绍所董事长、民生实业公司副总经理。曾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顾问、民建四川省委员会主任委员、省工商联主任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4年逝世。

助。例如十年动乱后期，我听说工商界一位有技术专长的同志，受到了冤屈，思想紧张，想走绝路。我赶快把他找来，问明情况后，我告诉他说，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能走绝路，要相信共产党的政策，一切问题都会搞清楚的。后来那位同志说：“在那以后，每当思想不通，手摸到绳子的时候，就想起你向我讲的话，我觉得这是工商联组织救了我的命。”

粉碎“四人帮”，我高兴得无法形容！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我双手拥护。过去我梦想振兴中华，走实业救国的道路，结果走不通。今天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要把祖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远远超出了自己原来的梦想，怎能不令人兴奋鼓舞呢？难道不应该把自己全部精力贡献给这一宏伟事业吗？

我虽然年老多病，但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效力的雄心尚在。几年来，我响应组织的号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了一些微薄的贡献。

我大半生从事交通运输工作，对航运事业特别有感情。十年动乱，航运事业遭到严重破坏，不能适应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我心里很着急。因此，每次遇到交通部的领导同志，我总是要根据当前的情况和问题，结合我多年的一些经验，畅谈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如象远洋航运问题、港口建设问题、确保航运安全问题等。我首先考虑的不是我的意见能否被采纳，而是倾箱倒篋地都摆出来，以期在领导同志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时能够有所裨益。我还打算再去长江沿途看一看，想对三峡高坝问题、川江整治问题等提些意见。

我有一些工商界朋友，散居在美国、香港等地，多年不通信息。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先后恢复了联系，互道别情。通过他们的介绍，一些外商来工商联了解情况，洽谈业务。如我的老朋友王德郢，介绍美籍华人边敬耕、伍承祖先生来成都，经工商联穿针引线，与省蔬菜饮食公司签订合同，在纽约开办“荣乐

园”川菜馆，取得了显著效益，使川菜在美国生了根。去年边敬耕先生又与省饮食公司在华盛顿合办“会仙楼”川菜馆，我以省工商联主委身份作为顾问前往参加开业剪彩。在美期间，会到了一些老朋友，又结识了一些新朋友。许多外国企业家听说我是工商联负责人，谈起来情意分外相投，一些人还相约以后多多联系，协助开展业务往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民生公司随即开辟了上海与台北的航线，业务很好。民生公司驻台办事处的几位同事，就是我在上海时亲自派去的。台湾与大陆被人为地分割以后，我对他们深为怀念，我想是我派了他们去台，使他们骨肉分离，感到内疚。这些年来，我一共写了25篇对台广播稿件，介绍祖国的兴盛、个人的情况，抒发我的怀念之情，期能对祖国的统一大业贡献一砖一瓦。

1983年

## 两代人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薛云麟\*

我出生在旧中国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家庭，我的父亲薛震祥是震旦机器厂的创办人，素抱实业救国思想，具有爱国心和事业心。1939年我在同济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就进震旦厂工作，立志子继父业，一展抱负，为中国机械工业作出一些建树。但那时强敌压境，国势危急，社会剧烈动荡，生产极不正常。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的反人民内战接踵而起，政局混乱，经济破产，百业凋敝，民营工厂奄奄一息，科学技术毫无用武之地，震旦厂亦陷于瘫痪状态。我作为有志于发展民族工业的年轻知识分子，痛切感到，中国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没有一个独立、强盛、统一、民主的国家，“实业救国”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根本无从谈起。

正当风雨如晦，长夜难明之际，曙光降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中国解放了。当时，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的政策，是符合民族工商业者的根本利益的，大大鼓舞了我的经营积极性。新中国刚一成立，震旦厂立即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我对共产党拯救国家、领导国家的杰出才能是衷心佩服的。但是当时我刚从旧社会过来，对于共产党的政策又不大理解、不大习惯。记得解放初期，国家为了发展消防器材生产，在重庆开办了一家前进灭火机厂，我便认为这将挤垮震旦厂，妨碍了我的“事业”，一度采取封锁技术，削价竞争等资本主

\* 薛云麟，曾任上海电机厂工程师、重庆震旦机器厂经理。现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委员，民建重庆市委副主任委员、重庆机械工业局技术咨询、高级工程师。

义经营方式来对抗国营经济。不久，“五反”运动开始，我在运动中受到深刻教育，推动了我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对于我个人，共产党根据“量才录用，适当照顾”的政策，在企业合营后安排我到机械工业公司担任副经理，1958年又调我到市机械局担任工程师，让我经常下厂蹲点，与工人实行“四同”，解决生产技术关键问题，使我所学的技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运用，对国家建设事业作出了一些贡献。我多次参加市的先代会，并被特邀出席省劳模会和全国群英会，还被安排为市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1964年党送我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脱产学习一年，系统地提高了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促进了我的思想改造。

在十年内乱中，我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我渴望共产党的正确路线能够重新得到恢复，让我能重新过50年代那样充满信心的生活。同时，我和妻子杨培贞彼此勉励，互相约定，在任何困难情况下，决不动摇对党的信心。

1976年一声春雷，“四人帮”被粉碎了，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得到恢复，一种巨大的喜悦使我全身充满力量。接着令人鼓舞的喜讯相继传来：1978年，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明确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第二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全体会议上又宣布：绝大多数原工商业者已改造成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正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这是我朝夕盼望、梦寐以求的声音，使我感到无比的振奋和极大的鼓舞，给我的工作增添了新的力量，我和我的家庭也重新显得有了活力，有了生气。我被选为重庆市民建会副主委、四川省民建会常委、四川省人民代表。子女们都感到大有奔头，努力为四化建设而勤奋地工作学习，大儿被评为工程师，担任某研究院的室主任。女婿女儿也分别评为工程师和助理工程师，我的家庭去年还荣获省、市“五好家庭”的



光荣称号。

这几年来，我信心百倍，干劲十足地为四化建设作出贡献。1977年底我在阀门厂同工人一道，通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劳动，研制成功了天然气管道用的开口切断装置“600气压高压电动抗硫球阀”获得重庆市科技大会奖。1979年与四川省石油设计院共同研制成功了高级孔板阀和气控平板阀，又获得1981年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1980年初，石油部委托省石油局邀集科研单位、厂矿和全国各大油田用户对两种阀门进行鉴定，一致认为这两项新产品质量良好，填补了国内空白，可以先行小批生产，逐步推广。1980年我被批准加入了工会，正式发表我为副厂长，负责全部技术工作。1981年我被上级评定为高级工程师，给我颁发了证书。《重庆日报》还报导了我的事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给予我如此多的关怀、荣誉和鼓励，常常感动得我心潮激荡，热泪盈眶，心情确实说不出的愉快。回想我父亲毕生指望“实业救国”无从实现，而今天我却能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下发挥一技之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为振兴中华而奉献心血。两代人的愿望一朝变成现实，试问，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使我感到振奋和舒畅的呢？

1983年

## 从老板娘到女技工

何玉兴\*

建国以来，我沐浴在党的阳光雨露下，从一个老板娘变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取得了一些进步和收获，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肯定。

几十年来，我毕生难忘的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对我的教导和勉励。1962年，我应邀列席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汇报了我从老板娘成为三级技工的过程，受到了代表们的热情赞赏。会议期间，在北京饭店的大厅举行晚会，灯火辉煌，充满欢乐气氛。周恩来总理神采奕奕，以矫健的步伐走进大厅，和代表们一一握手，中共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统战部的领导同志，把我的情况向总理作了介绍。总理亲切地拉着我在沙发上坐下来，问我参加劳动的详细经过。当总理知道我丈夫以前开的重庆日升机器厂规模还不小时，风趣地说：“你以前当老板娘不是很好嘛，现在生活也不成问题嘛，怎么想到要当工人？”

“开始我只是感到没有出路，后来更感到剥削可耻，要自食其力。”我如实地回答。

“是谁给你出的主意，要当个工人？”总理又问。

“是我自己想的。”我说。

“真是自己想的？”总理连连问了几次，高兴地说：“那好！老板娘成为了工人，新中国你是第一个。尤其是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这就更加难能可贵。这是一条宽阔的道路，但也会有艰难险

---

\* 何玉兴，曾是全国“三八”红旗手。

阻，你要坚持下去，勇往直前。”

当时，陈毅副总理也在。总理把我介绍给陈毅副总理说：“这是何玉兴同志，你们四川老乡。她原来是个老板娘，你看她现在象不象个工人？”

陈毅副总理也风趣地说：“哈，我们国家还有老板娘当工人的？！新鲜！来，把手伸出来，让我考考你。”当他看到我的两只手掌结满了一层厚茧时，满意地笑了：“嗯，你够格了。”接着，又问我多大岁数，我答说：“36岁。”陈毅副总理说：“你还年轻嘛，前途大得很！这不仅是你一个人的问题，重要的是你带了个很好的头，给工商业者家属走出了一条路，我们都要感谢你哩！”

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教导亲切感人，充分体现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关怀。我把这些教导深深铭刻在心田，成为前进的指路明灯。我成为工人阶级光荣的一员，这条路虽然是自己所选，但能够坚持下去，却全靠总理给了我勇气和力量。回想自己30年来所走过的这段路程，真是艰难曲折，经过不少的矛盾冲突和痛苦的磨炼，才“瓜熟蒂落”，得到了快乐和幸福。

重庆解放时，我才二十三、四岁，眼看着很多姐妹走上了各种工作岗位，为人民服务，而我还是老样子，过着阔太太的生活。当时，我毕竟比较年轻，新的事物和新的风尚对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我逐渐懂得一些使自己生活得更有意义的道理，觉得当个老板娘很不光彩，不愿再过剥削寄生的生活，便想去丈夫开的厂子里找点活干，学点本领。可是，我的丈夫出于对我的爱怜，怕我受累受脏干不下来，一再对我进行劝阻。“家庭关”过不了，我心里很着急。我趁丈夫出差到外地，就果断地进厂干起活了。后来，我丈夫看见“既成事实”，我的意志又很坚决，也不再阻拦了。以后我们还互助互勉，共同前进。

我是1954年进厂学车工的。象我这个养尊处优，从未劳动的人，要过好“劳动关”实在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第一天下车间，工人弟兄感到很奇怪，他们围过来问我：“老板娘，你不怕脏

吗？”我嘴上说不脏，心里却想他们一身多脏啊，机器油糊得满手满脸满身，多不舒服。但是为了学习劳动，我不能打退堂鼓，只得硬着头皮，咬紧牙关忍受下来。我在车间劳动站了一天，脚也痛了，腰也酸了，睡在床上翻身都翻不过来。第二天偷偷地问一个工人，这样痛要痛多久？他说：“两三个月。”我一听，倒抽一口冷气，“怎么得了，要痛这么久！”可是又怕工人笑我，只好装做无所谓地说：“那还不算啥。”这虽是违心之言，但多少表示出一些倔强劲儿。

有一次，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天还没大亮，又下着大雪，我想要是不参加生产，我还在暖和的被窝里享福呢。这一闪间的思想活动，被我克制了。我仍按时到工厂去干活，因为我的手被冻起疮了，不听使唤，提起榔头一锤，正好锤在手指上，顿时痛得我眼泪直滴，我赶快扯衣袖揩干了眼泪水，继续干活。手又冷又痛，铁又冷又硬，我锤着锤着，终于因手痛木了，抓不稳工具，被工人弟兄看见了，他们热情地为我擦敷松节油，关切地说：“痛吗？不要再这样了，你看你不是哭了吗？”他们又鼓励我：“不要紧，只要有坚定的决心，可以学会的，可以坚持下来的。”他们这么诚恳、友爱，使我深受感动，增添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如做“活塞”，师傅说不能有二丝之差。我第一天只做了1个，离定额差很远。我整夜不眠，思绪沸腾，自己警告自己不能“遇难而退”。第二天，在工人师傅的帮助下，我努力去做，由2个到3个、4个、5个，最后终于达到并超过了定额。我爱人有空时也教我学看图纸，我做活就更快了。后来我做“螺丝帽”又突破了定额。企业公私合营后，我被正式评定为三级车工。从此工人们不再喊我“老板娘”，亲切地叫我“何师傅”了。当我听到第一声喊“何师傅”时，不禁热泪夺眶而出！

但是，正象总理他老人家教导的那样，前进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在十年浩劫中，我也经受了考验。当我苦闷、彷徨，不知所措的时候，耳际回想起周总理的教导：“……这是一条宽阔的道

路，但也会有艰难险阻，你要坚持下去，勇往直前。”我心里亮堂起来，下定决心，照着总理指引的道路走去，决不回头。我一如既往，坚守工作岗位，坚持天天上班，完成生产任务。

1978年，我已经52岁了，我们水泵厂的车工，一般到了48岁就需要换工种，我已超过了几年。兼之因腰骨受伤，穿着“钢背心”，也实在不宜再做车工。在厂党委的关怀下，调我到一车间二类工具室当保管员。工种变了，但我思想不变，我苦练硬功夫，以较快的时间，把上千多种工具名称记熟，放置的位置也记清楚，并且熟悉了它们各自的性能和用法，如装千分尺的那一柜工具，我能闭着眼睛取放，没有差错。这不但是个细致工作，还容易得罪人。有的人前几年马虎惯了，借去的工具，用了随手一甩就不管了。有的公私不分，总想占点便宜。我坚持按制度办事，不拿公家的东西送人情。既然当了国家的主人，就得象个主人的样子，要爱厂如家，象家庭主妇那样，把国家的一针一线，一钉一木都放在心上，管好这个“家”。

我在生产上和节约上取得的微小成绩，经过车间工人的评选，曾三次荣获先进工作者的称号，并三次荣立一等功。这些荣誉的获得，总引起我对周总理的无限怀念。是他老人家给我指引了广阔的前进道路，使我越走越宽阔。党和政府宣布我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以后，我们夫妇同时被吸收加入工会，我还被选为职工代表。多年来的愿望实现了，真是我有生以来的最大的喜事。我认为这是我生活上的一个新起点，今后，我还要努力学习，不断前进。

1983年

## 海纳百川，不弃细流

### ——访贵州省工商联主委毛铁桥\*

唐慧敏

解放以前，贵州省交通闭塞，山多河少，航道短促，铁路不通，运输主要是靠汽车。因而汽车运输业就成了本省私营企业中资本比较集中的行业。

建国初期，省会贵阳有1100多辆商车（其中40%是带病行驶的病车或死车）。1951年，在省交通厅领导下，按自愿原则组成了35个联营社，各自经营，结果经营得法的财源茂盛，经营不得法的就亏本，发不出工资，甚至拆卖车辆零件过日子。

面临这个问题，当时贵阳市汽车运输业同业公会开会商量，15位常委中有13位主张把所有联营社合并为一家私营公司，集体经营集体管理，并推选毛铁桥为董事长。市人民政府在该业蹲点的行业整顿工作组，也基本同意这个意见。但是有一个人反对，那就是毛铁桥。他认为交通运输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建国以后，再开办私营公司，与解放后的新形势已不适应，主张直接成立一家公私合营企业。由于意见不一，同业公会为此开了有200多人参加的讨论会（包括资方和基层工会的负责人）。这是1953年的事。

这个问题，后来提到中共贵阳市委。当时市委第一书记兼

---

\* 毛铁桥，原在云、贵、川等地经营汽车运输业。现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顾问、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民建贵州省委主任委员、省工商联主任委员、省政协副主席。

市长秦天真同志邀集双方座谈，听取意见。对方说：“日前汽车运输业办的联营社多达35个，营业额大小不一，有盈有亏，终非久计，不如把所有车辆折价入股，人员车辆统一安排，成立公司，即能互助合作，解决亏损问题，消除业务竞争，走上发展道路。”毛铁桥建议：搞千人以上的大规模私营公司，人员复杂，管理困难，经营不易。何况，尚未开业，已背上40%病车、死车的包袱。“未老先衰”。更重要的，事关国家运输事业，责任很重。因此，必须有共产党的直接领导，有国营经济的代表掌握，这样不仅货源、燃料、修车需要的零配件等有保证，而且在经营方向上更易贯彻交通厅的意图，人与人的关系也容易安排。

对方说：“走公私合营道路是毛某一人之意，99%同行不赞成，应考虑多数人意见。”毛反驳说：“同业公会常委中的多数少数，决不等于整个行业的多数少数。”他认为最好由市政府召开全体联营社社员大会，听听群众呼声。

在长达5个小时的辩论中，市长们静静地听着。最后，秦市长和几位副市长同意了毛提出的召开联营社全体社员大会的意见。

不久，市人民政府召开了有千余人参加的社员分片大会，为期5天。这说明省、市委领导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和省委负责同志，都深入各个小组倾听群众对此的辩论。结果表明：千余人中赞成公私合营的占多数。

问题明确了。1954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联营社中的一主多车户，首批申请公私合营，共有好车130辆，国家也投入汽车50辆，成立了公私合营贵阳市汽车运输公司，这为以后全省汽车运输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奠定了基础。

毛铁桥在谈到这件往事时说：“当时我所以提这个意见，并不是在两年之前就认识到共产党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而是看到了两点：第一，从无数事实中，亲眼看到共产党一切工作是为国家利益着想的，是实事求是的；第二，受到了当时

童少生在报上发表的民生公司走上公私合营后那篇文章的启发。文章说，企业公私合营，‘功在国家，利在自己’。这两句话，调子不高，但符合我当时的思想水平。运输行业，虽有水上、陆上之分，企业规模也有大小，但是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事业，应该由共产党领导，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企业公私合营以后，毛铁桥说：“当时人民政府让我担任新成立的省汽车运输公司的负责人，不久后又安排我担任省交通厅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职务。由于实际工作的需要，我越来越感到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的紧迫性。私营联营社时期不过几十辆汽车，而到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汽车就多达成百上千辆了。这不仅是‘量’的变化，主要是企业性质的‘质’的变化。社会主义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在经营管理上有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的区别，这主要是方向道路问题。通过不断的业务实践和政治学习，才使我逐步提高认识，哪些必须从头学起，哪些可以昔为今用，哪些还可以推陈出新等等。我在政治上、业务上的社会主义觉悟逐步有所提高，对周围发生的新事务、新问题逐步有了些新的认识是从那时开始的。”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以后，毛铁桥虽已调离了交通厅，但对汽车运输业仍有深厚感情。他还经常回交通厅协助负责同志搞调查研究，提供一得之见。1980年，他针对当时汽车货运管理不善的现象，根据过去经验，向中共省委、省政府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汽运业应实行统一计划、统一组织货源、统一安排运力和统一收费标准的建议，以端正经营作风，挖掘运输潜力。这一建议得到采纳后，证明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他经营汽车运输业有40年经验，看问题往往比较深刻，切中要害。比如1981年，他去贵州轮胎厂参观时，发现该厂产制的轮胎含硫量较高，影响规格质量，该厂过去曾多次要求改造有关设备。毛过去是用汽车轮胎的大户，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于是不仅在省政协提出这个问题，而且直接找省政府呼吁，协助该厂



反映问题，终于由省计委批准拨款将该厂硫化罐改造为硫化机，解决了含硫量高的关键问题，提高了贵州轮胎的质量和在国内外的竞争能力。

这几年来，毛铁桥的主要工作是根据自己的特长搞好经济咨询服务。他说：“我们是在贵州省土生土长的，了解本省的实际需要和特点；同时，我们过去是经营中小企业的，对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较有经验，可以多少提些建议。海纳百川，不弃细流。有些建议，虽然看起来并不大，但是把这些建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集中起来，就能对四化起很好的作用。”

1983年

## 党恩似海

冯程南\*

我已是78岁的人了。回顾过去自己所走过的路，虽非平坦，但“千回百转总向前”，而今思及，仍心潮澎湃。

解放以前，我在贵阳经营利昌绸布号。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下，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来说，处境非常艰难，日子很不好过。那时，贵阳还是个小山城，工业不发达，交通阻塞，劳动人民朝不保夕，生活艰苦。“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正是贵阳当时的写照。加上旧社会的腐败，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工商业者毫无保障。记得当时我所经营的绸布，全部是从上海进货，再几经转运、人挑马驮才运来贵阳，后来为了方便，交邮局托运。1940年，我在上海买进一批货物，因日寇占领上海，邮局业务停顿，我只好把货物存在同业仓库中，计划从上海由轮船运至海防，再通过滇越路由火车运至昆明，然后换汽车运来贵阳。谁知货物运到海防、海防又被日寇占领，货物无法运出。我们请人在海防到处送礼、送钱、乞求，才逐一打通关节，可是，打开仓库后，货物早已全部不翼而飞了，损失很大。类似的事，真是不胜枚举。加之国民党政府的货币贬值，物价高涨，经营上更是朝不保夕。那时，我正如浮沉在生活瀚海上的一叶小舟，在狂风暴雨中，拼命挣扎。就在这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解放了全中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同其他同业一道满怀激情，迎来了新中国的春

\* 冯程南，原籍贵州桐梓县绸布号，曾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贵州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4年逝世。

天。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大转折。

解放以后，共产党对我关心备至。省、市党政领导同志，多次和我谈话，宣传共产党的统战政策，鼓励我们办好企业，组织我参观、学习，又给予很高的政治安排。1950年初，我被安排为贵阳市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我逐步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纠正了过去思想深处的“疑”字和“悸”，不断靠拢党，跟党走，努力工作。1955年我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搞合营试点工作，敲锣打鼓，参加了公私合营，党先后安排我担任省、市人大代表，市针织公司副经理，市商业局副局长等重要职务。从此，我进一步认识到剥削可耻和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的重大意义。虽然，党对我们进行赎买，但我坚持放弃定息，决心通过学习、劳动和工作实践三条渠道，来认真改造世界观。企业和机关共产党的领导同志对我很关心，每当我有了成绩，他们就充分肯定，热情鼓励；当我存在问题时，他们总是耐心地、诚恳地帮助我纠正缺点，继续前进。我深深感到，我能够从一个资本家变成公私合营企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这是党的教育的结果。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二次大转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十年内乱中，我被下放劳动，遭到批判、斗争。我深信总有一天乌云会消失，共产党的统战政策会回来。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并制订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我又一次获得解放。尽管我已年过古稀，但似乎年轻了许多。共产党明确宣布，我们已是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国家的主人翁。这样天翻地覆的大变化，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第三次大转折。通过这次大转折，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重新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前进了。

30多年来，从切身经历的三次大转折中，我深深认识到，我们民族资本家之所以能够接受和平改造，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国家的主人翁，是因为有了党的统一战线

这个伟大的法宝。现在我的7个子女、5个媳妇，个个都有工作，大多数都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的还担任了基层领导职务，有的是工程师和助理工程师。现在我担任省工商联副主委、市工商联主委、省政协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些荣誉都来自共产党的正确指引和领导，也和全国工商联的教育、鼓励分不开。党恩似海，这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1983年

# 我怎样从一个剥削者改造 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庄启发\*

## 童年的梦想

我1920年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一个商贩家庭里，父亲做鲜鱼行贩。我上小学时，每逢寒假、暑假就帮助父亲做记账称鱼等工作，知道了一些做生意赚钱的门槛。我们家乡到外地做生意的人多，不少人当了大老板。他们用赚来的钱在家乡买田、盖房，也拿出点来做些救济穷人和修桥铺路的事，赢得了好名。他们有钱就有势，到处受人尊敬，到处受人捧场，真是神气活现，出足风头，这些都使我十分羡慕。我暗暗下定决心，将来要学他们赚大钱，为祖先争气，光耀门庭。

## 发家致富三步曲

（一）当学徒 我父亲做生意本钱微薄，空壳场面，没有底子。白胞姐出嫁，胞兄结婚花了些钱，家里负债累累，一天一天衰落下来。我13岁高小毕业那年，经亲朋介绍到上海祥生汽车公司当学徒。

（二）奋斗 1937年抗战军兴，祥生公司内迁，我被分派到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祥兴公司修理厂任材料员、机务员。镇南关当时疟疾流行，日本飞机又天天来轰炸，有的同事很害怕，

\* 庄启发，曾任昆明启华汽车材料行经理。现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云南省委社会部主任委员。

就离职回上海去了。我坚持工作岗位，不久，我也得了疟疾，厂里把我送到河内法国人办的医院治疗。当时法国人不把中国人当人，不给病床，在走廊过道上铺上一条席子就算是病床，稍有好转，就强迫出院。我的病还是回镇南关一面工作一面继续吃药才治好的。后来我调到贵阳祥兴公司管材料。由于运货汽车受到敌机多次轰炸，该公司亏损很大，宣告结束。我因在贵阳管料时仓库丢失了两副钢板，被开除。我举目无亲，痛苦万分。

后来，经同事介绍在华夏汽车材料行当营业员。由于我业务熟悉，努力工作，很得老板信任。老板赚了钱，我也每年分得红利，加上自己的省吃俭用，逐渐有点积蓄。这成为我发家致富的基础。我和别人合开了一间小小的汽车材料店，生意很好。当时大西南是抗战后方，汽车材料是急用热门货。我一面在贵阳做掮客买卖，一面押运货物到昆明推销，果然利润很高，开始发起国难财。

但是我也受到过几次打击：一次在贵阳向一粤商买进雪佛兰厂铁盒活塞环一批，等我把货运到昆明开箱一看，盒内装的却全是假货铁圈圈，上了大当。我回到贵阳遍找这个粤商，但该人早已不知去向。我损失了一半本钱。又一次，我从贵阳邮寄一批汽车材料到昆明，被邮电检查所的特务借故扣压，后经多方挽请朋友说情，送了相当多的钱，才把原货提出来，可这时市场货多跌价，吃亏不小。这两件事对我打击很大，使我进一步尝到了旧社会人吃人的苦头。

1944年10月，我与好友郭华在昆明合伙开设了经营汽车材料的启华贸易行。由于我们年轻气大，又是多年内行，生意做得很灵活，开店半年就赚了不少钱。这时郭华因事需要返回贵阳，按股金比例分伙退出，以后就是我独资经营了。

（三）大发胜利财 不久，抗战胜利了，在爆竹和欢呼声后面，随之而来的是物价大跌。当时，昆明许多同业，有的要回上海，有的要回香港，不惜把存货拉到一低再低的价格求售，我乘

机尽自己所有，并想方设法借了钱来大肆贱价收买。现款不足，订为分期付款，滞销的货则作为代销。这些同业们要脱手的货，绝大部分都卖给了我。由于反动政府滥发钞票，这次物价暴跌犹如昙花一现，不过几个月，物价就直线上升。我低价买进的货，都高价卖出，暴利数倍。可以说我在前一阶段发了国难财，而这时又大发了胜利财。接着我到香港直接进货，进的都是昆明急需的热门货，纯利起码在50%乃至100%以上。脱销快，资金周转率高，真是一本万利。这时我兴高采烈，集中一切精力、财力，大显身手，生意做得特别兴旺发达。总起来可以这样说：资金越来越厚，名气越来越响，信用越来越好，脑筋越来越灵，办法越来越多，雄心越来越大。就这样，解放前我所经营的启华贸易行，已拥有将近二三千两黄金的资金了。

### 面临解放顾虑彷徨

事物的发展，总不是十全十美的。我当上了大老板，也招来了许多苦恼：首先是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各种摊派；其次是保甲长来抽壮丁，东躲西躲还得出钱；三是伤兵来讹诈硬要，不给钱不走。我被国民党军官和同业恶霸打了耳光，还要陪礼道歉，真是打落牙齿往肚里咽。

全国临近解放，有朋友劝我转移到香港去，并说：“要注意人怕出名猪怕壮啊！”我考虑后，觉得在国内做生意虽然受气，但却可以大笔大笔地赚来钞票。眼前昆明汽车材料这样缺货，正是自己进一步发大财的好机会，实在舍不得离开。不过如果昆明真的解放了，我又害怕共产党。经过多方考虑，我认为昆明一时还不会解放，莫如赶快到香港搞一批货回来先捞一把再说。同时，也可在香港探听一下上海解放后的情况。于是1949年9月我乘飞机到了香港。到港后听说，共产党的政策是保护工商业的，并不是国民党宣传的什么没收共产。于是我感到思想上轻松了。发财的欲望鼓舞着我积极采办了半架飞机吨位的汽车材料赶回昆明。回

冬后，我很快就卖完了这批货，纯利都在1倍以上，于是我决定暂时不走了。但也作了自己认为必要的准备和打算：除留下足够周转的资金外，把多余资金换成黄金、美钞、港币、缅币、印币等，隐藏起来，以防万一，还写信给香港同业，准备必要时与人合伙在港开设汽车材料行，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说实在的，我当时既恨国民党，又想依靠国民党，既想靠拢革命，又害怕革命。

### 共产党的教育和我接受改造的过程

1949年12月，云南省宣布和平起义。当解放大军抵达昆明时，我站在工商界的队列里热烈欢迎和慰问大军。接着参加了工商行业的学习，懂得五星红旗中的四颗小星中，就有一颗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懂得共产党是根据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把我们当作团结的对象；知道从中央到省、市的人民政府，都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担任重要职务。看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也感到自豪和光荣。我对共产党员干部的艰苦朴素作风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更是敬佩。

不久，全国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工商界掀起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潮。共产党的宣传教育激发了我的爱国热忱。我捐献了一门大炮，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表扬。1951年重估财产，经过几天剧烈的思想斗争，我将隐藏下来的黄金700多两、美钞4000多元、大头银元200多元，还有港币、缅币、印币以及半开银元好几千元都作为账外财产报了出来，折合人民币7万多元，投入企业作为追加资金。这一行动又得到共产党和政府的表扬和鼓励。我内心确实感动，同时也受到良心责备，不该在申报时还留下20两黄金和200元美钞。于是，在典型发言大会上我又补报了这20两黄金和200元美钞，并投入了企业，这才觉得心安。政府宣布账外财产投入企业仍是自己资金，这件事也使我认识到共产党讲话是算数的，政策是兑现的。

1952年“五反”运动到来，我被当作“大老虎”斗争，产生抵触



情绪，思想上陷入混乱。我一会儿埋怨自己不该暴露那些账外财产，成为大户目标；一会儿又后悔，自己为什么甘愿留在国内而不去香港；一会儿又埋怨自己，过去虽然赚了大钱，但没有享过福，解放太快了……如此等等。时而紧张，时而苦闷，最后才归到一点上，自信没有多大“五毒”行为，反正已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别无选择，只有听天由命吧。

运动过后，共产党并没有没收财产，而是通过斗争处理违法行为，教育工商业者守法。我被定为严重违法户，补退49000多元，其中暴利就占33000多元，其余是偷漏税收等。对于暴利，自己心中有数，确是事实，只不过以前没有认识到它的危害性。现在接受了教育，才认识到：只能取合法利润，不能搞暴利。至于纳税是每个正当商人对国家应尽的义务，搞偷税自然是危害国民经济的。有了这些认识，自己心服口服，感到定我为严重违法户，也没有给我什么刑事处分，这样处理是教育我今后一定要严格守法，一点也不过分，我积极交款完成了补退任务。“五反”运动的深刻教育，使我树立了服从人民政府管理，服从国营经济领导，服从工人阶级监督的信念。之后，银行主动给我贷款，我积极经营，生意做得很活跃，职工由2人增加到7人。

1953年1月，我参加了民主建国会组织。我一向认为我的资金是自己的辛苦赚来的。学习中，经过多次反复的讨论，相互提问，相互帮助，和自己的反复思考，才逐步明确剥削可耻、劳动光荣的观点，认识到新兴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取代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工商业者只有听共产党的话，真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

由于有了上面这些初步认识，当共产党提出“一化三改”的总路线时，经过学习，我就比较能深入地去体会和理解它的正确性。为了实现企业改造，我曾作了一些改善经营管理和加速资金流转的努力。1954年国家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我先计划认购5万元，后增为8万元，再增为10万元。1955年发行的公债，我又认

购了5万元。

1956年初，全国工商界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掀起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我也欢欣鼓舞地毫无保留地投入公私合营行列。经核定，我的资金为139000元。使我喜出望外的是，上级安排我为市五金公司经理，这是共产党给我的特殊而光荣的待遇啊！共产党采取赎买政策，对私股发给定息。我认为定息在实质上仍然是不劳而获的剥削所得，就写信给市委和市人委要求批准我放弃定息。市委、市人委肯定了我的积极行动，但不同意放弃，并鼓励我在工商界中继续发挥带头和桥梁作用。这使我更加感奋。我除了努力本职工作外，并把每季所领定息只留下零头自用，整数全部投入合营企业。我先后投入了27000元，我的资金增为16万多元。有的同志捐款筹办民办东风中学，我也捐了人民币2万元。

解放后，我经历了多次运动。可以说，每经过一次运动就得到一次提高，并加强一次对共产党的认识。尤其令我感动的是，我的一点点的进步表现，党和人民都给以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并在政治上给以极大关怀。我先后被选为市人民代表、市人民委员、民建市委委员、省民建委员、市工商联委员、省青联委员及投资公司常务董事、东风中学常务校董等职。这是党和人民给我的崇高荣誉和充分信任，也是鞭策我向前进步的巨大动力！

### 瓜熟蒂落 水到渠成

1976年，中共中央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党心、军心、民心、人心大快，工商界获得第二次政治解放。随着共产党对工商业者各项政策的落实和拨乱反正措施的执行，工商界的思想疑虑澄清了，大家热火朝天地为夺回“四人帮”造成的损失而努力工作。我在营业员的工作岗位上，连续三年都超额完成销售指标，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当接到安排我为本省五届人大代表的通知时，回想所受“四人帮”的迫害，不禁流下了热泪。1979年邓小平主席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代表共产党宣布，我国

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剥削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一天，终于盼来了！不少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周总理讲过：“阶级消灭，个人愉快”，这一理想已成为现实！

我要珍惜以往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宝贵经验，在党的领导下，戒骄戒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把有生之年的精力，一技之长，一得之见，无保留地贡献给四化建设。

1985年

## 为振兴中华贡献我们的聪明才智

郭 棣 活\*

上海解放前夕，我是上海永安纺织公司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我对共产党的政策很不了解，许多亲朋好友不断劝我离开上海，到海外去定居。正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上海解放了，共产党及时向我伸出温暖的手。在一次会议上，当时上海市长陈毅特地走到我跟前，和我握手说：“我们了解你，有人劝你离开上海，而你不去，你做得很对。”陈毅几句亲切的话，对我鼓励很大。以后，我在陈毅、潘汉年等共产党员的教育帮助下，逐步提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30多年来，我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以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精神，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对祖国每一个建设成就，我都从心里感到高兴。

现在，我们的伟大祖国正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这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原工商业者决不落伍。正如有的同志说：“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我们一定要和全国人民一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下定决心，发挥专长，奋斗不息，贡献力量，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做到有知识出知识，有经验出经验，有技术出技术。在工作中，要把国家关于现代化建设的方针、政策与实际相结合起来，多动脑筋，多作调查研究，

---

\* 郭棣活，曾任上海永安纺织公司副总经理。建国后曾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民建广东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工商联主任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侨联副主席、省侨联名誉主席，暨南大学副董事长。1986年逝世。

积极探索新问题，大胆创造新办法，经常向企业提出合理化建议，为提高经济效益，主动地积极地搞好经济咨询服务工作。

我们老年人，虽然不能卷起袖子和青壮年一样，站在第一线上大干，但是，我们可以动口讲。其一，可以围绕经济咨询服务项目，介绍自己办工商企业的经验，传授专业知识和技术专长；对一些经济业务和经济政策，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意见和办法。其二，可以以自己亲身经历的新旧两个不同社会的体会，向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出力。其三，有的还可以利用海外关系，采取各种形式，做好对外宣传和联络工作。1979年，我去美国探亲，见到了许多亲戚朋友，我向他们详细介绍了祖国真实情况，使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打消了许多不必要的思想顾虑。近几年来，他们纷纷回到祖国，探亲访友，旅游观光，有的还捐款捐物，支援家乡建设，有的还与我方合作，兴办企业。

在为四化服务献计、献策、动脑、动口的同时，有的同志还要动笔，写点文史资料，认真总结自己在旧社会兴办私营工商企业的经验体会，搞点企业发展史或回忆录之类的东西。有专门技术的能人，还可以著书立说，把自己专有的技术才能毫不保留地奉献给人民。有的也可以写解放后在接受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改造的体会，写参与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经验，以及写为改善企业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意见书等等。总之，我们一定要以国家主人翁的高度责任感，在有生之年，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贡献我们的全部聪明才智。

1983年

## 走在宽广的社会主义大道上

卢燕南\*

30多年前，广西的私营工商业者和全国各地的私营工商业者一样，敲锣打鼓，拥护和接受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走上了社会主义大道。

在这过程中，有几件事令我难于忘怀。第一件事，是1955年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前夕，我幸福地在北京怀仁堂亲耳聆听毛泽东主席接见民建、工商联中央和部分省市负责人时的亲切教导。毛主席说，广大工商业者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他向我们阐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希望我们认清形势，掌握自己的命运，走社会主义道路。会后，我赶回广西向工商界人士传达了党和毛主席的教导。在全国形势的推动下，全区迅速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但是，在刚实行合营时，许多原工商业者的思想认识还是跟不上发展的形势，对合营后的清产核资和人员安排问题，还存在不少疑虑。但实际结果却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定息问题原来大家是“坐三望四”，结果政府定为5厘，清产核资中也从宽折价，对原在职人员都作了“量才录用，适当照顾”，给予十分妥善的安排，许多人当了门市部正副主任、经理、厂长，有的担任各级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和地方的行政领导职务。这些事实提高了工商界人士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走上社会主义大道以后，我终生难忘

---

\* 卢燕南，曾任桂林市商会理事长，桂林市土产行经理。现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顾问，广西壮族自治区民建、工商联主任委员，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的第二件事，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党宣布资本家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存在，原工商业者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1979年上半年，全国政协开会，邓小平主席在会议的开幕讲话中说：

“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到国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十三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讲话亲切，与会的两会成员心情激动，欢欣鼓舞，互相祝酒庆贺，并纷纷给单位、家人电传喜讯。此时我心情特别舒畅，因为公私合营后虽然走上了社会主义大道，但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心情总是欢畅不起来。如今我们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资本家阶级的帽子摘掉了，心头如释重负，我怎能不喜从心来呢？我们更加感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我因病在北京住了几天医院，病稍愈就出院赶回南宁，把梦寐以求的大好喜讯及时向两会的广大成员传达。通过学习和讨论，广大成员更感到社会主义无限美好，也看到了自己的光明前途，激发了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热忱，更加坚定地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勇往前进。

从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到“四化”建设的新历史时期，经过整整30年的实践，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必然的客观规律，也更加坚定地走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在新历史时期中，我决心继续推动全区两会组织和带动广大两会成员，和全国人民一道，在党的领导下，为四化建设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1986年

# 新旧对比，社会主义就是好

林杏雨\*

## (一)

1949年，漳州解放前夕，满城风雨，谣言百出。工商界人士中，有的跑台湾；有的往香港；有的则先避在厦门、鼓浪屿，以便风头不妙时可搭外轮另寻出路。对此情景，我也疑虑不安。但回忆1932年4月20日，毛主席率工农红军攻克漳州时，对工商企业包括汽车运输公司、电厂（这些企业与我有关）和电话公司等，都秋毫无犯。打土豪打错了华侨，还要赔礼道歉。红军在进漳路上，吃了农民的香蕉、甘蔗等，统统照价付钱。因而促使我决心留下来，认定“跑”不是上策。

漳州解放翌日（1949年9月20日），我接到漳州军管会通知，叫我办汽车支前。我是漳浮（漳州——浮宫）长途汽车运输公司的经理，暗自思忖，这不是好差事。过去国民党叫办军差，商人都得吃亏，我起先以为“支前”和“办军差”差不多，不料事实证明不是一回事。支前是人民的光荣任务，而且解放军切实做到调用多少车辆发给多少钱，照章办事，不折不扣。当时驻在我们公司和驻在漳州电厂（我是该厂常务董事）的军代表先后告诉我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布告，保护民族工商业，保护全市人民的生命财产。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和实际措施击破了种种谣言，终于使我消除疑虑，安下心来。

\* 林杏雨，曾任漳浮长途汽车运输公司经理，漳州电厂常务董事。中国民主建国会漳州市委会顾问。



接着，成立了漳州公私汽车联营处，因为这个行业与支前有关，所以由军代表当经理，我当副经理，负责统一调度全市公私汽车的军运民输。从此，我开始学做社会主义工作，这是我跟共产党走的第一步。

1950年4月，漳州市成立了工商联筹委会，就在电厂办公，我当副主任委员。通过学习，我进一步认识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并且逐步学会协助共产党和政府宣传这些方针政策。例如，解放前，漳州各个私营汽车运输公司，都各自把持一条路线，各自自行车营业。这种情况，在解放以后当然不利于国家的运输计划，因而政府决定对汽车运输业实行“三统管理”，即统一货源，统一调度，统一运价。我感到这完全必要，促使我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二)

下面我想谈谈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几件事。

解放前，漳州电厂供电范围仅局限于市区照明用电，工业用电很少，农业用电几乎等于零。电厂资金有限，也无力发展。解放后，通过企业改造，政府对新电厂进行了大量投资，更新设备，利用南靖和华安两个水力发电站，供应漳州、龙海、平和、长泰、华安、南靖、漳浦等6县1市的用电，遍及工业和农业，发电量比解放前几乎增加了1000倍。

解放前，漳州私营汽车运输业有漳浮、漳嵩、漳龙和龙诏4家长途汽车公司，行车路线以漳州为起点，通达南靖、龙海、龙岩、厦门、海澄、诏安、漳浦、长泰等地方，总长394公里，共有汽车144辆，多购自美国。营业以客运为主，每天乘客约1000人次。解放后，同样以漳州为起点，行车路线有很大发展，每天客运多达25000人次，货运量每天约15000吨。汽车有4000辆，多是国产。现在形成的公路网四通八达，可以从漳州到达北京或广东深圳转往香港。省内货运更是畅通无阻。

### (三)

解放前，所有汽车公司和发电厂的机器、汽车、轮胎、汽油、油渣和大小配件，小至螺丝钉，几乎没有一件不是靠进口来的。国家在政治上又四分五裂，各路军阀割据一方，更不用说帝国主义的侵略了。虽然有些爱国人士大声疾呼，鼓吹实业救国，然而在那种腐朽的社会制度下，要靠实业救国，谈何容易！

新中国建立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亲眼看到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现在石油能自给，还能出口。我们自己不但会生产大小汽车，而且还会制造远洋轮船。前年，我女儿自马来西亚回国观光，她从国外带回来的不是洋货，而是我们祖国出产的优质缝纫机和脚踏车。我的儿子援外经过巴黎时住在中国大使馆招待所。他们一伙三人往郊区邇达，法国人看到是中国人就翘起大拇指。解放后，在海外的华侨已不再是“海外孤儿”了。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过去，我们被污蔑为“东亚病夫”，今天我们已经成了“东方巨人”。

### (四)

我是84岁的老人，现在还能每天读书或看报，也能写文件，作报告。这篇稿子就是我亲手写的。我在学生时代，经常患胃病，多次出血，现在是老而益壮，很少患病。我一贯安步当车，不持拐杖，天天还能够工作，这就是社会主义给我带来的幸福。我常对市两会的老年人说，为了保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们要讲究保健常识和常做健身锻炼，把自己的长寿幸福与祖国的美好远景融合在一起，争取多活几十年。我们经历过旧社会黑暗灾难的岁月，今天看到祖国如此繁荣昌盛和美好的远景，每个人都有了自豪感。我们热爱今天，也向往更加美好的明天。愿我们永葆青春，以期对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

以上是我从新旧对比中由感而发的。总括一句话：社会主义

就是好！

1983年



# 大 事 记

1949—1980

---

《大事记》由寿墨卿同志撰写并五次修订。冯和法同志参加了一、二两稿的审订工作，郑鸿同志参加了稿件的整理工作。

## 1949年

**1月31日** 北平和平解放。

**3月5日** 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又指出：“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3月15日** 华北人民政府公布《华北区对外贸易管理暂行办法》。

**4月24日** 刘少奇副主席在《对天津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在生产上、经济上，资本家比我们清楚，发展生产应首先与资本家合作，资本家在生产方面占有很高的地位。”

**4月25日** 刘少奇在天津工商业家座谈会上说：“政府的方针，是要使国营私营互相合作配合，减少竞争。政府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这就是公私兼顾。”“采取这样的方针，就是从原料到市场，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私营企业的活动范围很大，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又说：“到了社会主义，剥削制度就会取消。”

**4月27日** 华北人民政府公布《华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及《华北区私营银钱业管理暂行办法》。

**4月28日** 刘少奇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

们不让资本家剥削是容易的事。……可以随时随地将资本家剥削废除掉，但是却不能这样做。”因为立即“把资产阶级消灭，这样工厂减少了，生产降低，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

**5月19日** 刘少奇在北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私营企业“是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生产力。这个生产力是很重要的，今天没有他们还不行。”我们“今天是保留资产阶级，不是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立即消灭资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的路线”。

**6月10日** 上海军管会下令搜查证券交易所大楼内的金银投机大本营，将操纵市场、破坏金融的首要分子逮捕法办；同日公布《华东金银和外币管理办法》，禁止金银、外币自由流通，私相买卖，或以金银、外币计价，并自即日起由国家银行挂牌收兑。

**6月15日**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处在北平成立。

毛主席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向全国人民提议召开的。这个提议，迅速地得到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响应。”又说“……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和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广大，它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6月30日** 毛泽东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对于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又说：“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



**7月15日** 上海工商界人士陈叔通、盛丕华、笈延芳、胡厥文、郭棣活、荣毅仁、盛康年、严谔声等组织上海工商界慰劳总会，推动劳军运动。

**8月3日** 陈毅市长在上海各界代表会议上说，我们忠实地执行了公私兼顾和保护一切正当工商业的政策，用民主协商方式处理劳资纠纷。

**8月9日** 叶剑英市长在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说：我们遵照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

**8月26日**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会议选出常务委员23人，由盛丕华任主委，胡厥文、卢绪章、荣毅仁任副主委。

**9月5日** 上海市军管会颁布《关于私营企业劳资争议调处程序暂行办法》和《关于复业复工纠纷处理暂行办法》。

**9月21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毛主席在开幕词中指出：这次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纲领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10月1日** 毛主席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1月22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批准全国工会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关于私营工商企业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的暂行办法》、《劳资争议解决程序的暂行规定》等三

个文件。

## 1950年

**1月5日** 中财委发布《关于外棉免税进口的决定》。

**1月19日** 中央轻工业部召开第一次全国纸张会议，确定了1950年全国公私纸厂生产计划。

**1月20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全国盐务工作的决定》。在生产方面，采取公私兼顾，按销定产；运销方面，吸收私资扩大运销；税收方面，采取提高税额与税不重征的方针。

**1月31日** 政务院颁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工商业税暂行条例》、《货物税暂行条例》。

**2月21日** 中央贸易部发布《关于出口货物统购统销的决定》，规定钨、锑、锡金属矿砂和大豆、猪鬃、油料、油类等出口货物的管理办法。

**3月3日** 政务院举行第22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决定的基本精神是：节约支出，增加收入，缩小赤字，统一管理。决定的基本内容是：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

**3月14日** 中央财政部分布《关于实行统一盐税税额办法的决定》。

**3月16日** 中央财政部分布《摊贩营业牌照税稽征办法》，规定凡资本额满20万元者，应领取营业牌照，照章纳税。

**3月20日** 中央劳动部于3月7日至20日召开全国劳动局长会议，决定在私营企业中由劳资双方签订集体合同、劳动契约和集体协议，并设立劳资协商会议，建立新的劳资关系。

**3月24日** 政务院举行第25次政务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统一管理1950年财政收支的决定》、《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

把持制度暂行处理办法》、《关于改变粮食加工标准增加食用粮食的决定》。

**4月13日** 中财委主任陈云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关于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的报告》中指出：“在战争还未完全结束的时候，国家财政收支已接近平衡”，金融物价将由长期的波动走向稳定。他还指出：“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予以调整，使‘公私兼顾’的原则在实际政策和具体办法上表现出来”。此外，还提到继续改进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关系问题，并准备在今后几个月内召开若干必要的会议，拟订若干必要的法令，将重心放在调整工商业方面。

**4月中旬** 《新华月报》报道：自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实行以后，全国物价和金融市场呈现了普遍稳定的新局面。在商品市场上，表现为：批发交易大大减少，市场出现了供过于求的情况；投机商人力求脱售囤货，粮食、纱布价格普遍下降。在金融市场上表现为：银行存款增加，银根松动，利息降低。报道说，过去投机商人不惜高息借款从事囤积，一个多月以来，他们有的已经因为这种高息而破产，有的日益接近于破产的边缘。

**4月29日** 刘少奇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召开的庆祝“五·一”劳动节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就调整工商业公私关系问题，统一分配加工定货问题，有关私营企业的转业和私人资本的出路问题，对国计民生有益、但发生了困难的私营工业如何渡过困难问题等，提出了政策方针和具体办法。

**5月8日** 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为调整全国公私经济关系，从8日起召开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会议根据五种经济统筹兼顾的精神，适当地解决了许多有关公私经济的具体问题。

**5月29日** 第二次全国税务会议在北京召开。与会的各地税务工作人员和工商界代表，根据财政经济的新形势，对现行税法、税目、税率以及稽征方法等加以适当调整与修改。

**5月** 上海、北京、天津和中南区各国营经济采用加工、订

货、收购、包销、贷款等办法，协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克服当前的暂时困难。

**6月5日** 中央贸易部召开全国物价会议，决定地区差价应照顾到生产者、贩运者和消费者三方面的利益。

• 中央贸易部发出《关于调整零售价格的通令》，使私营零售商能获得合理的利润。

**6月6日** 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指出：“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份，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毛主席又说：“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

**6月12日** 中央贸易部召开公、私营盐业代表共同参加的盐业运销会议，讨论了食盐价格、销售利润、公私分工等问题。

**6月15日** 陈云主任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经济形势、调整工商业和调整税收诸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了目前工商业发生困难的情况，提出了关于调整工商业和税收的办法。陈云说：“为了调整公私企业关系，随时协商有关问题，公营和私营工商业以合组同业公会和工商业联合会为适宜。”陈云还要求各地工商联和同业公会协助有关方面做好加工订货和税收工作。

**6月17日** 中央劳动部制定《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组织及工作规划》。

**6月20日** 中央贸易部公布《食盐运销商暂行管理规划》，规定区内与区际贩运商，均须向产区盐业公司申请登记，经核准

后，始能办理运销。对商盐售价也作了规定。

**6月27日** 中央食品工业部召开全国油脂工业会议，对私营油脂工业的产销计划，加工成本、费用及加工任务分配等方面作了调整。

**6月29日** 中财委发出《关于调整税收实行日期的通知》，规定自本年7月1日起在全国一致执行。

**6月30日** 中央贸易部自6月22日起召开的各大行政区贸易部长会议决定：调整国营零售商店及其经营品种，国家只经营主要土产和大部出口品，让出广大土产市场给私商经营。

• 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在政务院第39次政务会议上作《上海市工作报告》。报告说，从5月份调整公私工商业关系以来，必要的正当的私营工商业已经完成初步维持和改造的任务。报告还提到工商业登记和健全同业公会的工作。报告说，上海有一万几千家工厂和10万以上的商户。过去有310多个同业公会，现已整顿和健全了近200个，并成立了工商联筹备会。在工商联的领导下，这些同业公会对推销公债和评议税负起了很好的作用。

• 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其中第二章第四条规定：“保护工商业，不得侵犯。”

**7月11日** 中央贸易部召开全国粮食加工会议，根据“公私兼顾”“以销定产”的原则，拟订产销平衡计划和成本核算。

**7月13日** 中央贸易部召开全国进出口贸易会议，划分了公私经营范围和委托私商代购代销办法，并在自愿原则下把进出口商组织起来。

**7月15日** 中财委发布《关于私营企业股东有限责任问题的指示》。

• 中央轻工业部召开全国橡胶会议。会议认为，私营工厂应采用联购、联制、联销办法，降低成本，打开销路。公营工厂应向生产资料方面发展，以照顾私营。

**7月28日** 中央食品工业部召开全国卷烟工业会议。会议规

定，今后一律停止批准新设工厂和手工作坊。大会建议成立全国性卷烟工业管理机构，统一掌握政策，制定计划。在价格上采取逐级保护措施，规定制造厂、批发商、推销商利润分别为纯益5%、2%和1%，零售商利润为毛利10%。

• 政务院举行第43次政务会议，通过《商标注册暂行条例》。

**7月31日** 西南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刘岱峰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关于西南财经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3月以后，全国物价日趋平稳，销路停滞，更加公债、税收影响，工商界曾一度非常消沉。5月以后，公路和铁路建设相继开工，国营私营开始接到订货；又以剿匪奏效，打开城乡交流渠道，生产情况才见好转。最近调整公私关系，获得初步成绩，多数工商界思想顾虑业已消除。但农村大量副业生产，仍无人问津。应鼓励私商下乡收购，由政府及国管机构加以扶助和支持。私营工业普遍存在冗员多、待遇高、浪费大、成本高、管理不善等现象，应在劳资协商的基础上进行改革。

**7月** 据《新华月报》报道：全国范围内的工商业调整工作开始后，各地私营工商业的情况即开始好转。

**8月1日** 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了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调整了公私关系。

**8月4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其中规定，地主、富农兼工商业者的工商业及与工商业相连的厂屋、店铺、住房、财产等不没收。

**8月15日** 中央轻工业部召开全国公私营制药工业会议。会议认为公私药厂应分工合作，交流技术，并加强中国医药公司机构，负起调剂公私药厂产品推销和平稳价格等工作。

**8月28日** 中央贸易部和燃料工业部召开全国公私营煤炭产销会议。会议决定有关煤炭运销方针和产销利润原则，并组织动员城市中过多煤商下乡。

**9月2日** 中央贸易部发布《关于公私联合购棉及棉花市场

管理的指示》。指示说，为使产销平衡，除对公私纱厂按开工锭数、时间、产量，规定用棉数量外，必须大力推行公私联购，有计划、有组织地调配原棉，防止盲目争购，棉价涨跌不定等现象。

**9月22日** 在政务院第51次政务会议上，纺织工业部提出了有关专业会议的综合报告。报告说，为了合理调整工商业，从3月至8月，先后召开了纺织、毛麻、机物料、复制印染和棉花等五种全国性专业会议。会议确定了生产方针和计划，解决了公私关系以及贷款、市场、税收、同业公会等问题，并就改进经营管理方面制定了各种标准。

**9月25日** 出版总署于9月10日至25日召开出版会议，对公私出版、发行、期刊、印刷业的调整分工作出决定，要求有步骤地进行专业化，并在发行方面逐渐做到合并联营。

**9月** 据《新华月报》报道，中国土产公司为解决农民土产品销路，保证城市供应，全国从5月份起，积极开展购销工作，并根据公私兼顾、分工合作的原则，以联购联销，委托代购，或由国营经济与私商合组土产购销委员会和以调整地区差价、由银行贷款放资金等方式，积极鼓励私商下乡收购，从而活跃了城乡贸易，收到良好的效果。

**10月1日** 陈云发表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的文章。文章着重指出：“我们是处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四个民主阶级联合专政与五种经济并存的时代，一切财政经济措施，必须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统筹兼顾，分工合作。”

**10月20日** 中财委批复中南财委《关于公私合营企业利润折旧提存意见》，同意中南财委提出的三种办法，即利润部分全部提出，公股上解，私股归私。

**11月9日** 中财委发出《对于目前棉纱管理的办法》的通知。通知指出：为了稳定棉纱市场，必须加强行政管理、严格取缔囤积居奇与投机行为，并暂时停止市面上的棉纱出售。通知又指

出：为了稳定纱价，目前应集中力量在大城市抛售，同时加强对棉纱交易所的管理。

**11月14日** 贸易部发布《严格取缔投机商业的指示》。

**11月20日** 中财委批准《公私煤矿暂行管理办法》和《公私煤矿安全生产管理要点》。

**11月25日** 中财委发出《公私医院免纳工商业税的规定》。

**11月26日** 政务院公布《关于劳动争议解决程序的规定》。

**11月29日** 中财委发布《关于1950年年终双薪或奖金问题的处理办法》。

**12月3日** 中央纺织工业部于11月22日至12月3日召开全国公私棉纺织工业会议，决定了“提高生产，改进管理，重点建设，稳步发展”的方针。会议一致拥护纱布统一购销原则，并保证1951年生产计划的完成，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出贡献。

**12月8日** 政务院公布《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实行对外贸易管制并采取保护贸易政策。

**12月15日** 中财委批准《进出口商申请营业登记办法》。

**12月19日** 政务院公布《工商业税（修正）暂行条例》、《货物税暂行条例》、《印花税暂行条例》、《屠宰税暂行条例》及《利息所得税暂行条例》。

• 政务院公布《工商业税民主评议委员会组织通则》和《税务复议委员会组织通则》，并规定：前者以税务机关、工商管理机关及工商业联合会的代表为当然委员，后者以当地财政经济委员会、税务机关、工商管理机关、地政管理机关、工商业联合会和工会的代表为当然委员。

**12月22日**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私营企业重估财产调整资本办法》。

**12月24日** 中央贸易部发布《私营工厂及进口商申请外汇暂行办法》。

**12月29日** 政务院第65次政务会议通过《私营企业暂行条



例》。

**12月30日** 中央财政部公布《进出口商报交工商业税办法》。

## 1951年

**1月4日**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公布《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并规定由当地工商局主持，工商联、总工会参加，召集国营花纱布公司及公私纱厂共同协商统购价格和代织代纺的工缴费。

• 政务院批准各大行政区财政经济委员会内设立私营企业局（后改局为处）。

**1月13日** 中南军政委员会发布《关于在土地改革期间处理城乡关系的决定》。决定指出，凡工商业较集中的城镇，或只有少数工商业的乡村集镇，皆不得进行农村式的斗争。地主兼工商业者，除反革命分子外，凡欠农民押金未退者，应依法退还，计算时不应加息滚利，一律实行折半清理。清理时应按其营业状况分别处理，不要因退押而致营业停闭，工人失业。

**1月16日** 政务院公布《特种行为消费税暂行条例》。

**1月30日** 第二届全国水产会议于20日至30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布置了生产任务，决定了渔民的组织问题、渔市场和公私营水产企业的处理问题。

**2月8日** 政务院发布《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

**2月12日** 贸易部发布《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2月26日** 政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在100人以上的公私合营、私营的工厂、矿场实行。职工在100人以下的企业，由劳资双方根据本条例原则，订立集体合同规定之。

**3月30日** 中财委发布《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施行办法》和《关于公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应进行登记的指示》。

**4月1日** 财政部公布《棉纱统销税征收办法》。

**4月4日** 卫生部报请政务院批准公布《关于调整医药卫生事业中公私关系的决定》。

**4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力推销土产》的社论。社论指出，在召开土产会议时，应广泛邀请私商代表参加。

**4月18日** 政务院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业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

**4月24日** 财政部盐务总局于4月11日至24日召开全国盐业生产会议。会议确定了国营盐场与集中民营盐场的生产方针，对于有发展条件的民营盐滩、井、灶，鼓励私人投资，并帮助他们改善经营。

**5月10日** 政务院公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暨实施条例》。

**5月28日**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农村金融会议闭幕。南汉宸行长在总结报告中指出，在推销农副特产品问题上，必须组织私商，扶助运输，办理汇兑、押汇放款等业务，推动私商把农民的产品运销出去。

**6月3日** 赴朝慰问团全体工商界代表号召全国工商界踊跃捐献飞机、大炮、坦克、汽车等武器，支援前线。

**6月11日** 中南军政委员会发布《促进城乡物资交流简化征税手续暂行办法》。

**6月15日** 重工业部从6月5日起召开公私营工厂酸、碱、染料工业会议。会议号召小型工厂组织起来，实行联合经营或合营。

**7月17日** 交通部公布《轮船业管理暂行规则》。

**8月4日** 公安部公布《无线电器材管理暂行条例》、《城市旅栈业管理暂行条例》、《公共娱乐场所管理暂行条例》、《印铸刻字业管理暂行条例》。

**8月8日** 政务院命令发布《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

**8月31日** 贸易部于8月17日至31日召开全国民族贸易会

议。

**9月1日** 财政部公布《临时商业税稽征办法》。

**9月14日** 据新华社报道，今年上半年，全国工商业继续好转，除批发商外，普遍地出现了淡季转旺的景象。

**9月19日** 财政部公布《摊贩业税稽征办法》。

**10月5日** 9月26日至10月5日，燃料工业部召开全国煤矿基本建设会议，决定加强对于地方煤矿的领导，加强对私营煤矿的监督和扶助，并帮助规模较大的私营煤矿进行恢复和改建工作。

**10月**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推定陈叔通副主席和李维汉、章乃器两委员，负责推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筹备工作。经过与出席、列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工商界代表进行座谈并与有关方面协商，商定由委员18人组成筹备处，并推定沙千里委员兼任筹备处秘书长，制定章程，报经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33次会议通过，开始筹备工作。

**10月25日** 陈云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作《关于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工商业的进一步恢复，使失业人数减少了，就业人数增加了。陈云说，为了培养技术工人，我们欢迎若干行业的私营工厂、作坊，招收学徒。

**11月14日** 贸易部颁布《行商管理暂行通则》。

• 贸易部发布《关于取缔投机商业的几项指示》。

**11月22日** 中财委公布《商品检验暂行条例》。

**11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向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的社论。

**12月8日** 中财委发布《关于1951年度公私企业旧有的年终双薪或年终奖奖金问题处理办法的指示》。

**12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中共党员自觉地积极地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从12月起，“三反”运动已在中央各机关普遍展开。

**12月25日** 北京市工商界举行大会，发动反贪污、反行贿运

动。

**12月29日** 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指示各省、市协商委员会，通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大力协助各级政府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并积极发动群众揭发奸商贿赂干部、盗取国家财富的犯罪行为。

## 1952年

**1月1日** 毛泽东主席发表《元旦祝词》，号召全体人民和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1月5日** 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上作《关于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报告。他说，民族资产阶级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还有其黑暗腐朽的一面。他们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必须加以打击和铲除。

这次会议批准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会议组织条例》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会议代表产生办法》。原定于3月5日召开的筹备代表会议，因“三反”“五反”运动正在全国开展，延期举行。

**1月9日** 周总理在中央、华北和京津两市的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指示要求全国党、政、军、民的全体工作人员，特别是工商界人士，以极严肃的态度积极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来反对资产阶级的侵蚀，来洗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

在同一个会议上，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作《为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的报告。报告特别指出：“应当在工商界中开展一个反对行

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报告要求“有上述违法行为的工商业者，应当据实向政府坦白，公开声明悔过，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的错误。”

**1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2月10日** 周恩来总理指示关于“三反”运动中对外侨外商案件的处理办法八项。

**3月8日** 政务院第127次政务会议批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彭真市长在会上作了报告。报告说，根据北京市情况，将私营工商户划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报告还就处理问题的五项基本原则作了若干说明。

**3月23日**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明确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业联合会，帮助整顿民主建国会，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于国计民生有益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发展私人工业，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营利润额，既要使私人资本有利可图，又要使私人资本无法夺取暴利。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

**3月24日** 政务院公布《关于“五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

**5月10日** 周恩来总理指示：1.关于监督生产问题，目前还在试点的初期，在取得经验全面推广之前，决不宜先在外商厂店中推行，尤其不可选择外商厂店作为试点的对象；2.关于劳资关系问题，应与监督生产问题区别开来，分别处理，以通过劳资协商会议订立合同为主。

**5月11日** 中央批转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上海计算违法工商户“五毒”行为的办法》，转发各地参照执行。

**6月13日** 政务院公布《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指示》。指示就“‘五反’运动定案处理的原则”、“关于核实定案工作”、“关于退财补税”、“关于‘三反’退赃与‘五反’定案工作相配合的问题”作了规定。

**6月15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胜利地结束“五反”运动》的社论。社论说明了“五反”运动所具有的极其伟大的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意义，说明了运动的目的绝不是要使私营工商业垮台，而是要清除不法工商户的“五毒”，以便于使私人资本的积极性用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社论要求各地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指示”，使一次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获得圆满的结果。

**6月20日** 全国工商联筹备代表会议于6月20日至30日在北京举行。

陈叔通在开幕词中指出，“五反”运动，对工商业者来说，是一次“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伟大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他提出了四点意见：首先，工商界必须服从工人阶级、国营经济和国家计划的领导，老老实实地遵照《共同纲领》办事，不再重犯“五毒”；其次，应该消除思想顾虑，正确地发扬工商业者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第三，应该加强学习，加强自我教育与思想改造；第四，必须加强团结互助，使工商业联合会成为以贯彻共同纲领、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为目的的人民团体。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主任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他说，“三反”、“五反”运动以后，“需要在新的基础上来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并就如何保障私营工商业的合理利润，规定加工订货规格，畅通城乡内外交流，降低银行利息，纠正税收负担中畸轻畸重的现象，按照发展生产、劳资两利原则，调整劳资关系，以及关于防止“三害”和“五毒”等七个问题，作了重要的指示，并提出了解决办法。最后他说：“全国工商业者在以往的经济恢复工作中，已经有了贡献；在今后伟大的经济建设中，仍将担负重要的责任。”他希望全国工商业家能与政府共同努力，来完成这历史上的光荣任务。

大会作出决议，保证在代表回到各地后，做好传达工作和下列各项工作：（一）推动工商业者在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在国家总的经济计划的指导下，发挥生产与经营的积极性；（二）根据全国政协关于学习的通知，组织工商业者学习《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决反对和清除“五毒”；（三）推动、协助各地工商联和同业公会的改组工作，使大中小企业团结互助、各得其所，并照顾到少数民族和华侨工商界的利益；（四）推动工商业者厉行增产节约，积极参加各种爱国运动，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

8月1日 政务院第147次政务会议通过《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

8月26日 全国工商联发出关于在工商界开展《共同纲领》的学习的通知。

8月29日 中共中央统战部发出关于在“五反”运动以后，改组工商业联合会和同业公会的指示，就改组工作中若干根本性问题提出了七项意见。

• 中共中央批转中财委党组和中央统战部关于处理资本家代理人的意见，其主要内容如下：

1. 在私营企业中，凡代表资本家执行或决定经营方针、财产

处理、人事任免和奖励等事项者，称为资本家代理人，如经理、副经理、襄理、协理、厂长等。

2. 处理资本家代理人的方针是：要他们继续做资本家代理人，进行学习和思想改造，积极从事生产和经营，不犯“五毒”，并推动资本家积极生产投资，监督他们不再犯“五毒”。

3. 民建会、工商联等党派团体及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和其他与工商界有密切关系的会议或活动，要适当吸收有代表性的资本家代理人参加。

4. 资本家代理人虽不应享受劳保待遇，但其生老病死伤残等问题，应依据惯例或比照劳保条例与资本家协商，由资本家给以必要的保障。

**10月1日** 在建国三周年的国庆节日，全国工商联代表全国工商界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致以节日的祝贺，表示中国工商界决心在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下，遵循《共同纲领》的轨道，服从国家总的经济计划的安排，积极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为建设新中国和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

**10月20日** 全国工商联筹委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今日召开。陈叔通主委在会上讲话。他指出，在筹备代表会议后，各地人民政府迅速开展了调整工作，私营工商业出现了新的繁荣景象，工商业者得到了鼓舞，消除了思想顾虑，发挥了经营积极性。他希望各地委员继续贯彻筹备代表会议决议的精神，特别是对陈云主任提出的七个方面的问题应该继续进行研究，不断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使问题得到解决，会议于22日结束。

**11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指示说，调整公私商业的方案应该是保持目前私营商业的一般营业额，不使其下降。其目的在于避免店员过多失业，或使失业店员能够转业。指示规定了调整办法：合理调整商品价格；划分公私商业的经营范围；取消对私商不适当的限制，禁止各地交易所的独占垄断行为。



**12月10日** 中财委发出《关于私营企业中资方代理人福利费用开支的若干规定的指示》。

**12月16日** 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会于12月16日至20日举行第三次（扩大）会议，就有关修正税制与简化纳税手续各项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提供有关部门参考。

**12月20日** 中财委发出关于偷漏税收补税问题的指示，规定偷漏的税收在“五反”时业经处理者，可不再追究；但“五反”前的偷漏尚未坦白者，以及“五反”后新的偷漏，应本今后从严的精神，除补税外，应当给以处罚。对少数刁顽的，处罚并应从严，送人民法院办几个。

**12月25日** 据统计，截至本日止，全国已成立工商业联合会或筹委会1045个，其中直辖市12个、省级组织23个、中小城市116个、县级894个。

**12月27日** 中财委发出《关于私营企业与公私合营企业的产品分配与需要物资的供应问题的指示》，规定了五项具体办法。

**12月31日** 中财委公布《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自1953年1月1日起实行。同时，公布了《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和《施行细则》。

## 1953年

**1月9日** 政务院第166次会议通过关于解放前银钱业未清偿存款付给办法。

**1月30日** 全国工商联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抗美援朝的宣传活动并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的通知》。

**2月4日** 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一届四次会议，周恩来副主席在政治报告中说，“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力量和比重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工业和批发商业方面，国营经济都已处于领导的

优势地位。”有关国计民生的主要商品，基本上已由国家掌握。全国银行已由国家统一管理。“这就保证了社会生产和消费的需要，保证了全国物价和金融的稳定，保证了进出口贸易和财政收支的平衡。”

**2月26日** 中财委复中南财委关于公私合营企业盈余分配的原则，规定本年度合营企业盈余，可于缴纳所得税、提存公积后，酌发股息。公积可较私营企业酌量多提，并可提出一定数量的职工奖励和福利基金。

**2月27日** 中财委发出《关于私营企业破产清偿程序的决定》。

**2月28日** 据统计，截至本日止，全国已成立1311个工商业联合会或筹备委员会。

**2月29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月20日至29日召开第六届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刘宁一副主席和赖若愚秘书长分别作了发言和报告，肯定了工会工作的成绩，也指出了错误，主要是：在私营企业中，忽视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的阶级矛盾，片面强调劳资协商，没有采取又斗争又团结的原则，没有认真加强私营企业中的工会工作。

**3月3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应当重视手工业的指示》。主要内容如下：（一）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不可缺少的一种经济形式，必须十分重视。（二）对于手工业中存在着的劳资、雇佣和师徒三种不同的关系划分不清，处理不当，对于组织联营和合作社，采取强迫命令等等，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手工业者的生产情绪，不敢大胆雇请工人、学徒，增加资本，扩大生产，这些均应加以注意，有步骤地分别加以解决。（三）对待手工业者，也应如同对待小生产者的农民一样，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主要是靠价格政策、市场产销关系，辅以必要的可行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教育指导他们，影响他们，引导他们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不可任意制定计划，强制他们发

展或闭歇，增产或减产。一切问题，均应照顾到他们的利益，由他们自己协商，取得他们同意，照顾到主客观需要和可能条件去求解决。（四）各地供销合作社应与手工业者建立密切联系，帮助他们供应原料，推销产品。

**4月9日** 全国工商联发出《关于加强教育与学习，搞好劳资关系，制止报复打击职工等不法行为》的通知。

**6月15日** 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毛主席又说：“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支持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7月9日** 毛泽东主席在1953年夏季财经工作会议的一个文件上，阐述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并说：“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

**7月10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七届执委会主席团二次会议通过《关于巩固劳动纪律的决议》。决议要求，工会各级组织必须把巩固劳动纪律作为自己在国营企业中保证完成国家计划，在私营企业中贯彻劳资两利的经常的重大责任。

**8月3日** 中财委复江西省政府关于粮食市场的管理问题，分别就初级市场粮食贩子和大中城市零售粮商，提出了不同的管理办法。

**8月6日** 中财委发出《关于粮食市场管理的意见的指示》，分别就初级市场的粮食交易、粮种收购、代客买卖和粮食加工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管理办法。

**8月12日** 毛泽东主席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中，批评了“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

**8月26日** 中财委复浙江省财委关于公私合营批发商纳税问题的意见：公私合营批发商，除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性质特殊，可不纳批发营业税外，其余同意浙江财委意见，暂视同私营企业照纳营业税。

**9月4日** 中财委发出《关于防止私商套购国营商业畅销货抬价牟利的指示》。

**9月7日** 毛泽东主席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了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毛主席指出：（一）过去三年多，做了一些工作，现在起要多做些工作。（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三）《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的方针，现在应该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四）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五）公私合营、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定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三种形式。（六）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七）私营工商业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八）要改变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思想，也要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九）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十）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十一）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很大的进步。（十二）完成整个过渡时期，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十三）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因此可以而且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

**9月13日** 中财委复商业部关于恢复批发商征税后所拟采取措施的意见。其主要内容如下：同意商业部所拟采取的两项措施，即对于纱布，百货大批发商，特别是在大城市，采取坚决淘

汰的政策和办法，被遣散的职工，大部分经过训练后可由国营商业设法吸收；对于中小批发商，则暂时适当放松。对纱布和百货大批发商淘汰的办法，宜分别对待。纱布关系民生重大，且大部货源已为国营掌握，私营批发商职工人数少，采取较坚决的淘汰步骤问题不大；百货品种繁多，牵涉面较广泛，职工人数也较多，故宜先从关系民生较大的主要商品着手，以便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造和淘汰。

**9月14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5次会议批准陈云副总理关于财经工作的报告。陈云说，今年国营和私营工业产量都有增加，市场上出现了淡季不淡气象。他接着指出了反对投机的必要。陈叔通委员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工商界对国家经济建设是有贡献的。我愿代表工商界响应人民政府增产节约的号召，协助政府防止和杜绝工商界中某些分子的投机倒把和偷税漏税的行为，对国家经济建设贡献出更多的力量。

**9月15日** 全国工商联盛丕华副主任委员传达毛主席对上海工商界的谈话。他归纳为四点：（一）工商界过去同情革命，有的和中国共产党共同反对过三个敌人；现在国家对人民做了好事。私营企业也是为国家服务。（二）私营企业也要厉行节约，提高生产，降低成本，为国家积累资金，逐步满足人民的需要。《共同纲领》规定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私营企业只有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才能走向社会主义。（三）私营企业可以按照四马分肥的办法，分得四分之一的利润。希望私营企业到内地开设分厂。走入社会主义，需要三四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到来的时候，工商界同样有工作可做，有饭可吃，并有社会地位。（四）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按必要与可能，有步骤地进行。首先从大型厂着手，要稳定中、小型厂。工商界可能还有顾虑，要耐心地进行教育，要在领导层中先形成核心，再逐步扩大。要做到心悦诚服，稳步前进。

**9月16日** 全国工商联发出《关于端正经营作风，防止重犯

“五毒”，纠正各种不良倾向的通知》。

**9月19日** 李维汉部长对全国工商联委员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间，经过很多曲折，有过动摇。他提醒民族资产阶级要有民族的立场，就是说，要有爱国主义。他要求民族资产阶级要注意两面性的问题，要消除“五毒”，合法经营，接受国营经济领导，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李部长说，在改造过程中，工商界需要有先进的，有代表性的资本家起领导骨干作用。这主要靠工商联、民建会以及工商界领导人，有计划、有步骤地团结和教育广大工商业者，逐步树立为国家人民服务的观点，并把他们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

**9月22日** 《人民日报》报道：交通部于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1953年全国交通会议。会议指出，对私营运输业，今后必须加强领导与管理，发挥其运输能力，贯彻公私兼顾政策，积极协助其改进经营管理，在业主完全自愿的原则下，有步骤、有准备、有区别地进行公私合营。

**10月23日**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陈叔通主席作了题为《为实行国家总路线，正确地发挥私营工商业的积极作用而奋斗》的开幕词。10月27日，中财委李维汉副主任向大会作了重要报告。报告阐明了党在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精神和实质，阐明了人民政府对于私营工商业所采取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以及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逐步完成其由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各种途径。他号召工商界的先进分子爱国守法，改进生产经营，紧密地靠拢党和人民政府，成为团结和教育广大工商业者的骨干，成为引导广大工商业者为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的模范。最后，他说：“一切积极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而努力的私营工商业者，今天有合法利润可得，将来有适当的工作可做，和全国人民一道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并同样享受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幸福生活。”他着重地指出：这就是“私营工商业者的光明大道”。大会于

11月12日闭幕。

**11月23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同时发布《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

**11月25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关于学习、宣传与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指示”。指示说，在资本主义工商企业中的工会组织和职工群众，担负着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责任。

**11月27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地方交通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地方交通工作，要求改进地方国营运输企业的经营管理，整顿和改造私营运输业，加强对民间各种运输工具的领导，以充分发挥现行运输工具与设备的潜在力量。

• 交通部发布《关于航务工作的指示》，要求“加强私营轮船业的领导和管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充分利用和发挥其运输工具与设备的能力，贯彻公私兼顾政策。”“对海上与主要内河的私营轮船业，应在业主完全自愿的原则下，采取积极的、有步骤、有准备、有区别的公私合营方针。”

• 交通部发布《关于公路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交通行政及公路运输部门，应本着国营领导私营及公私兼顾原则，加强对私营汽车业的领导。对较大的私营汽车运输企业，在国家需要和其自愿的原则下，可实行公私合营。

**12月23日** 纺织工业部发表《关于目前纺织工业情况及今后工作部署的指示》，指出：“我国纺织工业中的私营部分，历史较久，比重也不小。”“今后在发展生产，保证需要这一要求下，应有计划地适当扩大加工定货的范围，指导和帮助其提高技术，改善质量，改进经营管理，适当发挥其生产积极性，根据需要与可能条件，有计划地、逐步扩大公私合营的范围，加强对私营企业的改造工作。”

**12月30日** 由于国家的正确政策、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帮助，今年私营工商业的各行各业都有可观的盈利，工商业者称之为

“满堂红”、“难忘的1953年”云云。

## 1954年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献词》：《一切为了实现国家的总路线》。社论指出，为了实现国家的总路线，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改造私营工商业，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在1954年，要进一步加强国家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导，根据需求和可能，继续扩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1月6日** 商业部从去年12月10日至今年1月6日召开全国国营商业计划会议。会议决定，1954年除继续与合作社紧密结合外，还要利用私营零售商和城乡之间的小批发商的力量。私营零售商业将有相当部分变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零售商业。国营商业在批发营业方面将继续发展，对由此而影响到的私营批发商，应指导其转向工业生产，或改向国营公司批购商品，遵照国营牌价进行城乡贩运或经营零售业务。

**1月** 中财委发出《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

**3月1日** 全国国营纺织厂厂长会议自2月15日至今日在京举行。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钱之光在会上作了《关于纺织工业目前基本情况与今后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今年应进行以下各项工作：第一，整理与巩固原有公私合营各厂，不但要改善经营管理，同时要正确处理有关公私关系上的许多问题。第二，配合当地党委与政府，根据需要，与自愿的原则，对若干私营厂进行合营。第三，加强对各行各业与各企业的调查研究，为今后扩展公私合营工作作好准备。

**3月2日** 中财委发布《关于1953年度私营企业盈余分配问题的指示》，规定按照“四马分肥”的原则分配私营企业盈余。



**3月31日** 据统计，截至1954年3月31日止，全国已成立工商业联合会或筹备委员会的地区共有1985个单位，占当时行政区划2331个单位的85.2%。

**3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五反”运动遗留问题的指示》。

**6月14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这是我国第一个宪法草案。

**6月30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财委复天津市委“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主要内容为：

1. 关于私营企业的联营、并厂问题。目前尚不能由政府公开号召私营企业联营、并厂，对于私营企业自动提出联营、并厂，要求批准的，应个别地审查批准，并提出了几点掌握的原则。

2. 属于无法偿还“五毒”赃款而业不抵债的私营企业户，在审查核定后尽可能使资本家保留一部分，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改组为公私合营。对于欠国家银行贷款已业不抵债的，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处理，尽可能地减少使用破产抵偿对公欠债的办法。

3. 关于划分私营企业中高级职员和高级技术人员的阶级成份问题。在实际政策措施上要把他们和资本家区别开来；在实际工作上，应当按照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中关于知识分子一章的规定，把他们当作一般的职员。

**7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加强对私营工商业者的爱国守法教育》的社论。

**7月25日**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联合总社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供销合作社在过渡时期应该贯彻执行的三个基本任务：（一）通过供销业务，开展城乡交流，为农业生产服务，以支援国家工业化和巩固工农联盟；（二）引导小农经济和个体手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并促进其社会主义改造；（三）扩大商品流转，领导农村市场，逐步实现对农村私商改造，逐步切断农民和城市资本主义的联系。

7月26日 中财委、中共中央统战部发出《关于扩展公私合营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情况和意见的指示》，指出：关于合营企业的利润分配，中央确定的“四马分肥”原则，目前不应变更。但对少数利润过高的企业，可以考虑适当办法对企业利润和对资本家所得加以限制。关于合营企业清产核资中对企业原有公积金和呆滞材料、呆滞资产等处理问题以及企业原有土地的估价问题，在指示中作出了规定。

7月30日 中财委发出《关于利用私营工商业国外资金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各地在私营工商业进行公私合营工作中，均应给予公股代表一个对私股方面国外资金进行调查摸底和有条件进行诱导动员的任务，并协助创造条件逐步调回，再作为私股股本，或必要时部分留归其自用。对调回的外汇资金或物资，在折价或其他方面，可予以必要的优待。

7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指示说：要对私营商业积极地稳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一面前进、一面安排和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办法，把现有的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逐步改造成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商业。

8月6日 中财委复中南财委对私营批发商资金的处理问题。主要内容为：私营批发商资金的所有权虽属于资本家，但如何使用必须受国家的监督。首先应指导其用于其他有益的事业，如不可能时，则可指导存入国家银行。

9月2日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维汉在政务院223次政务会议上作了关于《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的说明。他说：“私营企业变为公私合营以后，社会主义成份在企业内部居于领导地位，企业的经营管理不再采取资本主义方式，职工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可以大大提高，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可以得到公方直接、经常的领导和教育，可以得到职工群众的帮助和监督，因而更有利于资本家的改造。由于职工劳动热情的

提高，公私合营企业的利润一般较私营时增加，可以积累更多的资金，用来扩大生产”。最后，李副主任就《条例》中几个主要政策问题加以说明：（一）实行公私合营，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二）企业原来的实有财产，不容许分散或抽走；（三）在合营企业中，公方居于领导地位，私方要接受公方的领导，这是确定不移的；（四）对于企业原有的实职人员，应当量材使用，使他们各得其所；（五）企业的工资制度和福利设施，必须逐步进行改革，逐步向相当的国营企业看齐；（六）必须改革旧的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制度，推行社会主义的先进的经营管理制度；（七）在盈余分配方面，股东的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共可占到全年盈余总额的25%左右；（八）应当适当发挥合营企业董事会的作用。合营企业和董事会还应该担负教育和改造私股股东的责任。

政务会议听取了李维汉副主任的说明以后，通过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

**9月14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命令规定，“自1954年9月15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棉布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所有国营、合作社、公私合营和私营织布厂、印染厂和手工业生产的机纱绵布和机纱手纺纱交织棉布，一律由中国花纱布公司统购、统销，不得自行出售”。“私营棉布批发商不得继续进行棉布的批发、贩运业务，现存棉布一律由花纱布公司统购。各级人民政府对棉布批发商的从业人员，应积极辅导其转业；无法转业的，在当地人民政府领导下，由中国花纱布公司、供销合作社分别安置”。

• 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命令规定，“自1954年秋季新棉上市时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棉花的计划收购”。“私营棉花商、贩，一律不得经营籽棉、皮棉的收购和贩运业务，其从业人员在当地人民政府领导下，由中国花纱布公司、供销合作社分别安置”。

**9月15日** 毛泽东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

刘少奇副主席在会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宪法第5条指明了现阶段的四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并在第6条中规定：“国家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宪法还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第9条）；“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第10条）。宪法第10条规定：“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国家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鼓励和指导它们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国家禁止资本家的危害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的一切非法行为”。宪法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第102条）。

**9月23日** 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时报告指出，改造是一个斗争和教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改造资本主义企业，使它们最后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企业；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改造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的思想，尽可能使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起积极有益的作用。

**10月4日** 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二次（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拥护和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议的决议”。

**11月30日**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联合总社临时理事会代主任程子华在合作总社临时理事会上，做工作报告。报告第三部分谈到领导初级市场和改造私商问题时指出：“采取一面前进、一面安排和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办法，对农村私商积极地稳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除一部分必须和可能转业的以外，一般地应逐步把私营商业改造成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其中某些成员，经过改造以后，也可以吸收为合作社的职工”。

**12月31日** 据统计，截至本日止，全国各省、市、县，共已建立2005个工商联组织，占全国行政区划的86.8%。其中省级组织26个，直辖市组织3个，省、专区辖市组织161个，县级组织1815个。

## 1955年

**1月5日** 从1954年12月30日起至本日止，国务院第八办公室邀请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工商界委员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举行工商业问题座谈会。由工商界委员就私营工商业当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说明了情况和意见。

陈云副总理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说对私营工业中有困难的行业，准备根据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四种经济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政策，作出合理安排，既要有所不同，又要大体上一视同仁。对批发商、城市零售商和农村集镇商业，他分别说明了不同的调整 and 安排措施，并就私营工业盈余分配问题，作了指示。

**1月6日** 在国务院八办召开的座谈会后，民建总会和全国工商联邀集参加座谈的委员，又举行一次座谈会。在座谈中，有好几位代表反映了当地私营企业困难情况和希望早日实行公私合营的意见。

1月8日 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与地方工业部于1954年12月5日至1955年1月8日联合召开了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会议对当前私营工业困难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国家对私营工业的方针应该是：对中央国营、地方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和私营工业，以及手工业，应在保证社会主义成份稳步地增长和国营经济领导的条件下，采取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进行合理安排，既要有所不同，又要一视同仁。反对资本主义无计划的盲目发展，克服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逐步将各种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为了贯彻统筹兼顾的政策，在扩展合营的方式上，应采取个别合营和按业改造相结合的办法。

2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经过互助合作道路，改造农村小商小贩》的社论。

3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积极利用和改造农村私商》的社论。

4月12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场领导、改造私商、改进农村购销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1954年入秋以来城市私营商业营业额下降，经营困难，失业增加，不少私商亏累，情绪不安。农村私商多数无法经营，引起供销情况紧张，农民买东西排队。指示认为：掌握批发环节是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重要关键，目前要继续整顿和加强批发环节，对已经代替的批发商，应继续贯彻吸收使用的方针；对城市零售商，社会主义商业前进过多的部分，应考虑作必要的退让，使所有私营零售商能在可以维持的水平上，服务于商品流转，然后，进一步贯彻逐行业安排改造的方针，加以改造；对农村私商，除了少数商业资本家可用经销、合营等形式加以改造外，对小商小贩，应根据自愿的原则，通过各种形式加以组织，经过互助合作的道路，分担农村商品流转的任务。

4月13日 国务院今日转发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加强私营企业开业管理问题的报告》。

**4月14日** 全国工商联与民建中央于4月14日、15日及18日共同召开工商业问题座谈会。就政府采取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新措施以后私营工商业中存在的问题和意见进行了分组讨论。最后，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商业部副部长吴雪之、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许涤新分别就有关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4月19日** 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于4月16日起至19日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讨论工商联的工作问题,作出了《关于加强改进工作的决议》。决议要求各级工商业联合会,积极协助国家机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推行全业安排、按业改造的政策,把企业改造和人的改造结合起来,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决议最后指出:必须进一步加强团结私营工商业者,关心他们的业务和思想情况,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反映他们的意见,同时反对他们的非法行为。要培养更多的骨干分子,并积极帮助广大工商界进行自我教育和改造。根据决议的要求和精神,会议通过了《全国工商联1955年工作提要》。决定在1955年,要集中主要力量推动督促各级工商联,协助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安排与改造。

**5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贯彻统筹兼顾的方针,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社论。

\* 全国工商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工商联配合统计局和手工业管理局或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或供销合作社)对棉织、针织、金属制品、陶瓷、木材加工、制糖、造纸、皮革、特种手工艺等9个行业的基本情况和供产销情况进行调查,以便统筹安排。

**5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重视商业工作》的社论。社论说,首先,加强各级党委和国家行政机关对商业工作的领导。其次,国营商业部门必须担负起统一领导全国市场的责任,贯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再次,在市场管理方面,各地不分主要或次要商品,乱定规章、滥加管制,以及任意宣布统购

统销商品的混乱现象必须立即停止。最后，要进一步加强商业行政机构和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在改善经营管理方面，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加强并改进批发工作。

**5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对农村私商的批发业务必须加强》的社论。

**5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认真办好公私合营企业》的社论。社论就如何调整好公私共事关系问题提出了意见。

**6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国营商业批发工作的新任务》的社论。社论就改进今后批发工作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

**6月21日** 新华社报道：地方工业部从6月1日到17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省市工业厅局长会议。会议着重研究了地方工业如何贯彻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生产、企业管理以及组织领导等问题。

**7月5日**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报告谈到关于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步骤和方法时指出，对于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和私营工业之间，在分配生产任务、分配原料、收购产品方面，必须贯彻国家规定的统筹兼顾的方针。一方面，要优先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另一方面，又应该适当照顾私营工业在我国过渡时期的作用。根据统筹兼顾的方针，对于公私工业的生产，正在进行统一安排。国家采取逐行逐业并在原行业中全面安排的办**法**，改造私营工业。

在谈到对私营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安排改造时，报告说，对私营零售商业将逐行逐业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对批发商和零售商的从业人员将由国家录用，或作适当安排。报告要求资本家必须在国家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下，努力克服困难，服从国营经济的领导，遵守国家计划，积极整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准备条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7月13日** 新华社报道：到今年上半年止，上海已有占私营



工业产值近1/3的235个工厂，实行了公私合营；占目前私营大型工业产值90%以上的工厂，接受国家的加工订货或收购包销。全市有1/3户数的私营批发商已经或正在进行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私营零售店也有3/4改造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店。

**7月16日** 国务院于今日批转商业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改进初级市场管理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必须迅速纠正当前初级市场存在的管理过严过死的现象，加强和改进对初级市场的管理。当前初级市场行政管理的基本任务是继续稳定市场，活跃城乡交流，严格取缔投机，保证国家购销计划的完成，并通过行政管理，协助国营、合作社商业对私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报告还规定了当前初级市场行政管理的范围，对组织机构等问题也都提出了意见。

**8月9日** 新华社报道：天津全市46个主要批发行业、4600多户批发商，除一部分进出口、国药、杂货行业的批发商正在改造和1000多户经营线绳、发卡子等批发商业已加强管理外，都已大体改造完毕。全市纯商业36个行业、私营零售商11488户，已有27个行业、7000户商店分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8月10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为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告全国职工书》，要求全国私营企业中的男女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要协助政府，监督资本家接受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公私合营、加工订货、代销经销等等方式，逐步地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为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基础。

•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爱国守法是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和标志》的社论。社论说，在我国条件下，爱国守法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一致的东西。我们要爱的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就必须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遵守宪法和法律、法令、规章，就能使自己的行动获

得正确的准绳，符合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这样一贯地做下去，一步一步地循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前进，获得光明的前途。

**9月5日** 商业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复上海市第二商业局《关于私营饮食、服务业的情况及安排和改造的报告》。批复中指示：在对私营饮食和服务行业进行安排和改造时，必须明确，在大城市里，高级的饮食、服务业，除适应国际友人的需要应保留一部分外，一般都应进行内部的必要改革，改进经营管理，改善服务态度，调整价格，并合理调整分布网，适当合并、迁移一部分，淘汰一部分。至于输送一部分过剩人员到新兴工矿区的工作，应做到有组织的输送，避免坏人混入新工矿区。

**10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改善城市和工矿区的副食品供应工作》的社论。社论说，副食品经营中私营商业还占有很大比重，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应分别将经营副食品的私营商业的力量组织起来，积极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以便进一步发挥他们在市场供应工作中的作用。

**10月11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关于举行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公报说，会议着重讨论了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逐步地实现农业合作化问题。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现在农村中正在经历着一个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即将在全国到来，有些地方已经到来了”。“面临着农村合作化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党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和有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而不应该缩手缩脚”。

毛泽东主席在发言中说：“农业合作化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关系问题，即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在同一时期内基本上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农业合作化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毛主席指出：“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社会主义基础上，逐步地

巩固起来，才能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毛主席接着指出：“土地改革，使我们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同农民结成了联盟，使农民得到了土地。……这一次联盟使资产阶级第一次感到了孤立。……等到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完全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

**11月21日** 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从11月1日至21日在京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前夕，毛泽东主席邀集出席这次会议的全体执行委员，座谈关于如何更适当地进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毛主席对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途、工商界掌握自己的命运、逐步地和平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对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的赎买政策、统一战线的作用和肃清反革命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毛主席着重指出，工商业者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看清祖国前途和个人前途，掌握自己的命运。

11月1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集出席这次会议的全体委员举行了座谈，国务院陈云副总理在会上作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对推行统筹安排、全行业公私合营、设立专业公司、定息、经济改组和全面规划等问题作了说明。11月7日，国务院陈毅副总理应大会邀请，作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若干思想问题》的报告。

在会议的开幕式上，陈叔通主委作了题为《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形势，为进一步推动全国工商业者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的开幕词。陈主委指出：目前国家正采取统筹安排、经济改组、按业改造等新方式，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全国工商业者，必须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地接受改造，在伟

大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中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许多委员通过学习和讨论，把自己的企业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的情况作了回忆对比，认识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唯一光明的道路。大家一致表示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以身作则，积极接受改造。

会议通过了给毛泽东主席的致敬电和《告全国工商界书》。致敬电向毛主席保证：要尽最大的努力，使自己从一个剥削者改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伟大前途结合在一起，向着幸福美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勇前进。《告全国工商界书》指出：“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得到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亲切关怀与指导，使我们对工商界对自己的命运和前进的方向，有了更明确的认识。我们认识到，只有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主动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同全国人民一道获得光明幸福的前途”。《告全国工商界书》接着指出，“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不是采取突然的强力的剥夺的办法，而是采取逐步的和平的转变的方法，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反复的协商和宣传教育，积极地创造条件，做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有秩序、有步骤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工商界每一个愿意接受改造和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人，都会得到国家的适当安排”。《告全国工商界书》要求每一个工商业者要坚守爱国守法的立场，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紧紧地跟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满怀信心地同全国人民一道，向着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目标前进”。

**11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6日到24日在北京召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和市委代表会议，讨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现在国家已有充分有利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会议提出了，在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企业的各

项政治、经济措施。

**11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有准备、有步骤地推动私营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社论。

**11月28日**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从21日至今日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农村私商改造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蓬勃发展给农村私商改造工作造成的新形势，总结了过去的工作，作出了对于农村私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

**11月29日** 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总社筹备委员会，发出关于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进行全面规划的通知。

**12月13日** 新华社报道：目前全国500人以上的大型私营工厂已经基本上实行了公私合营。

**12月27日** 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二”里指出：“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〇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

**12月31日** 据统计：截止本日止，全国各省、市、县共已建立2032个工商联组织，占全国行政区划省、市、县总数的88%。

## 1956年

**1月3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进一步做好对私营工商业

的改造工作》的社论。社论指出，最近一个多月以来，全国各大、中城市有很多重要的私营工业和零售商行业，都陆续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从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以来，全国各地私营工商业中的职工和资本家，都以无比的热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新的形势表明，采用和平过渡的办法，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它证明了党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1月4日** 中共中央转发青年团中央《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中青年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简报》。中央同意团中央加强对工商界青年工作的几点意见：即加强教育和培养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在各地青联组织中安排工商界青年代表人物，加强对资本家子女的教育工作，对具备青年团员和少先队员条件的吸收入团入队，在私营企业中大量建团。

**1月10日** 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召开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宣布全市35个私营工业行业的3990家工厂（包括4人到9人的小工厂）和42个私营商业行业（包括饮食和服务性行业）的13973户座商，全部被批准实行公私合营。

•北京市6万多职工、资本家和他们的家属分别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庆祝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的伟大胜利。他们还到国务院、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北京市工会联合会报喜。周恩来总理接见了西单区庆祝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报喜群众，并讲了话。

**1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改造私营工商业的伟大胜利》的社论。社论说，北京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达到了最高潮。北京是全国第一个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城市。这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带有全国意义的伟大胜利。许多私营工商业者不但和职工、店员们在一起热烈地庆贺企业的新生，并且纷纷拿出帐外的财产投入工厂、商店，用实际行动来表示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衷心拥护。

社论说，为了加快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速度，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已经决定由资本家对各企业的清产核资工作负主要责任、由资本家自填、自报的办法。社论接着指出，在合并改组过程中，必须充分注意到各企业生产和经营的特点，决不应该因并厂并店而减少生产和经营的品种，或者降低了生产和经营的质量。社论最后说，我们相信，在今后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资产阶级的改造工作中，全国的私营工商业者一定还会继续进步，和职工群众在一起，继续取得更大的成绩。

**1月13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加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工会工作的决议》。决议要求工会各级组织在合营以后，一方面要教育职工尊重资本家的行政职权，使他们能够尽职尽责；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争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由剥削者改造成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决议说，工会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时，应该吸收他们参加，并且欢迎他们参加社会主义竞赛。对于他们的创造发明、技术改进、合理化建议，要认真地处理，并且给予应得的表扬和奖励。对于他们在工作中所发生的缺点和错误，也必须给以适当的批评教育。对于少数资本家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法行为，应该进行揭露和斗争。工会组织还必须积极地协助政府进行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安排人事、实行经济改组、调整机构、改革制度等工作，来保证党和政府的各种政策的正确实施。决议又说，在企业公私合营以后，应该发动全体职工群众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以显示公私合营企业的优越性。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在政府没有颁布统一的办法以前，基本上维持现状，不能比合营前降低。决议最后说，对于原来是工人或劳动者出身的资本家，如果他们现在实际上已经没有股金，而是以自己工资收入为生活资料的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也应该接受他们加入工会的申请，按照工会章程吸收入会。

• 西安市人民委员会批准了全市最后的25个私营工业行业的

300家工厂和36个私营商业行业的3800多户座商，实行公私合营。至此，全市私营工商业已全部按行业实行了公私合营。

•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的社论。社论说：11、12两日北京市共有53800多手工业者，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加上在此以前已入社的36000多手工业者，全市手工业者已全部合作化。

**1月14日** 新华社报道：天津市私营工业50个行业5000多个工厂，已经全部实行公私合营。

**1月15日** 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接受了北京市在全国首先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喜报。北京市工商联主任委员乐松生代表北京市全体工商业者向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报喜，表达了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激心情，并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切力量。彭真市长在会上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 沈阳市私营工商业105个行业在昨今两日中，全部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 保定市私营工商业56个行业，到今日止已经全部被批准按行业实行公私合营。

**1月16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云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了有关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工作的讲话。讲话指出，批准合营之后，必须逐行逐业地进行工作，把清产核资、生产安排、企业改组、人事安排统统做好；对雇工很少或不雇工人的夫妻店应该采取经销代销的形式进行改造，以发挥它们的积极性；已合营的工厂、商店，在一个时期内不要变动它们原来的生产经营办法。

• 重庆市人民委员会批准了全市最后一批私营工商业行业实行公私合营。至此，全市私营工商业已全部按行业实行公私合营。

• 成都市人民委员会批准26694个手工业者加入和建立手工



业合作社，全市20个手工业行业已经全部合作化。同时还批准了市内47个工商业行业的17000多户私营工商户，按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全部纳入公私合营的轨道。

•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在高潮的最前面》的社论。社论说，在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首都走在高潮的最前面。北京的经验对于全国其他大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是有示范作用的。按照北京市的经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工作分三个步骤来进行：第一步是批准公私合营，生产经营照旧，从业人员一律不动；第二步依靠工人、店员和资本家的群策群力，进行清产核资；第三步把经济改组和调整商业网的工作放在最后。社论又说，北京市的经验证明，依靠职工，并且充分利用资本家的积极性，对于加快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有很大意义。

**1月17日** 南京市到今天止，私营工商业已经全部实行公私合营。

• 长春市58个私营工业行业的778家工厂和40个商业行业的2619户私营商店，也被批准全部实行公私合营。

• 南昌市完成全部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

**1月18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中共中央指出：对城市私人房屋的改造是完成城市全面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组成部分，应予以重视。改造时可基本上按照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进行，采取国家经租、公私合营等形式，逐步改造，并争取在一二年内完成这一任务。

• 合肥市的私营工商业已完成了以公私合营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改造。

• 武汉市私营工商业、私营交通运输业到今日为止，已经全部按行业实现公私合营。

**1月19日** 长沙市1900多户私营工商业全部被批准实行公私合营。

• 杭州市私营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

• 太原市私营工商业85个行业6100多户私营工业和商店，已全部实行公私合营。

• 济南市的私营工商业已全部实行公私合营。

• 兰州市私营工商业66个行业8496户，已全部实行公私合营。

• 福州市人民委员会批准了全市还没有实行公私合营的48个工商业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全市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月20日**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举行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全市尚未合营的205个行业106000多户私营工商业户全部被批准公私合营。至此，占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一半的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全部实行公私合营。

• 广州市人民委员会今天批准138个工业行业的4000多家工厂和商业、服务业、饮食业、交通运输业的132个行业的16000多户企业，全部按行业实行公私合营。

• 哈尔滨市最后一批48个私营工商业行业，今日被批准公私合营。

• 郑州市人民委员会批准最后50个私营工商业行业实行公私合营。

**1月21日** 上海市50万人今天下午举行集会，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会上通过给毛泽东主席的致敬电。电文说，全市600万人民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毛主席给我们带来了春天。我们全市的工人和农民，决心努力生产，争取提前完成国家的五年计划。我们全市的知识分子，决心提高自己思想水平和知识水平，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我们全市的工商业者都感到新生的喜悦，今后决心继续改造自己，努力争取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成为一名光荣的劳动者。

• 昆明市55个私营工商业行业，今日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

• 旅大市私营工商业今日已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

**1月22日** 天津市90多万人集会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

• 新华社报道：继杭州市以后，浙江省又有宁波、湖州、嘉兴、金华、温州、绍兴等6个城市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1月23日** 乌鲁木齐市举行大会，全市私营工商业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 湖南省到今日止又有衡阳、湘潭、株洲、邵阳、常德、益阳、津市和洪江等8个省辖市，已经完成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

• 江西省南昌、景德镇、九江、赣州、吉安、上饶、抚州等7个省辖市到今天止，私营工商业全部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

• 新华社报道：河北省又有唐山、石家庄、张家口三个城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全部批准公私合营。

**1月2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动员资本家把帐外资财投入合营企业的指示》。

• 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汕头、湛江、北海、江门和石岐等市的私营工商业，四天来先后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

**1月25日** 毛泽东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在我国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

**1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对目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应注意的问题的指示》。指示说，全行业公私合营“绝不是表示公私合营工作已完成，而只是合营工作开始”。“对企业原有的制度，包括进货办法、销货办法，管理制度、会计制度、工资制度，暂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不要改变”。“应当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营

技术中有用的东西，看成是民族遗产，把它保留下来，决不应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指示指出，对在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有降低产品质量和减少经营品种的危险，应定出纠正的办法。

• 国务院第八办公室邀请出席和列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工商界委员和代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的有关人员，座谈了国务院《关于对公私合营企业推行定息办法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价几项主要问题的规定》(草案)。会上，第八办公室副主任许涤新、孙起孟分别就上述两个文件作了扼要的说明。

• 新华社报道：黑龙江省在最近5天内，又有齐齐哈尔、佳木斯、鸡西、呼兰等20多个中小城镇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 辽宁省所有市和县城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

**1月2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价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原则的指示》。

• 新华社报道：吉林省长春、吉林、四平、辽源、通化五市，长白、白城、磐石、农安等县，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 新华社报道：辽宁省所有的市和县城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

**1月29日** 四川省泸州、内江、南充、万县、西昌、雅安、遂宁等16个市和县城的私营工商业到今日止，已全部按行业实行公私合营。

**1月30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幕。全国工商界为庆祝全国范围内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的到来，组织报喜队，向毛泽东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总工会、民主建国会中央及全国工商联报喜。报喜队由3大市23省（自治

区)的工商界代表30人及北京、上海、天津3市的工商界家属代表3人共同组成，由全国工商联李烛尘、盛丕华副主任委员为总领队。

周恩来总理在会议上做了重要的政治报告。报告就当前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发展作了详尽的分析，并指出了全国人民今后的努力方向。总理引用了毛主席的话说，目前我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总理接着说，我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也已经到来了。总理指出，我国手工业是很发达的，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并起着积极的作用。同时，我国手工业有经营分散、分布面广、行业复杂等特点，在进行合作化的时候，必须掌握手工业不同的复杂情况，正确地执行改造政策，以保存原有的优良特点和历史传统。在谈到民族工商业者所以能够这样踊跃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时，总理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政策起了决定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的繁荣滋长，私营企业内部积极要求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人店员群众的督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发展，国家所采取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案以及向他们进行的思想教育，这一切，就是帮助他们自觉地接受改造的必要因素。

在谈到公私合营以后的经济改组和企业改造工作时，总理强调指出，必须十分注意不要轻易改变原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必须善于保存原有经营方式中一切好的经验，作为历史遗产加以继承和发扬。总理又说，对于那些分散的肩挑小贩，不要急于改变他们的经营方式，因为这种经营方式对人民是方便的，也是受人民欢迎的，应该在长时期内将它保留下来。

31日政协副主席陈叔通就工商界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的情况，在政协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

• 新华社报道：山东省在最近几天，有烟台、潍坊、济宁等省辖市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1月31日 新华社报道：珠江水系各港私营轮船业共有船艚508艘，已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

**2月2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已有70%以上的市和一部分县城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公私合营，运动正继续向县城和集镇发展。

**2月8日** 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定息息率规定为年息1厘到6厘，以后在6月召开的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定为年息一律5厘)和《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价几项主要问题的规定》。会议在听了陈云副总理的说明后，通过了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决定指出：私营工商业在批准公私合营以后，一般在6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仍应按照原有的生产经营制度或习惯进行生产经营。一般仍旧由原企业主继续负责，企业原有人员原来担负的职务也一般不要变动。对广大的小商店可以批准进行公私合营，但仍保持目前的代购、代销、经销和自营的形式。对摊贩和肩挑小贩如来不及组织，可暂缓进行。

•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做好团结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工作》的社论。社论指出：逐步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一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工作。作好这一工作，除了应该组织资本家参加各种政治和时事学习外，要在工作中大胆使用他们，真正做到有职有权，并给他们以热诚的帮助和必要的鼓励。同时，关心他们的生活待遇，对他们工作和思想上的缺点和错误，也要进行必要的批评。

**2月28日**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发出《关于当前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的指示》。指示规定：(一)农村私商纳入各种改造形式后，不要轻易改变他们原有的经营管理制度和服务方式。(二)为了适应农村分散经营的特点，在改造的组织形式上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三)在目前改造中，对于私营店铺一般不作合并和迁移；对于农村分散的原有店铺，可基本上不动；对于集镇上如确实需要合并的店铺，可适当合并，但必须

首先深入了解市场需要的情况慎重地进行，绝不能大并大合。

(四)对于已经批准通过合营、合作商店(饭店)形式改造的商户，要迅速本着公平合理、实事求是、宜宽不宜严的原则做好清产核资工作。(五)批准改造只不过是改造工作的开始，还有很多工作要紧接着跟上去。(六)在改造工作中，还必须注意保持与居民购销需要相适应的商业人员的数量。对于那种不顾市场需要，硬性动员转入农业的做法，必须加以纠正。

**2月29日** 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从22日起到29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全国工商界积极分子大会致毛泽东主席的保证书和致全国工商界青年的一封信。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周恩来等接见了全体代表。会议期间，廖承志代表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和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跟祖国一道前进，为社会主义立功》的报告，对工商界青年目前思想中存在的工作安排、个人前途和摘帽子等三个问题，作了解答。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积极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为提早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

**3月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公私合营企业职工工资暂时不动的指示》。

**3月13日** 商业部第四届全国各省市厅局长会议今天结束。会议认为，为了做好私营商业的改造工作，各地必须迅速建立专业公司。会议对改造资本主义商业、小商店、小批发商、摊贩等工作制定了许多具体措施。

**3月27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关于组织各界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进行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的决定》。

**3月30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债务等问题的处理原则的指示》共9点。

**4月2日** 全国工商联邀集11个大中城市的工商联干部来会，汇报各地全行业公私合营后部分工商业者的生活困难情况。

会议认为大部分的困难，可以通过业务调整来解决；另一部分的困难，建议以举办工商业者公益金的办法对生活困难的私方进行补助。

**4月6日** 全国工商联与全国民主妇联及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联合召开的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于3月29日至4月6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以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接见了全体代表及港澳工商界妇女观光团全体人员，并摄影留念。全国民主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在会上作了《跟着祖国前进，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为题的报告。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就公私合营企业的生产改组问题、夫妻店应采取的经营方式以及人事安排和资方人员工资问题等，作了重要指示。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许涤新就公私共事问题在会上讲了话。大会通过了《告全国工商界姊妹书》。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充分发挥工商界妇女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积极作用》的社论。

**4月13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正确解决手工业集中生产和分散生产的问题》的社论。

**4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深入地改造农村私营商贩》的社论。社论认为，根据农村私商的特点和农民群众的要求，应该分别不同的性质和类型，对农村私商采取不同的改造方式。已经进行了组织改造的地区，应该进行一次深入的检查，加以合理的调整。

**4月25日** 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在谈到党和非党的关系时，毛主席指出，“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毛主席又指出，“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毛主席接着说，“希望你们抓一下统……”



战线工作，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谈到“中国和外国关系”时，毛主席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

**4月26日** 全国工商联发出《关于积极组织工商业者进行学习》的通知，要求各级工商联与有关单位进行具体协商，积极组织工商业者进行政治理论学习，使资本主义工商业者都能在今后二三年内，根据自愿，分期分批地轮流学习一次。

**4月28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对清产核资进行一次复查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私营企业全行业公私合营时，对企业财产的清理估价中偏高偏低的情况，应有重点地进行一次复查，实事求是、公平合理地处理。

•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慎重地改造城市小商店》的社论。社论指出，对于小商店的改造工作，应当根据他们经营商品的特点和他们在商品流通中的不同作用，区别对待。

**5月10日** 中共中央通知：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之后，参加工作或生产的资方人员，如确有先进技术贡献、政治上又表现较好的，可以评为先进生产者或先进工作者。

•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让农村市场进一步活跃起来》的社论。

**6月4日** 中共中央于4月28日和6月4日，先后发出关于退还工商业者在高潮中增资问题的指示和补充指示。指示说，对于工商业者在高潮中对公私合营企业的增资，不论是现金或其他实物，都应当一律退还原主。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公私合营和私营企业1955年度盈余分配

的指示。指示说，公私合营和私营企业1955年度的盈余分配，应根据“四马分肥”原则办理。其中股息一项至少占到企业盈余总额的20%。

**6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培养工商界进步核心分子》的社论。

**6月28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深入改造农村私营商业作好供销业务的报告》。报告就农村私营商业改造形式、调整商业网、不要轻易改变原有经营管理办法和私商工资待遇、改造私商思想等问题作了规定。

**6月30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1956年6月15日至30日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在会上作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李先念在报告中说，私营工商业者在解放以来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交纳税款、购买公债等方面对国家是有贡献的；在今后，他们将对国民经济进一步发挥作用。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有些私方人员还没有作适当安置，或者待遇上不够合理，这些问题都将陆续加以解决。对于小商贩的合作小组以及少数仍旧私营的小工商户，政府正在设法帮助他们改进营业状况。

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在会上作了《关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发言。他指出，到目前为止，除少数边疆地区以外，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都实行了公私合营；手工业一般地也都实现了各种不同程度的合作化；私营运输业或则实行了公私合营，或则实行了合作化。小商店和摊贩完成了几种不同形式的改造。他又指出，“企业的私有制向社会主义所有制改变，这在世界上早已出现过，但是采用这样一种和平方法使全国工商界如此兴高采烈地来接受这种改变，这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陈云接着就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讲了五个问题：一、关于一部分商店、摊贩、挑贩的生活困难和业务安排的问题；二、关于适当解决小业主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三、关于公私合营企业的定息问题和公私关系

的问题；四、关于公私合营企业中的职工和私方人员的工资福利问题；五、关于企业改组方面的问题。陈云说，公私合营企业的定息，可以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余户亏损户，不分地区，不分行业，统一规定为年息5厘。个别需要提高息率的企业，仍可以超过5厘。核定资产在2000元以下的私方人员，本人的疾病医疗和病假期间工资支付，都按本企业职工同样办理。陈云又说，我们应该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中一切有用的东西，看成是民族遗产，把它保留下来。陈云赞成由有关方面筹集一批款项，对发生困难的工商业者进行救济的办法。陈云说，一切公私合营企业中的业务改组和私方人员的安排，可以由相应的工商联、同业公会和私方人员先提意见。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达到这样的目的：公私合营的企业必须比资本主义的企业办得好，合作社的企业必须比个人经营的企业办得好。我们对民族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愿望和行动，表示热烈地欢迎。我们要认真地帮助他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陈云又说，公私合营企业、合作企业的职工和从业人员的劳动收入，不应该比社会主义改造以前降低，而应该在努力生产改善经营的基础上逐步有所增加。

陈叔通副委员长在会上发言，表示完全同意陈云副总理的发言，认为这个发言说明了政府对于工商业者的关怀和照顾。他说，定息定得很宽，各种办法考虑得很详尽，很周到，完全符合和平改造的政策，解决了目前工商业者所存在的主要问题。陈叔通指出，目前部分工商业者生活困难问题，确是需要急迫地解决，而不是一个等待从容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希望有关部门在工资待遇上从速进行调整；同时，全国工商联也在考虑生活互助金的办法，提供有关部门参考。最后陈叔通表示，今后各地民建会和工商联要紧密地主动地配合政府，积极推动私方人员加强学习，进行自我改造。我们工商业者也应该在公方代表的领导和职工群众的帮助下，积极搞好生产经营，在具体业务实践中，把自

已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李维汉副委员长在会上作了题为《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长篇发言，提出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学习和教育的问题，党和党外人士的工作关系问题，并阐释了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7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公私合营企业定息办法的若干指示，规定各地一定要在本年7月或者8月发付上半年的定息。

**7月5日** 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于7月5日至12日举行第五次会议，讨论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以后的工商联工作问题，并通过了《工商界生活互助金办法》(草案)。

**7月9日** 国务院第四、第五、第八办公室于7月6日至9日召开工商座谈会。会上贾拓夫主任就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生产改组问题，许涤新副主任就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一些问题，商业部部长曾山就有关商业方面的几个问题，对外贸易部叶季壮部长就充分发挥公私合营进出口业的积极作用问题，财政部吴波副部长就税务和公债问题，中华全国总工会栗再温书记就进一步做好团结、教育、改造私方人员的工作问题，分别作了发言。最后由陈云副总理就搞好公私关系问题作了指示。他说，公私关系，即公私双方今后在企业中如何合作共事，是今后工商业者和政府关系中的一个中心问题。陈云接着指出了搞好公私关系的一些具体措施，他认为：(一)要在中央和省、市两级，把政府业务部门和工商界的定期座谈会开好，在会上充分反映情况，交换意见，提出批评和办法。(二)在工商业务部门领导下，按行按业组织业务改进委员会，这种委员会，中央和地方都可以设立，吸收有经验、有技术的私方人员参加，以发挥他们的业务才能，推动改进工作。(三)分别召开公股、私股代表的专业会议，交流和推广做好这一工作的经验。公股代表会议由政府业务部门召集，私股代表会议开始的时候，由各地工商联召集，研究如何改善公私关系。(四)有关业务方针政策的文件应通过适当的方式，使私

方人员能看到。陈云最后说，现在生产关系已经起了根本变化，具备了许多条件，再加上积极有效的措施，逐步搞好公私关系是完全可能的。

**7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安排原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时候的私方在职人员的指示》，对安排原私营企业私方人员的范围作了进一步的规定。

**7月14日** 中共中央批转广东省委《关于召开小商小贩代表会议的报告》。报告指出，应设法解决小商小贩目前在业务和生活上的一些困难，保证他们都能获得必需的收入，以发挥他们在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政治教育。召开省市小商贩代表会议，有利于对他们的安排和进一步改造。

• 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私营企业改为国营企业以后遗留问题的若干规定》，对私营企业直接改为国营企业后所遗留的财产估价、人事安排、职工和私方人员基金福利待遇等问题作了规定。

**7月20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负责人，今天就退回在全面公私合营高潮期间私营工商业者增加的资金、对公私合营时的清产核资进行复查等两个问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负责人说，除全面公私合营高潮以前资本家的增资及资本家以原来在企业的垫款增资的以外，其他不论以现金或实物在高潮中的增资，应当一律退还。负责人接着谈到对公私合营时的清产核资进行复查的问题。他说，国务院曾于4月28日，对公私合营的清产核资进行复查工作，发出过一个指示。这个指示中说：“私营企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对企业财产的清理估价，各地大体上采取资本家自估、自报，同业互评等方式，工作一般进行得很顺利。但根据各地情况，一般有偏低现象。”负责人指出：对企业进行清理估价，应该实事求是、公平合理地处理，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有重点地进行一次复查。需要加以调整的，都应加以调整。

**7月21日** 全国工商联发出《关于组织工商业者广泛讨论“工商界生活互助金办法（草案）”的通知》。通知指出：有条件的

地区，在取得会员同意，并经当地有关部门同意后，可以根据这个草案的精神，结合当地具体情况，拟订实施方案，进行试办。根据这一通知的精神，有些地区即从1956年下半年起开始试办。

**7月24日** 商业部最近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商业厅局长会议，在今天结束。会议主要研究了各地分散经营的小商小贩在货源、资金、税负和组织起来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帮助小商贩解决货源、资金、税负等问题的办法。会议认为，在今年年底或明年一季度末，应把现有的全部小商小贩基本上组织起来。并肯定合作商店仍是一种必要的形式，应稳定下来，不要再随意变动，将来可以直接过渡为国营商店。

**7月28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私营运输业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问题的指示》。对小商贩业务安排问题；关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合作商店方面的问题；适当解决小业主方面的问题；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定息问题和公私关系问题，职工和私方人员的工资福利问题和企业改组、人事安排问题，作了指示。

**7月30日** 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召开公私合营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座谈会。会议认为，目前各省市应该首先对改组后的工厂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对合并得不好、存在着问题的，应加以解决。有的还应根据行业特点和具体情况，有计划地适当地分散。对基点厂选择不当，或联得不当的，也应作适当调整。对今后的改组应因地制宜，有规划地分期分批稳步进行。同时，对目前公私合营工厂存在的资金困难、财务、职工福利以及公私共事、企业建立民主管理委员会等问题，都作了一些规定。

**7月31日** 商业部从17日到31日召开了一次公私合营商店公股代表座谈会，讨论如何解决公私合营商店公私关系中的问题。经过讨论，对私方人员在业务经营上的作用和尊重私方人员职权等问题都取得了明确认识，并作了一些规定。

**8月1日** 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召开公私合营工厂公方代表座

谈会，讨论研究公私共事问题。会议指出：要使公私共事关系搞好，公私双方必须有明确的分工。公方代表应当首先尊重私方人员的职权，不要包办代替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支持他们的正确意见，使他们能够有职有权，守职尽责。党、团、工会应当教育职工尊重私方人员业务范围内的职务领导。对私方人员阅读文件、参加会议、建立民主管理委员会、董事会、私方人员社会活动等制度和办法，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中共中央于12月2日批转各地参考。

• 国务院第五、第八办公室批转国务院八办、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工作组《关于上海市改造私营批发商中遗留问题的报告》。指示各地方对处理私营批发商的工作进行一次检查，对原改造时安排不当、待遇低等遗留问题，迅速加以处理。

**8月6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会同劳动部、商业部和国务院四办、八办召开了全国新公私合营企业工资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的公私合营企业的工资标准和工资制度，应该逐步向同一地区、性质相同、规模相近的国营企业看齐。现行工资标准同当地同类性质的国营企业比较起来，高了的不减少，低了的根据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和实际可能，分期逐步增加。9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全国新公私合营企业工资会议的报告》。

**8月9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各地服务性质私营运输行业的意见》。指出：各地对服务性质私营运输业，如已由国营运输部门或其他国营企业或运输合作社接收、改造、安排妥当的，不再变动；如尚未进行改造的，一律由交通运输部门包下来，根据为谁服务、归谁接收的原则，归口安排改造。

**8月16日** 国务院批发文化部《关于加强对于民间和私营文化事业、企业领导管理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请示报告》。报告分别对民间职业剧团、美术画像业、游艺场、书场、影院剧场、出版业、新书出版业、古书收售业、图书租赁业、文物行业等行业的领导管

理和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方针和具体措施。

**8月25日** 新华社报道：上海现有7690多个公私合营工厂的私方人员和职工，一起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其中有1000人得到表扬和奖励，有的获得了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9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公股人员必须善于同私股人员共事》的社论。社论指出，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原来在企业中的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已经成为企业的工作人员，公私双方人员关系，变成了共事关系。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同私方人员很好地共事，团结他们，在实践中逐步改造他们，这首先是企业中公股代表的责任。社论接着指出：第一，应该在工作职务上使私方人员有职有权有责，大胆使用他们，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作出成绩；第二，企业中的重要工作，特别是有关企业改革、经济改组和生产经营中的重大问题，有关公私关系的重大问题的处理，应该认真贯彻协商办事的精神，让资方人员充分发表意见，甚至展开必要的争论；第三，为了使资方人员在分工范围内能够很好地进行工作，应该让他们批阅他们职责范围内所需要批阅的文件，参加他们职责范围内应该参加的会议；第四，要改进职工和私方人员的关系。

**9月27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指出：现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当前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实质上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陈云在会上作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他指出，在过去几年中，国家经济部门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已经成为不必要了。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也发生了一些盲目合并的现象，为此，应采取下列五



项措施：(一)改变工商企业间的加工订货办法为由工厂购进原料、销售商品的办法。对品种繁多的日用百货逐步改用选购办法，(二)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产品和商业的很大一部分必须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纠正盲目的集中生产、经营的现象；(三)必须取消市场管理办法中那些原来为了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投机活动而规定的办法。对于一部分农副产品，例如小土特产，应改变为允许各地国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供销合作社一起自由收购、自由贩运；(四)必须使价格政策有利于生产；(五)对某些生产品的国家计划管理的方法，应有所变更。工厂可以按照市场情况，自定指标，进行生产，并且根据年终的实绩来缴纳应缴的利润。最后，陈云指出，实行上述措施并不是使我国市场退回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而是在以国家市场为主干的社会主义统一的市场里，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

**10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习党外人士的长处》的社论。社论指出，虚心地、诚恳地向党外人士学习，不但是我们取得知识和经验的好方法，而且有利于搞好党和非党干部的合作共事关系，有利于发挥非党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社论接着指出，在发展经济建设的问题上，特别需要注意向这两部分人学习：第一，是向科学技术人员和专门家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第二，共产党员还应该向工商业资本家和资方人员，学习在今后仍然有用的经营管理企业的知识和经验。

**10月18日** 政协全国委员会发表对各界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学习中有关教学方针的几点说明：一、目前，各界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对于加强学习、改造思想的要求，比过去任何时候为高。因此，积极地帮助他们获得充分的参加学习的机会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参加学习与否和采取哪种方式学习，应当按照自愿原则，由各人自己决定，不要有丝毫勉强。二、各界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的学习必须贯彻自由思考、自由辩论的教学方法，使各种见解

和疑问能够自由提出和充分讨论，从而获得比较彻底的解决，不要采取那些可能引起学员的顾虑和增加他们精神负担的各种措施。三、应当区别各种不同的对象，根据学习时间的长短和学员能够接受的程度，分别决定教学的内容。

**10月24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放宽农村市场管理问题的指示》。

**10月3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公私合营企业、专业公司私方人员阅读文件、参加会议等问题的指示》，规定专业公司或合营企业中，国家干部和私方人员阅读文件和参加企业会议，在原则上应该一视同仁，并对私方人员阅读文件和参加会议的若干问题作了原则指示。

**12月10日** 全国工商联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在大会开幕前夕，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领导人邀集全联负责人和参加大会的各省市代表团的负责人，座谈如何进一步发挥工商界的积极作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毛主席说，公私合营以来，工商界有很大进步，我们之间比过去更熟悉了，更靠拢了。听说工商界学习热情很高，还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显示出很大的爱国主义，表明愿意为国家做工作。毛主席指出，工商界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有人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红色的，还是不要这样讲了。因为这中间有进步、中间、落后，有两面性，颜色不一，思想状态不一。因此，还要学习。

毛主席说，在农业合作化和公私合营以后，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基本上没有了。主要的阶级矛盾已经解决了。对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子弟，我们要教育他们，信任他们。入学、入团、入党、助学金、带红领巾等问题，要一视同仁，看品质，不看家庭出身。毛主席又说，我们的政府，是个商量办事的政府，我们有话尽可讲，不会借故整人的。

接着，毛主席谈到大中小户问题。毛主席说，大中小户应该分阶层。占工商界80——90%的小户，可以不划入资产阶级范围

内，就叫他们小资产阶级；资方代理人也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叫上层小资产阶级。关于定息的时间问题，毛主席说，我们以七年为期——今年、明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共计七年。还可以拖一个尾巴，拖到第三个五年计划。资本家所得可以重新投资开厂。

毛主席接着指出，革命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目的在于发展生产。中国要有几十年功夫，才能在生产上、科学上、文化上翻身。所以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工商联也适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在陈叔通主委讲话后，毛主席接着说，全行业公私合营，谁也没料到这样快。现在国有化，就不要这样快了，快了对国家民族都不利。

12日和15日，国务院薄一波副总理和陈云副总理分别向大会作了报告。薄一波说，我国资产阶级加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从业人员和家属约800万人，这个阶级有一定的生产知识和能力，有文化，有技术，又掌握着生产工具。我们的国家是个落后的国家，要发展生产，就要和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最后采取定息的办法。薄一波说，赎买政策是实事求是的政策，至少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会取消定息。

在谈到中小资本家愿意放弃定息，要求摘帽子的问题时，薄一波指出，中小资本家本来资本很小，而且许多人参加劳动，可以不称为资产阶级，改称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们对他这番话，报以热烈的掌声）。薄一波接着说，过早地取消定息，会影响部分资本家的生活，于人的改造不利。我们要让资本家安心接受改造，成为有益于社会主义的新人，和平改造政策有实际意义，而且有国际意义。

在谈到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出现地下工厂的问题时，薄一波说，这证明我们生产落后，供不应求，人民有需要。拿资本主义生产来补充社会主义的不足，没有坏处。

在谈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时，薄副总理指出，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是两个“万岁”，工商联也是“万岁”。现在阶级还未消灭，即使阶级消灭了，思想残余还将长期存在。工商联有很多事情要做。第一步帮助党和政府实现了公私合营；第二步要领导工商业者进行个人思想改造。这工作还是长期的。

薄一波最后号召工商业者改善经营管理，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

陈云副总理在报告中就定息问题，小型工商业者的问题，工厂管理委员会问题，公私共事问题和市场问题，作了政策性说明。

在大会开幕式上陈叔通主委作了《全国工商业者继续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充分发挥积极作用，为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的报告。

大会通过了《关于全国工商业者进一步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继续加强自我改造，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的决议》。决议提出了工商业者在积极接受改造方面所应共同遵守的五项基本准则。

会议于12月23日闭幕，由李烛尘副主委致闭幕词。

12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怎样对待手工业个体户？》的社论。

## 1957年

1月30日 《工商界生活互助金暂行方案》已报请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同意，全国工商联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联，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逐步试行。

2月27日 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论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说：“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在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說來，除了對抗性的一面以外，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面。”在我們國家里，“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存在着剝削和被剝削的矛盾，這本來是對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國的具體條件下，這兩個階級的對抗性的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這個矛盾。”

毛主席說：“私營工商業改變為公私合營企業也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這件事所以做得這樣迅速和順利，是跟我們把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當做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密切相關的。”毛主席指出，“現在有些人說：資本家已經改造得和工人差不多了，用不着再改造了”，“有人說，中國資產階級現在已經沒有兩面性了，只有一面性。”這不是事實。“一方面，資產階級分子已經成為公私合營企業中的管理人員，正處在由剝削者變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的轉變過程中；另一方面，他們現在還在公私合營企業中拿定息，這就是說，他們的剝削根子還沒有脫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資產階級的帽子，也還需要一個相當的時間繼續進行思想改造。”毛主席說：“在過去幾年中，大多數工商業者都是願意學習的，並且有了顯著的進步。工商業者的徹底改造必須是在工作中間，他們應當在企業內同職工一起勞動，把企業作為自我改造的基地。但是經過學習改變自己的某些舊觀點，也是重要的。”“那種認為不需要學習，不需要改造的意見，並不能代表工商業者中大多數人的意見”。毛主席說：“在我們，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

激烈的。”“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毛主席说：“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毛主席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接着毛主席提出了如何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毛主席说：“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毛主席说：这个口号，“也是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毛主席说：“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当然，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评，也只有在合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2月28日 商业部副部长姚依林在全国商业厅局长会议上说，已实行定息的公私合营商业今年的中心任务，是逐步建立企业的民主管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有计划地总结私营商业经营管理的历史经验。

**3月5日** 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食品工业部联合召开全国公私合营工业改造座谈会，讨论了继续以企业为基地，加强对私方人员的团结、教育和改造问题。

**3月12日**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一共讲了八点，主要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党内整风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问题。

**3月22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工商业者加入工会问题函复全国工商联说：“享有定股定息资方人员，无论是在公私合营企业或合作社的工厂内工作，均暂不能加入工会。享有定息的小商小贩成为供销社职工后要求入会的，目前也暂缓发展他们加入工会。”

• 国务院第四、第五和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工商座谈会。工商界人士着重就公私合营企业的经营管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工商业者的工作安排、生活福利、学习以及公私共事关系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分别就工商界人士提出的有关问题作了解答。

**3月29日** 全国工商联发出通知，要求八大市及其他重要省（区）辖市工商联（具体地区由省、自治区工商联决定），在上半年内分别邀集主要行业的合营企业中有代表性的私方人员及在国营企业或政府部门工作的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会，反映关于公私共事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和私方人员的思想动态，交流关于搞好公私共事关系的经验，并提出如何改善关系的建议和办法。

**4月2日** 全国工商联发出关于针对目前工商界思想动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说，目前工商界中存在一些不健康的现象：第一，工作缺乏热情，呈现松劲情绪；第二，骄傲自满，忽视改造；第三，争名夺利，追求个人利欲，闹私私不团结；第四，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等。指示说，以上这些错误与消极行为虽然从总的来看，目前并不是主要方面，但应该对其严重性有足够认识。为了及时帮助工商业者澄清各种错误思想，克服消极行为，更好地发挥积极性，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工

商业者的宣传教育工作。

**4月17日** 全国工商联转发国务院《关于修改私方人员病假期间工资支付办法的通知》。通知指出：“计算私方人员病假期间工资时，可根据生活困难情况或病假的时间长短，按照本人工资发给50%至70%，不必按工龄和非工会会员的标准计算。”通知规定此项办法自本年4月起实行。

**4月27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说，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

**5月12日** 全国工商联邀请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工商联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等，座谈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陈叔通说明座谈的议题和要求以后，到会委员一致认为，工商联应当努力消除工商业者的顾虑，鼓励他们大胆地放，大胆地鸣。

**5月15日**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工商界座谈会，邀请工商界代表人士帮助党整风。参加座谈的有大、中、小各个类型企业的各类工商业者，有民建、工商联地方组织的负责干部和两会中央的常务委员。截至6月8日止，座谈会共举行了25次，有108人发言。发言的大多对于公私合营企业中存在的公私共事关系问题，提出了批评和意见。

**6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派分子的斗争就在全国知识界、工商界中普遍展开。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社会主义制度猖狂进攻的反击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由于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估计的错误，“反右派斗争被



严重地扩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7月2日** 全国工商联与民建中常会成立两会临时工作委员会，下设联合办公机构，推动各地组织开展反右派斗争。

**8月5日** 新华社记者报道：全国工商界的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的群众运动，在各地党政部门领导下，已经在全国8大城市和24个省、自治区的100多个中小城市展开。

**8月23日** 国务院批准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公私合营企业清产核资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一）对老合营企业不论清估时是否偏紧偏松，提取公积金是否过大，其清估结果不应再作变动。（二）对未用准备金的处理，可以转作原企业私方的股本。（三）对私方无力偿还的对公欠款，有关部门应根据“宽了”精神予以减免。（四）企业经营时的待处理财产，除了已明确一时无法处理的财产，如冻结外汇等外，有关部门应积极加以处理、了结。

**8月26日**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李维汉发表谈话，要求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李维汉认为，下列问题可以作为整风运动中进行辩论的中心题目：第一，社会主义优越性问题；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立场的反动性问题；第三，当前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第四，继续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第五，接受共产党领导问题；第六，同工人的关系问题；第七，公私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制度问题；等等。李维汉说，工商业者只要积极地参加这个运动，坚决地批判和打垮右派，认真地改造自己的政治立场，就一定能够在政治上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平平稳稳地向着改造成为劳动者的目标前进。

**8月27日**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以《迎接社会主义改造新高潮》为题，发表联合谈话。谈话指出，李维汉部长关于在工商界开展反右派斗争和全面整风运动指示，对于推动鼓励全国工商业者积极参加运动，进一步改造自己，有重大的作用。

• 国务院发出《关于公私合营企业董事会、业务（生产）改进委员会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一）除某些有特别需要必须成立行业董事会的行业以外，一般行业不必普遍成立行业董事会；（二）工业系统已在专业公司内成立了技术人员和生产小组的，可以在小组基础上逐步扩展成为生产改进委员会，集中一些技术人员（包括有技术的资本家）研究与解决行业内的有关生产、技术问题；（三）商业系统按专业公司成立业务改进委员会的办法正在试行，可以由商业部将试点经验总结以后，再逐步推广；（四）不成立行业董事会的行业，董事会的任务，可以由同业公会和业务（生产）改进委员会分别担当；（五）原来准备安排为行业董事会的董事长、董事，由于没有成立行业董事会而没有安排的行业代表人物，可以在整风、反右斗争告一段落以后，根据具体情况和他们在运动中的表现另做适当安排；（六）行业董事会和业务（生产）改进委员会专职成员的工薪、办公费等由专业公司或者主管部门开支；（七）有关成立业务（生产）改进委员会的具体问题，可以由各主管部另作具体部署。

**9月17日** 李维汉部长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招待出席各民主党派全国整风工作会议和民建中央委员会、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代表的茶话会上，作《各民主党派需要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的讲话。

**9月21日** 全国工商联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9月9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联席会议，黄炎培代表主席团致开幕词，陈叔通代表两会常委会向大会作了报告。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关于批准陈叔通主任委员代表两会常务委员会所作的在工商界开展全面整风运动的报告的决议》。

**9月23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八届三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上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

**10月4日** 全国工商联与全国总工会发出联合通知，为关于

工会与工商业联合会加强联系配合，共同协助政府做好对私改造工作问题提出了五点意见，请各地工会和工商联组织参照执行：  
（一）工会与工商联各级组织应层层挂钩，上下左右贯通起来；  
（二）市（县）一级的工会和工商联组织，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可以建立定期的或不定期的联系制度；  
（三）各级工会和工商联如工作上需要，可以共同举行专门问题的座谈会或会议，以便就问题交换意见，作出决定。两会组织个别召开有关对私改造的工作会议时，可以邀请对方派员列席；  
（四）两会基层组织对企业中有关职工与工商业者共同性的问题，应在企业党组织领导下，共同协商解决；  
（五）有条件的地区，两会组织可以联合举办一些文娱活动。

**10月9日** 毛主席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上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讲话，违反了党的“八大”关于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

## 1958年

**2月9日** 民建中常会、全国工商联常委会举行扩大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两会中央《关于推动一般整风运动的决定》。

**2月10日**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黄炎培作了题为《认识大时代，改造做新人，大家鼓起干劲，来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言，陈叔通作了题为《工商业者必须痛下决心改造自己》的发言。许多工商界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表示要接受改造，改变立场，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2月27日** 李维汉部长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座谈会上指出：“要通过整风掀起一个自我改造的运动，来一个自我改造的大竞赛，在立场上和思想上来一个大跃进。”

**3月4日**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最近一次的双周座谈会上，经过讨论协商，一致通过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在各民主党派内部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加紧进行自我改造。

**3月6日** 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举行座谈会。李维汉部长和其他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座谈了关于促进工商界自我改造“大跃进”问题。李维汉要求负责领导的人做“大跃进”的促进派。

**3月14日** 民建中常会、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出《关于推动全国工商业者鼓起革命干劲进一步开展自我改造大跃进运动》的通函。

**3月16日**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召开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大会通过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

**3月25日** 从3月中旬起，在天津市工商界的带动下，全国各地掀起了一个工商界向党交心的自我改造促进运动。以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这些交心材料成为工商界受迫害的罪证。

**4月14日** 民建中常委、全国工商联整风工作委员会，于4月14日至17日，在天津举行了工商界自我改造大跃进交流经验现场会议。通过了七省（区）、八市工商业者自我改造竞赛协议书，并向各省、自治区、市的工商界提出竞赛倡议。

**5月5日** 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说，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的整风运动，应当采取积极态度，帮助他们实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在他们中间深入整风的结果，将使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巩固起来，在国家生活中继续起应有的作用，而各民主党派也就能够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会议一致同意根据毛主席的建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

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6月6日** 北京市工商界8000多人，举行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破资立社”大会。大会号召全市工商业者鼓足干劲，加速自我改造，在前阶段向党交心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自我批判，订出自我改造规划。

**7月22日** 民建中常会、全国工商联整风工作委员会，自7月22日至8月16日，在上海召开全国工商界自我改造经验汇报会议。会议签订了《工商界坚决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加速自我改造竞赛协议书》。

上海汇报会议以后，两会整风运动宣告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在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中，全国工商界被划为右派的共达2.4万多人，其中有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46人。

**12月25日** 全国工商联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与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联席（扩大）会议，从1958年12月25日至1959年1月22日在北京召开。会议自始至终贯彻和风细雨、细致说理的精神。会议决议：为了推动、帮助两会成员加强改造，积极服务，必须贯彻以政治思想改造为统帅，以劳动和实践为基础，以企业或者工作岗位为基地，并把这三者密切结合起来的方针，在党的领导下，尽心竭力地、细致深入地帮助和教育两会成员在劳动和实践的基础上破资产阶级立场和思想，立工人阶级立场和思想，积极地进行社会主义的自我改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1959年

**9月1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凡是已经改恶从善，并且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出确实是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对于这些人，今后不再当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待，即摘掉他们的右派的帽子。”

12月16日 民建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工商联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预备会在北京开幕，1960年2月18日结束。2月19日正式会议开幕，2月21日闭幕。正式会议由黄炎培主任委员致开幕词，陈叔通主任委员宣读了《全国工商业者，坚决响应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伟大号召，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提高自觉，鼓足干劲，更好地投入增产节约运动，更好地进行政治思想改造，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今后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总的要求是：坚持劳动实践，继续进行政治立场和思想的改造，以逐步改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光荣的劳动者。

大会作出决议，要求大会代表同全国工商业者一道，坚决响应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伟大号召，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提高自觉，鼓足干劲，更好地投入增产节约运动，更好地进行政治思想改造，在大跃进中贡献力量，做出成绩。

大会代表全国工商业者向毛主席发出致敬电，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表达了无限感激的心情，表示一定要积极投入大跃进的行列，尽心竭力地为祖国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坚持不懈地进行政治立场和思想的根本改造，逐步向光荣的劳动者过渡。

会议期间，刘少奇副主席接见了大会的常务主席，就工商界存在的几个具体问题，如定息、高薪、年老体弱退职退休、病假工资等问题，阐明了党的政策，说明了党对工商业者负责到底、照顾到底的方针。刘副主席着重地教导工商界要一心一意奔改造和服务的一面，奔社会主义的一面，一边倒，顾一头，不要三心二意、为个人利益分心。刘副主席还指示民建、工商联两会包下一头来，协助党做好推动和帮助工商界进行政治思想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工作。

这次大会是在党的领导下召开的一次团结的大会，一次自我

教育的大会，一次动员工商界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会。会议根据李维汉部长的指示，“采取和风细雨、神仙会的方法，发扬民主，让大家讲话，讲老实话，讲心里话，坚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引导大家自由交谈、讨论和辩论，达到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目的。”（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860页）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神仙会”成了一个重大罪过，不少参加过“神仙会”的人遭受迫害。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神仙会”才恢复名誉。

## 1960年

**3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工商业者应当下决心‘顾一头’、‘一边倒’》的社论。社论指出：“顾一头”、“一边倒”，这是当前工商业者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问题。我们希望工商业者作出明智的抉择，这就是一心顾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这一头，倒向社会主义这一边。

**8月14日** 李维汉部长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为六个民主党派的中央全会扩大会议所举行的报告会上，作了题为《学习毛主席著作，逐步改造世界观》的长篇讲话。他说，近几年来，工商界大有进步，知识界大有进步，各民主党派大有进步。但是，在大有进步中，“还有问题”。第一，形势迅速发展，“跟不上”已成为普遍的呼声；第二，在政治立场改造方面，多数人还有不同程度的问题，少数人还没有改变；第三，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在很多人身上很少改变；第四，革命攻到意识形态的“尖端”上来了，要求全面改变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改变世界观。

**9月26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推动和组织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界、知识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议》。

**12月28日** 民建中常会、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会第四次联席会议(扩大),从今日开始至1961年1月17日在西安市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工商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对于当前国内外形势和“三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一种“左”倾错误)的认识,进一步调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会议最后通过了1961年两会共同工作要点,规定:继续贯彻党的鼓舞士气、增强信心、埋头苦干、自力更生、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广泛深入地传达党对工商界的政策,对两会成员和家属进一步加强“三面红旗”的教育和“顾一头、一边倒”的教育,推动和带动他们积极服务,加强世界观的改造。

## 1961年

**1月14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在发表的《公报》中指出,在全国城乡居民中,占人口90%以上的绝大多数是拥护党和人民政府的路线和政策的,他们知道党和政府将坚定地领导他们渡过目前的暂时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并且积极地热情地帮助党和政府这样做。但是也有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企图利用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和某些基层工作中的缺点,进行破坏活动。

**1月17日** 民建中常会、全国工商联两会常委第四次联席会议,原则通过了1961年共同工作要点,着重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政治理论学习。

**3月27日** 民建中常会、全国工商联,自今日起到4月22日止,召开了有八大市和江苏、浙江两省参加的工作座谈会,研究有关党对工商业者实行“包一头”的情况和工商业者“顾一头”方



面存在的问题。座谈内容，比较集中地讨论了有关安排使用和公私共事关系问题，病假工资和疾病医疗待遇问题，年老体弱多病问题，1962年后的定息问题以及最近工商界思想动态和“顾一头”的情况及问题。

## 1962年

**1月30日** 毛泽东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又说：“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人口的95%以上。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

**3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3月27日到4月16日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次会议，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到工商业者时，周总理说，要继续团结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帮助他们进一步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并且把他们的定息从1963年延长三年，到时再议。

**4月18日** 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作题为《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的讲话。周总理指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存在的各个阶级、阶层的状况比较复杂，不能设想得太容易。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以为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好象社会主义改造很快就能完成。现在看来这些想法是不恰当的。社会主义改造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因为不仅是经济，而且各种旧的政治影响和习惯

势力，对我们仍有影响。思想作风上的改造需要更长时期。周总理又说：工商联的责任也加重了。一方面，我们对工商业者的定息，延长三年，到时再议。另一方面，工商业者也面临着调整的情况。工商业者里面有民族资产阶级、小业主、上层小资产阶级，也有小商小贩，其中一部分要回到集体经营或者是个体经营的商业中去，一部分还保留在国营的企业、事业单位里面，也有一部分年老的可以实行退休制度。工商联可以协助政府来进行这些人员的调查安置工作。对工商业者的安置要适当，例如有些人不适合到农村去，家又在城市，就不能勉强，应该在城市里面安置。在这一方面，问题比较多。工商业者中间也有一些生活困难的，工商联可以从定息中抽取一定的比例作互助金，如果不够，政府也可以协助。我跟陈叔老谈过这个问题，要在这方面研究一些具体的办法。工商联协助政府在工商业者的改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生活安置等各方面做工作，更要抓紧，不要放松，事情会更多，不会更少（原文发表于1980年《红旗》杂志第二十期）。

**4月19日** 民建会第二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全国工商联第三届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从今日起到26日，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两会1962年总的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工商界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贯彻执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和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决议。

**6月6日**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和民建会、全国工商联联合组成精简专门小组。小组的任务是在国务院精简小组领导下，向党中央、国务院就精简工作中有关工商业者的政策执行情况和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及时反映，提出意见和建议。

**8月14日** 全国工商联发出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联在贯彻《国务院关于在精简工作中妥善安置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若干具体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处理资产阶级工商业

者退休顾问的补充规定》中，做好工商界生活互助金工作，对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因等候安置、退休、请长假和家属被精简回家而生活确有困难的，进行适当补助。

**9月24日** 中国共产党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主席还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主席的讲话使工商界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农村“四清”，城市“五反”运动先后展开，延续到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运动。

**11月14日** 全国工商联转发了国务院批转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关于国营商业、公私合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的小商小贩下放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意见的报告》和《关于妥善安置国营商业、公私合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中老弱残的小商小贩的意见的报告》，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联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做好这方面工作。

**12月24日** 民建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全国工商联第三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自今日起到1963年1月20日在北京举行联席会议。这次会议是为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而召开的。

黄炎培主任委员致开幕词，陈叔通主委作了《关于在工商界中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推动成员和家属鼓足干劲、努力增产节约》的报告。会议决定，号召全体成员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时事政策，提高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加强自我改造，

逐渐改造世界观，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辉旗帜，积极执行政府的政策方针，努力增产节约，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新发展，为争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决议还表示，坚决拥护我国对外政策总路线，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以及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

## 1963年

**7月16日** 民建中常委、全国工商联从今日起至8月23日止，召开了宣教工作会议。会议在“左”倾思想指导下，作出了工商界出现了“大反复”的错误论断，决定要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工商界更大规模地、更加深入地开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11月17日** 全国政协三届四次会议于11月17日开幕，于12月4日闭幕。会议决定，在各界人士中继续广泛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把帮助各界人士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作为一项中心任务。

## 1964年

**4月20日** 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从今日起至4月23日止，召开了“三个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经验汇报会。会议以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理论为依据，开展了“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

**12月21日** 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和平改造民族资产阶级

的方针，并说：“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一定要消灭的，但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人，只要愿意进行改造，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是有光明前途的。”

## 1965年

**1月5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坚决拥护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号召一切爱国的、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积极投入运动，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过好社会主义关。

**10月1日** 《人民日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发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的社论。社论以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理论为依据，强调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把革命进行到底。

## 1966年

**3月6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延长定息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共中央决定，从1966年起再把定息延长一些时间，定息息率不变。延长多少时间，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决定。

**5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同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这就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动乱时期。

从8月下旬起，民建中常会和全国工商联两会机关接连受到

红卫兵冲击。根据中央统战部的决定，两会于8月24日起停止办公。

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批领导干部、爱国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折磨，工商界更不例外。尽管如此，绝大多数工商业者并没有动摇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信心。

## 1976年

**9月9日** 毛泽东主席逝世。

**10月6日**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被隔离审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

## 1977年

**2月18日** 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春节联欢会，热烈庆祝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以后迎来的第一个新春。这是经过十年浩劫后，民主党派、工商联恢复活动的开始。

**8月12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前召开，从今日到18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华国锋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阐明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并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胜利结束。

**12月24日** 中央统战部举行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常委座谈会。会上乌兰夫部长讲了话，童小鹏副部长宣布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临时领导小组名单。

**12月27日** 政协全国委员会第四届常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叶剑英副主席在讲话中说，我国各民主党派和许多爱国人士，早就同我们党有了长期合作的历史，对于我国民主革命

的胜利，是作出了贡献的。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总的看来，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在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中，大多数是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逐步前进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顽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是极少数。粉碎“四人帮”以来，各方面朋友的表现也是好的。接着叶副主席重申了中国共产党要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 1978年

**1月22日** 中共中央统战部于今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大型座谈会，重申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一贯政策。乌兰夫部长在座谈会上讲话中指出：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统战工作和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罪行必须清算。他们在爱国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人们中制造的假案必须平反、错案必须纠正、冤案必须昭雪。接着乌兰夫就进一步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八个政策问题作了说明：一、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银行存款、公债和其他财物被查抄。中央规定，被查抄的存款，不论金额大小，全部解冻，一次发还，并且按照银行的规定，发给利息。本人去世的，退还给配偶。至于其他财物，也要抓紧落实、退还。二、“文化大革命”初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普遍被扣减了高薪，或者只发生活费。中央规定，被扣减了薪金的，一般应当恢复原薪，并且补发过去被扣减的部分。三、“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大中城市的部分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私人房屋被占用。中央规定，这种私人房屋应当仍然属于他们个人所有，被占用了的私房，应当归还。四、公私合营高潮以后，许多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在企业中安排担任了各级行政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开始，不加区别地把绝大多数人下放车间或门市部从事体力劳动，使相当一部分具有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才干的人，用非所学、用非所

长，不能发挥积极作用，是不妥当的。这同当前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也不适应。统战部门要多多听取、认真研究工商界朋友们的意见，请民建、工商联推荐各方面的人材。中央规定，对他们的工作要进行适当调整，对确有技术专长的，应当授予相当的技术职称，如工程师、技师或顾问等，以用其所长；有业务管理经验的，可以安排适当的业务工作；不宜继续从事重劳动的，可以适当调整岗位和工种，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五、应当组织在职的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和职工一起参加劳动竞赛和评比，对于生产劳动和工作表现好的，应当实事求是地给以表扬和物质奖励；对政治上表现好、有突出贡献的，可以评为先进生产者或先进工作者。六、关于他们的生活福利待遇等问题。中央规定，对他们病假期间的工资，一律根据生活困难情况或病假期间长短，按照本人的工资发给50%至70%，已经按照职工待遇办理的，不变。医疗待遇，则参照所在企业单位的职工办法办理。关于非因公死亡待遇问题，现在规定，都参照所有单位职工的待遇办理。以上这两个问题，国务院将会发出相应的通知。至于退休问题，应当继续执行1962年国务院的规定，“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地方没有按此规定办理，现在要改正过来，被扣减掉的退休费，应当补发。七、按国家的政策，定息到1966年9月已经结束。现在有些资产阶级工商业者要求领取在此以前应领而未领的定息，行不行呢？中央认为，可以。八、对于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党中央重申：要坚持重在本人表现，不能唯成份论。在入党、入团、开学、招工等问题上，都不应歧视他们。这八个问题，现在已经下达执行。各级统战部门，应当协同各有关部门，把这项工作做好。同时，也希望，民建会、工商联组织的负责人，象过去一样，协助做好这项工作。一方面，在落实政策中，发现有什么问题，工商业者的思想情况怎样，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向我们如实反映。另一方面，协同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进行教育工作。



**2月2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同时举行。工商界的代表和委员分别参加了这两个会议。

**4月5日** 中共中央（1978）11号文件批准中央统战部、公安部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同年9月17日，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转发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指出：对于过去错划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这个文件下达以后，绝大部分被错划了的右派分子得到了改正。198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1980）60号文件，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这个通知下达以后，又有一部分被错划的上层右派人士得到了改正。工商界中被错划的人，经过两次改正以后，已全部恢复了名誉，并落实了政策。反右扩大化的错误，终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得到了纠正。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促进和发展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产生了积极作用。

**12月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今日到2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前的“左”倾错误，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决策上来。

## 1979年

**3月16日**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政协礼堂召开统战系统干部大会，宣布“中共中央批准为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帽子”，为全国统战系统平反、恢复名誉。

**6月15日** 政协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今日开幕，7月

2日闭幕。邓小平主席在开幕词中说，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到国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13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6月17日**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今日开幕。在会上华国锋同志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说，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已经消灭。资本家阶级在我国的历史条件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的一部分，我国政府对他们采取了正确的赎买政策，顺利地改造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也已经不再存在。经过近30年的斗争和教育，这些阶级中间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翁，是社会主义的工人，社会主义的农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

**8月15日** 中共中央统战部于8月15日到9月3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乌兰夫部长作了总结讲话。他说，在过去的30年中，统一战线发挥了巨大的积极的作用。在我国进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和争取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中，担负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说，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联盟。它包括广大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包括一切热爱祖国的人们。只要爱国、赞成统一祖国的人们，我们都要团结。我们还要继续深入地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侨务政策，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对特赦和宽大释放人员的政策。同时，也应当认真做好右派摘帽和改正的安置工作。

**9月26日** 中共中央（1979）95号文件，对落实工商业者的政策作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和补充。

**10月11日** 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22日闭幕。这是中断了十多年以后，我国进入了以实现四化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盛会。胡厥文致开幕词，胡子昂作了题为《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工作报告。报告叙述了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四人帮”疯狂迫害的经过后说，就在这种处境下，我们两会成员也没有动摇对党的信任，有些同志还做出了成绩。经过长时期的教育和实践，两会成员在世界观的改造上又有了很大进步。最近各地两会同志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各自岗位上又取得了更多新的成就。最后，他提出了两会今后六点主要任务。大会作出《政治决议》，要求两会各级组织和成员，一定要进一步调动一切直接、间接的积极因素，全力以赴地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充分运用我们长期从事工商业、做经济工作中积累起来的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经验，以及其他任何一技之长、一得之见，在四化建设，特别是在当前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贯彻中，提意见，献计策，见行动，出成果。要充分利用我们的特殊有利条件，遵照党的政策，加强同在港澳的和国外的亲属、故旧的联系，努力在发展国际友好关系，促进贸易往来，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利用国外资金等方面多做工作，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作出更多贡献。决议又说，我们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中有广泛的联系和影响，我们一定要遵照我国政府公布的对台湾回归祖国的完全公平合理的方针，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进一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以利于台湾骨肉同胞、包括台湾工商界朋友，尽早地回到祖国的怀抱中来！

**10月19日** 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招待会，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在招待会上讲了话。他说，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我国开始向

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的重要时刻召开的，是一次历史性的盛会。他指出，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是我国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我们党有过长期合作、共同战斗的历史，是我们党的亲密朋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里，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被迫停止活动，很多成员遭到了残酷迫害，绝大多数人经受住了这场严峻的政治考验，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这是难能可贵的。现在，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不容忽视的作用。我们相信，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一定能够在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扬民主，加强法制，进行自我教育和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我们热诚地希望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国家大事，热心社会主义事业，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勇敢地、负责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批评，做我们党的诤友，共同把国家事情办好。

**10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新时期民主党派的历史使命》的社论。社论指出，党中央已经恢复了民主协商的优良传统，为全党作出了表率。我们一定要严格尊重和保障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面前的平等。同时，我们热烈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解放思想，打消顾虑，以国家主人翁的负责态度，在有关四化建设和一切国家事务上，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批评和建议，勇于代表成员的合法利益和合理要求，充分发挥互相监督的作用，同心协力为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早日实现四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11月15日** 中共中央中发(1979)84号文件，规定把原属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即小商、小贩、小业主，从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并明确指出了区别的范围、标准，区别工作的原则，区别出来的劳动者的各项待遇以及区别工作的组织领导。

## 1980年

**1月1日** 邓小平主席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指出，保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做好四件事：第一，一定要坚持党的政治路线。第二，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

**8月28日** 邓小平主席在五届政协第三次会议上致开幕词。他说，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需要用极大的努力，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重要的是：在经济上，要积极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政治上，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组织上，要大量发现、培养和提拔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人才，广开才路，人尽其才。邓小平说，在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它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了。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团结，使我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践中，做出积极的贡献。

**9月14日** 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四届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联席会议，于今日至16日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在两会工作中如何发挥广开才路作用的问题，作出了《关于认真贯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的精神，进一步活跃和开展两会工作的决议》和《关于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对原工商业者的安排使用工作的决议》。这个《决议》曾由中央统战部、组织部转发全国党政有关部门参考。

12月18日 民建中常会、全国工商联发出联合通知，召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会议于1981年1月18日到1月29日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各省、市、自治区两会成员280多人，其中有62%以上的人是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和其他荣誉称号的获得者。胡厥文主委在开幕词中说，四化建设需要我们，我们更需要四化建设。我们大多数人的年龄已经不小了，报国之日苦短，报国之心倍切，当前正是我们为四化出力效劳的时刻。

这次会议，是在党中央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时刻举行的。在会议召开的前夕，《人民日报》发表了《政治安定是经济调整的保证》的社论。

参加会议成员，除交流为四化建设服务的先进经验外，主要围绕政治安定和经济调整这个中心进行认真的讨论，并提供了积极的建议。

